

回忆朱德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回忆朱德

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

徐向前

12月1日，是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我国各族人民，深切怀念这位德高望重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国务活动家，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党和国家、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的一生。

从青年时代起，朱德同志就怀着从戎救国的志向，考入云南讲武堂，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了革命军事生涯。继后历任滇军的排、连、营、团、旅长，参加过辛亥革命昆明起义，讨袁护国之役和护法战争，战功显赫，威震川滇，成为爱国名将。五四运动前后，朱德同志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异常失望，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为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毅然弃官出走，在柏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朱德同志的名字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

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又高举革命红旗，率部发动湘南起义，与毛泽东同志会师湘赣边，共同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是我们的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一起，领导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驱逐日寇，还我中华；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推翻蒋家王朝，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时期，朱德同志作为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军队的建设发展，为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为粉碎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为维护我国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百年来，革命巨浪一个接着一个，中国大地天翻地覆。朱德同志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阶段，始终坚贞不渝，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大浪淘沙卷万里，潮头难留几许人！他就是这“几许人”中的一个。在茫茫雾海中，朱德同志不仅具有透视航向的超凡目光，而且具有破浪前进的巨大勇气。因此，他不像那些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今天是时代的骄子，明天便成为历史的渣滓。他的一生，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锐意革旧立新，始终勇往直前。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重要特色和最光辉之点所在。

自从南昌起义、狄收起义和广州暴动发生，我军进入初创时期：起，朱德同志的名字，遐迹皆闻，举世所瞩。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心里由衷地敬佩和高兴。此后的岁月里，一直在他领导下战斗和工作，更增进了对他的了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回首往事，一幕幕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促膝谈心，剪烛话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朱德同志既是全党全军爱戴的军事统帅，又是我和许多同志的良师益友。他的伟大革命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朱德同志是大山的儿子，具有山岩般坚强、刚毅的性格，热爱人民，憎恨敌人，胜不骄，败不馁，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他出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那是个险峰交错的山区，县

城就坐落在高山上。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向外线进攻，解放仪陇县城，我跟部队到过那里。朱德同志的少年时代，是在仪陇度过的。穷困的家境，坎坷的生活，山区劳动人民勤劳、朴实、勇敢、顽强的品质，培养了他渴求光明、奋发图强、刚毅果敢、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和革命理想、革命事业结合起来，就放射出夺目光彩，成为他蹈险履难、革命到底的动力。

青年时代的朱德同志，曾在一无盘缠、二无同伴的情况下，只身徒步数千里，费时两个多月，从四川去昆明报考。其顽强意志，感人至深。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潮汕一带被敌击败后，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屹立于危难之间，勇挑重担，力挽狂澜，与陈毅同志率领一支仅剩七百余人的孤军，英勇苦斗，转战千里，保存了革命力量。传播了革命火种。其大智大勇，实属难得。长征途中，他年已半百，但仍像年轻人一样，生龙活虎，爬雪山，过草地，吃糌粑、青稞、野菜、树皮、草根，行军战斗之余，还和指战员一起打篮球，浑身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钢铁般的力量。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里，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林彪、“四人帮”时期，他无法扭转局势，积愤在胸，特地书写“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自励励人，他未能活到“四人帮”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那天，但坚信那天必会到来，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他的一生，经历了数不尽的苦难、风暴、曲折、艰险，也赢得了巨大的胜利和荣誉。他不因挫折而灰心，不因胜利而骄傲，总是那样沉着、从容、坚定不移、举重若轻，领导我们闯过一道道难关，夺取一个个胜利，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他的坚毅性格和伟大形象，常使我想起毛主席的词句：“山，刺破青天愕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我们的朱德同志，就是一座这样的革命大山。

朱德同志汪洋大度，宽厚过人，光明磊落，堪称团结的楷模。

他搞五湖四海，历来不搞“圈圈”和“摊摊”；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贯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凡是和他相处过的同志，无不为其“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博大襟怀所折服。

历史上，我们的党和军队因为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又因小农经济和封建势力的影响，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过的。特别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大搞宗派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和红军的团结，造成了严重危害。朱德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数支武装力量，拢成团结战斗的集体，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对教条宗派主义者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和“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古柏同志）等大批领导骨干，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红一、四方面军首次会合后，由于张国焘怀有野心，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甚至公开伸手要权；教条主义者又用“左”的眼光看待红四方面军，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致使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朱德同志从一致对敌的大局出发，做各方面的工作，努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芦花，他和我交谈时，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两军的团结最珍贵，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论平时或正式会议上，他都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表里如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朱德同志异常痛心，一面坚持对张国焘的说理斗争，一面耐心做团结干部的工作。“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句话，就是那时说的，在四方面军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有次，张国焘要他给党中央发电报，取消那边的中央，朱德同志说：“那个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如果没有他的中流砥柱作用，要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第二次北上，真不知艰难多少倍！

朱德同志公道正派，不信邪。对三个方面军的干部，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对老干部和新干部，无亲无疏，一视同仁，为全党全军共同称道。记得抗战开始前，因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株连红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弄得大家灰溜溜的，不久，张国焘叛变投敌，这些同志的日子更不好过。朱德同志力主公道，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张国焘严格区分，视为党的宝贵财产，充分信任，大胆使用，温暖如春，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初期，一大批知识青年涌进革命队伍，朱德同志对他们备加关心爱护，经常勉励他们与工农干部搞好团结，相互学习，以便在革命战火中迅速成长。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人山头的“总司令”，而是全军的总司令。周而赢得广大指战员的衷心拥戴。

在党内斗争中，朱德同志实事求是，严己宽人，既坚持原则，又爱护同志。他对“左”的党内斗争方式异常反感，开展批评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他善于团结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咎既往，坦然相处，他没有一个私敌，不做一件挟私报复的事，真正达到了无私忘我的境界。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志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忍受委屈而决不怨天尤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肆意篡改历史，对朱德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朱德同志受到无理的批判。他蔑视这群历史小丑，坚信人民必将战胜他们，忍辱负重，为党为民操劳，尽力支撑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他的宽广胸襟和高风亮节，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朱德同志大半生魂系疆场，纵横驰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军事统帅的超人胆略和卓越才能。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军队和人民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为马列主义军事学说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二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两大贡献，都凝聚着朱德同志的智慧和心血。

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上，他十分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我军必须坚持古田会议的建军方向、原则，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成为党和人民的奋斗工具。他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名著中，系统总结了井冈山以来的建军经验，深刻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原则，以及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军事装备、主力军与后备军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我军的建设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社会主义时期，他居安而思危，对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极为关注，多次到部队视察，观看演习，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人民战争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制定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条件下的整套战略战术原则，领导我军实行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反“围剿”中，长征途中，抗日烽火中，解放战争中，他参加组织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

斗，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光辉奇迹。

解放战争期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是攻打临汾的困难时刻，部队新，敌人又硬，城坚难摧，屡攻未下，我军伤亡和消耗颇大。要不要继续打下去？能不能啃下来？前方的意见不够统一。正在石家庄的朱德同志得悉后，认为培养攻坚兵团是争取战略反攻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环。要知难而进，拿下临汾，锻炼部队，为全军提供攻坚大城市的经验，他在写给前方领导同志的信里说：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情况下，一定能打开。“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他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锻炼成为攻坚的铁拳头。

朱德同志为革命战争而诞生，是擘画军事、驾驭战争的伟大能手。他自幼即喜好武事，爱读兵书；长年的战争岁月里，经常手不释卷，熟读古今中外兵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尤其是对于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更注意悉心钻研，因而具有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他的军事著作，是我们党的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同志从基层军事单位于起，梯次成长，足智多谋，身经百战，又具有极为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这两个方面结合于一身，才使他能娴熟掌握“战争的游泳术”，统帅军队，驾驭战局，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朱德同志寓伟大于平凡，党性很强，严于律己，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几十年如一日。

建党初期，朱德同志经过许多曲折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极其珍重党员的光荣称号，从入党那天起，就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和党规党法要求自己。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模范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同一切危害革命利益的倾向作斗争。弥留之际，对子女遗言：“要做无产阶级！”并把自己的积蓄作为党费上交，表现了他对党的无限深情。

朱德同志终生不忘广大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本色，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为他那平凡、朴素的“庄稼人”风度所感动。行军路上，他经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伙”、“老头”、“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过草地时，为了寻找能吃的野菜，他亲自我藏胞调查，并率先带人去挖，尝过后才让部队吃。部队宿营时，他不爱住深宅大院，喜欢往普通民房，常常不顾疲劳，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朋友，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了解战士、了解人民的，所以讲话生动实际。能把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到群众心坎上，为群众迅速接受和掌握。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朱德同志铭刻在心。勤劳节俭，廉洁奉公，以身作则。他经常列举历代成败兴亡的史例。教育大家。在战场上和打土豪中，强调一切缴获要归公，不准私自打埋伏，发洋财。谁若违犯，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坚决追查，严肃处理。在延安，他是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除了组织部队开荒生产。还有块“自留地”。起早贪黑，拾粪浇水，辛勤管理，种出的西红柿个头特大，我们都吃过，一时传为美谈。在毛主席“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在朱德和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延安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不仅克服了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而且形成我军参加生产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

建国后，朱德同志一尘不染，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认为，有些年青人只追求个人享受，不愿为人民利益艰苦奋斗，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他说：“希望我们青年一代，坚决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并以模范的实际行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对于一些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也应该加强勤俭教育，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的少年儿童，这方面的教育更为迫切需要。”他的教诲，对我们现在和今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革命后代，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朱德同志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永远属于人民。他为人民而斗争，人民为他而骄傲。1946年毛主席为朱德同志题词，用“人民的光荣”评价他，赞誉他，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的心愿。

今天，正确阐发朱德同志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学习他的优秀品质、革命胆略、卓越才能和优良作风；继承他的未竟事业，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对朱德同志的最好纪念。

1986年11月

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

聂荣臻

今年12月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同志一百周年诞辰。朱德同志早从红军时期起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的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我在他的领导指挥下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岁月。透过历史的烟云，回顾朱总司令在革命斗争中走过的艰难历程，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他的光辉形象又历历地展现在我眼前。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朱德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富强，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

朱德同志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时代，他是云南起义的革命军人，参加过护国战争，英勇善战，屡建战功，1917年升任旅长，月薪大洋一千多元，可谓“高官厚禄”了。但他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为旧军队的腐败、不断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苦闷忧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他从多方面的反复比较和思考中认识到，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除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于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先后到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未能如愿，但仍不灰心，1922年一直找到德国柏林。朱德同志入党以后，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从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民主革命时期致百废待兴、曲折坎坷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凤餐露宿、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到艰苦创业、日理万机的和平岁月，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朱德同志始终对党的事业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革命到底。

1925年，朱德同志由德国到了莫斯科，进入军事训练班学习。1926年夏回国后，他被派到四川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他们原来就认识，在旧军队里一起打过仗。那时候杨森正脚踏两只船，与我们共产党也在拉关系，所以他把朱德同志留下了，蒋介石一反共，杨森也跟着反共，于是朱德同志来到了武汉。我当时在湖北省军委工作，朱德同志对我说，他与朱培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开展工作有有利条件，军委就决定把他分到南昌朱培德的第三军，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同志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改造旧军队，引导他们往革命的路上走，对后来的南昌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昌起义失利后，我在香港得知朱德同志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退到武平时，遭到敌人第十八师的追击，损失很大。这时部队还有一千五百多人，一千五百多支枪。退到信丰，部队疲劳已极，一些师、团干部先后离队，有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自动离队。面对这种困难混乱的局面，朱德同志非常坚定，如中流砥柱，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对大家说：“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于他的坚定，终于团结住了大部分官兵没有走。我当时听了这个情况很感欣慰，同时又为朱德同志担忧，怕部队失去控制而溃散。我立刻把这些情况向中央军委报告，并建议军

委要二十五师进入湖南，与当地农民运动会合，以图发展。后来，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下，艰苦转战，经过赣南到达粤北马坝，朱德同志化名王楷，利用与范石生在滇军中认识的旧关系，取得了范石生给予棉衣等物资上的接济。这支部队原定也是要参加广州起义的，未能赶上。广州起义失败后又转战到湘南，发动了湖南起义，队伍得到了发展，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1931年底，我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分外高兴。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浑厚老成、平易近人的风度，向我讲述了自南昌起义失败分子以后，他如何带着失败了但不肯低头的队伍，辗转到了湘南又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形。听后，我充满了对他的敬仰之情。

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断取得了粉碎敌人多次“进剿”、“围剿”的重大胜利，使井冈星火，渐成燎原之势。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朱德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与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北上。途中，他与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面对张国焘的威逼胁迫，朱德同志坚定他说，天下红军是一家，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整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去反对毛，做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联系。”“北上的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朱德同志与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又注意方式，强调团结。他为我们党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军的团结和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后来曾深情地赞扬朱德同志“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这个评价他是受之无愧的。为了革命利益，不怕威逼，不受利诱，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朱德同志的这种崇高品德，每逢关键时刻，尤其表现得鲜明和突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想起这些时，不由得对朱总司令更加钦佩和景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和华北地区作战，始终得到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当我们打了胜仗时，他发来贺电贺信，给予嘉奖和鼓励：当我们为一个战役琢磨最佳作战方案时，他常为我们排忧解难，给予指导。记得1947年10月我们在清风店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朱总司令很快给我们发来了《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诗一首，大家争相传阅，很受鼓舞。在我们研究如何攻打设防坚固的石家庄时，朱德同志对晋察冀参战部队发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号召，要求各部队在作战中，加强党的领导，精心计划，大搞军事民主，认真钻研战术、技术，严格入城纪律，做好入城教育工作。我们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发动大家想办法，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反复研究、演练，使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结果一举攻克石家庄，全歼守敌两万四千人。喜讯传出，党中央来电祝贺，朱德同志也发来了贺电，称誉解放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给广大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全国解放以后，朱德同志毫不懈怠，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1955年12月中旬至1956年2月中旬，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陪同朱德同志出访东欧六国。在访问期间，他常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要积极争取外援，注意学习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请外国专家到我国来工作，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朱德同志三十年前说的这些话，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倍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始终坚贞不屈，与林彪、江青一伙作了顽强斗争。

1976年7月6日，敬爱的朱德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十年来，我常常怀念他，想起他伟大的一生。自从朱德同志投身革命以后，在任何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和全党全军在一起，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始终鼓舞全党全军树立必胜的信念，带领我们前进。“朱毛”成为我军战胜国内外反动派的胜利的旗帜。朱德同志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但他又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没有一点架子。在老百姓中，他是老百姓；在战士中，他是战士。他奋斗了一生，在九十高龄、精力即将消耗殆尽的时刻，仍然挥毫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苍劲的大字，这充分体现了他毕生的唯一追求。

综观朱德同志的一生，引用他当年悼念罗荣桓同志的两句诗来赞誉是很恰当的：“忠诚革命贯平生”，“留得丰功万古存”。朱德同志的丰功伟绩和革命精神，将继续激励我们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四化大业而奋斗到底。

1986年11月

在朱德同志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胡耀邦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朱德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过去这一百年，是我国人民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时代。朱德同志几乎经历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全过程，成为光照千秋的人民领袖之一。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十年前，朱德同志逝世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环境，对朱德同志伟大的一生和他所作的贡献没有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也没有能充分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令人高兴的是，在朱德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完全能够这样做了。

朱德同志1886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他在青年时代，已深感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中。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把国家和民族已推到濒临灭亡的边缘，为了拯救祖国，朱德同志和许多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样，苦心焦虑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09年，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的时候，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积极参与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又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中站在斗争的前列，英勇善战，功绩卓著。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国人民仍然处在贫困和苦难的深渊中。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他在苦闷中继续进行探索。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为了寻找

革命真理，1922年他毅然抛弃官职，奔赴德国，在柏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

1926年7月，他从苏联回国后，按照党的指示从事革命的军事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他是中国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和陈毅同志一起，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率领起义军余部，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境，保存并发展了这支革命武装。1928年1月，他们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胜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农村进行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4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共万余人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的第一支主力红军——红军第四军，他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这次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红四军在井冈山地区继续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更加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领导下，红四军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互相配合，开始点燃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燎原烈火，为革命的发展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道路。

1930年8月以后，朱德同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有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治军经验。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沉着机智地指挥红一方面军，以寡敌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四次大规模“围剿”。他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强调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违反中央的决定，率部南下，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朱德同志坚持原则，坚持耐心说服和教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的错误行动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同这两个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一起，坚持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对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开展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在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局十分危急的时刻，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力挽狂澜。他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局面。朱德同志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真诚团结友军，积极配合作战，促进了八路军同在华北友军的团结。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当局逐渐推行政治限共以至军事反共的政策，华北抗战出现了复杂、困难的局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军事“磨擦”，朱德同志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既坚持了原则、坚持了斗争，又以诚恳的态度和灵活的方法，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在朱德、彭德怀等同志领导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到1940年为止，八路军、新四

军由四万人发展到五十万人，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1940年5月，朱德同志由前方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战场的抗日战争。这时，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加紧经济封锁，解放区军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朱德同志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开荒种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他亲自指导南泥湾的开发工作，推动大生产运动，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南泥湾”精神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一个优良传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朱德同志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同时，参与指挥解放区军民进行胜利的自卫作战。这些，对改善我军的战略态势起了重要作用。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不久，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怎样进行攻坚战，夺取敌人盘踞的大中城市，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德同志亲自筹划和指导进行石家庄战役，首开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并向全军推广了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战略决战阶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向敌人展开猛烈进击，所向披靡，迅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朱德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历任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1955年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时，他尽管年事已高，但仍不辞辛劳，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群众生活和军队建设情况，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决策。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情况，朱德同志积极主张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他把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搞好军事训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事关全局的头等任务提到全军面前。他反复强调，人民军队要坚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又不要受过去的经验的束缚，要努力使军队的建设适合现代化、正规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他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时，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在纪律检查工作中，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他提出要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使党的纪律能够约束住每一个党员干部。他虽不主管经济工作，但仍在这方面提出过不少有创见的而又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建议。他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朱德同志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在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的困难情况下，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坚信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定能够驱散乌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

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的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可与日月同辉。

朱德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信人类这个最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实现。自从他确立这个伟大理想后，就终生为之奋斗。他深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中间会遇到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探索前进的过程中也需要付出种种代价，甚至会遭受巨大的挫折。但他坚信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一对的困难总能找到克服的办法。因此，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危急关头，他坚如磐石，从不动摇。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时，余部孤立无援，强敌尾追，饥寒交迫，军心涣散。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朱德同志泰然自若。他对部队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他斩钉截铁他说：“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的坚定和乐观，强烈地感染并鼓舞着大家，终于渡过难关，使这支具有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优良传统的革命武装队伍得到保持和发展。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征途中，革命的道路依然坎坷不平，而他一如既往，顽强地奋斗不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那种可贵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他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来鞭策自己，勉励别人。1975年初，在朱德同志八十九岁高龄时，还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表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决心。这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

朱德同志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毕生光明磊落，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处处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始终坚持军队一定要听党的指挥，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他认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应该是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他一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但他从不向人民提出任何个人要求。甚至在遭受、不应有的委屈时，他也襟怀坦荡，毫不计较。对周围的同志，他却敦厚慈祥，关心体贴，相见以诚，循循善诱，使人如对春风。在党内斗争中，他一向实事求是，从不整人。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又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绝不含糊。长征途中，当张国焘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准备另立中央时，他大义凛然他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行动应按党中央的决定执行。他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反对。同时表示：中央只能有一个中央，那就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另外成立中央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他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泽东同志曾经热情地赞扬他在这场斗争中“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同志具有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既是我党的一位杰出领袖，又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他叱咤风云，指挥着千军万马，又朴素得像一个普通士兵，在参加革命以前，他已身居高位。但一旦认清了革命的真理，他就毫不可惜地把这些弃如敝屣，在革命的战争年代，他和战士一样地穿粗布军衣，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窑洞。井冈山时期，他身为红四军军长，经常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人所共知，至今传为佳话。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他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在担任党、军队和

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后，依然生活俭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朱德同志是老实人。他注意深入实际，一贯主张：要实际，不要浮夸，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办好。他时刻关心群众疾苦，谛听群众的呼声，处处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他历来是我们党内军内遵守党纪、军纪、国法以及一切公共生活准则的典范。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伟大，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它将传诵千古。对新一代年青的领导者的成长，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朱德同志光辉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四十年前，在他六十诞辰时，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人民的光荣”。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给他以高度评价。对这些赞誉，朱德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无论其规模的宏大和内容的丰富，都是举世罕见的。站在这场斗争前列、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努力把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独立地解决一系列前人没有遇到过或没有能解决的重大课题。他们同亿万人民间呼吸、共命运，在实践中顽强探索，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永不停步地开拓前进，对历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朱德同志便是他们中杰出的一位。今天，对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来说，正是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人物。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他那高大而淳朴的形象一直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并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敬仰，我们纪念朱德同志，就要学习他那坚定的革命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崇高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思想作风，一代接一代地把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今天，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1986年12月1日

中国人民的光荣

杨尚昆

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朱德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前几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朱德同志的一生作了全面而崇高的评价。今天，我受中央委托，在朱德同志的故乡参加这个纪念会。到会的有朱德同志的亲密战友和伴侣康克清同志，有四川省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还有朱德同志的亲友，大家聚集一堂，共同缅怀朱德同志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我国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举世闻名的我军总司令，深受全军指战员崇敬和爱戴的元帅。他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四川人民的骄傲！

朱德同志是贫苦农民的儿子。他二十二岁前的青少年生活，是在四川度过的。在这里，他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忧心如焚。1909年，他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长途跋涉，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在云南昆明参加“重九起义”。以后他又先后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护国战争和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在川南纳溪县，他指挥部队以寡敌众，击败了袁世凯的北洋军队，使他名闻川滇。从1916年到1920年，他驻守泸州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深感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解除中国人民的苦难。为了寻找中国的真正出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外出寻求革命真理。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1922年，他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去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回国后，投身于革命的军事运动。他受党的派遣，回到故乡四川，运用自己在四川军界的影响，到万县做川军杨森部的工作。在这期间发生了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九·五惨案”，万县和四川各界民众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热潮。朱德同志因势利导，促进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使这场运动得到广泛的响应和热烈支持。这时，我的四哥杨闇公同志正担任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万县事件后不久，朱德同志来到重庆，同闇公和刘伯承同志三人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筹划了“沪顺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地方武装起义的一次尝试。

1927年，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他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境，在孤立无援、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从思想上、组织上对部队进行整顿，提高了斗志，加强了纪律，开展了群众工作，使部队摆脱困境，不仅保存了这支革命武装，而且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胜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部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创建红军第四军，任军长。随后，他们又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您

功达维地区会师以后，他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恶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功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率领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诚团结友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朱德同志身负党和军队的领导重任，为了民族的解放，抗日的胜利，日夜辛劳。他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也十分关心四川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时，他重新同隔绝十年的家乡亲友取得了联系。他多次写信给亲友，动员真心爱国、愿牺牲一切、能吃苦耐劳的人，积极参加抗日，参加革命。他写了一首《寄语蜀中父老》的诗，“秣马太行侧，十月雪飞自；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对大后方人民，特别是四川人民寄以厚望。他曾致函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缙绪和川康绥靖公署长官邓锡侯，指出：抗战以来，四川对国家民族已有极大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上奋勇杀敌，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使人兴奋鼓舞，欢跃不止。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同志参加了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指导工作。他筹划和指挥解放石家庄战役，首先取得了我军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作战经验，圆满完成了中央委托的任务。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建国后，朱德同志年事已高，但他仍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为国际友好活动而辛勤操劳。他参与领导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注重军事院校建设和部队的训练工作，八十八岁高龄时还乘舰出海检阅海军。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到各地视察工作，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切实而重要的建议和主张。他十分关怀四川的建设和发展，曾七次来四川，到过重庆、成都、宜宾、泸州、南充等城市和农村。他关心成渝铁路、宝成铁路的修建，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和其他工业建设，关心农业的多种经营、手工业和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发展。1960年3月，朱德同志曾来到仪陇，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马鞍场，走访亲朋故旧，并题词勉励家乡人民：“仪陇要多给国家作出贡献。”这再一次表明了他对故乡人民的殷切期望。

同志们，朋友们！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崇高而淳朴的形象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伟大人格和革命风范至今仍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曾经受到过他的直接教育，我自己就曾长期在朱德同志领导下工作，特别是抗战前期在华北的时候，更是经常同朱德同志见面，亲聆他的教诲。朱德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朱德同志一生坚持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到底，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不畏艰难险阻，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地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在革命危急关头，从不动摇，坚如磐石。正像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赞誉：“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同志有着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一贯尊重党对军队的领导，尊

重各级政府，遵守党纪、军纪、法律、法令以及一切规章制度。他对家乡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和鼓励很多，他教育家属亲友严格遵守国家各种规定，他从不利用职权对家乡人民和亲友进行特殊照顾。他是遵纪守法的典范。

朱德同志十分爱护党的团结，他胸襟广阔，顾全大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同志。在党内斗争中公道正派，既坚持原则，又不伤害同志，是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

同志们，朋友们！

朱德同志英勇奋斗的这几十年，正是中国人民进行气势磅礴、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和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共同奋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碰到的种种复杂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指导思想和革命风格，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每想到这些我们就更加怀念和敬仰朱德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四川是朱德同志的故乡，有一亿多人口，有丰富的物产和比较发达的文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四川人民都对国家和民族作出巨大的贡献。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四川的父老兄弟们致意。希望四川人民再接再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好。我相信，我们四川人民一定不会辜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一定不会辜负朱德同志的教导，为国家和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向朱总司令学习

陈毅

同志们：

今天我们的干部晚会，是欢迎总司令，听取总司令的指示。在座大部分同志，没有和总司令见过面。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志对总司令的光荣斗争历史，英明伟大的领导，许多宝贵的指示，是有认识的。关于这些，我趁总司令作报告之前，再讲几句，表示我们大家对总司令的拥护与欢迎。

第一、我们欢迎总司令，首先要学习总司令对人民事业、对党的无限忠心。二十多年来，总司令一直和毛主席在一起，领导我们的党和军队同反革命作斗争，没有一天离开过党和军队，没有一天离开过老百姓。不仅二十多年是如此，从历史上算起来，总司令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参加讨袁战争，以后参加党，参加北伐。总司令和毛主席、董必武同志等是我党最老的党员。1921年、22年即参加党的同志，现在已不很多了。大革命失败后，总司令坚决地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带着队伍继续上山于革命。从此。总司令就和毛主席亲密地合作，从无间断。当时，在从大革命胜利转到失败的不利情况下，由于毛主席和总司令的英明领导，我们得到了发展，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了强大的工农红军。这完全是由于毛主席和总司令忠心为人民利益服务，没有丝毫为“我”打算所致。因此，中国人民也就选定了他们两个做自己的领袖，以前我们党的领袖不是朱毛，而曾经是陈独秀那样的人，可是大革命一失败，情况一严重，就考验了我们的党，更考验了陈独秀。陈独秀这样的“领袖”，受不住考验而垮台了！同时，中国的党，中国人民，和我们军队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严重情况下，考验出我党和我党领袖朱毛是不怕失败不怕挫折的，是人民真正的领袖。在尔后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八年敌后的抗日战争中，又考验了我们的党和领袖。在二十多年的历史考验中，中国人民是胜利了，我们的党和领袖胜利了，证明我们的党如铁打钢铸，坚不可摧！今天欢迎总司令，正是全国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倍觉兴奋。总司令代表中央交给我们任务。我们全体同志应当学习总司令的大公无私、对党对人民无限忠心的伟大精神，来完成总司令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假使现在还有同志处处为个人打算，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种同志站在总司令面前，应当感到无限羞耻和惭愧！

第二、要学习总司令对党的路线坚定不移的精神。我们的团以上干部，要特别重视学习这一点。在长征中，由于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内发生严重的分裂。当时，总司令在四方面军，处境非常困难。但由于总司令的伟大精神，克服了张国焘的错误，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成员认识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认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严重，而站到党的旗帜下来，保全了革命的力量。这是总司令对党对人民的一个伟大贡献，对于抗战中我党：力量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毛主席回想到这段历史时，曾对我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这种伟大的人格与高尚的革命品质，是我们每个同志提高修养的标准。在革命形势顺利发展下面做一个英雄好汉是容易的，但到了革命遭受挫折和严重失败的关头，能不能坚持？当党内发生严重分歧时，能不能站在党的立场坚持党的路线，领导全党来挽救革命？就很难讲了。但我们在总司令身上可以找到这种常人难得的高贵品质。现在我们提出反军阀主义倾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部队的纪律，就应当学习总

司令这种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忠诚的保证完全做到。否则，参加这个会议就是不诚恳的。

第三、总司令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很高的政治远见。与实际结合的革命的乐观主义。总司令知道革命斗争中的种种困难，但丝毫不害怕这些困难，认为什么困难都有办法克服。特别是愈困难的时候一就愈可以看出总司令的革命乐观精神，对同志不断地鼓励，鼓励大家不要气馁，告诉大家反革命的嚣张是暂时的，乌云无论如何遮不了太阳，革命一定要胜利。总司令这种乐观不是盲目的，而是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出革命一定胜利的科学结论，以及毫无个人安危荣辱的打算，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伟大精神所致。我们现在快要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十年、二十年以前的那种困难，是不会有有的了。但也不是毫无困难，如粮食、弹药、后方他处理、部队可能受到暂时削弱……等等，可能成为我们的困难。不过，这些困难与总司令过去所遭受的困难比较起来，真是“渺乎其小焉者也”。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就在这些困难面前沉不住气，讲怪话，发脾气，不安其位。这种同志在今天面对总司令时，应当警惕奋发起来，化懦弱为勇敢，化恐惧为无畏。特别我们将来要到更远的蒋管区去，将有更多的困难。在今天欢迎总司令的会议上，就要向毛主席和总司令保证，我们不怕一切困难，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能够有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够胜利。

第四、总司令的度量很大，在我们党内是有名的，在我们军队洞志中，也是很少能相比拟的。正如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总司令就有这种浩如海洋的度量。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都公认毛主席和总司令是领袖，人人尊敬，是没有问题的。过去队伍小，党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总司令对于任何同志都是关心体贴，能够吃亏，自己作模范，善于说服人，很少看到总司令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地向同志们耐心说服解释。我们同志中，有许多气量太小，受不起委曲，吃不起批评，听不得“反映”。在今天欢迎会上，就要好好的以总司令的度量为榜样，把气量扩大一点。有功劳不要去争，有过错自己分担一肩。人家批评得对，很好地接受，人家讲得不对，也可以提供参考。不要眼光如豆，只看到个人的名誉、地位、享受，而要高瞻远瞩，雾月光风，养成革命者、政治家的风度。对敌人作斗争要坚决，对自己人就要多讲和睦。总司令就是这样对敌坚决顽强斗争，对内高度善于团结宽大的典型代表人物，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第五、总司令的生活非常朴素，多年来都是穿的布衣服，一件棉袄要穿几年，补上好几个疤。他工作做得多，对革命贡献很大，可是不计享受。总司令这种高贵的性格与作风，举世莫不钦佩。总司令出身于农民家庭，家里贫苦，生活朴素。辛亥革命中在云南做了很大的官，但很快就丢掉不干，转过来参加党、参加革命，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勤苦的生活作风，与群众完全一致。特别是总司令经常和士兵在一起，对接近士兵、接近群众很有兴趣，以广泛的接触干部和士兵为精神上莫大的愉快，这完全是工农劳动人民天性的表现。总司令是二个伟大的统帅，也是一个普通的士兵。这是我们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学习的。假使同志们的生活超过士兵太远，在今天的会议上就要加以考虑，今后应当约束自己。只有过士兵一样的生活，才能得到士兵的爱戴和亲近，才能倾听和反映士兵的呼声，也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干部”。否则，就会脱离士兵，思想意识也会起变化，变成剥削者的意识。这种干部无论能力如何强，如何会打仗，都不可能把部队搞

好，也不可能打胜仗。现在我们有些干部遭受士兵的反对，生活上奢侈浪费就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同志特别应当向总司令学习，坚决地转变过来。

第六、总司令是中国革命中著名的。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侵解放军的主要创造者和组织者之一。他精通革命军事学，熟悉各种战法，并有不断的创造。他在我党七次大会上的论解放区战场那一篇报告，是毛主席的天才军事思想的很正确的解释和发挥。几年来，总司令还有许多讲演，都可作为我们干部做军事工作的根据。我们欢迎总司令，就要加强军事学习，提高战术，熟读总司令的文章，并实际运用去战胜敌人。总司令是不喜欢那种既当了兵却不喜欢学军事的人的。

今天我只能简单地讲一讲总司令伟大革命品质的较突出的几点。总司令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三十多年，许许多多的优点长处，对党对人民的贡献，都值得我们学习，在这里无法详细向同志们介绍。希望同志们好好地去研究总司令的一切著作和指示，对照自己的思想和作风，认真地执行总司令的指示，修养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好干部。

誉盖华夏名垂后世

薄一波

朱德同志是伟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儿子，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谨以这篇文章，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

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是同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分不开的。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就听说过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知道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之役；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他深受影响，放着滇军旅长、川军师长不干，却毅然从西南跑到北京和上海，一心要找共产党；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又远渡重洋，到德国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自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朱德同志就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崭新姿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经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朱德同志的名字，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名字一样，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熟知，而且也为世界人民所知晓。可是，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我还没见过这位我敬仰已久的英雄人物。

抗日战争前夕，我受北方局委派，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办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十分重视培训军政干部，为建立武装做准备。抗战开始后，日军很快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伪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阎锡山对旧军失去信心。于是，我建议组建新军，对阎说：看来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要我负责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坚决去搞。牺盟总会的工作可以委托别的人去做。于是，我们就以帮助阎锡山抗日的名义，用阎锡山的武器，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我任政治委员，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军事指挥员。决死队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由一支部队发展成为四支部队（相当于四个团），最初成立的决死队改称“第一总队”。

1937年9、10月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先后开赴山西战场。9月下旬，我带领青年抗敌决死队，在从五台去盂县的路上，遇到朱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多少年来，在我心目中，朱总司令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令人敬畏的英雄。见面之后，我很惊奇，他竟是一位老农式的人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一见面，我就自我介绍：“我叫薄一波，是共产党员……。”

“不用说了，我知道、知道。”朱总司令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亲切地说。

当时，我十分兴奋，继续说：“我虽然带领一支部队，却不会打仗。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相当于一个团。我们准备在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

朱总司令听了我的话，明确地对我说：“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驱太原，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了”

朱总司令继续说：“你在山西的工作开展得很不错嘛！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和我谈过，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样，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八路军准备在华北各沦陷区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现在，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接着，朱总司令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入。我们得到情报，国民党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他要占据那块地方。你要立即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去，把张慕陶撵走！你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我又向朱总司令汇报说，我们部队的干部政治素质较高，有许多人是在白区工作很久的共产党员，但是不大会打仗。部队里有不少旧军官，只有少数军官是我们的人。我要求给我们派一些军事干部来。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行！要多少，给多少。”后来果然陆续派来不少军事干部。这是八路军和朱总司令对决死队的最大关心。

我把朱总司令的意见向北方局汇报了，北方局同意我们去晋东南。我又去见阎锡山，对他说我们想到晋东南去。他问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那里地理形势好。他当然不了解我们的用意，连声说：“对！对！”还兴致勃勃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今长治一带）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一总队去，并委任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时正是旧军溃败，阎感到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其进步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时候，他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组建新军上。我乘机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五到十个旅的新军。阎锡山即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五个旅的番号，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由原来的四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四个纵队（旅），同时组建了工卫旅。这样，我们通过合法手段，迅速扩大了山西新军，后来又使之发展成为一支具有正式番号的五十个团的队伍。

二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千山万壑、铜壁铁墙的巍巍太行，像一道顶天立地的脊梁，耸立在山西、河北之间，与汇集百川、滔滔东流的黄河互为表里，“外河而内山”，是个可以依托的天险。其形势的险要，正如陈毅同志诗中所描写的：“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是个天然的游击战场，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我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带领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在八路军到来之前，就把这个地区合法地先占领了。

11月，太原失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弃地溃退。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从此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朱总司令根据党中央创建华北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晋东北南下，来到太行山区，坐镇这个地区，指挥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

12月，朱总司令在和顺县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彭德怀

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等人，我也被找去参加了。当时，日军正从太原南下，已经占领了太原以南的子洪口。会上首先讨论我军事力量如何配备的问题。青年抗敌决死队来到大街山区后，已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加上两个游击团，共有五个团的兵力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薄一波走的是“沁州路线”，他的军队和行署直到现在还戴着“山西帽子”，说着“山西话”，意思就是说有些右。我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他们是从极左的角度看问题，客观上会破坏统一战线。我乘此机会在会上提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脱离阎锡山？请北方局指示。朱总和彭总听罢，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你们根据党的指示同阎锡山合作，只做公开的合法工作，表面上戴“山西帽子”，说“山西话”，实际上是在做共产党的事。正是由于同阎锡山建立了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你们才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打开了这样一个局面。戴“山西帽子”有许多便利之处，现在不能变。朱总说：“实际上，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嘛！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顶帽子是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巧妙而艰苦的工作才得来的。来之不易呀！怎么能随便丢掉呢？！”我听后非常高兴。朱总和彭总问：“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我提出，我没有打仗经验。朱总司令当即决定派毕占云同志到决死一纵队担任参谋长，一二九师还派了一个团框架的干部。以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会上，左权同志谈了打日寇必须集中几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二千人，装备好。我们可以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我听了觉得很对，三个打一个，回去后可以找机会试一试。

1938年7、8月间，正是麦收季节，日军一个联队从子洪口南下，向我们进攻。我认为机会到了，可以打一仗。虽然参谋长毕占云同志不大同意，但我还是坚持要打。于是，派了三个团，一个团从正面阻击，两个团从两侧打。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结果没有打赢，这就是决死一纵队第一次同敌人交手的有名的韩洪陇斗。我们总结经验，认为三个打一个，这个战术思想是正确的，不过也要看本身力量如何，战斗经验如何。如果是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去打，是可以打赢的；而我们这支没打过仗的部队去打，就没有把握了，不过，仗虽然没有打赢，部队却表现得很英勇，同阎锡山的旧军不一样，不是一打就跑；决死一纵队经受了这次实战锻炼，开始变成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

三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以及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都十分关怀新军的成长，决死队在韩洪战斗中没打好，却仍然得到朱总司令的鼓励。打完仗以后，朱总司令在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经验。他说，打仗不能怕打败仗，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的。决死队的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要改变部队的成分，抽出知识分子，补上农民。他又说，看起来决死队打仗还不行，要开个训练班，加强作战方面的训练。于是，就在沁县的西林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决死一纵队排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都轮流参加了集训。

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总部的负责同志几乎都讲过课。朱总司

令每周一、三、五来给大家讲游击战术，左权参谋长每周二、四、六来给大家讲步兵战斗条令。后来彭副总司令也来部队作报告，讲党的政策。从总部驻地王家峪到西林训练班有几十里路。当时朱总司令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和年青人一样，每次都是骑着马来给大家讲课，而且训练班没有正规的课堂，讲课的首长不辞劳苦，就在树林子里上课，使听课的向番深受感动。大家不仅学会了打仗的本领，而且从这些负责向吉身上学到了可贵的革命精神。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增添了力量和信心。训练班一共办了三期，每期三个月。收获很大。

我们把这次集训叫做“西林整军”，它对于决死一纵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课。经过集训，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显著地提高了。集训结束后，我们又换掉了一批排、连、营的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整个部队气象一新，斗志更加昂扬。

在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中，决死一纵队和整个山西新军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来到山西后，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发展了群众的抗日力量，改造了“牺盟会”和组建了“决死队”，掌握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他认为这两个组织部落入了共产党之手，暗叫“上当”，图谋消灭新军。于是，他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39年12月动员六个军的兵力，首先进攻驻在晋西的决死二纵队，接着向新军各部队展开全面进攻。虽然风云突变，可是我们已有所准备。因为我们在半年前的“秋林会议”上，已经察觉到阎锡山阴谋利用旧军消灭新军。当时，朱总司令和北方局及时指示我们：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确掌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彭副总司令还亲启到决死一纵队来，作了题为《随时准备击退顽固派的进攻》的报告。我们也多次研究了应变之计。这次阎锡山刚一动手，八路军总部就帮助我们，我们立刻动员决死队的四个纵队、政治保卫队三个旅和工人武装自卫旅奋起反击；并号召各地“牺盟会”负责人向阎锡山发电，表示坚决站在新军一边，坚决还击任何挑衅；同时，立刻撤掉了新军各部队中顽固的反共军官，并争取了摇摆不定的旧军人。经过半个月的激烈战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新军除决死三纵队损失一部分外，其余部队分别在晋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会师。“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决死二、四纵队则纳入一二二师战斗序列。

这一时期，蒋介石一再指使国民党部队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使内战危机不断增长；同时，日军也采用“口笼政策”，加紧向八路军进攻。为了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我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初，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发出命令，对日军展开破击战。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八路军以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同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经过五个月的激战，击毁敌人碉堡近三千座，毙伤日伪军二万多人，缴获大批物资和弹药，沉重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经济体系，严重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百团大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决死队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部分，在老部队的带领下，也参加了“百团大战”，经受了炮火的严峻考验和锻炼，立下了战功。

当时，国民党名曰“抗战”，实际上却积极搞“限制异党活动”。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消灭共产党。1938年6、7月间，传说重庆国民党政府准备派一个“战地军风纪视察团”来解放区视察八路军的军风纪，还说这个团的权力很大。他们扬言，如果发现八路军有什么“不轨行动”（他们已经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就地开白条子吃粮食），可以“就地处理”，给八路军的军饷，可以立即停发。

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花招，并没有把共产党、八路军吓倒。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十分镇静，准备如果他们真的要来，就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朱总司令的英雄气概。我曾听朱总司令理直气壮地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战，打日本侵略者，人人有责。既然要打仗，就要吃饭，不能空着肚子打。八路军打日本，吃粮食，是合情合理的，犯什么法？”他这番话在太行山地区广泛流传。从此，老百姓把给抗日民主政府送公粮，供给八路军，视为自己的天职。这个“视察团”后来并没有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终于制造借口，把给八路军的军饷停发了。蒋介石想饿垮共产党、八路军，完全是白日做梦。恰恰相反，坏事变成了好事。重庆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却促成了从延安开始并迅速发展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共产党决心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同全国人民一起，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五

朱总司令一向十分关心和重视生产，是一位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卓越领导者。他在延安时期亲自到南泥湾去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在后方工作。1947年，刘少奇、朱总司令率领中央工委来到河北平山县，住在西柏坡。我去过他那里几次。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后方动员工作和后勤工作，谈到了动员多少人参军，给部队造了多少炮弹，织了多少布，等等。他听了很高兴，对我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练兵、生产、教育。土改后，要大搞生产，要办工厂，各种工厂都要办。”他曾在冀中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过：“土改后，首先要发展农业。粮食、棉花、牲畜、水利、农村运输等等都要很好发展。”“现有公营工厂，只要不赔钱的就要开下去，不能毁坏了。”“在发展公营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扶持私人工业的发展，银行也可根据需要贷款扶持它们。”朱总司令不仅提倡发展生产，而且善于治“家”。他一向主张军队要精减后方人员，吃公粮的人要减少，要多办工厂、生产合作社。记得有一次，我向朱总司令谈起敌后根据地精兵简政情况时，说到每百人能养活多少脱产的人，我认为按照经验判断，一百个人养活一个脱产人员最好，比较宽裕。养两个人，日子还可以过，养三个人，就不行了，必须来一次精兵简政，如此循环往复，有过几次精兵简政，吃穿的问题就好办了。朱总司令赞成我的看法。正说着，周恩来同志来了。他听了我们的议论后，点头称是，说：“解放区只有农业和手工业，百人养脱产人员的比例，不仅华北而且华东等解放区都是如此。”又说：“我们进了城，也要宣传精兵简政。”朱总司令接着强调说：“我们就是要搞生产，大搞生产。”此后，他对我说：“恩来同志是我们的当家人，有他，我们就有办法了。”

六

在中央工委工作期间，朱总司令除了抓土改、生产和支前工作，对军事

工作也很重视。

1948年3月，为歼灭国民党军在晋南地区的最后一个孤立的据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发动了临汾战役。当我军扫清临汾守敌的外围工事攻占东关的时刻，朱总司令及时发来电报，建议采用晋察冀部队攻克石家庄的经验，“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即集中重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炮击其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装入大量的黄色炸药进行爆破，炸开突破口后，趁机以步兵进攻，迅速占领突破口，并向两翼展开。他希望我们再接再厉，攻克临汾。在战斗中，我军虽重创敌军，但由于部队刚由地方武装升编，装备差，骨干少，缺乏攻坚经验，也造成较大的伤亡，临汾城久攻未克。这时朱总司令了解到有的同志不想再继续打下去，立即给我和滕代远同志来信，鼓励我们坚持到底，直至取得胜利。他指出，“临汾在敌人无堵援的条件下，一定可能打开”。同时强调：“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杨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临汾战役的胜利，除了徐向前同志善于用兵，指挥得法，战士们不怕牺牲、勇敢作战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外，与党中央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其中也包含了朱总司令对我们的鼓励。

七

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工作相当艰巨，朱总司令对经济工作十分关心。当时我在中财委工作，他每周都要把我找去汇报各种生产情况。他常对我说，中国人口多，要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使他们都有工作做，好好搞生产。他还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草一木、一上一石都是我们的财富。朱总司令特别重视手工业生产情况。他认为，手工业行业就业门路广，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应该大力发展手工业。他主张要打“倒算盘”。意思是说，任何人都要吃饭，有活儿干的要吃饭，没活儿干的也要吃饭，因此，要千方百计广开就业问路。只要有点活儿干，哪怕一天只挣几毛钱也好，总可以对生活有所补助，总比一个钱不挣还要白吃饭、还要国家补助好，这样就可以减少国家一些负担，要是没有活儿干，挣不到钱少填不满肚子，就不得了。朱总司令时时都在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做经济工作的人教育很大。

在发展手工业生产问题上，朱总司令实事求是，提了不少好的有见和建议。例如，1950年7月，他在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强调指出，合作社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是由城市或乡村中的手工业者及家庭手工业者在自愿联合的原则下组织的、从事生产的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因此，作为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向集体化过渡的进程中，不要急于改变它的私有制形式。又如，1953年12月，他在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作的报告中主张，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应该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绝对不要规定一种格式。

朱总司令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要稳步进行。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他曾经多次发表过意见，单是1957年，他就多次找我谈话，对手工业生产的问题，颇费苦心。在谈话中，我曾提出，要解决人多的问题，手工业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为了开辟财源，不要把一切都统死了。类似特种工艺美术品，有些可交给个人去搞，以调动积极性。朱总司令同意

我的看法，他说，手工业产品是出口贸易的大项，所以，发展手工业，不仅可以解决人多问题，而且可以多为国家换取外汇。像金银手饰、翡翠玉石等应组织数万人生产、出口。景泰蓝、象牙等也应大量生产，要多收学徒，不要使之绝种。他从外地视察回来后，还向我谈起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改进的意见，为此，他在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特别就手工业生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60年代以后，我同朱总司令就没有什么接触了。1976年，他老人家逝世时，我还被监管着，没能前去告别，实在令人遗憾。斯人虽逝，精神长存。我永远不能忘记朱总司令对我的谆谆教诲，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英雄气概，他那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以及他那平易近人、朴实谦逊的作风，一直激励着我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写于1979年，改于1991年

“ 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

宋任穷

“ 鲲鹏九万里，直上云海颠。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 ”当读着朱总司令这些豪迈的诗句，他那威武、刚毅、慈祥、谦逊的形象，便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朱总司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建立了丰功伟绩，是中国人民敬仰和热爱的领袖。总司令的革命精神、优秀品德和高尚情操，以及他无数感人至深的事迹，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称颂。这篇短文，仅就我同总司令的几次接触，作一些片断的回忆。

是军长，又是普通一兵

1927 年秋收起义后，经过三湾改编，毛泽东同志率部向井冈山挺进。此时，朱德同志已经威名远扬。我们这些在这个时期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几乎都知道他从德国、苏联留学回国后，便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北伐战争，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屡建奇功的革命英雄。1928 年 4 月，朱、毛率部在江西省宁冈砦市会师，在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初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朱德同志。

朱、毛会师后，几支革命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我在红军的基层单位工作，先后任连党代表、营部文书兼营士兵委员会主席和团宣传科干事等职，在井冈山斗争开始的那个时期，敌人就妄图将革命卡死在摇篮里。在这个重要关头，朱、毛共同指挥了许多重要的战斗。会师后不久加 5、6 两个月，就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重兵进剿，重创敌军，三次攻克永新县城；在这些令敌人胆寒的战斗中，表现出了朱、毛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朱、毛还直接领导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建设和扩大工农红军，创建、发展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

朱德同志是运筹帷幄、指挥雄师劲旅的军事统帅，又是植根群众、和群众、士兵打成一片的普通一兵。他在创建全新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方面，以身作则，起了表率的作用。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长，他没有一点架子。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士兵和工农群众，他总是和蔼可亲，关怀备至，大家都由衷地尊敬他、爱戴他，乐意同他接近。不论谁找到他，他都能与之亲切地交谈。一次行军途中，朱军长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则牵着马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些不认识他的老百姓，还以为他是一位历经战火、颇有经验的老马夫。在繁忙的军务之余，他还身背斗笠，穿一身旧军装，到田里帮助老乡干活。朱军长出身佃农家庭，小时家境贫寒，四、五岁就帮助母亲在田里干活，农忙季节则整日跟母亲一起在田里劳动。因此，干起农活来很在行。他一边干活，一边向群众了解情况，做群众工作。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实行重重封锁，部队吃粮困难的时候，朱军长同年轻的官兵一道，经过黄洋界，挑粮上山。四十开外的朱军长穿着草鞋，挑着两大箩筐米，矫健地走在凹凸不平的盘山小路上。朱军长在井冈山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与广大官兵、工农群众同甘共苦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广大红军官兵，至今仍受到热情赞誉并被传为佳话。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从长征到延安，从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后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朱德同志

仍始终保持着这种优良的传统。

虑事精细爱兵如子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关乎革命成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后，又同周恩来同志一道，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艰苦转战，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有这样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是1935年3月，红军根据朱总司令电令，东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向南，直指乌江。蒋介石急忙调兵“围剿”。3月底，红军主力乘虚南渡乌江，把敌人甩在乌江北岸。当时，陈庚同志和我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待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后即可拆桥。后来，我们得知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陈庚同志和我到宿营地后，即向中央军委首长汇报情况，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场。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陈庚同志和我以及在场的三营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当即表示接受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我们当场保证，天亮以前一定重新把浮桥架好。接着，我们顾不得吃饭，由我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返回乌江边，这时天已经黑了。经过一夜突击，终于在天亮前又把浮桥架了起来，等候九军团的到来。七点，九军团还没有来，我们才按原定计划，把浮桥拆掉。部队在极端疲劳的情况下，又急行军追赶大部队去了。原来，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活动，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当时因作战频繁等原因，一度与中央军委失去了联系。后来，九军团几经转战、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

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批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一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由此，也更增加了我对总司令的敬仰之情。

注重发展生产强调实事求是

全国解放后，朱德同志担任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但我们仍习惯地叫他“总司令”。随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总司令的主要精力也倾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这一时期我同总司令的接触，主要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

中央开会时，总司令曾多次参加东北组的会议并发表意见。他讲话不长，但总是那么朴素，那么实在、那么中肯。据我的回忆，总司令经常强调两条：一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同自然作斗争，引导到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上去，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总司令还非常关心流

通领域的发展，强调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扩大贸易，增加出口，包括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出口。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要学会做生意，这是一件大事。做生意只靠商业部门是很不够的，各级党委的同志们和大家都要学会做生意。

总司令强调的第二条是，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在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郑重提出，全党都要学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谈到党内斗争时，他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总司令这些正确的意见，当时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在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的那些日子里，我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的思想，对总司令的这些意见不大以为然。总司令总是坚持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反复阐述他的正确主张。

为了关心和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总司令还不辞劳苦，深入各地视察。1964年7月，总司令同董必武同志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由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陪同，这次视察，日程安排得很满，总司令到了沈阳、阜新、通化、吉林、延吉、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大兴安岭等地，深入工厂、农村、煤矿、林区、学校等基层单位，搞调查，听汇报，对东北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针对东北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总司令指出，东北工业多，工业要支援农业。工业本身要注意配套，特别是机械工业和加工工业一定要配套。东北的冬天时间长，农村许多地方农民一到冬天就没有事干了，当地叫作“猫冬”，即冬闲。对此，总司令说农民冬天没有事干不好，要帮助他们多找生产门路。那年，总司令已七十八岁高龄，为了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国家富强起来，总司令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劳。

度量大海意志坚如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肆虐，总司令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强加到他的身上。大家对此愤愤不平。1969年，林彪发布所谓一号命令，总司令也被迫离京，“疏散”到广东从化，为时将近一年。1974年9月，经周总理批准，我从劳动了五年的东北农村回到北京，临时住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里。招待所离总司令的住处不远。很久没有见到他老人家了，这时，我和老伴钟月林非常想去拜望他和康克清同志。1975年的春节前后，我们到了总司令住所。总司令看上去老多了，着实使人忧心；当看到他仍是那样慈祥，那样持重，那样但然的时候，又使人感到欣慰，我紧握着总司令的手，向他问候，祝他健康长寿。他也拉着我的手，目光凝重地望着我。我有许多话要向总司令讲，但是没有讲。我知道，总司令心里也有许多话，他也没有讲。此时，相对似是无言，实则尽在不言之中了，无声的语言把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这次相见，总司令只同我谈了学习问题。他对我说，要认真学习，学习马、恩、列的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在情况复杂、处境困难的那些日子里，他一面积极支持恩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面同“四人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而对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种种冤屈和不公正对待只字未提，表现了总司令的博大胸怀和对党、对理想的忠贞。这次见面，交谈不多，但我亲眼见到了敬爱的总司令，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这次一别竟是我同总司令的诀别。

1976年6月，我和总司令都因病住在北京医院，我住一楼，总司令住四

楼。我多么想上楼去看望病中的总司令。可那时“四人帮”及其亲信设置种种障碍，我们这些人不是想去就能去的。结果，咫尺竟成天涯，直至总司令与世长辞，都未能如愿上楼见他一面。

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人民和历史是最公正的。人民深深地怀念总司令。历史将永载总司令的不朽业绩。我们怀念总司令，就要继承总司令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不懈地努力。

1991年5月

朱德之德

萧克

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必然会造就出伟大的人物。朱德便是从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十年间所产生出来的伟大人物之一。

朱德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旧民主主义时期的高级军官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后，便毕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丰富经历和他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世人皆知。我作为朱总司令麾下的老战士，在与他数十年的接触中直接感受到，他那勤俭、忠诚，坚毅、明智、宽厚的高尚品德，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

—

勤劳与俭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朱德勤俭持身，几十年如一日。他出身贫寒，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勤于劳作，习惯于肩挑背负，爬山涉水。1928年冬，他身为红四军军长，带头从宁冈县的白露挑谷上井冈山。这时，他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挑着担子上山，并不为难。第二次反“围剿”时，部队在东固、南陇地区“待机”，他带领指战员帮助老乡耙田插秧。在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身体力行，亲赴南泥湾勘察地形，布置屯田垦荒任务。全国解放以后，他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治军，时常告诫我们要发扬吃苦耐劳、廉洁朴素的优良作风。他一贯反对讲排场、大手大脚的公子哥儿作风，提倡伙食单位养猪种菜，严格经济管理制度。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种菜，节衣缩食。他曾经这样写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我认为，朱德的话，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依然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二

朱德的忠诚，在党内、军内是有口皆碑的，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青年时期起，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学习军事。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以后，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便决心终生为党从事军事运动，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服从党纪党章，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他带领一部分部队，独立活动。他和陈毅一起，把武装力量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党员，把党的组织工作做到基层，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同时，千方百计与当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保留了我党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

三

朱德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早年为了去昆明学习军事，他从故乡首途，历时七十多天，在当时西南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旅途之艰难，可想而知。在护国讨袁战争中，他率部随蔡锷入川。在四川纳溪前线，敌众我寡，他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时攻时防，与敌搏斗四十多天，赢得了“英勇善战”的称誉。南昌起义军进到东江，他率部镇守三河坝，为掩护主力在潮汕、揭阳与李济琛主力作战，与多于我军三倍之敌激战数昼夜。虽然没有取得胜利，却也表现出他的大智大勇和顽强的意志。三河坝战后，他率领余部转战于粤闽赣边和湘粤赣边的崇山峻岭之间。天寒地冻，雨雪纷飞，后有敌军追击，前

有民团滋扰，又无军需给养补充，部队中人心涣散，离队者越来越多。在这阴霾密布、前途渺茫的生死关头，他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革命已经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军队对革命的态度如何？另一个是南昌起义也失败了，今后采取什么军事政策呢？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要继续革命。他登高一呼，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今天中国的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俄国终于在1917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只要继续革命，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今后打游击呀！他还说这一带有农民运动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的讲话，既从政治上指出革命前途，又以战略家的眼光自觉地实行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当时，能够做出这样的决断，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与明智啊。朱德正是靠着他那坚毅、顽强的胆略，在黑暗中看清革命前途，从而稳定了军心，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四

凡是接触过朱德的人，都能够体会到他的宽厚，他善于团结同志，待人和气，不积怨，不记仇。下级有错误，他批评而不苛求。和同志的关系，无论是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可谓“与人为善”、“善与人同”。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对不恰当的批评，甚至恶意诽谤，他都泰然处之。庐山会议后，林彪曾说他从来不是总司令，他听到后，只是付诸一笑，并不急于解释。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在长征中，张国焘闹分裂，反对党中央，朱德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但又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使张国焘无可奈何，只能与之共处。在南下过程中，他继续耐心地团结同志，进行说服工作，终于使左路军重新踏上北上之路，在张国焘未叛逃之前，朱德对他始终以党内问题来看待。毛泽东曾评价朱德“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可谓恰如其份。

朱德的高尚品德，正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具体体现。他是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所称颂和学习的榜样。

朱德之德，令人景仰。

1991年12月

怀念逐日深

杨得志

1976年7月6日，当我在武汉听到朱德同志逝世的消息时，心头猛然一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太不幸了，刚刚哭送过总理，又要哭送总司令（当然没想到两个月后又哭送毛主席），于是，泪水立即模糊了双眼。望着滚滚奔流的长江水，望着对峙江岸的龟蛇二山，我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这之前不久，我到北京开会还去看望了朱总。虽然是在医院里，但他的精神很好，十分关心地询问部队情况，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回忆万里长征，谆谆告诫我要搞好部队建设，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临别对他还不顾劝阻，执意把我送到电梯门口。后来，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他出席会议、会见外宾，猜想他一定很好，怎么突然就走了呢？而我们的那次见面竟成为永诀！

从那时到现在，我对朱总的怀念，不但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反而越来越深切。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前线，还是在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工作中，我总是经常想到朱总司令，想到他的光辉业绩，想到他的伟大形象，想到他的谆谆教诲！

确实，我对朱总司令太熟悉了。六十多年前，我离开筑路工地，参加的就是他和陈毅亲自率领的部队。我是跟着他们走上井冈山，走上革命道路的。在向赣南、闽西进军的途中，在出击闽中的路上，我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是追着他的脚步前进的。从江西的高山密林里他号召我们要“努力学习”，到天安门城楼上他勉励我要“掌握现代军事知识”，从当战士到当军区司令员，在近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里，我一直是他指挥下的一个兵。特别是在许多重要时刻，直接听到了他那振奋人心的话语。

早在1928年湘南失败之后，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有人英勇战死，有人叛变逃跑。关键时刻，朱总经常集合部队讲话，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先讲世界形势，次讲中国形势，再讲红军的前途。那一次次铿锵有力的声音，扫除了人们心头的疑云，激发了人们勇猛的斗志，在毛泽东同志带病迎接下，返回了井冈山。就我自己而言，是从朱总的讲话中，从井冈山的斗争和“八月失败”的沉痛思考中，才真正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跟随党走过几十年的战斗历程，做了自己能做而又该做的一点工作。

1938年夏天，我奉命由六八五团团团长改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赴任途中，我在山西故县村见到朱总，当时他正戴着眼镜读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讲演稿。一见面，他就问我读过讲演稿没有，接着谈了讲演稿的详细内容，说毛主席讲了二十几个问题，很重要，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要我们有耐性，不要犯急性病。他强调指出，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民心所向，或者叫做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所无法和我们比拟的！

当我说到对敌后平原作战缺乏经验时，朱总就鼓励我在战争中学习。他非常乐观地说：工作艰苦，斗争形势也会错综而复杂，不过我看没啥了不起的嘛！他还让警卫员拿来西瓜，一边让我吃，一边嘱咐我到三四四旅后要注意方式方法，团结干部战士，开辟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朱总的这次谈话，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在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中，

我认真学习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干部战士，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与全国军民一道，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的石家庄战役，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大城市。战役开始前的准备阶段，朱总司令亲临前线，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野战军司令部。他听取我们汇报情况，和我们一起分析敌情，审问俘虏，研究战役部署。他还深入基层和干部战士交谈，同工兵、炮兵部队的同志研究技术问题，向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大大激发了指战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旅以上干部会上，朱总又针对有些部队不太重视战术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石门战役打的是攻坚技术，是勇敢加技术”。

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指导我们作战，朱总提出要住在我们野司。可是敌机不断来狂轰滥炸，我和罗瑞卿政委商量，考虑到他的安全，就一起劝他到冀中分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住，他摇头不肯，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来找我朱德。”我说：“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朱总虽然不情愿地离开了野司，可心里还时刻关注着战役的发展，我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他听得认真，并提出他的意见。战斗开始后，部队很快扫除敌外围据点，突破外市沟时，朱总亲自打电话给我。就在我们讲话的时间里，敌第二道市沟又被我军突破，我立即把这最新消息报告了总司令，他兴奋地说：“打得好呀！我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边的同志可是都望着你们哪！”战斗刚结束，朱总又通过聂司令员转来了嘉奖全军的电报，高度评价解放石家庄“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随后，他又来到石家庄，听我们汇报，找基层干部战士座谈，科学总结了攻坚战术，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堑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并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后来，我还读到了朱总《攻克石门》的诗：“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从朱总司令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到战役中的具体指示，战后的科学总结，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对我后来指挥打仗和领导部队建设，都起到了长远的作用。

1950年10月，我们十九兵团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当从西安到达山东兖州稍作安排后，就接到军委的通知，要我和李志民政委去北京。在中南海，朱总听过我们汇报后，又详细询问了部队集结的各种情况，从武器装备到思想动态、从部队纪律到生活管理，都一一问到了。他对着朝鲜的地图，向我们讲了彭总率领先期入朝部队的情况，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我和志民同志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请朱总到山东兖州去参加兵团即将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像打石家庄时那样给我们作指示。

我们团部队不到一周，朱总就赶到了兖州。12月下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他一到就和兵团领导交谈，了解会议准备的情况。会议开始前，他要到连队去看看战士，我们和医生都说天气太冷，部队住地分散，建议他在有木炭火的房间里分批接见一些指战员的代表，他笑着说：“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来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就这样，他冒着冷风，看望了几个步兵和炮兵连队。由于疲劳和天冷，朱总感冒了，而且发烧、咳嗽，即使这样，他还是带着病给我们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作了报告。他讲抗美援朝的意义，我们兵团的任务，指出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干部和

战士一起摆出困难，找出解决的办法，做到和敌人交手时有胜利的把握。讲完话之后，他还在寒风中与大家合影留念。临离开部队时，他送给师以上干部每人一本刘伯承同志翻译的《兵团战术概述》，并在每本书上亲笔题字，送给我的书上写着：“得志同志，努力学习。朱德。”我们正是牢记朱总的教导和期望，奔赴三千里江山，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不可能在这一篇短短的文章中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但是，即使这些事情，不也如同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全部光辉一样，映现出朱总的高贵昂质和求实作风吗？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朱总的这种品质和作风，都是鼓舞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1991年7月

伟大的精神崇高的品德 伍修权

稍知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人，没有不知道“朱毛”的。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早已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名字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旗帜和象征。我们这些追随“朱毛”几十年的老兵，一直把朱德同志称为“总司令”或“朱老总”。不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和平建设时期，以至在动乱的“文革”岁月中，只要一提起朱总司令，就从内心唤起一股崇敬、希望和亲切之情。

1931年，我从苏联回国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才有幸地见到闻名已久的朱总司令。以后因工作关系便经常与他接触，从而使我对他的过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总司令的一生是辉煌的，但却不是一切都顺利的。他也有着自己的曲折、坎坷乃至艰辛。他作为一个贫苦佃农的子弟，出于爱国之心，立志从军习武，上过云南讲武堂，在爱国将领蔡锷的军队里，从班长、排长逐级升任为团长、旅长，立下了不少战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只是社会现实迫使他不能满足于个人的功名成就，他一直在不断寻找着更正确的救国救民之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一下看到了光明。1922年，他毅然放弃了旧军队的高官厚禄，奔赴上海要求参加刚刚一岁的中国共产党。然而。他的诚恳要求被陈独秀冷漠地拒绝了。随后，他到德国找到了周恩来同志，才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了他的夙愿。从此，他选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指针。他入党后，在德国、苏联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开始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出现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

1927年8月1日，朱德同志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树起了中国工农武装的第一面旗帜。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转战闽粤赣边界，保存了革命火种。不久，朱德同志又领导了湘南暴动。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正式建立了以朱毛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揭开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极为光辉的一页。从此以后，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便传遍国内外。我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亲身感受到，朱德同志尽管功勋卓著，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虽然身居高位，手握军权，但是，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表现出他特有的忠诚、谦逊、宽容和忍让的高尚品德，使我感到非常敬佩。

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以后，我从闽粤赣军区调到瑞金的红军学校工作。当时，朱总司令正在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他的夫人康克清同志也住在红校内。因此，朱总司令一回到瑞金，我们就能见到他。总司令对红军学校一直特别关心，每次从前线回来，都要找红校的干部和战士交谈，了解情况，向大家讲述战争形势，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军事知识，迅速提高战术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的需要。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并听他谈话的时候，觉得他根本不像人们传颂中的红军领袖，更不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

“赤匪头子”，而像一个身穿军衣朴实善良的老农民。他的平易近人与随和宽厚的性格，不仅给我留下了最初的深刻印象，而且感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始终保持了这一特色。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周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上海站不住脚而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到中央苏区，就指责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正确战略战术是什么“游击主义”、“右倾错误”等等。同年九月间，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由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满脑子都是军事教条主义，自恃有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支持，根本不把朱总司令放在眼里，独揽军事指挥权，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独断专行。他的这种作法，使我们许多同志都为之忿忿不平。可是，朱总司令并不计较这些。他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努力工作，继续为党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这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

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我被调到军委总部，担任李德的翻译。当时，朱德同志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司令。这时，我同他的接触更多了，经常在军委和中央的会议上，听到他的发言和讲话。他的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敌我情况的透彻分析，使我十分敬佩。然而，由于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和李德的专权，朱德和毛泽东等同志的许多正确意见，都被一再拒绝接受。结果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进行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初期，朱总司令在军委纵队，我也随军委纵队行动，康克清同志是机关直属队的指导员。当时，因卫生条件很差，许多同志因吃了辣椒拉肚子。康克清同志为了朱老总的身体健康，不让他再吃辣椒。可是，朱老总是四川人，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还是找辣椒来吃。康克清同志便以直属队指导员的身分禁止他吃辣椒，堂堂的总司令只得服从她的“命令”。这虽说是一件生活小事，但却反映了朱总司令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

朱德同志既有顾全大局、宽厚忍让的大海般的胸怀；又有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让步、坚决斗争的高度原则性。1935年1月，长征到达遵义，因工作的需要，我也列席了在遵义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总司令在会议上拍案而起，严肃地批评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愤怒指责李德等人的瞎指挥，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虽然因事隔多年，对他在会议上发言的具体言词已经记不清了，但对他那慷慨陈词的神态和是非分明的原则性，我却一直铭记在心里。正是由于朱德等同志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决定撤销了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从而使党和红军又重新回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从此以后，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根据中央的决定，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随同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行动。不久，张国焘背离中央的北上方针南返川康。这时，朱老总实际上被张国焘剥夺了指挥职权，以至被软禁起来了；但是，朱老总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并没有畏怯退让，仍然坚持原则，主张北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地斗争，迫使张国焘北上，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从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长征以后，毛泽东同志正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一如既往地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他的这种从不居功，毫不争权，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坦荡胸怀，在党内外早已有口皆碑。但是，林彪之流却对朱老总的这一美德进行恶毒攻击，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是争权夺利的野心家，而对朱老总的高尚品德，却没有丝毫地损伤。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工作，与朱德总司令同住在延安的王家坪。当时，他已年过半百，而我们只不过是三十上下的年轻人，有的还没有成家。朱老总经常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大家。那时所谓好吃的，也不过是他。用四川家乡的方法脆制的臭咸鸭蛋，有时有一两盘四川味蔬菜。每当休息时，朱老总不是和我们一起打篮球，就是找我们或参谋、警卫员们一起打扑克牌。一玩儿起来，就分不清谁是总司令，谁是小战士了。他照样同打扑克的对家打暗号出牌。他每赢一盘，都和小青年们一样乐得开怀大笑；要是偶尔输了，就非得翻过本来才罢休。所以，在游戏时，他也是个非赢不可的“常胜将军”。从这些生活小事中，也可以看出朱德同志对同志，对群众是多么真诚与热爱！这是他的崇高品德的一个重要侧面。

全国解放进入北京以后，我与朱总司令的直接接触的机会少了，主要是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见到他。有时，在外事活动中也常与他相遇。每次重逢，他都关切地问问我的近况。虽然这时他已经是党和国家的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人们还是习惯地叫他“总司令”。他对我们也还是像过去在瑞金和延安时那样亲切随和。有几次他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我有幸成为代表团的成员。例如：195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同志是我党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王炳南和我都是代表团团员。出国前后，他从贺词和讲话文稿到活动安排与礼仪等各项工作，都过问得十分认真细致。他率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文革”开始后，从未总司令本人到他带领过的一大批老同志，都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一些造反派组织还成立了什么“揪朱兵团”、“批朱联络站”，把大字报和大标语，贴的到处都是。当时，也有一个专门揪我的“兵团”。我听说朱老总面对那些恶毒攻击，一直像泰山一样巍然不动，不屑理会，我的心里也就踏实多了，使我受到很大鼓舞，经受住了这场特殊战斗的考验。后来，我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以后，第一个去拜访看望的就是朱总司令。因为我们都是劫后重逢，所以，见面后格外高兴，他老人家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令人十分痛惜的是，1976年夏天，朱老总突然一病不起，溘然长逝。这不仅在我个人的感情上受了重重一击，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人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当时，江青一伙正利用周总理的去世和毛主席的病重，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朱总司令这棵大树又倒下去了，确实使人分外担心。幸而几个月后，由当年“朱毛”亲自带领培养出来的老师们和党的领导人，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头子的“四人帮”，使党和国家终于摆脱了危机并出现了转机。虽然朱总司令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天，但是，这个胜利无疑是实现了他老人家的遗愿。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我每时每刻都在怀念着他。每当我追忆起他的丰功伟绩时，特别敬重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他确实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特别在今天，学习朱德同志的革命精

神和崇高品德，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作为一个跟随朱德总司令数十年的老兵，衷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应以朱德同志为镜子，经常照照自己，特别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更应该如此。

朱德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存！

1991年6月

朱总风范永存我心

康克清

阳光洒进卧室，放在书桌左端的朱老总瓷盘遗像泛起光彩。他抿着嘴正在静静地思考着，微笑着，似乎正要同我交谈什么……这一历久而弥新的神态，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今年12月1日，是朱老总诞辰一五周年。我凝视他的遗像，往事历历，宛若昨日。

—

记得1928年秋天，红军刚刚来到我的家乡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万千农民欢天喜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国民党军队正从河西向我家乡逼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决定撤离。我们农军战士接到上级命令，除留下必要人员，其他同志一律随红军上井冈山。我们万安的一百多个农军战士，包括七名女同志，就这样上阵了。对我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从此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了。

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说，“朱军长来了。”以前，我还幼稚地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现在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和敬仰。我挤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着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凡，平凡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俩会结成终身伴侣。

以后，在战争的岁月里，在行军途中，我常常听到战士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很艰苦，可是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每每部队一宿营，朱军长就去和老乡聊家常，帮他们扫地、干农活，就像是自家人。他的行动无形中影响了广大指战员，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在向赣南、闽西挺进，以及后来在苏区的那几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每次作战；朱老总总是先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研究兵力的部署，作战斗动员，认真细致地对待每项工作。即使碰到了挫折，他也镇定如常，告诉大家要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前途是光明的。人所共知，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是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在战斗的间隙，他和战士们有时一起下棋，有时一起打篮球，总是精神抖擞，非常认真。朱老总爱护战士是有名的，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苏区打“AB团”伤害了不少的好同志。有一天，一群人跑到朱老总驻地，不分青红皂白，把朱老总的警卫员小拐子（李少清爱称）抓起来了。朱老总闻讯走了出来，严厉地指出，小拐子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跟共产党干革命，“AB团”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证据抓人？那伙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小拐子如今仍然健在，每谈及此事，他对朱老总的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二

1934年，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直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提出了错

误的作故方针，改变了朱、毛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最后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忍痛撤离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回忆长征，最难忘怀的是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军经历千难万险，在川康边境的懋功与四方面军汇合，大家高兴得跳啊，唱啊，以至热泪盈眶，像亲人久别重逢。岂知张国焘心怀叵测，在过草地前，他就煽动部队说前面有大河没法过，要部队折回西康。朱老总和刘伯承参谋长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当时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敦促他北上抗日，可是他拒不受命。一计未成，他又公开策划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妄图将另立中央。带领部队南下的阴谋强加于人。他一再逼迫朱老总发表反对党中央北上的宣言。朱老总斩钉截铁地说：“我赞成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手只能举一次。”“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我们这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办不到。……”张国焘恼羞成怒，就诡计多端地搞小动作，进行挑衅。

有一次五军团断了炊，几位同志不知从哪里赶来了几只羊。张国焘唆使部下借口把他们痛打了一顿，羊却被扣下杀掉吃了。五军团的同志气不过，找到朱老总评理。朱老总反复讲：“官兵都是好的，是革命的，要多做工作，不能为此打内战，要顾全大局。”张国焘的挑衅手段极其恶劣，明明他当时有七匹马，可偏偏朱老总的那匹马找不到了。有人知道是张国焘的警卫牵去杀了。有天晚上，他们竟还撤了朱老总的卫兵。张国焘一伙就是这样肆无忌惮，不断制造事端。朱老总胸有成竹，以不变应万变，使张国焘的阴谋难以得逞，官兵们也逐渐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张国焘连我也没放过，他派人监视我，给我另行分配工作。显然，这是为了限制我和朱老总的接触。我实在憋气，要去我党中央说理。朱老总耐心地劝导我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我觉得朱老总说得有理，心情也就平静下来，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我们始终处于有理、有节的主动地位，团结了广大红军干部。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军心民意、充分暴露了他反党篡权的朋谋野心，最后只能落个身败名裂。

忆起长征途中朱老总同张国焘的几番斗争，三言两语很难表达当时尖锐、复杂的情况。朱老总始终如一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后来，毛主席听了他与张国焘斗争的汇报，称赞他“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他是当之无愧的。

三

1939年冬天，朱老总五十三岁寿辰。没有开庆祝会，也没有贺寿筵席，祝贺的形式朴实而庄重。在一个广场上；搭起了席棚，席棚的墙壁上，贴满了信件，这是战士和同志们给他写的祝贺信，大家都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当时，天气寒冷，可是去那里看信的人却人山人海。其中一个青年战士的信里，有这样一句充满深情的话：

“我对父亲的爱是和他属于那革命的事业结合着的。”

我也参加了这个行列，聊表自己的心意千万一。记得我给他写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还

有,你见书便读,学而不厌,总是前进着,提醒同志,督促同志,爱护同志……”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我现在的认识。几十年过去了,后来的生活实践更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

1940年春天,国民党内的投降倾向日益严重,党中央决定要尽一切可能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战,并决定朱老总亲赴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当时反共老手胡宗南、朱怀冰等正在洛阳。大家对朱老总的安危十分担心,朱老总却说:“只要国民党不公开投降日本,我们就要以斗争求团结,又团结又斗争。”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没啥了不起,一切以统一战线、抗日救国为重嘛!”作为随员,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临行前,中央领导同志一再交待,无论是闯过日军的封锁线,还是通过国民党的统治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朱总司令的绝对安全。护送朱老总出太行的红三连全体共产党员一致保证,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朱总司令受任何损伤。

那天清晨,当三连的健儿们到达朱老总在武乡的住地时,他已一切准备就绪,笑眯眯地对大伙儿说:“好啊,你们来了。咱们就出发。”上路后,有的战士悄悄说:“咱们的总司令像战士的慈父,平易近人,半点官架子也没有。”当时,朱老总特地穿了一套新卡叽布灰军装,腰里束的宽皮带上铸有“瑞金纪念”四个字。他骑在高头大马上,神采奕奕,八路军总指挥的气概和威严跃然在眼。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冀察分会副主任委员王藻真先生和我们同行,在人流中他一再盛赞朱将军文精武备、心胸似海的气度。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朱老总总是关心野外警戒的同志吃得饱不饱,穿的是否能御寒,有没有热水洗脚,有时,还帮炊事员支炉灶安排大伙的生活。他还一再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敌情,严防敌特破坏。通过封锁线时,朱老总亲自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碉堡里的动静,充满信心地鼓舞大家说:“鬼子们再刁,也是侵略异国领土,他们人地两生。我们有老百姓相助,就是刀山剑林也能穿过去。”根据朱老总的意见,延安电影团的同志,把四盒拍好的胶片《延安与八路军》分别捆在背包里,随时背在身上。因为这些胶片反映的是华北前线子弟兵坚持敌后、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是人民群众英勇支前参战的壮丽画卷,是珍贵的资料片,必须保护好。在紧张而有秩序的行军中,朱老总一面随大伙翻沟芽林,一面查看地图,通过电台随时和延安联系,并了解前线各作战部队的情况,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就在这样繁忙而紧张的情况下,他对每个随行人员都十分关心,布置工作细致妥贴,使每个指战员都深切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这次行动不仅是护送朱总司令,更是保卫华北抗日前线的总指挥部,关系着敌后各根据地广大军民抗日斗争的成败。大家都兢兢业业,高度戒备,我更感到肩头沉甸甸的份量。

有个深夜,远方传来几声犬吠声。“快走,快走!”前面传来命令,要通过公路封锁线,紧急而低沉的口令在护送部队中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虽是寒冷的春夜,但在急行军中,每个人都汗流浹背。为了抓紧时间赶路,尽快脱离日军警戒区,部队刚刚过了邯(郸)长(治)公路,鬼子的一个汽车队就开过来了。朱总司令命令:“直插田间,由便道行军!”带路的老乡领着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了敌军流动哨巡逻区。

当我们到达八路军新一旅驻地——壶关县的郭家坨时,朱总司令和同行的王葆真先生进行了划界谈判,确定以距郭家坨五华里的大井村为界,界北

为八路军防地，界南为国民党防地，双方不越界，界上不驻兵，消除摩擦，团结抗战。这一举动对于揭露顽固派、团结友军起了很大作用。

5月初，我们到了河南济源县王屋山上。一天拂晓，朱老总漫步山野，遥望滚滚的黄河，耳闻日寇隆隆的炮声，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敌人任意践踏，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下了太行山，渡过黄河天险，我们就到达了古城洛阳，受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款待，朱总司令在卫立煌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记得有这么一段话：“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汉奸、投降分子和‘摩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卫立煌为首的国民党第一战区的要员们，听了朱总司令以抗日救国为重的真诚演讲，多数表示赞同。但也有吹冷风的人，他们看到朱总司令和卫立煌一谈一整天，很是投机，就讲起卫立煌“近朱者赤”等闲话来。在多方面的接触中，我们发现有的人笑里藏刀，妄图扣押和谋害我八路军代表，但多数人还是愿意共同抗日的。朱老总根据他们的不同态度，按照党中央“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

这次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效。协商解决了晋东南国共两方军队以漳河为界的驻防区；允许十八集团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继续给八路军发放军饷等。谈判之余，朱总司令和我们一行随员，都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时晚饭后，当朱老总和警卫部队一起打篮球时，球场四周的观众挤得水泄不通，看着朱老总在球场上机动灵活的身影，战士们也打得毫无拘束，他们对八路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中旬，我们离开洛阳，路经西安，稍事休整。5月24日，即动身返回延安。同行的增加了茅盾夫妇和张仲实同志等，共四十多人。经过黄陵时，朱老总提议拜谒一番。我们的车队停在桥山脚下，大家抬级而上，来到黄陵前。入口处有一牌坊，上书“轩辕黄帝陵”五个大字，有卫兵守卫。卫兵看到大群人前来，连忙阻拦，说是奉上级命令，此乃国防重地，不准参观。我们派人找上级交涉，他们听说是十八集团军的朱总司令谒陵，也就通融了，陪我们一同登上陵墓，还作了介绍。整个陵墓古朴雄伟，迎面一个巨大的土塚，塚前有一个平台，台前立一大石碑，上面刻有祭文。陵墓周围的山坡上古柏森森，直插蓝天。

在陵前我们合影留念。朱老总请茅盾同志讲讲黄帝的故事。他说，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姓姬，号轩辕氏，相传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黄帝既有武功，又擅文治。在他的治理下，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手下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他的妻子嫫祖发明了养蚕和缫丝。他又与一个叫歧怕的医生编了我国第一部医书《内经》……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或者是神话。但这些传说神话在人们口头传颂了五千余年，正说明了黄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他代表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茅盾讲完，

朱老总作了即席讲话。他说，刚才沈先生（即茅盾）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一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到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朱老总的讲话言简意赅，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心。

四

缅怀朱老总，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那十年，党和国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都处在忧患之中。朱老总正是怀着难以言喻的深重忧虑，于1976年7月6日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而又正处在劫难中的人民。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难以理解。有一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总要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提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1967年1月的一个傍晚，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一伙人闯进了朱老总的住地。正巧朱老总不在家，那伙人就在门前、墙上贴满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等标语。不久，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大有乌云压城之势。当我向朱老总谈起这些情况时，他坦然他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若干年后，戚本禹刑满释放，寄来了道歉信，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深表悔恨。虽然朱老总已经作古，但即使是在这件事情上，也证明了历史是最公正的。

1967年夏秋之交，我正在接受群众的批判，批判我是“走资派”，“十七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我有口难辩，思想上很难接受。回到家里，我忧心忡忡地对朱老总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要成什么样呢。”朱老总却充满信心地因答我说：“只要主席在，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也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京举行。当时，朱老总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但他仍抱病参加会议。林彪、江青一伙心怀叵测，在会上多次对朱老总进行因攻，逼他检讨，有一次他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不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不再说话。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啦。”

这年十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的“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我困惑地问朱老总：“真的要打仗了吗？”朱老总深沉地回答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战争的预兆和迹象。”

这时，朱老总要被“疏散”。他对我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我为难地说：“按理说你应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全国妇联的军代表若不点头，我要走也走不了。”朱总沉思片刻，果断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请他去跟他们说说。”就是这样，我随朱老总到了广东。我们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接待我们的人，不许我们进广州市，要我们直接去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可是我们哪里有心情欣赏？他们还规定我俩不得访问附近的工厂、农村，散步也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我对这样的规定很反感，我说我在北京是自由民，想到哪里都可以随便去，困在这里算什么。就在这样的逆境中，朱老总仍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宽慰我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你就安心陪着我吧。”

时刻萦绕在朱老总心头的，是工农业生产。有时他自言自语：他说：“，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破坏了生产，这如何得了！”

1970年夏天，朱老总因人大常委会开会回到北京，行动上略有了一些自由，他不顾年迈，抓紧时间到首钢和农村去视察。针对“四人帮”一伙批“唯生产力论”的谬论，他对生产第一线的干部说：“别听有些人‘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可是实际上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劳动，不生产，能行吗？粮食、钢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1974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在会上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同志的名，矛头对着周总理。更令人忧虑的是她把手直接伸向了部队。回到家，我赶紧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告诉了朱老总，他听完后没有马上说话，似乎在思考什么，我着急地看着他，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答案。半晌，他才胸有成竹地说：“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经他这么一分析，我如释重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朱老总万分悲痛，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不断念叨：“恩来，你在哪里？”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难以言喻的焦虑，拄着手杖，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行庄严的军礼，久久不忍离去。

那时，他的健康情况继续下降。可是他总说：“总理不在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带病开会，看文件，会见外宾，找人谈话。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班子很好，不能变动。

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已经有病，但他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这次会见的时间有变动，朱老总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他的病情更加重了，经医生会诊后，立即住院治疗。7月初，当先念同志到医院看望他时，他一再强调要抓好工农业生产，并说：“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

朱老总怀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因为他未能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未及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当我坐在他最后十年生活和工作的房间里，缅怀这些往事时，每每感到朱老总依然在世。他每天用的砚台和毛笔仍在书桌上摆着，继续为我使用；他读过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都留下了他阅读时的记号和眉批；还有那把用布沿了边的芭蕉扇……每件他使用过的物品，似乎都散发着他的气质和情神，当我目睹或接触到它们时，总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感到无限的亲切和充实。尤其当我抬头凝眸端详挂在左侧墙上的条幅——“革命到底”时，真是思绪万千。那是朱老总 1975 年 3 月 6 日书写的，四个苍劲、浑厚的大字，显示了他的坚强意志，倾注了他对我及后来人的希望。他的真诚、善良、坚毅、博大、宽容等一切美好的思想情操，仿佛都融在字中，跃然纸上，令人回思无穷，令人感奋不已。

对先行者的最好怀念，当然不是眼泪和誓言，而是怎样脚踏实地把他们的事迹推向前进，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朱老总和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将永远激励我们朝着他们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奋勇向前！可以告慰朱老总的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稳步前进！

朱总风范，永存我心。

1991 年 7 月

浩气传千秋

萧华

当新中国在东方巍然站起的时候，中国人民忘不了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忘不了毛主席及其他兴邦创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说过：朱毛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朱就没有毛。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风雨同舟，并肩作战，为创建和发展成无不胜的人民军队，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吏义的反动统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朱总司令的英名，象一颗灿烂的明星，将永远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闪光！

—

1928年4月底，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耒市胜利会师，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红军会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从此以后，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我从1928年参加革命以来，多次听到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朱德同志的英雄业绩，一次又一次地激动着我年轻的心，可惜，总没有机会见到朱德同志。1930年6月，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行北上战役，来到了兴国。7月中旬，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北上誓师大会。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梭标闪光，昂扬的战歌声，宏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忽然，热烈的掌声铺天盖地，如江潮一样汹涌而起——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政治委员等领导同志登上了讲话台！

毛泽东同志，我早已见过两次了，而朱德总司令，则是头一次见到。在我的意想中，这位领导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伟大人物，该是一尊英气勃然，高大威武的形象呀，可站在眼前的朱总司令，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个头不高，腿上打着齐整的绑带，脚穿一双粗茅草编织的草鞋，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然而，脸上的表情是轻松而慈祥的，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双深邃明净的大眼，稳重地环视着集结在草坪上的队伍。当他站起身的时候，就习惯地将两腿分开，双臂交叉在背后——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大约是因为经历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斗争的缘故吧，所以那副瘦削的身体就显得像钢铁一样坚强。在那个年月里，我所见到的国民党的军官，哪怕一个小小的排长都是趾高气扬，耀武扬成呀，老百姓看见了，就远远地躲到一边去了，简直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而我们工农红军的总司令，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沉稳厚重，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军队呀！

在我后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的时候，与朱总司令的接触就频繁起来了，并亲聆他的教导。那时候，为了提高和巩固部队的战斗力、红军青年工作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为了教育和团结广大青年群众，我们红军的连伙中还成立了以朱总司令名字命名的“朱德青年队”。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参加红军的战士大多是十五六岁或二十岁左右的工农青年，所以，无论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还是朱德同志，上上下下都对青年工作关怀备至。

每当青年团或“朱德青年队”开会的时候，朱总司令向来是有请必到。总司令讲话操一口四川音，从容自然，通俗易懂，有些重要地方，他就反复他讲解。他说：“我们红军，是闹革命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我们不能光看到敌人的强大，不要怕眼前的困难，我们要用战斗夺它几十个州县，将来的天下都是我们的！青年人要有这个志气，要在这支队伍中当中坚、

打先锋，要给受苦受难的穷人争气。希望你们勇敢坚强，作吃苦耐劳的模范，英勇杀敌的模范……”总司令的话，浅显朴素而鼓舞人心，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青年战士们听了很受教育，很受鼓舞，越听越想听。

周恩来政委和朱总司令为了将青年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不仅帮助我们青年部制订了具体的方针措施，而且在青年部的各项具体活动中又是热情的组织者和积极的参加者。1933年7月，我在《青年实话》周刊上写过一篇《火线上的青年晚会》的文章，就真实地记录着朱总司令在青年晚会上视察军事体育比赛、歌咏比赛和游艺比赛的生动情景，朱总司令总是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出现在革命队伍之中，是丝毫没有官架子的。我记得总部机关有一次开晚会，大家轮流抽签，或者唱歌，或者说笑话，或者猜谜语，轮到朱总司令抽签时，恰巧抽出了一根写着“说笑话”的签子，总司令的笑话讲得趣味横生，乐得大家前仰后合，有的人竟笑得捧住肚子、迸出了泪花花……。当时红军的官兵，就是这样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每逢我在工作中碰到了难题去找总司令的时候，总司令就耐心地开导我，讲井冈山的艰难困苦，讲我们这支军队充满了光明的前景与希望。总司令自己的生活很俭朴，饿了的时候，就把锅巴、炒米用白开水泡一泡来充饥，他有时候边嚼边讲：“革命战争就是个大熔炉，只有经得起千锤百炼的人，才是个有希望的青年。”接触得多了，每一个人都从心眼里感到、朱总司令是诲人不倦的良师，也是爱兵如子的慈母。他就是用这种实心实意、诚诚恳恳的思想工作，关怀着青年一代的成长。

二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战役，对长征中的红军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关口。赤水河蜿蜒七百里，是川、黔两省边界的重要水道，是我们向北挺进的一大障碍。

渡河的那天，天空浓云密布，阴沉沉地下着小雨，条条小路像涂了一层油，光滑难行。赤水河大约二百米宽，深水里飞涌着暗灰色的浪涛。正当红军组织渡河的时候，突然传来四川军阀刘湘派遣他的主力“模范师”向赤水压来的消息。那时候，红军正依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部署，挥军北上，湖南军阀何键，贵州军阀王家烈，云南军阀龙云，蒋介石的“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几十万人马正从各个方向对我们进行合围，妄图在赤水和长江之间将我军一口吃掉，整个形势是相当危急的。为了掩护红军主力从赤水镇渡过赤水河，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迎击敌人，阻击“模范师”的进攻。

这个团奉命后轻装疾进，以闪电般的动作，在距赤水河三十里左右的地方，拦住了气势汹汹的“模范师”。那时候，我奉军团首长的指示，到这个团进行战时政治工作。

双方相距只有几百米，透过茫茫雨幕，各自能隐约看到对方晃动的身影。敌人都是本地兵，地形熟悉，又以逸待劳，情况对我们是很不利的。就在敌人居高临下，沿着丘陵地带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朱总司令突然赶到阵地上来了！细雨淋湿了他的农裳，裤腿沾带着黄泥，就连那浓重的眉毛上也挂着水珠儿……总司令到来的喜讯迅速传遍了阵地，红军战士声威大震，勇气倍增。朱总司令不顾危险，沉着冷静地同我们一起，亲临前线进行指挥。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挫败下去，我担心总司令的安全，几次劝他退到后边去，都被他坚决地回绝了。战斗接近黄昏，两个营相继后撤，只留一个营继续坚守着阵地，子弹象蝗虫一样在四处横飞，我们再一次提出要求：“总司令，你

年岁大，路又很滑，还是先走一步吧，这里有我们顶着，你放心好了。”总司令抹了抹满脸的雨水，声音不高，却很坚决：“不行！”就这样，总司令和最后一营人一直坚持到黄昏时分。有总司令在身边，同志们仿佛就有了坚定的主心骨，忘记了疲劳、寒冷和伤痛。这一营人，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顶住了“模范师”一次次的冲击。

直到夜幕降临，我们才和总司令一块，赶到了赤水河边，在那竹绳竹排扎就的浮桥上，迅速地赶了过去，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渡河。

自从那次炮火硝烟中仓促一会，总司令就与我们分别展开了艰苦的长征，一年多的岁月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朱总司令了。人不见，心相连。朱总司令坚决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进行斗争的情景，我是知道的。张国焘自恃军力雄厚，向党要挟，诬蔑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率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是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朱总司令与张国焘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是不能离毛的。”“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我是举手通过了的，我决不能反对它！”这场斗争，表现了朱总司令威武不屈、坚定不移的革命气概。总司令部么大年纪了，他先后过了三次草地，在那么险恶的政治环境和那么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我们这些已经北上了的干部战士，怎能不为我们的朱总司令担忧呢？！怎能不为兄弟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担忧呢？！

1936年10月初，我奉命率领红二师主力到会宁东百余里的界石铺，向西安、平凉方向警戒，掩护二、四方面军通过西兰公路。有一天，通讯员告诉我，会宁来的长途电话找我。当我拿起听筒时，里面突然传出朱总司令那熟悉热情的四川口音！赤水别后，梦牵魂绕，想不到在这儿猝然相逢了！我双手把住听筒，心头一热，喜泪盈眶！周围的同志听说是朱总的电话，也忽拉一下围拢上来，悄然聚集在电话机前，这些老同志，与我们的总司令同甘共苦，一个锅里搅过青菜南瓜汤，相互间有着深挚的感情啊！

在电话里，朱总的声音也很激动，他简直恨不得将什么都一口气问个明白：

“毛主席身体健康么？周副主席怎样呀？彭总、剑英、荣臻、小平、左权……他们都好么？……陕北根据地有多大呀？刘志丹、徐海东你见过没有？他们有多少部队？陕北的粮食怎么样？你们的部队扩大了多少？……”对于朱总司令所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这次通话，长达半个小时，朱总司令对老同志、老战友无微不至的深切关怀，对陕北老根据地军民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像长江黄河的滚滚浪涛一样，激动着我的胸怀，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永不磨灭的一面。我抑制不住自己火热的感情，后来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军旗红似火，银线传佳音。欣闻朱总话，热泪顿沾襟。去春别赤水，今秋逢会宁。声声山岳重，句句铭记心。……”

三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朱总司令以军事家独有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始终同毛主席一起，指挥着对日作战。

1938年夏天，在吕梁山兑九峪镇子上，朱总司令视察了我们部从和群众白卫队的表演。表演场上，刺刀闪着寒光，梭标红缨似火，雄壮的歌声与整齐有力的脚步声交汇在一起，刺杀比赛开始了，喊杀声震动天地，三八枪如龙翻卷……颇有点“长矛大刀闪银光，抗日烈火遍山乡”的景象，朱总司令

望着这生龙活虎的队伍，面露喜色，他仿佛看到了抗战胜利的伟大曙光。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朱总司令给战士们和参加会议的老百姓讲了话，他兴奋地指出：“我们八路军北上抗日，去年九月的平型关战斗，打败了日本鬼子的主力部队板垣师团，以后，又在阳明堡勇敢地袭击了敌人的飞机场，大大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壮大了八路军的声威。我们八路军、敌后的抗日军民和整个的中华民族已经建成了新的抗日长城，日本鬼子在这样伟大的长城面前，是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给我们以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1938年的秋天，我奉命率先遣部队东进，准备到敌后（津浦线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路过晋东南太行山的时候，我特地到朱总司令那儿去，听取他对我们开展敌后工作的指示。

那时候，抗日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总司令的工作是紧张而繁忙的。他和彭老总每天都守在作战科，拿上放大镜，察看地图，有条不紊地批阅从黄河两岸各个战场飞来的电报。听说我们来了，朱总和彭总非常热情地接见我们，招呼我们吃饭，而且立即就敌后工作作了一系列详细的指示，大意是：

“要发展抗日武装，壮大抗日力量。派你们到敌后去，你们是火种，目的是要在广大的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统一战线，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点燃抗日的熊熊烈火；

“你们远离总部，是敌后的敌后，为了创建根据地，你们的一切供应都要依靠人民支援，都要依靠你们自己解决，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

“平原游击战争是一个新的问题，要很好地组织游击队和自卫队，创造作战的经验。准备长期坚持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

朱、彭总司令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心里装着整个敌后波澜壮阔的抗日战场。听罢他们的明确指示，我觉得胸襟开阔多了，眼睛也更亮了，于是我们就满怀信心地挺进到了敌后。

当时我担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以后又奉命担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担子是很重的，斗争也是极其复杂而尖锐的。在我们正需要力量的时候，1939年的秋季，朱总和彭总又托人给我和杨勇副司令员带来了指示信。这封信很长，约有六千余字。在信里除充分肯定“开创了今天鲁西北的根据地，军队的本身也是在这个艰苦的斗争中更加发展、更加坚强起来了”的工作成绩之外，还特别强调：“应该知道，没有军队就没有根据地，但如果没有根据地，军队也就不能生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经验应该深刻记住。”“目前鲁西北军队工作的方向，一股的不是发展，而是巩固，因此，巩固军队第一等的重要问题，便是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与提高军队中的党性问题。”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应当在干部中提出创造大批模范指挥员的运动。要求每一个干部都为着模范指挥员的方向而进行极大的努力。大批模范指挥员的养成，这是铁的党军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倡学习，“勤学者奖，懒学者罚。”朱总司令经历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坎坷，艰难险阻，在巍巍的太行山，在抗日的第一线，他加强了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和研究，在给我和杨勇同志的这封信里，就处处闪耀着马列主义真理的光辉。从1937年到1940年，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同日伪作战一万多次，歼敌十万余人，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华北收复赖群雄，猛

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朱总司令在四十年前留下的这首气势磅礴的《赠友人》的诗篇，显示了他稳操胜券的革命军事家的英雄气概。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从亲身的接触中，对此有着更加深切的体会。

四

“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施旗满地红”。新中国建立之后，朱总司令进驻北京，这期间，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十年动乱中，是非混淆，人妖颠倒，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更成为林彪、“四人帮”那伙篡党篡军的阴谋家的眼中钉，他们公然诬蔑总司令是“黑司令”，对总司令忠于革命、忠于军队的历史业绩肆意歪曲，诬蔑……敬爱的朱总司令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横遭诬陷。当我得知有的“造反派”在墙上画了漫画，丑化他的形象的时候，真是万箭穿心，义愤填膺！

我也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关了七年半之久，在我被毛主席指名放出来后，我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去看望朱总他老人家。

数年不见”他明显地苍老了，皱纹也多了，脸上的寿斑也更明显了，然而，他戴着老花镜，仍是那么慈祥，那么和善，那么可亲，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一句连一句地询问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满肚子的话在嗓眼里哽着，一句也说不上来。只有悲愤，只有热泪。坐下来后，他老人家仿佛慈父摸准了儿女的心思似的，给我留下了许多肺腑之言。

他说：“肖华呀，你还年轻么，在部队，还可以工作几十年的。”

“要振作精神呀，共产党员，受点委曲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的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我们不能灰心呀，肖华同志！”

当我以愤慨的心情诉说林彪一伙肆意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时，朱总司令显得严肃了，他沉默了片刻，摘了老花镜，语调深沉而缓慢，“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林彪才是一个营长哟，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不行的。长征时，李作鹏是个小机要员，邱会作呢？是个担担子的挑伕……后来官做大了，与我不来往了，见了我连理都不理了！他们的架子大得很了，连我都不认识了！……”

朱总司令说到这儿，不屑地摇了摇头，明确地表示了对这伙丑类的蔑视。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

“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这些年，你被关着，外面有许多情况你都不了解了，所以要抓紧学习呀，多看些书，特别要多看些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

朱总司令历来注重学习，这我是深知的。五十年来，他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在革命最紧张、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从来也没有放松过自己的学习。在太行山，他曾拿一只小板凳，和大家一块坐在梨园中，听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这次我出来以后，就听说这些动乱的年代里，他仍然坚持学习，而且让儿媳妇当学习组长，他亲自进行组织辅导，让全家老小一段一段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想到这儿，我望着他老人家放在书上的放大镜，红铅笔，充满了钦佩之情。

总司令见我凝望着桌上的书，想了一想，忽然关切地问我：“肖华，你的家里现在还有书籍吗？”

我说：“我的家给那些人抄了三次，一掠而空，什么都抄完了，抄走了。”

听了这话，总司令站起来了，他走到一边，打开书橱，执意要送书给我。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从书橱里选取了一本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选集。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要好好地学，它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列的武器。”几年过去了，每当我捧起这本书，朱总司令的教诲就回响在我的耳边。

1976年，朱总司令病危之际，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在他老人家辞世的前一天下午，我同肖劲光同志一起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老人家躺在病榻上，已经不能讲话了。他只能微微地睁开眼睛，深情地、吃力地注视着我们。周总理不幸逝世，“四人帮”加紧夺权，毛主席也重病在身，而朱老总……国有危难，万感交集，我们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浩气壮山河，遗爱永留芳！敬爱的朱总司令，早在1946年，毛泽东同志就为你作了“人民的光荣”的光辉题词，望着这金光闪闪的题词，勾起了我的万千思绪：南昌起义的枪声，井冈山的扁担，茫茫的雪山草地，巍峨庄严的太行山……伟大祖国的山山水水，无不标志着你创军开国的丰功伟绩。林彪、“四人帮”妄想将你从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抹掉，到头来被历史潮流淹没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在几十年的革命风雨中，我是在你老人家的循循诱导下逐步成长起来的一名战士，我要铭记着你的教诲，永远前进，永远革命！

1981年6月

教诲照征途

韦杰

在战争年代里，我有机会几次受到朱总司令的直接教诲，抗日战争初期，曾跟随他老人家渡过一段难忘的日日夜夜。每当我回忆起他老人家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亲切感人、循循善诱的谆谆教诲，总感到心中有无限温暖，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激励我去战斗！

—

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是在 1932 年春天。当时，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胜利地粉碎了敌人连续发动的三次反革命“围剿”，正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方面军总部办了一期情报侦察干部集训队。我也参加了这次集训学习。朱总司令对集训队很重视，亲自给我们上课，使我这个刚开始成长的基层干部，受到了朱总司令这样的老前辈的直接培养教育。

集训队办在瑞金附近一个小山上的松树林里，住的是茅草搭的简易房屋。没有课堂，更没有桌椅。每逢上集体课，每人就搬一块石头当凳子坐在地上。那天，当朱总司令来上课的时候，我们早已整理好队伍，大家怀着无限兴奋喜悦的心情，热烈鼓掌欢迎。朱总司令穿了身补了疤的军服，孔着腰带和绑腿，神采奕奕地来到我们队列前。我是跟随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中央苏区的，还没有见过总司令，但他老人家的崇高威望早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早就盼望有一天能见到这位深受崇敬的人。这下朱总司令就站在我的面前，而且马上就要给我们上课，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老人家那慈祥、浓厚、亲切的笑容，一下就吸引了我。我不转眼地看着他老人家，不停地使劲鼓掌。当值星员一声口令命令我们坐下的时候，我还呆呆地站着，班长在旁边拉了我一下，我才很快坐下。总司令首先问我们都是哪里人：

“老表有多少？”

江西的同志举手。

“老广有多少？”

广东、广西的同志举手。

“湖南人有多少？”

湖南的同志举手。

“还有其他省的吗？”

有几个福建的同志举手，说他们是福建人。

接着，朱总司令笑着问：“我是四川人，讲话你们听不听得懂？”“听得懂。”大家齐声答道。

总司令说：“我尽量讲慢点，如果你们听不懂，就给我提出来。”使我感受最深、教育最大的，是朱总司令在讲课中，处处突出毛主席。他那朴素的语言和真挚的表情，自然地吐露出他对毛主席真诚的尊敬和信赖。他饶有风趣地说：

“人家都说‘朱毛’，其实应该是‘毛朱’，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应该在前头，我的名字应该在后头。”

我猛听到总司令这样说，还不知道是啥意思，仔细一想，才领会到这里面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含意啊！记得当我们刚从广西到江西苏区的时候，到处看到敌人贴着‘活捉朱毛’的标语，老百姓也悄悄问我们：“朱毛有这么大

的本领，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今天，从总司令的讲话中，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朱毛”的关系，他们是在革命激流中结成的战友，是在坚定的共同信仰下结成的同志。而正是他们亲密的团结，互相信赖，才使敌人害怕，才使老百姓误认为是一个人。毛主席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党的总前委书记。总司令在讲话中，就亲切地称毛主席为总政委。他联系自己的革命实践，总是口口声声赞扬毛主席。他说：

“我们和总政委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会带兵打仗，照他的办法就能打胜仗。”“总政委说，现在敌人比我们强大，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拚，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到江西以来，就用了这个办法，打了很多胜仗。”接着，总司令又用很多反“围剿”中的战例和通俗易懂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十六字诀这一战略战术原则。他说：“用这个办法就能变被动为主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搞得他没有办法对付。”

这时，我虽然已经当了人民军队的一名基层干部，但对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还是很不清楚的。总司令在讲课中，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详细讲解了毛主席的建军原则。他说，我们红军和旧军队不一样，我们是为了全国老百姓翻身求解放打仗的：红军里的每个成员都是阶级兄弟，干部要关心士兵，士兵要尊重干部，要把官兵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和群众的关系搞好，不要虐待俘虏，动不动就骂人打人，搞体罚，那是旧军队的军阀主义作风；红军要有严格的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克服自由散漫和游击习气，大家在统一指挥下，把劲用到一起，才能打胜仗。

参加集训的同志，大多数做侦察工作时间都不长，经验不多，对侦察工作的重要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总司令在讲课中，针对集训队的这些特点，特别强调情报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你们不要小看情报侦察工作，这个工作是各级领导机关的耳目，只有准确地掌握了敌情，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如果不了解敌人，你们做情报侦察工作的不能及时给上级提供情报，我们就两眼一抹黑，无法指挥打仗。当时，由于红军装备比较落后，侦察手段主要是靠化装深入敌后、抓俘虏审讯等办法了解敌情。朱总司令在讲课中，还用自己在几次危急关头，如何化装脱险的亲身经历，专门讲了要学会化装、抓俘虏。他说，做侦察工作要机灵，装个啥像个啥，善于勇敢机智地对付各种复杂情况：到一个新地方，要很快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不然你化装出去就会露马脚；万一被敌人抓住，要想办法跑掉。在敌人审问时，绝对不要讲红军内部的事。我当侦察排长前，只是跟老排长执行过一次侦察任务，以后排长牺牲了，领导上就叫我当排长。所以，到底怎么做侦察工作，对我来说还是一窍不通。听了总司令生动形象的讲课，才大大提高了我对侦察工作的认识，懂得了要做好侦察工作，必须学会一套对敌斗争本领。

还有件使我难忘的事，是总司令给我们讲射击课。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当上红军第一次得到一支“汉阳造”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是排长教会我瞄准、装子弹、击发、拆卸擦拭。也就是凭着掌握的这点基本要领，在战场上消灭过敌人。但是，子弹飞出去为什么打得那么准，它的原理是什么？我常常为这个事纳闷不解。听了总司令讲的射击课，懂得了一些射击原理，才使我开了窍，解开了这个谜。总司令在讲课中，通俗易懂地讲了目标、准心、标尺的关系，讲了弹道是一个抛物线，教我们如何掌握目测距离，我们不理解什么叫“抛物线”，又没有黑板划弹道的形状，总司令就用手扔了块石头进行形象教学。从此，我才懂得了子弹飞出去是弯曲的抛物状，枪要打

得准，必须根据目测距离修定表尺，注意选择瞄准点。以后经过反复练习、体会，实战的锻炼，射击本领才逐步有所提高。

集训队在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直接培养下，办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开展革命竞赛。大家虽然住在茅草棚里，生活非常艰苦，但同志们个个生龙活虎，刻苦练功，学化装、学国民党军队官兵讲话；练射击，练击拳，练黑夜摸哨，练爬树翻墙。在掌握一些基本功的基础上，集训队还组织同志们三、五人一组，开展了化装侦察、抓俘虏等实成练兵。大家都想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练就一身硬功夫，都想在这短暂的集训中多学点东西。三个月的集训虽然很快过去了，但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人民军队传统教育，学到了参加红军几年来没有学到的东西，思想豁然亮堂了，革命精神更振奋了。不久，敌人就开始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我们回到部队，就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

二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公开打出右倾分裂主义的旗帜，强迫左路军南下川康边界地区，遭到可耻的失败。以后，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胜利，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和二方面军一道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四方面军两次过草地，同志们受尽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部队战斗力遭到严重摧残。为了保证二、四方面军顺利北上，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由先期到达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一部到甘肃会宁一带，歼灭企图阻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国民党部队，并积极筹措物资，做好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工作。我当时所在的十五军团骑兵团，就参加了接应二、四方面军的工作。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了总司令，又一次聆听他老人家的直接教诲。

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发起了“东征”和“西征”两个战役，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大为发展。我们骑兵团，就是在这个期间，利用缴获敌人的马匹才进一步扩充起来的。现在，同志们听说朱总司令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北上来了，心情激动。热情高涨，无不为即将到来的各路红军大会师而万分高兴。我们在会宁城外围，经过激烈战斗，很快消灭了驻会宁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控制了会宁城及其附近地区，等候迎接朱总司令和二、四方面军同志们的到来。

10月的甘南，天高气爽，红日高照。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先后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参加接应的部队胜利会师。10月10日，在会宁城召开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讲了话。

情报侦察集训队结业后，我就回到了部队，以后一直没有同朱总司令见过面。这次见到总司令比以前消瘦多了，内心里感到非常难受，深深为他的健康担忧。但总司令饱满的革命热情仍不减当年，特别是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他深感来之不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毛主席领导你们北上打了胜仗，扩大了根据地，事实又一次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现在三个方面军会师了，红军更强大了，兄弟部队之间要搞好团结。一方面军的同志先到，条件好一些，要帮助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克服困难。

早在二、四方面军到达之前，参加接应工作的部队就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开展了迎接二、四方面军的活动。甘南一带地处黄土高原，粮食缺乏，群众生活非常贫苦。为了给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储备粮食，我们把每天三餐饭改为两餐，省下一餐粮食留给二、四方面军的同志。甘南一

带一般的水里含盐碱很重，吃起来苦得涩嘴，不能食用，因此吃水异常困难。据说，当地老百姓选女婿，还要看你家地窖的水好不好，可见饮水的奇缺。为了让二、四方面军到达后有水用，所有部队都节约使用地窖里的水。同志们还开动脑筋，筹划物资，连夜为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打草鞋，搓羊毛绳打袜子、手套，准备渡河用的羊皮船。会师后，一方面军的同志就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和亲手打的草鞋、羊毛袜、手套等，送到二、四方面军同志们的手中。后勤卫生部门还想尽各种办法，积极为伤病员包扎伤口，治疗疾病。有的部队还杀猪宰羊，为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改善生活，共同开联欢会，演文艺节目，扭陕北秧歌舞，庆祝胜利。在那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会宁城内外，喜气洋洋，一片欢腾，大家都为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而欢呼，为战友们欢聚一堂而高兴。开庆祝大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和兄弟部队联欢，很晚才休息。但躺下后，很久不能入睡、一方面是，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兴奋、激动的心情使我不能很快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我看到总司令骑的马是那样瘦弱，思考着在我们团里选两匹好马送给总司令。第二天一起床，我就把我的想法同团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找了个内行，选了两匹最好的油黑“走马”送给总司令。

总司令看到两匹膘壮的骏马，非常高兴，问道：

“这马是哪里来的？”

“前不久缴获的。”我答道。

“训练过吗？”

“敌人训练过，我们也在训练。”

“这马会做动作吗？”

“会。”

旁边跟随总司令的同志接过缓绳，命令马做了卧倒、立起的动作给大家看。

总司令看到马很听指挥，动作熟练，十分高兴地对我们说：“这马真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你们要爱惜呀！”接着，总司令向我们详细询问了骑兵团的情况，一再叮嘱我们要把牲口保护好，要学会训练牲口，把红军这支新的部队建设好。本来，在张国焘强迫左路军南下川康的过程中，曾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对朱总司令进行围攻威逼，百般刁难，甚至阴谋陷害。但总司令在同我们接触中，却以他伟大的心胸，把个人所受的种种迫害置之度外，在言行中毫无任何表示，而且多次讲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作战英勇顽强，极力维护全党和整个红军的团结。一再指出，现在三个方面军的兄弟部队会师了，要往前看，顾全大局，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抗日高潮。朱总司令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革命全局的度量，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曾高度评价朱总司令在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表现的崇高革命品质，称赞他意志坚如钢，度量似海。朱总司令坚持真理，以革命利益为重，维护全党团结的崇高品质，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三

1937年8月，我在抗大教员训练队任队长。一天下午，上级通知我，晚上朱总司令找我去谈话。听到这个通知，心里在高兴之中，也有点胆怯。高兴的是，朱总司令在百忙中，亲自找我谈话，使我有机会能直接向总司令汇报自己的工作，聆听总司令的指示；胆怯的是，是不是自己在工作中有了缺

点错误，朱总司令知道了，要批评我。我不知道朱总司令的住处，吃完晚饭，我找了个熟悉的同志带路，就向朱总司令住地走去。快到总司令住的窑洞时，那位同志指着窑洞告诉我后就回去了。

警卫的同志带我走进窑洞。朱总司令正在审阅文件，他见我进来，忙起身同我握手，招呼我坐，叫我抽烟，并说，这烟是周副主席从敌战区搞来送给他的。我一听高兴极了，忙双手接过烟。总司令又给我划燃火柴，叫我坐下，等他看完文件就给我谈。

不一会，总司令看完了文件，来到我身边同我并排坐下，然后问我：

“你的名字是哪两个字？”

我在手心上写了姓名，告诉总司令。

“哪里人？”

“广西东兰县。”

“啊，老根据地嘛。”总司令高兴地说：“韦拔群同志，你知道吗？”

“知道。我们叫他‘拔哥’。他打仗很勇敢。我就是在他影响下参加红军的。”

“那你是红七军的？”

“是的。”

接着，总司令又问我教员训练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然后，总司令问我：“你们队的干部参加上课吗？”

“也上一点课。不过，我文化低，又没有进过专门学校，现在主要是向同志们学习。”

“你教什么？”

“教射击，”

“你懂射击原理吗？”

“懂一点，就是总司令您教的那些。”

“我教的？”总司令半信半疑地问：“什么时候？”

“32年春天在中央苏区，我在总部办的侦察干部集训队学习。您给我们讲射击课……”

总司令猛然回忆起来了，笑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是随便吹的，算什么讲课。”

“我就是听了您讲课后，懂得了射击原理，经过练习，枪也打得更准了。”

“过去，国民党天天想吃掉我们，弄得我们到处跑，无法办学校来培养干部，就靠上级教下级，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有了抗大，就可以较系统地培养点干部，将来有条件，还要办更多的学校……”

我细心地听着总司令的谈话。他那语重心长的话语，和蔼可亲的笑容，使我开初那种胆怯紧张的心情很快消失了。接着，总司令说：

“我给毛主席讲了，要你到抗日前线去工作。”

我听说到前线，非常高兴，忙问：“到哪里？”

总司令说：“到总部特务团当团长。有意见吗？”

我听说到特务团，更高兴了，忙站起来坚决地答道：“没有意见。”

总司令叫我继续坐下，然后向我介绍了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说现在成立了八路军总部，他要到前方去，特务团就跟他和总部一道走。接着，又给我详细介绍了特务团的编制、装备情况，执行的任务，和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谈话间，又吩咐警卫人员端来一盘糖饼招待我。他讲的是四川土话，请

我“宵夜”。我不懂“宵夜”是什么意思，他给我解释是吃晚饭。当时延安的生活仍然很艰苦，总司令这仅有的一点东西，我怎么忍心分享呢？我再三推辞，总司令还是要我尝一尝。这次，总司令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总司令把我送出窑洞，反复告诉我，要很快到特务团去报到，抓紧了解部队情况，做好出发前的准备。我给总司令敬了个礼，总司令同我紧紧握手。我用双手捧住总司令温暖的手，很久不愿松开，一股热流顿时通过我的全身。我深深地感到，这有力的握手，寄托着总司令多么亲切的关怀，多么殷切的期望啊！

回来的路上，我边走边回忆着总司令刚才的谈话。总司令循循善诱的教导，考虑问题的深远，布置任务的周密，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从内心里无限敬佩，我不禁向自己发问：总司令的一言一行，不正是在对我进行言传身教，教育我应该如何去做好新的领导工作吗？

我回训练队很快移交完工作，第二天下午就到特务团去报了到。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我就带着手枪营，跟随朱总司令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展开，战斗极为频繁，八路军总部也根据作战的需要经常转移。为了隐蔽和安全，一般都是在夜间行动，总司令当时已五十余岁，但他旺盛的革命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每到驻地，他总是不辞辛劳，在处理完重大事情后，抽出时间到特务团看望部队，或到团部。或下连队，和干部、战士席地而坐，问长问短，促膝谈心。干部、战士们也总是毫无拘束地向总司令交心，把心里话告诉这位受人尊敬而又令人亲近、温暖的人，每到连队，总司令总要到炊事班看一看，视察部队的情况。有的炊事员是南方人，不会做小米饭和馒头、面条等北方饭。他告诉炊事员，到了北方，要学会做北方饭。要向群众学习做北方饭的本领。他特别重视部队的官兵关系，总是指出，这是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队伍本质的体现。他十分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处处关心战士的疾苦；干部不要让战士害怕你，而要乐于接近你，要让战士感觉到革命队伍的温暖，干部之间情同手足。有一次，我陪同总司令到手枪营一个连队，他听说连里有时行军后没有烧水给战士烫脚，他就指示说，今后这样的事，一定要安排好，每次行军后要尽量烧水让战士烫烫脚，这样才能消除疲劳。当时，部队还没有袜子穿，每人只发了一块包脚布包脚穿草鞋。又有一次，记得天气有些冷，我陪同总司令到一个连里，看到一个战士光着脚穿草鞋。总司令叫住那个战士，亲切地问道：

“同志，你没有发脚布吗？”

“总司令，发了。我们南方人不习惯包。”

“现在到了北方，天冷，不注意要把脚冻坏的。”总司令关心地教育那位战士。

“总司令，我家是在南方山区，冬天也很冷，光脚穿草鞋习惯了，不要紧。”

“同志，不行啊。我们现在要打仗，万一脚冻坏了怎么行？”

“是，我马上回去包上。”那个战士敬了个礼，高兴地离开了。

接着，总司令指示我，要各连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没有包脚的，要战士们都包上，防止冻伤。

总司令还经常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团的领导同志，说特务团的干部、战

士都是经过挑选的，又在总部身边工作，责任重大，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勤勤恳恳地把部队带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抓紧间隙组织部队练兵。特务团的装备比一般部队好，手枪营每人都是一长一短，弹药也配得多。他总是教育我们，这些枪枝弹药得来不易，要爱护武器，节省弹药。每次行动出发前，他总要详细询问我们的准备情况，或者通过左权参谋长或总部机关的同志，向我们作具体交代，告诉我们沿途要注意的问题，如遇意外情况如何处置。随着部队的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团机关的组织建设也逐渐健全。但我们的领导作风还往往习惯于老一套，一有事，团的领导就各自带着一部分部队各走各的，不善于使用和发挥机关的作用。有一次转移出发前，我们团的领导同志部分头到连队检查准备情况去了，团部只留了个参谋守电话。总司令来到团部，见我们都不在，于是，就告诉参谋把我叫回去。结果找了很久才把我找到。我回到团部，总司令一见我就指示说：“你们亲自下连队检查是对的。但家里要有人值班看门，以便于上下经常联系，遇着紧急情况，才能及时处理。现在部队发展了，又是同日本鬼子打仗，还只习惯于过去的办法，搞不好就要吃亏。要学会使用司令机关进行工作，充分发挥机关的作用，这样才能适应新的情况。”总司令的指示，话虽不多，但却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我们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很快根据总司令的指示，全面检查了我们的工作，订出了改进办法。当总司令知道我们工作有了改进以后，又及时表扬我们改得快，有点战斗作风。

总司令还经常利用空隙时间，走访于田间，登门于炕头，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无论是干部或群众，也无论是老人或青年，他都谈得拢，论生产，摆家常，谈笑风生，亲如家人。偶尔，群众知道了他就是八路军的朱总司令，先不连声称赞，表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无限热爱和衷心拥护。

有一天，我刚吃过晚饭，总司令身边的一个警卫员跑米告诉我，说总司令吃完晚饭一个人出去了，他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我忙放下碗，并吩咐机关的同志立即分头到村里去找。此时。天色已接近黄昏，我想总司令一定不会远走的，很可能是到哪家老乡家里串门去了。但找了很久，还是未找到下落，我心里很着急。

我正在十分焦急的时候，一个参谋前来告诉我：

“团长，找到总司令了。”

“在哪里？”我忙问。

“在村西边地里，同两个战士一起，在帮助老乡干活。”

于是，我叫参谋给我带路，很快赶到了村头地里。只见总司令手拿锄头，正肩并肩地同一位老大爷在地里除草，他们有说有笑，时而引起老大爷哈哈大笑。他见我们又有几个人来到，忙吩咐我们快下地帮忙，并说，一定要除完这块地的草才收工。在总司令的带领下，我们很快把草除完了。

回村的路上，老大爷才知道刚才帮助他除草的是朱德总司令。临别的时候，老大爷握着总司令的手，含着眼泪，半晌才说出几句话来：“总司令，你是天下最好的司令，八路军是天下最好的队伍！”

总司令说：“老大爷，老百姓养活了我们，我们不为老百姓办事，哪还算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老大爷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只是连连点头、不停地称赞：“好！好！好！”

我在特务团工作了半年多，又回到野战部队去了。临走时，朱总司令又

给我谈话，给我做思想工作，对我在特务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鼓励我到野战部队好好工作，争取多打胜仗，从当时我的心情来讲，我是舍不得离开朱总司令的，但是，想到总司令的嘱咐，人民的重托，我只好抑制住难舍的心情，告别了总司令，到了新的战斗岗位。

四

1940年，我们新一旅住在太行山壶关县一个村子里。大约这年4月间，朱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国延安，路过我们部队驻地。壶关县城里驻有日本鬼子，为了保证总司令旅途中的安全，我们根据师里的指示，派了旅司令部一位负责同志带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专程去指定地点迎接总司令，其他部队也加强了对沿途要点地区的警戒。总司令到达驻地的那天，我同唐天际政委也提前到途中等候。

离开总司令身边已整整一年多了，多么想见见他老人家啊！当我看到总司令骑着马走来时，看到他老人家身体还是那么健壮，精神还是那么充沛，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喜悦，赶紧走上前去迎接。总司令一眼就认出了我，很远就跃下马来招呼我，叫我的名字。总司令热情地同我们前来欢迎的同志一一握手，然后一同来到部队驻地。机关的同志听说朱总司令来了，总想搞点适合总司令口味的东西给他吃。但由于当时根据地经常遭到日寇的袭扰，群众生活都很艰苦，结果派了几个人出去采购，也只买了几斤韭菜和一些鸡蛋，包了一顿素饺子招待总司令。管理部门的同志感到没有尽到同志们的心意，可朱总司令边吃边笑着说，这素饺子就够好了，下次路过你们这里，素饺子也不要做，就同大家一块吃。

朱总司令不顾旅途的疲劳，连夜找我们旅的领导同志谈话，听取我们的汇报，作了很多重要的指示。总司令在指示中，对全国抗战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反复强调要作长期抗战的打算。他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困难是暂时的，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当时，我们部队驻地附近，驻有国民党的军队，不仅不积极抗日，有时还同我们搞摩擦。总司令指示我们，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讲团结抗战、打日本，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重点打击顽固派。

在总司令到达的前不久，驻壶关城里的日本鬼子和汉奸队伍，曾派出一支小分队出来骚扰，对群众进行抢劫掠夺。附近的国民党部队怕得要死，不敢碰日本鬼子。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了一个团进行伏击，打了个小胜仗，缴获了儿匹马和一些物资。我们给总司令汇报了这一胜利消息，把战利品送给了他老人家。总司令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地说：

“打得好！现在国民党不打日本，还说我们不打日本。我要把这些战利品拿去给他们看看，看到底是谁不打日本！我们要用这些事实揭穿他们的造谣宣传，给顽固派狠狠打击！”

我们当时虽然已经同日本鬼子打了不少仗，从实战中取得了一些对付日本鬼子的经验。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各方面都比国民党军队强的敌人，各方面特别是战术思想上还不适应新的斗争的需要。总司令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中，一再指示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教育我们要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和敌人的特点，运用过去的作战经验，从战术思想上提高我们的认识。他极其通俗透彻地指出，游击游击，不

要只游不击，也不要只击不游。要善于针对不同条件，灵活运用战略战术，适时抓住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总司令的指示，又一次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开阔了我们的心胸，鼓舞了我们战胜日寇的必胜信心。

那天夜晚，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不觉得就到了深夜。我们本想再多听听总司令的指示，但考虑到总司令第二天还要长途行军，只好让总司令去休息。我们连夜又向护送总司令的部队作了布置。同志们听说要他们继续护送总司令，个个情绪高涨，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总司令的安全。

第二天大清早，总司令就起床了。吃完早饭，总司令就和随同人员一道，出发赶路了。我们怀着难舍的心情，把总司令送了很长一段路。

4月的太行山，暖洋洋的太阳晒在身上，使人格外舒服，步行一段路，身上还冒出微微毛毛汗。地里的麦苗已经抽穗，阵阵和风送来扑鼻的猜香味，总司令走了很远，还不时回头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看着总司令远去的背影，很久不愿离去，祝愿着他老人家一路平安，回忆着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激动的心潮，就像地里的麦浪在起伏翻滚：总司令啊总司令，请你老人家放心，我们一定牢记你的教诲，保卫根据地人民辛勤劳动的果实，收复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

1979年6月

难忘的回忆

方志纯

一连串的回忆和印象，在我的脑海中索绕着。这些回忆是细碎的，但都是珍贵的；这些印象是恬淡的、但却是深刻的。

从 1926 年到 1965 年，在这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和朱德同志有过多接触，有大庭广众之中的接见，也有两人促膝叙谈，听他的亲切教诲。但不管是哪次会见朱老总，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朱德同志和毛泽东等同志一道，缔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外国朋友称之为“红军之父”。他呕心沥血于军队的建设，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带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他特别重视对军队干部的教育和培养。

1927 年 1 月，朱德同志在南昌创办了军官教育团。虽然，这个教育团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但是，这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朱德同志，却以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用马列主义思想影响和培养着这支队伍。尽管这只是朱德同志培养新型的军队指挥官的尝试，但从这里，已经奠定了他培养革命军人的基础。当时，我在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农民协会工作，曾目睹过朱德同志是怎样培养教育团的军官的。

朱德同志注意引导学员，使军事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1927 年夏天，是江西，特别是南昌地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国民党右派杀害江西省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革命群众举行“四·二”暴动捉拿“AB”团头目、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五卅”惨案后的江西沪案后援会运动、朱培德宣布对共产党人“礼送出境”等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每逢社会上有什么重要事件发生时，朱德同志总是要率领教育团的学员上街，武装示威。那锃亮锃亮的刺刀，闪烁着耀眼的寒光，叫反动派看了胆战心惊；那一千多人整齐的队伍，看着叫人精神振奋；部队迈着坚实的步伐，那“嚓嚓”的脚步声，一声声地震撼在群众的心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许多地方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而在南昌地区，反动派却不敢大打出手，最后只是将共产党人“礼送出境”，这与朱德同志当时在南昌任公安局长和教育团团团长是分不开的。

虽然时间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朱德同志率领军官教育团游行时，那整齐的队伍，坚实的脚步，闪光的刺刀，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还在眼前晃动。

朱德同志当时已看出了农民运动的重要，他强调武装斗争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当时，江西省农民运动训练班正在南昌开办。为了在思想上武装农民，朱德同志曾给农民运动训练班的学员讲过课。为了从实力上武装农会，朱德同志曾派军官教育团的同志给农训班送去大批枪支弹药。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军官教育团学员的思想觉悟，朱德同志又请农训班的同志到教育团讲课。在这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军官教育团和农民训练班的学员，在政治、思想、军事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朱德同志在办军官教育团时，注意在实战中培养指挥员。我记得 1927 年 4 月间，江西军阀李烈钧，因为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掌权，逃离南昌，在上饶成立了伪江西省政府。朱德同志毅然率领军官教育团的年轻学员，

参与进剿，让学员在战斗中学习指挥战斗。

“八一”起义以后，朱德同志率部离开南昌，省委在南昌坚持工作也日益困难，我就回到了家乡，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开始了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我随赣东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十军到中央根据地，在黎川又和朱总司令见面了。朱总司令在黎川篁竹街（当时，红军总司令部驻在这里）接见了。朱总司令在询问了赣东北根据地的整个情况后，特别关心地询问了红十军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情况，并问我军队建设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向朱总司令报告说，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踊跃参军，兵源不成问题，困难的是武器和指挥员缺乏。武器还好办，可以从敌人手里夺。指挥人员就没办法了。

朱总司令问：红十军不是从连排到军师都有一批很好的干部吗？

我说：整个赣东北军队的指挥员，只有一个黄埔生，其余都是学生和农民出身，闹革命后才接触军事工作的，虽然打仗很勇敢，但指挥艺术要差一些。

朱总司令感慨地说：是啊，自有军队以来，物色将帅就是军队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人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求兵容易求将难啊！他接着指示说：我们总算是初步培养出了自己的军官。今后，各级指挥人员还是要在战争中培养。

就在这次接见中，朱总司令还谈到了领导班子、指挥员的重要。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起决定作用，但是也不否认个人的重要作用。一个领导班子的好坏，可以影响一块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一个指挥员本领的高低，可以影响和决定一场战斗的胜利与失败。

1937年，我从南方到延安，朱总司令在问到闽赣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时，我向他汇报说：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是闽赣根据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闽赣省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枯均叛变）。朱总司令又一次对我说，没有一个好的指挥人员，没有一个好的指挥班子，是带不出好的部队的。至于叛徒，那就另当别论了。

朱总司令对军队指挥人员要求严，对指挥人员的培养看得很远，不光从当时的战争考虑，而且从未来的战争考虑。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苏联学习了三年，在军事课中，我们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学习指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1946年，朱总司令接见我，当我谈到在苏联的军事学习，认为学的东西没有用，流露出不屑于汇报的情绪时，朱总司令批评我说：你别看我们今天是小米加步枪，但到明天，我们的军队是会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也会有海军和空军各军种，陆军也会有众多的兵种的。你们学的东西用得上。我们要有一批能指挥多军种、兵种联合作战的优秀的指挥员。

“可别忘记了草鞋哟！”

朱总司令喜欢穿草鞋。

我第一次看见朱德同志穿草鞋是1927年5、6月间。那天，地方党组织请朱德同志来训练班讲课。我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打量着这位鼎鼎有名的将军。他迈着坚实的步伐，微笑着向我们走过来了。天哪！当过滇军旅长、现在是北伐军名将的朱德，脚上穿的竟是草鞋。他那天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有他脚上的那双草鞋，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自此以后，我穿着

草鞋上街时，也昂首阔步，毫无愧色了。

我向朱德同志谈到这次他穿着草鞋给我们讲课的事，却是在五年之后。1933年，我率部在闽赣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朱德同志在黎川县接见我。我一见总司令脚上的草鞋，便自然想起在南昌见到他的情景。我向总司令坦白说：

“开始，我穿草鞋上大街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看到您都穿草鞋，才觉得穿草鞋是我们农民的本色，还自豪得很呢！”

朱总司令笑着说：“草鞋好嘛，我从小就喜欢穿草鞋。”停了一下，他指着眼前的山头说，“你看，我们将要穿着草鞋在这里跳跃、穿插、迂回、奔袭，打垮穿胶鞋的国民党部队，粉碎敌人的‘围剿’。”

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挥下，我们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我们穿着草鞋，跟随朱总司令——他和我们一样，也穿着草鞋——转战江西，跃进福建，在闽赣之间的广阔战场上纵横驰骋着。

没想到，我穿着草鞋的脚，竟从中国走到了外国，竟会出现在莫斯科街头。

1938年5月，我奉命前往苏联，去共产国际党校学习。离开延安前，我向朱总辞行。朱总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最后，他严肃而又慈祥地对我说：

“到了外国，可别学洋气，要保持我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不要在莫斯科穿上皮鞋，就忘记了在延安穿的草鞋。”

到苏联后，我们倒真没忘记穿草鞋。我们中国支部的几个同志，精心编织了几双草鞋——用布条编的，还点缀了红头绳，确实漂亮极了。穿着这草鞋，我们去谒列宁墓。当我们出现在红场时，许多苏联同志都围上来，惊异地看着我们脚上的草鞋。他们开始像是猎奇，后来像是领悟了什么似的，竖着大拇指称赞我们说：“好！”“好极了！”在夸奖声中，我们迈着穿草鞋的双脚，精神抖擞地前进在十月革命的土地上。后来，一些苏联同志还来找我们，要我们教他们打草鞋呢！

回国后，当我把在莫斯科穿草鞋的事讲给朱总司令听时，朱总司令高兴地笑着说：

“没想到，你们把‘草鞋作风’带到了外国，不错！”

全国解放后，又是因为“草鞋”问题，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1962年，朱德同志来江西视察工作，我陪他去一个农场时，朱德同志看到这个农场编的草鞋不错，就买了几双。我疑惑地望着他，心里想：朱老总这样大年纪了，还穿草鞋？他望着我，好像是自语，又好像是教育我说：

“进城十多年了，穿皮鞋了，但可别忘记了草鞋哟。”他指着买下的草鞋说，“这些草鞋我要带国北京去，不光我穿，还要教娃娃们穿。”

啊！这草鞋，不正是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吗！今天，在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当我又想起草鞋的时候，朱德同志洪亮的声音，又在我耳畔响起……

“农业还是要搞多种经营”

朱老总喜欢来江西。他喜欢庐山、喜欢南昌、喜欢井冈山、喜欢武夷山……他喜欢这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解放后，他多次来江西，每次来，都要到这些山区看看。他关心老区的群众，关心这里的生产。

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朱总司令在视察这些地方时对恢复和发展我省的农业生产作了许多宝贵指示。

1962年的一天，春光明媚，春风劲吹，五百里井冈，喜气洋洋，迎来了井冈山熟悉的客人——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全面视察井冈山后，重点视察了井冈山垦殖场。朱总司令赞扬该场办得很好。他说：江西国营垦殖场的办场方针是正确的。在山区办垦殖场很好，农、林、牧、副、渔、工，综合利用，全面发展，为加速山区的开发和建设，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走出了一条好路子。他鼓励井冈山垦殖场的同志们说，井冈山是光荣的山，革命的山，是天下第一山，你们在这里办场，一定要继承革命传统，把垦殖场办好，改变山区面貌，为井冈山争光，为毛主席争光！朱总司令看到井冈山垦殖场内山清水秀，竹木繁茂。指示说：井冈山山区竹木多，资源丰富，要充分利用。但是，可千万别大手大脚，浪费资源。要搞好农业、林业，也要搞好多种经营：要发展工业，也要搞好手工业。在谈到发展手工业生产时，他说：要充分利用小材小料，多生产些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如箩筐、扁担、斧头柄、刀把、拐仗之类的小商品，既发展了生产，又繁荣了市场，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

离开井冈山，朱总司令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我省国营蚕桑场。朱总司令先后三次到蚕桑场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对该场的生产、对江西的农业生产，作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指示。

朱总司令对蚕桑场又种粮又养蚕，农业、副业、工业全面发展很感兴趣。他说：农业还是要搞多种经营。不搞粮食不行，光搞粮食也不行，要综合利用，全面发展。他指着蚕桑场的红壤说：江西的红壤多得很，要加强改良红壤的研究，红壤土改造好了，可以种麦子，种豆子，种花生，栽桑树，甚至可以栽果树，发展多种经营，潜力大得很呢！

农业生产要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朱老总早在延安大生产时就提出来了。当时，他号召我们要开荒种西瓜、烤烟等经济作物。后来，我们用自己种的烤烟加工生产了不少香烟，销路不好时，朱总司令还亲自给我们的各解放区写信，推销延安生产的纸烟。

大茅山——这是方志敏同志曾经战斗过的山。1962年3月，朱总司令驱车来到这里。他看到这连绵的山峦，高峻的山峰，蔽日的森林，连连说道，好地方，好地方，打起仗来这是个好地方。他万分惋惜地说：第五次反“围剿”时，如果把部队带到这一带来，以武夷山为依托，和敌人周旋，那战局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视察大茅山垦殖场时，他拿着该场利用小材小料生产的刀把、锄头把等小商品，高兴地说：这就对啰，综合利用山区丰富资源，把小材小料部派上用场。中国的手工业曾经是很发达的，现在我们生产水平、机械化水平提高了，但别忘记了老祖宗，要发展手工业。

云山垦殖场、红星星殖场、江西“共大”……这些山山水水之中，留下了多少朱老总辛勤跋涉的足迹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每当我学习到这里的时候，朱总司令在江西视察的情景，又在我眼前浮现起来……

1980年

忆朱总司令二三事

覃应机

1934年春，我正在国家保卫局参加干部训练班学习，当时国家保卫局就驻在瑞金沙洲坝的新茶亭村。一天晚上，中央机关在老茶亭村中央临时政府大礼堂里举行文艺晚会，我们这些参加训练班学习的学员负责晚会的保卫工作。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其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首长，在进入大礼堂时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中等个子，穿着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显得朴实又很有神采。战友们告诉我，他就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自始至终都聚精会神地观看台上的演出，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在看到李伯钊同志表演的苏联《战士舞》和听到邓小平同志演唱的法国《马赛曲》的时候，显然被李伯钊同志那灵巧刚劲的舞姿和邓小平同志那激越昂扬的歌声所吸引，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朱总司令。

后来，在长征路上，我虽然又几次见到朱总司令，但都没有与他直接接触过。西安事变后，我在云阳镇参加了总部举办的政治训练队学习。这期间，不时遇见朱总司令，并且还有机会多次聆听他关于形势问题的讲话。朱总司令作形势报告像讲故事叙家常，像在摆“龙门阵”似的，扣住了听众的心弦，使人受到教育，难以忘怀。1937年7月，我提前结束了在总部政治训练队的学习，奉命带领一批情报人员奔赴抗日前线，8月到达山西太原。这期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先后到了太原。从这个时候起，我作为总部侦察队长，追随朱总司令转战在太行山上。直到1940年5月，他返回延安总部的时候止，烽火硝烟近三年，我或接受总司令的指示，或随他外出执行任务，或聆听他的教诲，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总部从五台山南移的时候，我和刘秉琳等同志担任联络友军的任务。总司令指示我们联络友军应注意的事项，强调与友军要多讲团结抗战，激励友军的抗战热情，不要拿友军的物资，特别是在友军遇到困难的时候，更不能乘人之危索取资财。我们严格执行总司令的指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在南移途中，娘子关失守的时候，守军赵寿山的部队（属西北军、系统）败退下来，我们在盂县遇上他们。我和刘秉琳等五人去联络，见到了赵寿山。赵说他的损失很大，守不住关口，蒋介石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逼他枪毙了一个团长……他还说，此时他的部队骡马比人还多，要把一批骡马送给我军。我们一面谢绝他赠送骡马一事；一面把他真心实意对待我军的情况上报总部。但赵寿山还是执意要送我们联络员每人一匹马，我们始终没有接受，使我军在友军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八路军总部驻在洪洞县的时候，有一次，朱总司令应友军邓锡侯部（属川军系统）的邀请，去给他们的军官讲话，我以联络参谋的身份随行。到邓锡侯的司令部门前，迎候的邓部人员把我们引向大门，我便带上三名警卫人员走在总司令前页。门前布着双岗，两个卫兵站在门旁的一边。我刚踏上门前的台阶，就见眼前寒光闪闪，四个哨兵同时掣出了四把大刀。我禁不住一惊，双脚继续向前迈，右手迅速把在腰间的手枪套上。同行的三个警卫人员，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哨兵的大刀“呼”地各自划出一圈弧光之后，便嘎然架在门洞之前。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哨兵在向朱总司令行执刀礼。我们八路军不行这种礼，因此，我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旧军队迎接贵宾的一种隆重礼仪。邓锡侯这样做，一是表示他隆重迎接朱总司令；二是

想显示一下他的军威。我们四人在台阶上还了一个军礼，便跨进门槛，走了几步，分列两边，回头恭候总司令。这时，只见总司令刚好上了台阶，迈步进门。他神情庄重肃穆，从容不迫，泰然而又恬然，大将军风度，自然天成。总司令的举止令人敬佩，既向友军表明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又向世人显示八路军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的总司令真是久经战阵，见多识广，谋略在胸，智勇双全。和总司令在一起，就常常能这样大开眼界，增长见识，深受教育。

曾经和总司令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朱德总司令十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他号召太行根据地人民发展经济，增加生产，支援前线；他在根据地倡导成立“生产消费合作社”，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他指示部队在作战间隙积极参加劳动，帮助群众搞生产：他提倡种果树，多种花椒树、核桃树、柿子树。

总部每到一地，只要住上一段时间，总司令就在指挥作战的间隙里，和总部工作人员一起到驻地附近的山上挖地种树。在索堡，我们总部人员在河滩围垦一块土地，又在河里筑了一道拦河坝，还修了一条灌溉水渠。这些劳动，总司令部参加了。每当总司令挽起衣袖，捋起裤脚，汗淋漓地劳作时，我心里就常想，指挥千军万马的朱总司令，这时多么像一个勤劳纯朴的农民啊！解放以后，当我读到他那感人肺腑的名篇《回忆我的母亲》，就想起了他在太行山根据地劳动的情景，心中顿然似有所悟——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母亲为这个家庭操劳终生；他热爱他的母亲，实际上也就是热爱中国的劳动人民，热爱我们这个古老的祖国。所以，他执着奋进，为祖国独立，为人民解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总司令喜爱种花。不仅在和平年代，就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在住处周围种上各种各样的花卉。他精心护理这些花卉，时常为它们浇水、施肥、除虫。驻在王家峪的时候，有一次，我搞外勤回到总部，一进门，就见园内总司令栽的一片秋菊正开着花，黄的、红的、白的、紫的，五色斑斓，令人欢欣快乐，忘记了鞍马的劳顿。后来进了北京，总司令爱花之情更浓，其中对兰花则更是一往情深，听说他不仅在中南海住地种了许多从全国各地采集来的兰花，还把不少他喜爱的兰花送给北京植物园。60年代初期，他到井冈山，曾经亲手挖采“井冈兰”，带回中南海。1963年春，他到广西来，也到龙胜族自治县的花坪、桂南的大明山和桂北越城岭上的老山界等深山老林里去采集兰花，带回北京去……古往今来，兰花被视为高洁朴素之物，咏兰的诗文比比皆是。董老（必武）就曾盛赞兰花，为兰花题写了“国香”二字。朱总司令也写了不少赞兰花的诗。他爱兰花，爱的就是这种“国香”，这当中寄托着他的一种高尚情怀，那就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炽热的爱。

说总司令爱祖国爱人民，他一生中的事迹举不胜举，但使我特别不能忘记的是1964年春，他到广西视察的往事。当时，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没完全过去，人民生活还相当困苦。他不顾年迈，风尘仆仆，到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区的农村，看了一些社员的生活、生产情况后，对我们说：广西应该多搞一些上特产出口，比如乌龟、甲鱼、山瑞、蛤蚧、果子狸和蛇，以及这些珍奇动物的加工产品三蛇酒、蛤蚧酒等等，比如田七、罗汉果、桂皮、白果等等中草药材，还有竹编、芒编、藤编等民间手工业工艺品，都应该多搞。这些东西换汇率高，有的甚至和黄金一样贵重，可以换回尖端的技术和产品。目前，我们还不急着吃和用这些东西，拿去出口，换回外汇，就可以使人民

群众的日子好过一些。这个意见，总司令不但对我们说了，而且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又强调了。毛主席听了，当场表示赞扬。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遵照总司令这个指示去办。如今广西的土特产和中草药材的生产、加工，以及民间手工工艺品的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出口额大大增加，每年换回来的外汇，为广西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5年春，总司令来广西视察工作后去云南。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秘书告诉我，朱总司令从昆明来电话说，广西和云南应该“联合起来，考察一下天生桥筑坝发电，同时能不能在那里修一条运河，把坝里的水引入右江。如果能够的话，云南的木材、土特产就可以从水路通过广西到广东，源源不断地抵达香港，销往世界各地。这对云南、广西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将会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后不久，我们便组织有关人员考察这项工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项工程被搁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又继续做这项工作。现在，天生桥大坝正在筹建之中，总司令当年提出的其他有关考察项目也已被列为天生桥开发的内容之一。往事如烟，但总司令关心人民生活，关心国家建设的殷殷之情，却总是萦绕在我的记忆里。这又自然使我想到总司令的爱兰花的往事。人们说总司令爱兰花，他自己更像兰花，这话说得极好。记得“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我和其他几个省区的领导同志去参观北京植物园，园内技术员特别向我们讲述了总司令给北京植物园送兰花的往事。当诉说到这些兰花在“文革”期间被人捣烂的情景时，在场的技术员和职工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们的总司令，不正如兰花幽远的芳香一样，飘溢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吗！

1991年7月

追求真理的足迹

刘鼎

1924年春寒乍暖时节，我随孙炳文同志一道去德国。自此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朱德同志以及中共旅德支部其他同志相随为伴，共同生活和战斗，度过了难忘的岁月。这段往事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尤其对朱德同志的印象极深，他那音容笑貌、举止言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在西去的列车上

我和孙炳文同志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前往柏林。

一路上，河流、山峦、村落、田园和一座座充满异国风光的城镇在眼前闪过。我们无心欣赏欧洲大地奇特的景致，而在破旧残败的车厢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此次出国，我们受命向国外同志传达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因此，在漫长的旅途上，我们谈论的话题多半是刚刚结束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职工”三大政策；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和国共合作的前景；也谈论着巴黎、柏林、哥庭根和正在那些地方学习和斗争的同志们。

谈到朱德同志的时候，孙炳文同志更是滔滔不绝，充满了敬佩之意。我知道，早在滇军讨袁时，他们俩就一道共事，出生入死，休戚与共。1922年秋，两人又一起出国留学。他们是情谊深笃的挚友。

“你说，朱将军为啥子要到德国留学？”孙炳文同志问道。

朱德同志曾任蔡锷的滇军旅长，是位战功赫赫、威震三军的将领，是我们四川人引以自豪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在讨袁战争中屡建奇功。纳溪一战，把北洋军阀张敬尧打得落花流水。他用兵如神，爱兵如子，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从不骚扰百姓。因此，四川、云南一带人民群众传颂着他的事迹——这是我早有所闻的事；至于朱将军为什么出国留学，而且偏偏到德国去，就不得而知了。忽然想到德国有个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我脱口回答：

“大概是考察军事吧。”

孙炳文同志笑了，摇摇头说：

“不。他出国留学，而且执意到德国去，因为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朱将军到那里为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考察德国社会，寻求拯救中国的真理。”

接着，孙炳文同志详细地对我讲述了朱德同志出国前后的经历和这两年在德国的近况。

原来，朱德同志从连年军阀混战的痛苦经历中，看到国民革命借助军阀力量来实现是毫无前途的。他在苦闷中急于寻找一条拯救中国的正确道路。他曾在上海找中国共产党，会见过陈独秀，并且提出入党申请，但却遭到了冷遇。只有周恩来同志理解他的救国抱负，在柏林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两年，朱德同志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深入考察德国社会，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德国，思想日趋深邃、成熟。现在正在哥庭根大学就读，并领导着中国留学生学生会的工作，在留德学生中很有威望。

列车的隆隆声在寂寞的夜空中回荡。柏林越来越近了。想到就要见到朱德同志，我久久不能入睡，思绪随着列车的节奏翻腾着，翻腾着。

改组国民党派德支部

到达柏林后，我们先向党内传达了有关文件，动员共产党员、青年团员

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推动国民革命。接着，又在国民党员中作了传达。随后，中共旅德支部根据大家的提议，决定召开大会改组早已涣散了的国民党旅德支部。当时，在柏林的“跨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赞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员都参加了会议。会上提出改组人选，我被选为支部书记，朱德同志虽然没有到会，仍被选为组织主任。

不久，我和孙炳文同志前往哥庭根会见朱德同志。

在一栋古老的小楼里，我们见面了。

异国相逢，格外亲热。当孙炳文同志把我介绍给朱德同志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欢迎！欢迎！你来了，又增添了一份力量。”

坐定后，孙炳文同志向他讲述国共合作以来的国内革命形势，我党的新政策，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内容。这时，我仔细观察这位对面而坐、久闻大名的滇军宿将。他穿着一身普通的西装，黝黑的脸显出全神贯注、极度沉思的神态，前额宽大而又微微隆起，淡褐色的一双眼睛专注地闪动着。看得出，他敦厚、朴实、敏睿，昔日雄姿犹在。

孙炳文同志讲完，我又介绍了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的情况。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几份文件递给他。他接过去，仔细地翻阅着。

“很好，这里面写的，我完全赞成。”

说着，他兴奋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慢步，像是深思什么似的。过了一会，他冲着孙炳文同志说：

“浚明（孙炳文同志的字），你还记得吧，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诉说我们多年的苦闷。孙先生也深感军阀势力靠不住，国民革命要找新的出路，国民党要吸收新生力量。当时，孙先生谈到他正酝酿制定新政策。时过两年，这新政策果然出来了！我赞成党的国共合作政策，赞成国民党‘一大’宣言。推进国民革命，任重而道远哪，我们这些身在国外的人要抓紧工作才是。咱们一起把国民党支部工作抓起来，给它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你们看好吗？”

自此以后，我和孙炳文同志在哥庭根住下了。我们的住处离朱德同志寄宿的地方不远。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开会，研究工作，组织学习讨论。朱德同志对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抓得很紧。因为一般留德学生只知道他是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而不知道他已经加入共产党，所以，他在宵学生中很便于广泛接触。经过宣传教育工作，一些中间派，甚至少数原是右派学生，也纷纷加入国民党旅德支部。这样，我党在哥庭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中间的影响日益增长。国民党旅德支部改组后，真正成为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

“旅行”讨论会

在哥庭根大学里，我党旅德支部党小组是经常组织学习讨论的。那时，我们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朱德同志学习很认真，记了不少本笔记。他读的书，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连接近他的德国同志都很感动。他们说：“一个中国将军到德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么刻苦，我们德国人难道不应该好好学吗！”

我们还经常组织讨论会，大体上一周一次，多半和旅行结合起来。大家到哥庭根郊外或附近的山岗上；三五成群；边走边谈。争论热烈时，索性席地而坐，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记得有一次讨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大家

争论不休。郑太扑那时生活很苦，有时连吃饭钱都没有。他就说，到了社会主义吃饭不成问题啦，到处都安上营养输送管，只要拧开龙头，就像喝自来水似的，一下子就喝饱了。有的人说，将来，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了，资本家的工厂被没收了，工农差别消灭了：也没有什么大城市，城市农村交错融汇在一起，城乡差别消灭了：没有小家庭，没有买卖婚姻，结婚是自由结合……，这些议论现在看来未免太浮浅而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我们却十分严肃认真地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而一往深情地探讨着、向往着、憧憬着。

朱德同志在我们中间年龄最大，阅历丰富，考虑问题比我们这些青年人深刻、透彻、现实。所以，我们很尊重他的见解。一次，在讨论问题时，许多同志惊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朱德同志却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他接着说：“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

从此以后，我们的讨论会更加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些青年同志怀着敬意称朱德同志叫“半封建半殖民地”，语谐而意庄，钦佩他分析问题有真知的见。。

出庭退楼

朱德同志忧国忧民，思想深邃，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有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善良的同情心，即使对德国人民也是如此。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败。协约国中以英帝国主义为主的几个国家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德国经济在沉重的债务下完全崩溃了。马克贬值，跌到二亿四千万马克兑换一美元，到后来更是以天文数字下跌。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马克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家庭主妇挎上一篮子纸币只能买回一、两块面包或几斤马铃薯。工人的工资购买力几乎等于零！饥肠辘辘的人民群众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1924年初，美帝国主义趁火打劫，以援助为名推行“道威斯计划”，加剧了德国经济的恶化。

朱德同志对德国人民的处境十分同情。在他领导哥庭根大学学生会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原先，学生会曾经用五美元买下一栋不小的楼房。后来房主到法院去起诉，要求赎回楼房。法院传学生会负责人出庭受讯。不少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有的说，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两厢情愿，岂能反悔？这楼不能退！有的说，反正马克不值钱，他要多少马克给他多少。

朱德同志却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原主。他说：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所以才造成通货膨胀，马克贬值。世界上哪有五个美金买一栋楼的便宜买卖？德国经济破败到如此地步，遭殃的是老百姓。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无代价地退还原主。他还表示：

“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办，那末由我出钱赎这栋楼好了。”

大多数学生被说服了，一致赞成朱德同志的意见。

开庭那天，朱德同志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出庭了。

学生会代表在法庭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对德国人民的野蛮经济掠夺，抗议美国政府宣布的“道威斯计划”。公开声明：我们中国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同情德国人民。我们宣布，一个赎金都不要，把这栋楼退还原主。

在场旁听的许多德国人非常感动，那位房主更不知说什么好，频频向我们点头致谢。

这件事顿时轰动了哥庭根城。德国人民群众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留学生真好！对朱德同志，附近相识的德国人本来素有敬意，因为在德国人眼里，“将军”这称号和公爵一样显赫。一些德国妇女平时看见朱德同志都行礼致敬。他们知道退还楼房是朱将军的主意后，交口称赞，对他更加敬佩不已。

康德大街的斗争

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朱德同志的革命斗争精神。

朱德同志离开哥庭根回到柏林不久，发生过一起与右派学生争夺留学生总会办公室的斗争。

中国留德学生总会设在柏林市中心热闹繁华的康德大街上一栋楼内，有七、八间房子，地方很宽敞。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学生经常在这里活动、学习，来往路过柏林的同志也常来这里，一时成了我党的一个活动中心。国民党右派和另立旗号的所谓“青年党”学生，也在这里出出进进。本来，各派学生部有钥匙，各自开锁进门，自由出入。有一天，右派学生突然把门锁换了，并宣布占领留学生总会，还贴出一张布告，说是过去这里被共产党霸占了，他们要收回云云。

面对右派学生的无理挑衅，我们开会研究，决定夺回来。于是，我们带上人马拥进楼去，用斧头劈开门锁，又重新安上一把新锁，也贴出一张布告，严正声明：留学生总会受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旅德支部领导，留学生部有权使用会所。

那伙右派学生不死心。有一天，朱德同志、孙炳文同志和我还有几个人，正在房里装订刊物，一群右派学生突然闯进来，寻衅打架。朱德同志一看来者不善，迅速抓起一把椅子往地上一摔，随手抄起两根椅子腿，往墙根一站，像一尊怒目金刚，冲着那群右派学生大声喝令：

“滚出去！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那群右派学生定眼一看是朱德，没敢轻举妄动，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我们开玩笑他说，“朱将军，你真把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威风拿出来了。”

朱德同志听了哈哈大笑。

此后，右派学生再也没敢来闹事。我们在这套房子里刻蜡版、印刷、装订、出刊物。朱德同志和我们一起干。写文章他出主意，提意见，有时还动手修改。油印、装订这类脏活、累活，他抢着干。看到他那样和蔼可敬，埋头苦干，沉默寡言，言必中肯，人们很难想象，在反动势力面前，却是那般刚毅、坚定，英勇无畏。

“红色前敌”阅兵式

1925年，衰败的德国经济尚未复苏，政治动荡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广大德国人民中间蕴藏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德国共产党的威望大增。另一方面，

一般出壳不久的反动势力——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徒，也在政治潜流中混水摸鱼。德国的政局十分纷乱混杂。当时，德国共产党拥有相当力量。党的外围组织有一个叫“红色前敌”的，是以军队原则编制起来的准军事组织，类似现在我国的民兵。广大工人和部分农民、学生参加了“红色前敌”。1925年夏天，德国共产党中央在柏林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红色前敌”阅兵式。二十多万“红色前敌”成员，手持木棒，从全国各地赶到首都，在柏林郊外一个很大的公园里搭起无数顶帐篷，威武壮观。

朱德同志，还有一些中国同志也应邀参加。

在举行阅兵式那天，只见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棍棒林立，口号声、欢呼声惊天动地，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同志发表了演说。接着，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开始了。“红色前敌”一个个方队，穿着一色服装，扛着木棒，喊着口号，步伐整齐地走过柏林市区。围观的群众喝彩助威。政府当局派出的警察被吓得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与此同时，还举行了野营军事训练，巷战演习。“红色前敌”表现出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人民群众对他们非常支持，捐献给他们大量面包和别的食品，放在“红色前敌”的宿营地前，堆积得像一座座小山似的。

朱德同志详细地了解“红色前敌”的组织形式和人员情况，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过后，他对我们说：“真了不起！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参加‘红色前敌’的，有许多人参加过世界大战，保卫德国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还有一些人参加过汉堡工人武装起义。他们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有人民群众支持。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第一要有人民的军队，第二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

朱德同志从“红色前敌”阅兵式上受到的启发，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人民战争军事思想。这不能不说是朱德同志留德学习的一个重要收获。

悼念孙中山先生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消息传来，中国留学生们悲痛不已。中共旅德支部和国民党旅德支部决定在柏林举行大型追悼会和示威游行，筹备发行悼念孙中山先生的小册子。

朱德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活动，日夜操劳，十分繁忙。

追悼大会会有几百人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还有许多德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会场气氛庄严肃穆。许多人失声痛哭。

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人们抬着孙中山的遗像，撑着大幅挽联，沿着柏林主要街道缓缓行进。一路上，许多德国群众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孙中山先生是属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家，处在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德国人民自然了解他、景仰他。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就连那些柏林当局派出的以维持秩序为名监视我们游行活动的警察，都对孙中山先生遗像行注目礼。

游行队伍在中国驻德大使馆门前停留许久，不断有人以激昂悲愤的声音发表悼念演说，向那个反孙中山、反人民、媚外辱国的北洋政府驻德大使发出抗议。

这次悼念孙中山先生活动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柏林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我们用国民党旅德支部名义写的传单也散发到柏林街头和全国各地。为时几天的悼念活动反映出中国人民的觉悟，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对帝

国主义和德国反动派，对反革一命的中国军阀政权，也是一场大示威。

声援“五卅”运动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内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重新抬头，新老军阀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沆瀣一气。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的游行示威队伍竟遭到英国军警的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香港海员和各界工人总罢工，英帝国主义霸占下的香港变成一座臭气熏天的死城。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集会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柏林，群情激愤。中共旅德支部立即发出通知，号召中国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德国共产党中央全力支持我们的行动，在他们的机关报《红旗报》和刊物上，发表文章痛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开展了“中国还给中国人”的运动，还派人陪同我们出发到德国各地参加集会。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中国同志在群众集会上登台讲话，不管是讲汉语还是讲德语，群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德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真诚地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柏林，爆发了中国留学生占领中国驻德大使馆事件。这是我党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影响很大、震动了德国反动当局的一次行动。

朱德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有一天，我们包围了大使馆，提出要中国驻德大使出来接见，答复我们的要求。那个平时神气十足的大使害怕挨打，早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愤怒的人们冲过警察警戒线，涌进使馆大厅，找到了一个使馆小官吏。我们盘问他：

“大使到哪里去了？”

“他……他……不知藏到哪儿了，没出门。”吓坏了的小官吏战战兢兢地回答。

“搜！”

一声令下，学生们一拥而上，从一楼搜到三楼，终于在一个衣柜里把大使拖出来。人们连推带拥把他带进办公室，当众向他提出留学生的要求，并把拟好的抗议通电递给他，严正地对他说：“你只要还是个中国人，还有中国人的良心，请在通电上签字，和我们一起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我国人民的暴行！”他唯唯称是，乖乖地签了字。

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集会活动连续一个多月，特别是占领驻德大使馆的行动，使那个反动大使非常恐惧，他向德国政府提出把闹事的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驱逐人员名单上，朱德同志的各字赫然列在第一名。

铁窗之夜

大约6月下旬，为扩大声援“五卅”运动的影响，在德国共产党帮助下，以中国留学生总会名义在柏林一所学校里组织了一次集会。警察闻讯包围了会场。群众看到警察出面干涉，非常气愤。德国同志高呼：

“社会民主党人滚出去！”

“反动警察滚出去！”

“要中国！不要社会民主党！”

为什么德国共产党人点名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呢？因为当时柏林警察总监是社会民主党人，是他派出警察包围会场，自然遭到唾骂。

散会时，警察开始抓人。他们把德国人、别的外国人都放过，唯独逮捕中国留学生。朱德、孙炳文、房师亮、章伯钧、缪焕星等同志，还有我，一起被捕。

深夜，我们被带进柏林的一座监狱。这座像古城堡一样的监狱十分古怪，高达五层的大楼竟没有门，人们要顺着一座楼梯一直爬上楼顶，再从楼顶一层层走下去，才能走进各层楼牢房。显然，这种奇怪的建筑设计的目的是防止犯人越狱或外面劫牢。

我们被带进三层楼，一人一间，单独监禁。狭小的牢房里摆放一张破板床、一个铁凳、一只铁马桶，就再也没有旋转余地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躺在破板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有生以来，那是第一次坐班房，而且在国外，我的焦躁心情可想而知了。

朱德同志却很坦然，他安睡、吃饭、做操，和往常一样。

一连几天，我们在监狱里大声吵闹、唱歌，抗议，闹得看守警察不得安宁。三天后，柏林当局不作任何解释，悄悄把我们释放了。出狱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德国共产党积极营救的结果。我们被捕第二天，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就公开报道消息，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政府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德共中央还直接向社会民主党质问：中国留学生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何罪之有？政府当局悍然出动警察逮捕中国留学生，岂不说明政府站在英帝国主义一边吗！既然政府当局和掠夺德国的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那末，表明它已经背叛了德国，背叛了人民。德共要求社会民主党表态：究竟站在英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中国留学生一边？社会民主党不敢回答。德共就大造舆论，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下台。德共巧妙地把社会民主党置于被告席上，弄得他们狼狈不堪，迫于形势，只好把中国留学生释放了。

不久，在北洋政府驻德大使的乞求下，德国政府借故将朱德同志和一批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那时，国内已来电调旅欧支部五十多名干部回国。此地不想久留，“驱逐”正合吾意。1925年夏秋之交，朱德同志离开了旅居四年的德国去苏联，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开始了新的战斗。

同年冬天，我也离开德国去莫斯科。

五十九年前，朱德同志怀着寻求真理、拯救中国的伟大抱负，毅然抛弃高官厚禄，飘洋过海去德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他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从斗争实践中坚定了信仰，掌握了理论，磨练了斗志，丰富了经验，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由一个旧军队将领转变为革命军队统帅，最终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朱德同志早年在德国这段斗争经历，对于今天广大青年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我热切盼望青年同志们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继续坚持真理，维护真理。

1981年

北伐时期的朱德同志

文强

1926年6月初，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提前毕业，集中到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进行特别训练，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准备。邓演达为负责人。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陈启修等同志曾到校讲课。

北伐开始后，我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作宣传员。8月底，北伐军逼近武昌城。我们奉总政治部命令，经鹦鹉洲、汉阳到达汉口。不久，总政治部由南湖文科大学搬进汉口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办公。

这时，由于形势发展得很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决定挑选一部分人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入川工作，我有幸为其中之一。

大约是9月下旬，为使朱德同志和全体随行人员见面，邓演达召集大家于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第三楼大厅讲话。与会者大致来自四个方面：第四期黄埔同学；留德、留日学生；朱德同志的同事、同学、同乡；邓演达身边工作人员，共三、四十人。

会上，邓演达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朱德同志并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邓演达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入川的第一道关卡宜昌还控制在北洋军阀余孽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之手，为了能顺利通过这道关卡，要求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尔后，朱德同志也讲了话，大意是：遵照邓演达主任的指示，与大家共同入川工作，感到很高兴。但是，现在入川尚有困难，卢金山的部队（吴佩孚系统）还驻守在宜昌。所以，大家必须化装，路上还需要多加小心。

一两天后，我们分别化装成教师、学生、商人，随朱德同志乘英国太古公司的一只轮船，分散在一千多名旅客中，启程前往万县。但船行到宜昌，不能再走了。我们一打听，由于英国军航炮击万县，发生了万县“九五惨案”，使得英国轮船不能上行，大家十分着急。这时，朱德同志上岸给杨森打了电报，杨派“蜀渝”号兵船来接我们。此间，在宜昌耽搁了几天，约于10月初才抵达万县。

那时，国民政府虽然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他并未立即宣布就职，他的头衔仍然是吴佩孚委任的“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川鄂边防督办”，挂着五色旗。

我们到万县后，住在一家鸡毛店（即小客栈）里，大家很有怨气，认为杨森欺人太甚。朱德同志劝告大家不要计较，并嘱咐我们要谨慎行事，尽量少外出。三、四天后，我们搬到南津街宝隆洋行里。宝隆洋行原为英国人开设，“九五惨案”后，英国人跑掉了，由杨森接管。从此，这里就成了我们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

开始，杨森对我们的态度很冷淡，他还在观“风向”。所以，我们最初的活动还是处于秘密状态。因为杨森还脚踏几只船，一方面同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勾结在一起；另二方面又同奉系军阀张作霖有联系；同时，又向国民政府讨好。此外，他身边还有一伙“青年党”分子，是反对国民政府的。所以，局面相当复杂，斗争很激烈。杨森的态度是“有奶便是娘”，谁占优势就依靠谁。

朱德同志到万县后，建立了二十军党部。期间，在万县发展了一批进步

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党的组织。我记得在“九五惨案”后，万县成立了“后援委员会”，其中有一干事叫牟偶仁，很活跃，朱德同志就派我去争取他。后来，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朱德同志工作很忙，既要杨森的工作，又要了解整个四川的情况。并派我和滕代顺（际代远之胞弟），江亚中、熊荫寰、谌杰致杨森办的讲武堂担任区队长。

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地传到万县，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朱德同志提出要办报，积极宣传北伐革命。经大家议定，取名《壁报》，用四开纸，主要按国民政府北伐宣传大纲的精神编写文章。报纸一经发行，轰动了整个万县。“青年党”分子就派人捣乱，同时，他们也办了一份《快刀报》，开篇文章的题目叫“快刀斩乱麻”，双方的斗争公开化了。但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很恼火，就向杨森告状。于是，杨森下令，双方报纸都取消。听到这个消息后，朱德同志就去找杨森，向他晓以大义，据理力争，杨森终于被迫同意我们继续办报。

11月，杨森为形势所迫，靠向武汉国民政府，被迫东下宜昌，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职。朱德同志也和他一起到了宜昌。

朱德同志和杨森从宜昌回到万县，正值顺庆起义失败，刘伯承同志派罗觀光、刘希武先赴万县，将起义失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朱德同志闻此消息后，即派人筹集了一批款子，又派人携款前往开江，接应起义部队。

一天，杨森在白庄（杨的别墅）请朱德、刘伯承同志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作客。这是杨森自我们到万县后第一次表示友好的态度。席间，刘伯承同志对杨森说：“惠公，你的部队番号如此之多，建制庞杂，人却不足二万，不要‘狗吃牛屎——好多’，希望你把部队好好整顿一下。另外，是否仿效广东办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同志也劝说杨森迅速整顿部队，办起军事政治学校来。杨森接受了他们办校的建议，大约在12月中旬，军政学校就办起来了。校址在万县杜家花园。并在万县西较场举行阅兵仪式，我担任总值星官。除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外，还有杨森办的讲武堂学生二百多人参加。朱德、刘伯承同志和杨森都参加了。杨森在会上讲：戏们已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以后我们就是革命军人了，大家要共同努力，完成北伐革命的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出杨森的为人，是很善于随机应变的。

阅兵后，朱德同志到涪陵去找郭汝栋。郭与朱德同志交情颇深，朱德同志就把胡陈杰（郭的亲戚）安插在郭部、任政治部主任。此后，只听说朱德同志到了宜昌，没有再回万县。

“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反动势力重新抬头。我于四月初离开万县，经宜昌到了武汉。回到武汉后，我见到朱德同志。他对我说，邓演达是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领袖之一，与本党的政治主张合得来，是真正拥护三大政策的同路人。不论客观形势如何变，他不会变，我们要爱护他，不能冷淡他。接着，朱德同志又对武汉国民政府进行了分析，他说，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像个烂冬瓜，外面好看，里面已烂得难以救药。本来中心人物是汪精卫，他是以“左”派领袖来迷惑人。他刚从法国回国，一到上海就与陈独秀靠拢，发表了共同宣言，多么迷惑人。我看汪精卫是假左派，终究靠不住，邓演达迟早会吃他的亏，会被假左派排挤得在武汉无立足之地。过了不到两月，汪精卫果然于7月15日发表了反共宣言。这与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实行残酷地大屠杀如出一辙。当时，我对汪精卫一向是迷信不移的，正是朱德同志明察秋毫，泾渭分明，将邓、汪两人谁重

如泰山、谁轻如鸿毛，给我指点得清清楚楚，使我深省而不忘。

大约在4月底5月初，在武汉世界旅馆我再次见到了朱德同志，他当时很懊恼地说，四川发生的事情，尽在意料之中。现在杨森又勾结夏斗寅要打武汉。我问他今后怎么办。他说：我已到过南昌，那里云南人很多，有许多老同事，可以开展工作。此后，我回湖南老家探亲去了。

马日事变发生后，我回到武汉，在炮兵营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发表反共宣言，挥代英同志指示我到九江向周逸群同志报到。我于7月28或29日报到后，随周逸群同志到南昌，随即找到朱德同志的住所。一进门，看到周恩来同志也在，朱德同志问我到南昌做什么，我说是奉挥代英同志的指示，来九江找周逸群同志接关系，到他那里工作，以后又随周逸群同志到南昌的。

南昌起义时，我在贺龙同志部第三师司令部任特务连连长，同时又是师党委负责人之一。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在会昌我又见到朱德同志。那时，天气很热，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他敞着怀，手提着枪，同我谈了几句。这是我到南昌后第二次见到他。

朱德同志在南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了解南昌部队的情况，做上层人物的工作等等，掌握的情况确实可靠，了如指掌，为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1991年6月

朱德同志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

赵镭

南昌军官教育团的诞生

1926年夏天，朱德同志从欧洲回国，先在四川军队里进行革命活动。这年冬天，朱德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来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

当时驻在江西的是北伐军朱培德的部队。朱培德任江西省省长、第五路军总指挥，下辖第三军、第九军和第六军。第三军和第九军都是滇军流亡部队。朱德同志决定利用他过去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工作干部，以便从各方面展开革命活动。

在朱德同志亲自主持下，学校很快创办起来，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接受共产党中央军委领导。校址选定在南昌市进贤门里花园角的讲武堂内，朱德同志任团长，魏谨钧任党代表，刘介眉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后为陈奇涵同志），还建立了团部各机关。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到1926年底，学校开始接收学员。

朱德同志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6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当了护国军的混成旅长，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作战机智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时友军战况不利，有败北模样，只要朱旅长一赶到，把上面绣有“朱”字的红旗往阵地的山顶上一插，敌军就闻风丧胆，望旗动摇；而友军则军心复振，士气重发。常以此转败为胜，扭转战局。因此，朱德同志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以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欢欣鼓舞，辗转相告，纷纷要求入校学习。江西各地许多进步青年也赶来报考。到1927年2月中旬，仅一个多月就接收学员一千一百多人。我当时在第三军当见习军官，在自己积极要求下，第一批被选送入校学习。

教育团全团共编为三个营。第一、二营共七百多人，学员大部分是滇军中排级以上的军官、军佐，其中大多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他们在滇军中当兵多年，转战数省，流亡在外，受革命的影响较深，大部趋向革命，当然，思想很进步的只占少数；其中个别的还是共产党员。思想落后，对革命不满的也占少数。较多的一部分是到这里来寻求出路的。他们自以为出路全在苦学，于是老老实实，肯干肯学。第三营约四百多人，大部分是各地选送来的热心革命的青年，少数是江西军阀李烈钧保送的富有人家或其僚属的子弟。这些人大都是想学点本事，以作升官发财的资本。但一般年纪较轻，有一定文化水平，因此大多数经教育后转向进步，趋向革命。

这些阶级成分、个人经历、思想意识复杂的学员，能不能教育好呢？当时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这些学员大多当兵多年，受到社会的恶习影响较深，已不容易接受教育。但朱德同志对他们的教育改造是很有信心的。记得他曾经说过：学员们的思想亟待改造，也可以改造。在过去，他们就像在茫茫大海里行驶着的无指针的帆船，没有不迷失方向的。现在有了共产党，就有了灯塔，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培养成为革命的力量。

把教育团办成一个革命堡垒

学校接收学员大体完毕，还没有举行开学典礼，就正式开课了。

开学之初，朱德同志忙于校外的活动，学校的教学计划只凭副团长刘介眉拟定。刘介眉是个旧军人，军阀习气很重，不重视学校的政治教育，学员每日的活动还是和旧式学校差不多，每天三操两讲堂。不久，朱德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办校必须为革命，不能因袭旧规。我们必须注意学员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所学军事知识才能为革命服务。这样，教学计划很快就有了改变，逐渐改为两操三讲堂，三操三讲堂，最后是三操四讲堂。学习的内容，特别是政治教育内容显著增加了。政治课主要是讲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同志常在纪念周（每星期天早晨举行）或晚点名时讲话。朱德同志的讲话，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学员进行循循善诱的教育，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针对一些学员思想极其混乱，有人赞扬这个主义，有人赞扬那个主义，朱德同志指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完全对立的，无政府主义是乱臣贼子主义，自由主义则是用所谓的“人人自由”造成天下多少罪恶，都是我们反对的。我们信仰的唯一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共产主义。

又一次，针对某些学员提出的“革命何时才算完”的问题，朱德同志指出：要知道反革命势力是长期存在着的，我们在这里消灭了它，它又会在另一个场合，采用另一种形式，猛然出现在革命人民面前。那里的革命人民把它消灭了，再有机会，它又会重新出现，我们得再次消灭它。这样辗转反复，直到最后把它消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揭示了的。所以，我们当革命取得胜利之时，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的反扑。我们不能有片刻的松劲，不能解除思想武装。我们要时刻准备战斗，我们要有长期革命的思想，要有终生为革命的坚强意志。不然，我们就会被反革命所消灭。

学校开办之后，在“开学典礼”问题上，朱德同志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蒋介石已经暴露了野心家的面目，正在南昌活动，并想到军官教育团来“训话”。对此，朱德同志先是借口“筹备工作未完”，开学很久也未举行典礼。后来经朱培德和王均一再催促，才同意举行，并决定借此机会揭露蒋介石的丑恶嘴脸。

“开学典礼”在2月底举行。蒋介石在会上大放厥词，吹嘘自己在北伐中的“功劳”，胡说什么他实行的“三民主义”是“最革命的主义”，要大家“绝对服从”他。这番屁话当场受到与会的郭沫若同志的讽刺和揭露，使蒋介石红着脸退席而去。

朱德同志接着开会，针对蒋介石的一派胡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指出，北伐军出师以来，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先锋。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尤以汀泗桥、贺胜桥的战斗最激烈，并继续攻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蒋介石夺人之功，暴露了他的野心。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扒手把已得的革命果实强夺了去！朱德同志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的功绩后，又指出，蒋介石标榜的“三民主义”，不是什么“最革命的主义”，要想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实行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去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朱德同志的这番讲话，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的野心家面目，我们听了都十分痛快，大大提高了革命觉悟。

随着政治思想教育的加强，党的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当时，教育团的共产党组织虽是公开的，但党员及其活动是带秘密性的。党组织有计划地在进步学员中逐步发展党员，最初每连只有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学期结束

前，每连已发展到十数人，有的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三分之一左右。

党领导着教育团的建设和对学员的教育、改造，而这领导的核心便是朱德同志。

在半年多的学习期间，大家对朱德同志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出国前已是少将衔级，但生活一直保持简朴，我们见他平时只穿套粗布军服，裹副粗布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有时还穿草鞋。他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接着又兼任第九军副军长。上班总是夹个皮包走路，很少坐黄包车。他的住房只有简朴的床铺和一张旧方桌，几张木凳子，简单得像个旅客。他常因开会或工作忙，吃不上饭，便买个烧饼充饥。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风度，对下级一点架子也没有。有时到他家里，他招待学员，就像亲人一般。在学校中，也从未见他斥责和处罚过学员。

朱德同志对学员非常关心。学校开办之初，他就强调对学员的管理上要注意说服教育，启发教育，严禁打骂。教职员和学员中如有意见向他提出，可以不受越级上提的限制。他常说，我们革命军队要求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亲密无间和思想一致，语言一致，行动一致。这就必须做到以理服人，启发士兵自觉遵守纪律。他十分关心学员们的政治思想进步，常向我们讲解革命形势和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在讲话时，他总是以自己受人压迫、被人剥削的经历、体验来教导我们，还常用一些幽默的言词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解释一些重大事件。当我们被他这些幽默的有时带点讽刺性的语言引得哈哈大笑时，也就更加深了对反革命的憎恨，领悟了他所讲的深刻的道理。可惜我们听朱德同志讲话的机会还嫌太少。因为当时他兼职很多，有时还要到邵式平同志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去讲课，或者到南昌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去讲演，忙得很。我们常常看见这些革命团体来校请他，而朱德同志总是来者不拒，有活动就挤时间去参加。

当时，朱德同志的革命清动，是不受当局限制的。因为第三军部队虽属蒋介石统辖，而江西地区属武汉政府领导，那时宁汉对抗，所以江西方面也不敢公开反动。教育团是军事单位，朱德同志既是团长又兼市公安局局长，而且他在滇军中影响大，连第三军军长王均在滇军中也还是他的间接下级，朱培德及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也是他旧时平级同僚，因此没人敢公开干涉他的活动。甚至当蒋介石公开反动，宁汉合作，蒋、汪合流之后，在南昌革命力量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各革命团体的人还纷纷到教育团来找朱德同志谈工作，开秘密会议，请他去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团实际上成了南昌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和堡垒。

配合校外政治斗争

1927年3月以前我们所听到的报告，大部还是些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但从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惨遭杀害起，每次报告便增添了一两件令人愤慨的事件，3月11日，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被迫解散了，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妇女协会等机关被AB团分子捣毁了。17日，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遭到特务的围攻，接着这些机关又被强占……。针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朱德同志指出，反动派已经开始动手杀害革命同志了，我们要准备还击。他还尖锐地指出，AB团的捣乱决不是孤立的事件，阶级敌人已经杀进南昌来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朱德同志领导教育团和南昌各革命团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追悼烈士，揭露敌人，公审AB团头子

之一程天放，组织宣传队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不久，“四·一二”惨案发生，“四·一八”蒋介石宣布成立了

145 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学员的情绪也一天比一天激愤。“四·一八”以后，全团立即举行大会，朱德同志在会上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了革命，我们必须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打击这一卑鄙伪叛变行为！

这时，朱培德还不敢得罪武汉政府，王均也装聋作哑，作狡猾的骑墙派。我们在朱德同志的领导下，抓住他们这一矛盾，当即行动起来，展开校外活动，选出了八十人组成临时宣传队，训练了宣传人员，分四人为一组，于星期日、节假日分头向群众进行宣传。我被指派为组长，在百花洲的观鹅亭附近向群众宣传。我们的讲话，大大激发了他们对反革命的仇恨情绪。

差不多与此同时，为了反击反动派，团内一部分学员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领导着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等群众武装，收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连该团副团长关麟征以下全部人员也被抓起来了。

“马日事变”后，教育团出发去赣东，小部分留守学员的校外活动，更达到了高潮。我们依照朱德同志历次教导的精神，明确提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推翻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南昌反动当局开始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AB团的活动更加猖狂，斗争更为尖锐。记得在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组来到孺子亭前，见亭中喝茶的人很多，我们就展开宣传活动。正讲着，突然有三个歹徒，拿起桌上的茶碗向我们打来，把我的头皮擦破了，场里顿时骚动起来，但我们事前已作了准备，又有在场的工人、学生协助，当即把骚乱平息，把目标转向了这些坏分子。群众愤怒地高喊“捉拿反革命分子！”当场抓获一个AB团分子。

为了对付反革命的破坏，我们加强了对策。如广泛地与地方各学校联系，与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联系，甚至与相邻的第三军炮兵团中某些较觉悟的士兵也秘密建立了联系。南昌市的警察与保安人员、消防队员，因朱德同志兼任公安局长，对他们进行过很多革命教育，他们也多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样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打击反动分子的气焰。这种活动，直到7月初反动的卫戍司令部派出纠察队，公开阻止革命活动和敌人大肆捕杀革命者时，才转入文字宣传（写标语、传单），进入半秘密的活动。

国内的政治形势自然反映到校内来。在展开校外政治活动的同时，教育团内部也经常展开两种思想的斗争。如对形势问题、农民问题、劳工问题、政权问题、军队问题、武装工农问题、现阶段革命领导权问题、革命与反革命问题等，常常依不同的看法分为几派，在教职员、学员的小组讨论会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朱德同志常常参加我们的争论，引导我们，并帮助我们作结论。在这急剧发展的形势下，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朱德同志的指导、帮助，也是非常及时的。每当一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思想就前进一步。

支援农民运动

教育团在朱德同志亲自培育下，锻炼得更加坚强了，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了。就在蒋介石开始公开反动的前后，教育团在朱德同志的主持下，进行了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便是派出一部分力量分散到各地去，协助农民运动的开展。

一天，朱德同志把我们一部分学员召集起来讲话。他说：我们常讲要发

动工农、扶助工农，现在很多县的农民起来了，但运动还不深入。现在要把你们派出去帮助他们工作。他指示我们怎样开展工作，又特地嘱咐我们要注意纪律，不许像旧军队那样糟蹋老百姓。他说，只有老百姓看你们真像革命者，你们的工作才能展开。

147 这次我是随曾天宇同志到万安去。在当地调查情况，向农民宣传，然后训练骨干，组织起农民协会。工作了大约两个多星期就调回南昌。我们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体会到这一做法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与农民结合的结果，一方面使我们受到了锻炼，又帮助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开展。

第二次支援农民运动的活动，是借“剿匪”之名进行的。5月间，南昌当局命令军官教育团出发前往赣东“剿匪”。但所剿的是些什么匪呢？一部分是真正的土匪，是土豪劣绅为了对抗农民运动组织起的地主武装。他们招兵屯粮，与零散的军阀队伍结合起来，打击当时的农民运动。但绝大部分却不是土匪。原来是：江西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归来后，就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北伐军进入江西之后，党向农民群众宣传了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消灭贪官污吏、铲除军阀、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这些口号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农民一经发动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而当时我党尚缺乏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有些地区党的领导作用还没有跟上去，广大农民便自发地雨后春笋般行动起来，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他们的革命行动自然打击了地主阶级。当时虽然北伐军已到，但各地的旧政权机关仅仅是名义上换了一下，实质上并未摧毁和改造、反动军阀李烈钧就自立伪江西省政府，还在滥行加委），这些旧式的县长、司法官等，大都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一切法律、法令、条例、规章，依然完整地因袭着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一套，处处卫护士劣势力，而诬蔑革命群众为“匪”了。于是便大喊大叫起来，请求当局派兵“剿匪”。

对于这种农民运动，味德同志有高度的评价。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革命。现在农民起来了，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这些地主阶级分子的狂呼乱叫，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问题。

当时，江西军队很多，但日趋反动的江西当局，却不派他们，而派军官教育团去“剿匪”，用意是很恶毒的。他们诬蔑革命群众为“匪”，企图用这种“借刀杀人”的办法，既遏制了农民运动，又可使走向革命化的教育团在与农民的冲突中遭到削弱。但朱德同志早已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并教导我们要辨明是非，分清敌我，变“剿匪”为支援农民运动，他要求我们站稳立场，给那些反革命以毫不留情的打击。朱德同志的教导，对我们开赴农村后分清敌我以极大的帮助。

这次，教育团各连除留了些学员继续参加南昌的革命活动外，其余的由朱德同志亲自带领前往赣东（当时我因病未去）。记得动身之前，朱德同志召集学员讲了一次话。他首先谈到这次出发赣东，是对我们一次很好的考验与锻炼，人人要有群众观点。要有阶级斗争的思想，要有为公共利益而奋斗的意志。在谈到出发的任务时，他教导大家：去到乡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去做，很好地爱护老百姓，尤其是要团结好贫苦农民。如果我们团结好老百姓，那么谁是真土匪，谁是土豪劣绅，谁是反革命，老百姓自然会告诉我们的。我们把反革命武装消灭掉，把土豪劣绅的气焰打下去，农民就起来了。

部队开到赣东临川一带，当地的反动官吏和土劣以为“救星”来了，他们杀猪宰羊，大摆筵席。革命群众也曾一度对我们发生误解。朱德同志坚决执行了阶级斗争的原则和援助农民斗争的方针，首先就给了地主土匪武装以坚决打击，又派出干部去指导农民斗争的开展。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真正的匪患平息了，农民得到支持和指导，农民运动更加发展起来。在部队奉调回南昌的时候，朱德同志又派了教育团一名党部干事担任临川县长，留下一名党代表担任农协自卫军大队长，一名副官主任担任临川县公安局长，还留了些学员在农村工作，安排停当后才返回南昌。这一革命行动，不仅支援了农民斗争，也给了学员以实际斗争的锻炼，从而使教育团更走向革命化。

6月间，情况更紧急了，并且传来反动当局策划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朱德同志便迅速结束了教育团，将一、二营学员毕业，三营有四百余人留团继续学习。一、二营除少数回原单位外，绝大部分都由朱德同志主持，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派到赣江流域和鄱阳湖周围的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作工会、农协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

南昌起义前后

1927年6月以来，南昌市的反动力量，活动日渐加剧，尤以AB团的活动最为猖獗。他们已经控制国民党所有军政机关及一些群众团体，制造白色恐怖。每晚戒严时间提早，街上岗哨增多了；国民党党校学生和卫戍司令部的侦察队横加盘查行人，卫戍司令部的巡查大队从早到晚到处抓人。许多革命同志和进步青年被捕了；路上行人突然会被抓走，连住宿旅馆、出入城门、上下码头，也遭受严密盘查，稍有可疑即遭逮捕。受军官教育团影响的第三军炮兵团因被怀疑而调出城外，其中一些人已受到监视。军官教育团党代表魏瑾钧等也被捕了。幸好军法处有我们的人，被捕的党员才未被害，都释放了。有的同志被捕后斗志仍坚，释放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但有的人，如魏瑾钧等，因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虽获释放，却意志消沉，妥协投降了。

教育团中，某些反动的国民党教职员和个别学员，也在公开叫嚣“分共”。朱德同志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反对“分共”活动，领导着全体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与这些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尖锐的斗争，结果争取了中间分子，孤立了右派分子，打击了反动分子，平息了这一风潮。大大鼓舞了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保护住了这一部分革命力量。

敌人看看从内部搞不成，就由反动军阀朱培德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名义，将朱德同志驱逐出南昌。于是朱德同志在6月下旬被迫暂时离开南昌。但二十多天后，朱德同志在党的指示下，于7月21日又秘密返回南昌，利用滇军中老部下老关系的掩护，进行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数日后，负责筹划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到达了，他就住在朱德同志寓所——花园角四号。俟后，刘伯承、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徐特立等同志也陆续到达。这时，贺龙、叶挺同志率领的二十军、十一军也都来到南昌。周恩来同志便与朱德等同志秘密联系，紧张地展开活动，于是教育团又成为南昌起义的基地和重要力量之一。

原来教育团的枪支就不多，一、二营平均每两个人有一支枪，三营每连只有十支左右，且种类复杂。但是枪支部掌握在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手里，一、二营学员分配工作后，又加强了留团人员的枪支配备。

起义的前几天，团里紧张起来。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连续打了两次野

外，熟悉了南昌市的主要街道，察看了南昌市周围的地形、地物及其通道，在行动中利用地形地物很认真，执行命令很坚决。晚上连着进行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传口令、识别记号等动作，都能做到迅速、肃静。但当时，大家并不知要举行起义。直到7月31日晚，才突然宣布起义密令，发来普通口令与特别口令，联系信号及识别记号。由于教育团兵力单薄，武器较差，子弹缺乏，分配的战斗任务是：一面监视进贤门方面的情况，一面监视小花园故军的一个团：这个团由另外的起义的部队负责解决，我们团作预备队。

临近起义时，朱德同志一直忙于和周恩来等同志共商发动起义事宜，有时忙于和开进南昌的贺龙、叶挺等同志接头，有时还要应付滇军中的上层工作。

朱德同志根据前委的决定，在部署好军官教育团的战斗任务后，31日晚上以请客为名，将敌第二十三团团长沙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沙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邀请”到大士院三十二号伪市长李尚庸住宅，饭后就打麻将。朱德同志的警卫员给了敌团长的卫士一些钱，让他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又把敌三个团长的枪拿到另外一个地方，晚上九时以后，起义总指挥部送来一份“山河统一”的口令，朱德同志借故退席。接着，埋伏在院外的十多名起义军战士冲进室内，把这三个家伙抓了起来。这一行动，为顺利消灭敌第二十二团、第二十四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1日凌晨两点钟，振奋人心的战斗打响了，起义军战士奋勇地向敌人发起进攻。一时间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密布全城，喊杀声响成一片。不久，枪声渐渐稀疏下来，起义军鲜红的旗帜，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迎着东方升起的太阳，高高插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屋顶上，市民们放着爆竹，万众欢腾庆祝胜利。这次起义进行得十分顺利，仅四个多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起义的部队共三万多人，除第二十军的全部和第十一军、第四军的各一部及教育团留队人员全部外，在南昌城还有一部分警士，两个保安队和一个消防队，由于在朱德同志兼任公安局长时受到教育，起义时没有散掉，也未乘机发洋财，保持了完整的建制和良好的秩序，并编入了起义军序列。

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光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起义后，朱德同志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该军共有两千多人，主要由我们教育团组建，还有不少南昌市的瓷器工人和铁路工人参加。我们换上了崭新的枪支，编成了九军指挥部的基本队伍。我们无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在朱德同志亲自率领下，同友军一道雄赳赳，气昂昂地投入了进军广东的南征。

写于1977年6月，改于1991年6月

激流归大海

栗裕

1978年5月，我有机会重新登上井冈山，回到阔别五十年的革命圣地，一一重访了当年战斗过的旧址、遗迹。特别是在弇市（今宁冈）的会师桥头，在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的建军广场，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第一次见面的龙江书院，故地情景，勾起我对多少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他们高大的革命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从潮汕失败到井冈山会师这段历程中，我是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的部队中工作。这两位令人崇敬的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又遭失败之后，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两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立下的不朽功绩，已经成为矗立在人们心目中的丰碑。

正确的决策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我在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警卫队当班长。8月3日起义军开始向广东进军。9月23、24日占领潮州、汕头以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潮州，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正当后勤人员在潮州城内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的时候，大约是9月27、28日，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知道，这是起义军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当时广东境内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第八路军。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只要战斗进展顺利，把广东境内的反动部队打垮，就可以重整旗鼓，以广东为基地，组织第二次北伐了。

9月30日早晨，炮声突然由远而近，并且愈响愈激烈。接着，我们的一些零散部队撤下来了。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我军进攻敌栋济棠师和薛岳师，起初节节胜利，后在汤坑附近受挫，伤亡很大，部队正在后撤。就在当天的上午，潮州城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站亲率三个师，正沿着韩江西岸向潮州扑来。我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仅有第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一部分和教导团一个总队，仓卒应战，坚持到黄昏，不得不撤出潮州城。因为事先完全没有估计到要撤退，后勤部门已经筹集到的大批冬衣，物资和几十万元军饷，绝大部分都丢掉了。我们撤出潮州时，得知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已经攻入汕头，到汕头去找革命委员会是不行了。于是我们在后勤部长带领下，找到了几只船，东渡韩江，向饶平（今三饶）前进，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同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会合。从潮州到饶平多是山道，我们每人负重七、八十斤，走的非常吃力。途中，又传来一个更加不利的消息：革命委员会撤出汕头西进至乌石一带，与从汤坑转移来的主力部队会合后，被敌人重兵围攻，遭到覆灭性的失败。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感到意外地震惊。

当我们到达饶平时，二十五师和教导团已先撤到饶平。原来，他们在三河坝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在朱德同志的卓越指挥下。仗虽然打得十分艰

苦，但打得非常出色，给进攻之敌钱大钧部两个多师以很大杀伤。他们得知汕头方面的消息不好，便主动转移致饶平。这时，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约两千。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

当时我们这支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这时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朱德同志认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我们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于是，朱德同志率领我们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10月16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我们向西北转移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即派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10月17日追至武平城，逼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我们这个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敌人进入武平城后，追出西门，遭到我们的阻击，又退回城里去了。我们排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立即紧跟大队行进。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而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在南昌起义开始发动的时候。8月1日晨二时前后，我所在的警卫队，奉总指挥部的命令，去策应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起义。我们跑步进入阵地后，按照上级部署向营地上空打了一排枪，短时间的沉寂后，很快听到教育团营地吹起了欢迎号声，接着，看到一队武装士兵，护送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武、蓄着胡须、年约四十岁左右的军官走了出来。人们说，这就是军官教育团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同志。他态度和蔼，满面笑容，频频向我们招着手快步走过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石径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就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战斗时，我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去，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

他卸下我的卜壳枪，丢下我走了（这个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当我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们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当我看到朱德同志在石径岭战斗中的英雄形象时，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战胜伤痛的力量。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径岭战斗、我们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真正的英雄

自从蒋介石、江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打边走。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角（定南、龙南、全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愈来愈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10月天气，山区的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流行病折磨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程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士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这种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带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部队，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在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刻，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真是像青松那样挺拔，像高山那样耸立，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当然，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我们的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尽力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和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在旧军队里，官兵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生活待遇悬殊。但我们看到身为军长的朱德同志，却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简朴生活，和士兵一样吃大锅饭，一样穿灰色粗布军装。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

行，深深地感动着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后来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时陈毅同志正在武汉，是武汉军政分校党的负责人。8月2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但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撤走了。陈毅同志又不顾一切艰险，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亲自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去当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同志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后来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8月半赶上起义部队，10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定。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陈毅同志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1927年10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同志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

朱德同志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

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

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陈毅同志对之作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是讲了两条政治纲领，我们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就是依据这个纲领作些发挥工作。

陈毅同志也恳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加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四十四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在叛逃中自我爆炸。陈毅同志回顾过去历史时指出：“南昌暴动，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根本是个逃跑分子。”可是，林彪死党及“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竟然百般美化林彪，大搞伪造党史和军史的阴谋活动，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这简直是对历史的无耻歪曲和篡改。

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乃是那些对革命坚定不移、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战士。

大庾整编

1927年10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正如朱德同志所预料，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候，继宁汉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同志便利用这个间隙，领导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和整编。总的来说，我们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成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是，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在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在组织上，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痞、流氓也占一定的数量，在未经改造之前，他们常常成为害群之马。在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像毒菌一样腐蚀着部队的肌体。从饶平到大庾约一个月的进军中，环境异常恶劣，上述这些不良因素给部队带来了更大的损害，如果不坚决加以改造和整顿，这支队伍不但不能继续执行革命任务，战胜凶恶的敌人，甚至部队本身能否存在下去也成了问题。

这次整顿和整编部队，实际上是从信丰整顿纪律开始的。本来，在向西

转移的一路上，破坏群众纪律，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就时有发生，大多数同志对此现象十分气愤和不满。但是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跟闭一只眼，不敢过问，以致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和处理。当部从进入信丰城的时候，破坏纪律的行为就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了。这座县城里，有商店、酒楼、当铺和钱庄。部队则一进城，少数坏家伙钻进酒楼饭馆里去大吃大喝，吃完把嘴一抹就走；有的还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零花。”这些人的恶劣行径，简直和军阀队伍一样，影响极坏。

面对部队的这种严重情况，陈毅同志当机立断，要号兵吹紧急集合号，并叫传令兵传达发生敌情和转移出发的命令，带起队伍——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二十多里，走到一个山墩里的平地上才停止下来。就是在这里，举行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丰全体军人大会。在大会上，陈毅同志宣布了革命纪律，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当场宣布执行严肃的革命纪律，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这是陈毅同志第一次和全体同志见面，大家都被他这种果敢机智的领导所震动，为有这样的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同志来协助朱德同志领导部队，从内心里感到喜悦。

全体军人大会之后，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我们便到大庾地区驻下来，对部队继续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同志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像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记得当时部队还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与此同时，整个部队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共组成七个步兵连。我被分配到五连任指导员，连长是耿凯同志（他是朱德同志领导的教导团的学生，后来牺牲了）。另外还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总共九个连，合组成一个团。这支队伍虽小，目标却是很大的。各地国民党反动势力，都知道我们是南昌起义剩下的贺、叶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我们走到那里，就有地主民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荫蔽，我们便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对外化名王偕（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

自饶平出发以来，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一直很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常常到基层军官和士兵中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现在整顿了党的组织，重新整编了部队，他们就能够依靠和发挥组织的作用，更好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潮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

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同时，转战赣南山区时走散和离队的人员，因为到处遭到反革命势力的追捕，有些人又陆续返回部队，这一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大家。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产峻的锻炼和考验，质显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次大员整编，是我们这支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我军的完全改造，是上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现的。

这时候还处于建军初期，我们党还缺乏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革命军队的经验。而建设这种军队的一整套方针路线，是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上和理论上给我们全面、系统、正确解决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领导起义部队西进的战斗历程中，为我军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的经验，他们都不愧为我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

上山打游击

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这支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11月上旬，我们离开大庚县境，来到了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这里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又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这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部队进入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此以前，我们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在崇义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二十天左右，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

12月上旬，我们转移到仁化，和中共广东北江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这里，得知了我党要举行广州起义的消息，同时接到党中央来信，指示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部队于12月15日赶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于是，我们兼程南下，但刚赶到韶关城郊，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了。

这时韶关市内的气氛十分紧张，店铺、银行、钱庄纷纷关门。韶关商团有七、八百条枪，如临大敌，阻止我们进城。我们就开到韶关城外西南郊的西河坝，打算住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可是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甫也不让我们住，“哇哩哇啦”对着我们吵。我们不懂外国话，无法和这个神甫说道理。正在争执不下时，陈毅同志走过来，亲自和神甫谈了一阵，这个神甫才算老实了。这时我们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队伍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广州

起义的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在西河坝驻得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就率领我们转移到韶关西北六十里左右的犁铺头。这是一个农村集镇，来到这一带，就更便于开展工作了。我们白天休养生息，保存力量，训练部队；晚上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农村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且开始了打土豪。这时，部队还收容了一些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这一带来的同志，我们的队伍开始有些扩大，思想情绪和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

对于这一段斗争实践，朱德同志十分重视。他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南昌起义，开辟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但是当时还缺乏实践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战斗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

这一时期，我们所以能够在长途转战之后，取得暂时比较稳定的环境，休整部队和开展农村群众工作，这是和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利用敌人阵营内部矛盾，正确地运用革命策略分不开的。当时驻在我们部队附近的，是滇军范石生的十六军。范石生同朱德同志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与蒋系、桂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是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朱德、陈毅同志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尽管在全国范围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在当前的具体情况下，仍有可能同范石生实行短暂的“合作”。于是，由朱德同志利用老关系，在范石生接受了我們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等原则条件下，同他达成了协议。我们改番号为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

团，朱德同志（仍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团长。我们从范石生那里取得了一批现洋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解决了当时弹药、冬衣、被服等供给的困难。

1928年1月初，蒋介石发觉我们这支起义部队隐蔽在范石生部，指令方鼎英率部从湖南来粤北，拟以四个团驻韶关，另以四个团留驻犁铺头以北之乐昌，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要范石生解除我们的武装，逮捕朱德同志。范石生立即秘密地通知了朱德同志。对于出现这种形势，我们本来是有所准备的。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部队立即连夜出发，从乐昌以南十几里的一个地方西渡武水，向湖南开进，去创造农村革命的更大局面。

湘南起义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经过近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忠实工具，完全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从而不能不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决心丢掉国民革命的旗子，继毛泽东同志之后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1928年1月20日左右，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我们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随即在那里正式打出了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湘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湘南。但是，湘南的党和人民

顽强机智地坚持了秘密斗争。当 1927 年冬爆发军阀混战时，他们趁机恢复了各地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建立了赤卫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传来，给湘南的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

在犁铺头时，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即已着手选择政治、地形、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以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在部队进入宜章县境，与湘南特委、宜章县委取得联系后，他们对湘南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决定在湘南举行暴动，并在湘南特委的协助下，拟定了首先巧取宜章县城的行动计划。

1928 年 1 月 22 日中午，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我们这支部队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利用胡少海的名义，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地开进了宜章县城，并立即控制了全城。

原来胡少海同志出身于宜章城里一个有权势的大地主家庭，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对现状不满，背叛了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但未暴露身份。我军一进城，人们便纷纷议论说，这支部队是本城大豪绅的儿子胡少海率领的，胡少海在国民党第十六军里当上团长了。我们进驶县城的当晚，国民党宜章县政府的官员和地主豪绅大摆筵席，欢迎我军军官。筵席开始不久，我出席宴会的同志，按照预定计划，迅速将伪县府官员、豪绅等抓了起来，并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宜章解放了。与此同时，县衙门内外的反动团队，也被我军解除了武装。接着，我们又砸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了地主豪绅的粮仓和库房，向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分发粮食、财物。在全城军民一片欢腾声中，伪县政府门前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高高升起。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战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每个人的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同时，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农民组建了宜章农军。

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震撼了湘南和粤北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忙派许克祥带五个团的人马，由广东韶关直奔宜章而来，妄图扑灭宜章暴动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

提起许克祥这个在“马日事变”中双手沾满湖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恨，义愤填膺。现在他又来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面临着优势的敌军，用什么样的战法来打它呢？朱德、陈毅同志根据南昌起义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摆开阵势打硬仗，要打游击战、运动战。于是，朱德、陈毅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军，决然撤出宜章县城，荫蔽集结在宜章城西南的白沙堡、芭篱堡、圣公坛一带山里。许克祥部即占领宜章并追出城来，妄图消灭我们。隔了一天，我军在转移途中，于岩泉、栗源一带与许克祥的先头部队遭遇。我们在农军的配合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对运动中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当时我们部队虽仍不足千人，却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战斗力是很强的。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乱了，歼灭其一部，余敌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许克祥的司令部所在地砬石镇。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争相逃命，我军很快便将敌人的五个团全部打垮。许克祥连摆在桌子上的饭菜都未来得及吃，就扔掉轿子，丢掉皮大衣，带少数马并逃脱了狗命。砬石镇到处是敌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这次战斗，我们缴到了一门山炮，许多迫击炮、大批的步枪、机关枪，二百多担

子弹。打垮许克祥之后，我们又重新占领了宜章县城。这是潮仙失败之后我军改变作战方法，首次获得重大成功，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

宜章起义取得胜利之后，立即着手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这是我们这支起义部队转入农村斗争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一月底，宜章县召开了隆重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县工农兵政府。各区、乡的工农兵政权也相继成立。这时宜章农军已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由胡少海同志（后来在闽西牺牲）任师长。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已先后成立。初期的红色政权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在这里提出来了。虽然由于时间所限，还没有来得及制订和公布土地法，正式开展土地革命，但在党和各级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群众起来烧毁田契，有的地方自发地分了土地。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我们一个班出去，就带回一长列新战士。宜章县的革命进入了高潮。

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砵石战斗的胜利，轰动了整个湘南。在农历年关以后，湘南其他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为了支援各地的起义，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先向郴州前进。在黄泥坳地方与敌何键的嫡系周南（师长）的两个营遭遇，我们把它打垮了，占领了郴州城。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时我们只要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地方党和农民武装的支援配合下，就可以解放一个县城。不到半个月，先后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成立了赤卫队、自卫军和革命群众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四师和几个独立团。在上述五县斗争胜利的影响下，起义的烈火，又迅速在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等县的大部地区，以及茶陵、攸县、酃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燃烧起来。

朱德、陈毅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南起义，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引导湘南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辟了大好的革命新局面。

井冈山会师

就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艰苦转战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举行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经过著名的文家市会合、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于1927年10月27日到达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底，当我们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陈毅同志曾读过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知道他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领袖，久已景仰。这时我们正处于孤军转战、极端艰难的境遇，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的消息，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1月间，我们在崇义、上犹地区时，为了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情形，朱德、陈毅同志便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去进行联系。不久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来了一个营由张子清、伍中豪同志率领，是上井冈山途中在大汾遭敌袭击而转移到这里的。起初据地方党组织报告，上犹县的鹅形地

区有一支革命武装在那里活动，陈毅同志立即换便衣亲自前去和他们取得了联系。通过他们，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那时候，兄弟部队之间很讲阶级友爱，我们从范石生那里搞到的一揽弹药和军用物资，不仅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同志带领的这个管，还有一部分由这个营携带返回井冈山。1928年2月初，我们打郴州时，毛泽东同志又派一个特务连到郴州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1928年2月间，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湘南起义创造的一片大好形势，遭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严重损害。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主张，即为了不让军阀队伍沿湘粤大道停下脚来占领湘南，要求把湘粤大道两侧各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湖南省委专门派人到部队来传达这个错误主张，并要求坚决执行。“左”倾路线的烧杀政策，虽然受到一定的抵制而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贯彻，但已经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引起群众的不满，甚至激起人民的反抗，使我们的斗争受到很大挫折。同时，由于湘粤大道是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我们占据湘南，控制这条大道，对各波军阀威胁很大。3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他们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便立刻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我们进行“协剿”。朱德、陈毅同志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4月上旬，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同志率领湘南农军，由郴州撤向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路赶来，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转移，在汝城、酃县城郊打击了追击之敌，掩护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湘南部队顺利地到达耒市。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胜利地回到了耒市。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般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从此，我们这支队伍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沿着正确的道路胜利前进。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开辟的光芒万丈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都竭尽全力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群山环抱的耒市，在初夏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秀丽。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5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

任军参谋长。记得在如今称为建军广场的那个场地上举行的庆祝会师大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大量的禾桶排列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的讲坛和舞台，演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精彩的节目。部队和民众挤满广场，大家的革命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率领我们艰苦转战、立下丰功伟绩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已经相继离开了我们，从潮汕失败以后跟随朱德、陈毅同志一路转战同上井冈山的许多老战友，也都先后牺牲和去世了。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曾经费尽心机对这段历史肆意歪曲、篡改和捏造，甚至对朱德、陈毅同志进行无耻的诬陷。这就使我在无比愤慨的同时，深沉地感到，有责任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记述朱德、陈毅同志这一段历史功绩。陈毅同志生前说过：“伪造历史就是犯罪。”只有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反映出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妄图阻挡革命历史潮流的林彪、“四人帮”一小撮丑类，已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一生为人民立下不朽功绩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将永远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1978年12月

朱德同志与湖南起义

李奇中

—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起义大军主力沿闽赣边界，直下广东潮汕地区，一部控制三河坝，由朱德同志指挥。潮汕地区和三河坝相继失利后，朱德同志率领三河坝周士第余部和贺龙同志从潮汕退出之一部，历尽千辛万苦，于11月辗转到达韶关犁铺头，队伍编成一个团隐蔽在范石生的十六军内。这时，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这样，部队总算站稳了脚跟，武器装备、薪饷均得到补充。朱德同志在来到韶关之前就范石生部有过直接联系，并达成了“队伍保持独立行动”的协议。到达韶关犁铺头后，与范石生从长计议商量今后双方共同行动，决定把队伍拖到广东雷州半岛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向桂越、滇越边境发展，扩大革命力量。正当计划酝酿成熟之际，突然得到消息，蒋介石发现朱德所部是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命令范石生立即予以消灭。范石生因与我军订有协议，我们是保持独立行动的队伍，所以，让我们迅速离开韶关。

朱德同志率领我们这支队伍离开韶关，原先计划是去海陆丰，与广州暴动失败后的余部会合，但走到南雄附近发现南雄已有方鼎英部一个师挡住去路。南雄通不过，只好把队伍折转北上，到达仁化后再计议今后行动。队伍在仁化驻了一夜，朱德同志当晚约集大家商定，待队伍到了湖南宜章县的蟒山洞后再确定下一步行动。于是，部队在拂晓前离开仁化，经过乐昌南面的长乐圩，渡过北江，径往湖南宜章蟒山洞。

蟒山洞是大山区地带，地势险要，是队伍休整的好地方。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等计议，队伍既然到了湖南地界，我们正好可以发动湖南的革命运动，可望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互相策应配合，发展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

于是，决定搞湘南暴动（后来称湘南起义），发动土地革命。朱德同志总结了南昌“八一”暴动时，忽略了群众问题，搞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教训，认为在湘南搞革命，必须注意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由军队支持群众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因此，在蟒山洞与宜章党的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由宜章地方同志秘密发动群众，同时，从军事方面朱德同志也有所准备。

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国民党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驻扎在坪石、乐昌一带，我们过仁化、乐昌时，正好从许克祥部队的鼻子底下穿过，估计许克祥部一定会同我们打一仗的。为此，我们也作好了准备，决定先扫除这个大祸害，以保证湘南后方的安全。估计韶关的范石生部不会来打我们，所以我军没有顾虑，这是在广东方面。在湖南方面，我们要主动打出去才能摸清敌人的底子。照这样的估计，必须首先消灭许克祥部，才能取得革命势力向湖南发展的保障。

我们队伍先到了蟒山洞以东的武阳司，武阳司距坪石不远。不出所料，许克祥的队伍果然从坪石、乐昌向武阳司前进，于是，双方在武阳司以东地区遭遇。许克祥率部扑来，双方展开激烈地战斗，不到两小时，许克祥所部就被我们的钢铁队伍打得昏头转向，纷纷溃退。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坪石、九峰，战斗才告结束。许克祥换上老百姓衣服落荒逃命了。战斗结束后，把缴获的不好携带的重武器抛入坪石大江中。把俘虏和缴获的大量轻武器、

弹药等，都保留下来，在以后进入宜章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时，编成第二十九团。

我们歼灭了许克祥部之后，不再回蟒山洞，而是驻进了宜章县城以南的碣石彭家，在碣石彭家充分准备湘南暴动事宜，例如暴动时使用的红色军旗，红色战斗标志，标语口号等等。宜章地方同志也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例如智取宜章城，在黄沙堡、黎云堡等处打土豪劣绅，准备部队进城。

二

1928年1月12日，朱德同志带着手提机关枪的卫士排，雄赳赳气昂昂地骑着高大的棕色骡马，率领我们队伍从碣石彭家进驻宜章县城。随后朱德同志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宣布废除国民党军旗而改为斧头镰刀满地红军旗。下辖两个团，番号为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朱德同志任军长兼任第二十八团团团长；陈毅同志任党代表；王尔琢同志任参谋长；龚楚任第二十九团团团长；我任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兼教导大队队长。

与此同时，宜章县宣布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宜章全城居民家家户户挂红旗放炮竹，人人颈上系红领带，左臂别红袖章。这既是在过年，也是在欢迎工农革命军成立和庆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老百姓欢天喜地喜气洋洋，整个县城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部队在宜章休整了两天后，就高举红旗向郴州前进。第二十九团留驻宜章训练，并担任对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保卫工农革命军后方的安全。朱德同志率领军部及第二十八团出发。出发前，朱德同志讲了话，大意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是革命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军队，开始打起斧头镰刀满地红的军旗。南昌“八一”起义时是利用旧式军旗，现在才打起红色军旗，因为它是标志着永远革命的军队，希望大家特别尊重红色军旗。这支革命队伍在当前所担负的任务是土地革命，要打倒地主上豪劣绅，要实行分田地，要为人民翻身而打仗。因此，咱们的任务很重，责任很大，我们应该好好完成这个革命任务。

朱德同志率领第二十八团进到揭岭时，前卫部队首先将敌人击垮，敌人退据良田，会合良田之敌实行顽抗。我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敌军不支，纷纷溃退。我军跟踪追击，敌人未敢在郴州停歇，一直向耒阳逃窜。我军顺利占领郴州后，随即沿郴来公路继续前进，进到耒阳郊区，准备攻击耒阳之敌，郴州是湘南郴州、宜章、汝城、资兴、永兴、桂东六县的首府，占领了郴州，就标志着占领了六县，影响非常之大。附近各县的革命青年和农民代表得到红军到达郴州的新闻，纷纷到郴州联系并请示分配任务，请缨杀贼。朱德同志以郴州为暴动根据地，命令陈毅同志主持根据地一切事宜，例如接待各县的革命青年及农民代表，分配任务，组织群众，发动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群众很快就动员起来了，行动起来了。一些土劣势力特别顽固的县，派出少数部队支援，不到一个月就使湘南十个县连成一片，陆续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三

朱德同志率第二十八团进抵耒阳近郊，侦察敌情，发现耒阳之敌约有一个师的兵力，于是周密部署兵力，巧妙运用战术，于次日拂晓对敌军发起攻击。由于我军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士气旺盛，奋勇冲杀，激战至中午时分，终因敌军不支，纷纷溃退，我军完全占领了耒阳县城。追击部队进抵耒水东岸，敌军退过河据守衡阳城，敌我成对峙状态，双方相持至4月间。

我军占据耒阳之后，派部队分赴各县支持土地革命斗争，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影响所及的地方，如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汝城、桂东、酃县、安仁、茶陵等十县都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广泛组成人民武装约一万多人。

朱德同志在湘南暴动期间，规定官兵薪晌伙食一样，打土豪所得财物归公，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平等，等等。朱德同志很关心人民疾苦，时常分赴各地巡视，有陈毅同志等陪同。在分赴耒阳、永兴、资兴、郴州的市镇巡视时，看到有些房子被烧毁，表示深为痛惜，便对陈毅同志说，房子不要烧掉，老百姓可以住，我们军队也可以住，为什么要烧掉呢？

四

1928年4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两个师从两个方面向我军发起攻击，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为了保持实力以利再战，朱德同志暂时将队伍撤退。他率领第二十八团由耒阳经安仁、茶陵，向江西井冈山方向撤退，同时，命令陈毅同志率领驻在宜章的第二十九团以及有关各县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从郴州、资兴、酃县向江西井冈山方向撤退，约于4月底，两支队伍在井冈山附近集结。

1928年4月28日，由朱德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和湘南地方武装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5月初在江西砦市举行会师大会，两支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参谋长。

两支队伍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势力增大，声威大震。后来，在江西、闽西发展革命运动，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

湘南起义的重大意义在于：先有湘南起义和湘南十余县苏维埃政权的创建，然后，有井冈山会师和全国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所以，湘南起义为工农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伟大的会师

何长工

—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伟大的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井冈山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程，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

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我10月5日自井冈山出发，10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12月中旬辗转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

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帐，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

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到达了犁铺头。

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到了蔡协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

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他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译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

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

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些盘费，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角暴动。

二

1928年1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湖南暴动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收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敌人。立即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红军的行动。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失败了。

3月上旬，接到湘南特委的指示，委任毛泽东同志为师长，并命令他将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三十一团作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三十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

第三十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上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键的队伍，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将北犯的粤军，阻挡在九峰山脉，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起义军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

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部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立刻向南撤退。我们跟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的主力，朝我们压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

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迫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报告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陈毅同

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那撤出时，正是打濠口的时候。

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堵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载福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谁知，一开会，杨载福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到衡阳去。杨载福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他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

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

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部队在后面掩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

三

当我们快接近酃县的河渡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已经到了沔渡了！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

我随着陈毅同志、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得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拼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利索。朱德同志笑眯眯他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我报告说：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

第七师归队了，陈毅同志也留在朱德同志身边。4月24日，我们第三十二团回到耒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兄弟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

回到耒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耒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4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第三十一团回来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者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竖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见地点是在宁冈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同志先到了龙江韦院，当毛泽东同志到来时，朱德同志赶忙借同陈毅等同志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快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进了龙江书院屋里，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他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对我说，何长工同志，你负责准备一下吧。他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倾吐盼望之情，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展望未来前途，表示今后决心，到处欢声笑语，一片热闹景象。

四

山明水秀的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清，秧田更绿。在省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掇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十点钟，离这二十里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人，群众也不少，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汇成了喧闹的浪潮。

十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接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响彻云霄，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个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是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掌声。

接着，毛泽东同志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用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到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祝贺这支队伍在将来跟反动派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祝贺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声势更加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会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务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进攻，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湘赣边界的红旗子，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这时，许多学生和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井冈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农民和学生，长途跋涉奔上了井冈山。后来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同志率领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

1977年3月

朱德同志在闽西

傅柏翠

1927年9月，朱德等同志率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向广东进军途中，曾经过上杭县境。当时，朱德同志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曾住在上杭县城旧道前衙门保安宫革英书院。记得南昌起义部队到上杭县城的当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南昌起义部队在上杭县城只住了一、二天，便分水、陆两路离上杭，经峰市向潮州、汕头进发。部队出发前，起义部队指挥机关和中共福建省委曾开会商定：当起义大军进军广东得手后，由朱德同志率领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回师福建，以上杭一带为革命基地，收编闽西地方武装兰王田部，扩大建制，协助中共福建省委成立省革命委员会。10月，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汤坑受阻，除少数随彭湃转移到海陆丰外，其余大部被打散。这时，我们派出去的地下交通张友民、兰鸣岗、雷三鸣回到上杭县北四区报告：朱德同志率两千来人激战三河坝后，按老路撤回到了上杭县境内。我和罗明立即赶去接应。当朱德同志所率的南昌起义部队，撤到上杭县的洪山一带时，因我们晚了一步，没有联系上。当时，因广东的敌人紧紧尾追，为了摆脱追敌，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只经过上杭境内，便取道武平县的象洞，经江西抵粤北坪石，后转入湘南发动农民年关暴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革命队伍和湘南起义农军共一万来人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所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朱毛红军便在拥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扩大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14日，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14日第一次入闽，在福建省长汀县的长岭寨，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部二、三千人，并击毙了郭凤鸣，解放了汀州城。此后，红四军便在上杭、龙岩、永定一带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不久，蒋桂战争爆发。4月1日，朱毛红军三个纵队回师赣南，发展革命根据地。4月底，蒋桂战争虽告一段落，但桂系军阀徐景唐不甘罢休，在广东宣布独立反蒋，5月13日，广东军阀陈济棠被蒋介石收买，发布讨桂宣言。于是，桂粤军阀又打了起来。这时，福建守敌很弱，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和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张贞，都亲率主力去广东潮州、汕头参加徒粤混战。5月18日，红四军由宁都返回瑞金，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确定要在闽粤赣三省边界建立红色根据地。5月20日，朱德军长和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21日，到达上杭县的庙前宿营。这天，我突然接到毛泽东同志、朱德军长和刘安恭（刘当时是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闽西）同志联名写来的一封急信，大意是：红四军已再次入闽，部队到了庙前，请火速来商量有关事宜。我接信后，立即和红军派来的教官曾省吾，先找到刘安恭，再一起到红四军军部，见到了朱军长。不久，毛泽东同志也来了。晚上，就一起开了个小会，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军长详细询问了闽西的近况，我和曾省吾一一作了汇报。开会中，毛泽东同志问我：若敌人尾追上来，你们地方武装，能不能挡住敌人，坚持四个小时？我回答说：“能！”毛泽东同志默默点了点头，便和朱德军长一面看地图，一面亲切地交谈。两人商量后决定：乘福建敌人主力到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混战之机，红军主力直下龙

岩、上杭。攻下龙岩城后，再攻打守敌薄弱的永定、漳平。当时交给我四项任务：（1）组织兵力拦阻尾追红四军主力之敌；（2）派人打入白区侦察白匪行迹，及时报告红四军军部；（3）立刻集合地方武装，成立红五十九团，跟随红四军主力行动；（4）攻下龙岩后立刻到县城会合，接受新任务。会后，我连夜赶回蛟洋，布置战斗任务，作好阻击敌人和配合红四军主力攻打龙岩城的战斗准备。

5月23日清早，朱德军长和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从小池向龙岩发起进攻。当时，龙岩城守敌只有刘烈波、小股土匪，一听到红军主力攻城，吓得弃城而逃。朱德军长和毛泽东同志率部进到龙岩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朱德军长和毛泽东同志率红军撤出龙岩城，进驻坎市，挥戈南进，直指粤闽边境。25日，红军首次解放永定县城。第二天，在永定县城南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永定县革命委员会，选张鼎丞任主席。会上，毛泽东同志、朱德军长讲了话，并作出了拆城墙的决定。不久，刘烈波又带者一股匪徒龟缩回龙岩县城据守。这时，根据侦察得悉：从江西尾追红四军之赣敌李文彬部，追到涂坊后，又撤回闽赣边境的长汀。中共上杭县北四区区委，将此消息接连连写了七次密信，派人送到龙岩，由地下党转送红四军军部。不料，龙岩县委书记谢绍武（后来叛变了革命，当了伪警察局长）将信扣压下来，没及时地把密信转送给红四军军部，使朱德军长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永定等待前方送递情报，结果等了近十天之久也未接到情报，失去了按原定计划准备立刻攻下守敌薄弱的漳州城的机会。后来，只好改变行动计划，先派出红四军三纵队与我所率的红五十九团，于6月3日，向龙岩城发动突然袭击，很快就赶跑了守敌刘烈波。6月5日，忽然得悉白匪旅长陈国辉率主力由广东急返闽西。这时，朱德、毛泽东同志在龙门发布命令，要红四军三纵队和红五十九团立刻撤出龙岩城，会同红四军二纵队赶到龙岩大池集结；要红四军一纵队也撤到上杭县大洋坝。这样，故意给陈国辉让开一条路，将敌人引向龙岩空城，并决定在陈国辉主力未到龙岩之前，先吃掉白沙守敌钟铭清团。6月7日，朱德、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二、三纵队由东而西，正页攻击；我红五十九团为右翼，经苏家坡迂回南进；红四军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直扑白沙。三路大军齐头并进，给白沙守敌钟铭清以突然袭击，激战一个多小时，全歼钟匪一个团。战斗结束，朱德军长立刻在前线找到我，交给我两项任务：（1）把在白沙战斗中所缴获的部分枪弹分配给地方武装；（2）把近百个红军伤病员护送到老苏区蛟洋，创办一个红军医院，并派了一名姓陈的司务长当红军医院院长。6月10日，红四军主力便开赴连城县新泉休整。这时，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将红五十九团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当时，还在新泉大草坪召开了整编大会，会上朱德军长宣布前委的命令任命我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张鼎丞为党代表。前委还决定，从原红四军一、二、三纵队抽调部分干部到四纵队。开始我很高兴，但后来看到新调来的干部有很多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有时还打骂士兵，队伍中对新调整的干部有些意见。我为此有点左右为难，曾想不干。有一天开民主会，下面给我提意见，大家说我有农民意识。当时，朱德军长也正好来到四纵队，并参加了民主会。他也作为普通一兵，在会上问我：是不是怕难，不想干？我说：既不怕难，也不是不想干，就是怕工作干不好。朱德军长立时坐过来，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说：不怕，想干就好！工作有困难好解决。会后又和我个别谈心，耐心对我进行教育。在新泉休整期间，红四军前委会多次

召开会议，研究红四军的行动。原定计划准备先消灭长汀的守敌李文彬，再打回赣南，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这时，正好龙岩县地下党负责人郭滴人、邓子恢、陈聘三前来报告说：白匪陈国辉在广东参加桂粤军阀混战吃了败仗，现在垂头丧气回到龙岩县城，士气低落，不堪一击，当地群众已作好准备，要求红四军打回龙岩城。于是，前委便决定改变计划，立即出兵三打龙岩。

6月17日，朱德、毛泽东同志率红军离开新泉，回师东进，攻打龙岩。18日，部队抵小池宿营。19日，朱德军长指挥红四军兵分三路向龙岩县城发起总攻：一路由三纵队攻打北门，并以一部分兵力埋伏东门外东官山上，准备阻击逃窜之敌；一路由一纵队从南门攻城；另一路由朱德军长亲自率领军部和二纵队，沿龙门大道向石门开进，担任主攻，三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逼进龙岩，激战几小时后，敌人便打出白旗，自匪陈国辉吓得在城里的水门公馆住室换上使衣跑出来，向漳平、永富狼狈逃窜。红军乘胜追击，很快第三次攻下龙岩城，全歼白匪两千多人。这时，刘烈波逃到岩东，处境很不好，见自己无处藏身，只好打着白旗派人送信投诚红军。朱德军长为了扩大红军力量，改造教育白匪，亲自在龙岩城里和刘烈波接谈，宣传红军对待起义投诚官兵的政策，欢迎他们参加革命，从此，刘烈波打起了赤卫队的旗号（后来虽然刘本人叛变了革命，但他部下的士兵，很多都改造成为革命的力量）。此后，朱德军长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在龙岩一带开展土地革命，发展革命武装，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

1929年6月下旬，在龙岩县城公园右侧小马路下的公民小学（当时是红四军政治部所在地），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会场正面有一个高五、六尺的方台，台上放了几条长凳。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台前有天篷，两边有小走廊，到会的士兵代表持枪席地而坐。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只开了一个晚上。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呢？主要是为了统一党内思想，更好地统一红四军的行动，发展革命力量。因为当时红阶军成员主要来源于农民和起义官兵，游击思想、军阀残余、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在红四军内部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特别是中央2月7日来信9要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朋军的内容在官兵中传开了，于是引起了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如对红四军今后如何行动，是立脚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来解决部队给养，还是靠攻下州、县来解决部队给养专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否要离开红四军等问题，官兵看法不一，议论纷纷。所以在三打龙岩取胜后，为了鼓舞士气，更好地统一红四军行动，以利再战，便利用战斗空隙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对中央2月7日来信，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否要留在红四军的思想认识问题。

红四军七大闭会不久，在上杭县的蚊洋由红四军新任前委书记陈毅同志主持召开第一次前委会议。朱德、毛泽东同志及新当选的前委委员都参加了、会上，对红四军今后的行动作了详细研究。这时，收到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要尽可能向反动势力薄弱的宁化、漳平等方向发展。根据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议议程有三项：（一）红四军的行动，若敌人发动三省（闽粤赣）“会剿”，为了分散敌人进攻目标，保存、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便更好地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红四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留闽西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一路出征闽中，转移

敌人进攻目标；（二）确定陈毅立刻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选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三）毛泽东留闽西一面养病，一面领导闽西的革命斗争。

1929年7月底，敌军开始三省“会剿”，斗争形势很紧张。这时，朱德同志在上杭县左坑召开了第二次前委紧急会议，具体落实第一次前委会议决定，研究如何粉碎敌人三省“会剿”的办法。会议最后决定：一、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斗争，为了迷惑敌人，只打出四纵队的旗号，使敌人误认为在闽西只留下“土共”；朱德军长亲自率领红四军主力二、三纵队转向闽中，把敌人进攻目标引向闽中。这样，可以保存和巩固闽西老革命根据地。第二天，林彪带一纵队开到永定一线，防粤敌陈维远；我带四纵队进到上杭、连城、新泉一带，防赣敌金汉鼎；朱德军长率红四军军部和二、三纵队向宁洋县进军。8月4日，攻克宁洋县城，朱德军长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工农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革命武装。8月8日，攻占了漳平县，朱德军长在漳平住了十天，在县城里分别召开了穷苦手工业工人、贫雇农、居民座谈会，帮助建立中共漳平县办事处、漳平县城防第一赤卫队、县工会和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并没收上豪的财物分给农民，还进行了筹款。这期间，又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继续向闽中的大伢、德化进军。8月15日，朱德军长率部离开漳平。20日，对大田发起围攻，久战不克，撤至石牌，后转入永春一带。朱德军长率领红四军官兵，在沿途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协、赤卫队。红军由于严守纪律，爱护百姓，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极好的影响。当时，前委开会研究今后行动，认为：因闽中山高路险，地形复杂，加上天热，沿途病员很多，部队纷养困难，于是，决定8月28日，由闽中回师闽西。8月29日，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在回师途中一举歼灭白匪张贞的四十九师一个团，缴枪三百多支，迫击炮一门。电台一部。朱德军长率部乘胜追击，30日上午，再次攻克漳平县城，又歼灭了张贞师的另一个团，缴枪三百七十多支，子弹三十多担，炮两门，俘敌百余名。9月2日，在红四军配合下，龙车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9月5日，朱德军长在水尾村接见了农民暴动的领导干部，并留下红军老战士两人，协助当地农民开展武装斗争。9月6日，朱德军长率红四军二、三纵队离龙车、回师龙岩。朱德军长率红四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出征闽中，既扩大、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又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三省“会剿”。

1929年中秋节前，朱德军长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由闽中胜利返回上杭县的白沙。9月18日（农历8月17日），我奉命星夜率四纵队赶到白沙。接着，林彪的一纵队也奉命赶到，四个纵队在白沙会师。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永定开展土地革命。这时，闽西特委和上杭县委来信，要求红四军攻下长期被敌占领的上杭，消灭福建第三个白匪头子卢新铭。因为上杭县城三面环水，一面为开阔地，城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有“铁上杭”之称。红军、赤卫队曾多次攻城都没攻下来。朱德军长一面召开会议研究攻打“铁上杭”的战斗计划；一面派侦察员进城摸清敌情，并布置部队动手做云梯、搭舟桥，作好渡汀江和攻城战斗准备。9月20日清晨，部队和赤卫队员，由白沙向上杭县城进发。朱德军长令二、三纵队为主攻，强攻北门，并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赤卫队攻取东门；令一纵队配合一部分赤卫队袭击西门；令四纵队和部分赤卫队作预备队，佯攻南门。朱德军长亲临前线，站在城东北的高地石牌岗指挥攻城战斗。白匪卢新铭凭借上杭天险负隅顽抗，并把队伍集合在城里保安官前面大操场训话。正在训话中，恰好我方一发炮弹落在敌军队伍里，

匪兵四处奔逃。卢新铭见红军已强渡汀江，东、西城门已经接火，仓惶丢城偷渡逃跑。天亮时分，红军攻下东、西城门。接着，南门也被攻下。最后只剩下北门这一顽固堡垒，朱德军长亲自率卫士班冲到北门城墙下，向守城门的敌哨兵展开政治攻势，向匪兵喊话，“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并命令二、三纵队从北门两侧搭云梯入城。不一会，城内响起了枪声和喊杀声，北城门从里面打开了。朱德军长立即率红军战士从北门冲进城。霎时，上杭县城四周城墙上飘扬着红旗，全城欢庆解放。当天，朱德军长在城里召开群众祝捷大会。他站在一张方桌上，用川北话宣传党的十大政纲，动员群众拆城墙，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到会群众听了十分高兴，很多城郊的农民，星夜赶到城里参加拆城墙。第二天，为了祝捷，中共上杭县委举行了小型会餐。朱德军长鼓励大家要团结一心，消灭更多白匪，壮大红军队伍，夺取更大胜利。在会餐中他看到多做了一、两个肉菜，便教育我们说：打胜仗是要庆贺的，改善生活也应该，但肉菜不要搞得太多，不要吃肉当饱，要分餐吃。在会餐中有人问朱德军长，为什么他脚板这么硬，日夜兼程腿不疼？他微笑着对大家说：他从小就跑惯了山路，小时上学每天来回走四次，每次要走五、六里，所以越走腿越有劲。

红四军攻下上杭不久，大约在1929年10月上旬，在上杭县城内太宗庙，朱德军长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党代表和士兵代表等。会议内容有三项：（一）根据红四军广大官兵的要求和中央9月28日来信精神，通过了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决议；（二）通过了把闽西各县联合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提案；（三）根据广东、福建省委和东江特委的指示和要求，讨论了出征东江的问题。会后，由彭祐、郭化若等三人执笔，起草了一封请毛泽东同志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信，朱德军长签了名，信是由上杭发出的，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同志便由永定到了上杭县城，参加红四军前委领导，并和朱德军长一起着手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红四军前委书记，在陈毅还没有从上海返回中央苏区以前，还是由朱德同志代理。

在古田会议期间，朱德军长和红四军军部卫上班住在一户老农家里。主人是个胆小的老年人，他怕红军走了受连累，不敢出面。会后，朱德军长离开古田，这位老人回到家里，发现谷仓里的谷子少了。开始有点生气，但用手一翻谷子，发现谷堆里埋有朱德军长留下的银洋和一张纸条，老人顿时又急又喜。这以后，他遇到村里的人就夸朱毛红军怎么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点稻谷，还留下这么多银洋，表示以后朱毛红军一进村，他要抢先把红军领进自己家住。红四军“九大”开得很成功，开得很团结，官兵上下大受鼓舞。这次会议总结了红军建军两年多来政治思想建设工作的经验，是推动我军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1991年7月

战士的伟大榜样

伍云甫

—

1928年2月中旬的一天，湖南省南部的未阳县，刚下过春雨，天晴了，太阳照射在起伏的山坡上，这时，城里城外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地忙碌着，有的举着一串串红绿色的鞭炮，还有的准备了很多大米、油、盐、猪肉、蔬菜……人们怀着大早望云霓的心情，排在道路的两旁，等候着人民自己的队伍——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中午刚过，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率领着工农子弟兵来到了。人民群众的欢呼声和鞭炮声响成一片，如过盛大节日一般。曾经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死气沉沉的来阳县城，又活跃起来了。

当时，我在第一区任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我的弟弟伍永禄，不满十八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当传令兵，跟着朱德同志行动。当队伍在未阳县东乡敖山庙住下后，他抽空请假回到家里，告诉我说，朱师长要来看我们。从当时我县的情况来说，一个师长要到老百姓家里来看看，简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这个不平凡的消息，振奋了我们全家。我乐得整夜合不上眼睛，怀着激动的心情，盼望着朱德同志的来临。

我家住在来阳县城南的松茂堂村，村前有鱼塘和稻田，村后有树林，有一人抱不住的大樟树和木子树。我家住的房子很破旧，我们把房屋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父亲去买了猪肉和鲜鱼，母亲杀了一只老母鸡，准备好好招待革命军的朱师长，表示我们的敬意。

第二天上午，朱德同志真的来了，随同来的有我的弟弟和四个卫士。我们全家分外欣喜。朱师长穿着灰布军装，腰间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虽然南方已是春天，可是穿着单衣和草鞋，还是有些冷的。朱德同志精神很好，他浓黑的眉毛，特别显得英武，他的眼睛是那樣的和蔼亲切。他对我们很关切，问了我们的生活，以及当地党的工作情况。他同我的父亲；弟弟和我围着一张小方桌坐下，问我：

“未阳情形怎样？工作还好做吧？”

我说：“还好，从去年秋天起到现在止，全县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起来了，现在就要恢复工会和农会组织了。你们一来，工作就更要好搞些。”

我还谈了一些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我县革命力量对敌人展开乡村游击战争的情形。

他接着对我讲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他说：

“南昌起义以后，在南昌只住了三天。8月5日誓师东征。誓师时有十七个团，约三万人。由于队伍未经改造不巩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又缺乏斗争经验，因而在行动中遭到很大的损失，人也少了，枪也少了。三河坝失败时，有些人思想上发生混乱，当时，我不得不说，‘要革命的跟我来，不革命的就走。’好在大家看我还坚决，大部分都跟我来了。”

他说这段话时，是那樣的深刻、坚决有力，显得非常有信心。

“我们在碓石、乐昌打了一个好仗。”他的声音是更加坚实有力了。

我们急切地催他继续讲述战斗的盛况。

他说。“许克祥的部队，根本不值得一打。两个团，消灭一个，击溃一

个。敌军溃退时，乱成一团糟，在砬石桥上挤下去淹死的也不知多少。”

他又说：“你们看现在部队不少，这都是沿途发展壮大的。我们就要上井冈山去同毛泽东同志会师了。”

这时，朱德同志笑了。他好像在沉思，眼神很深远，向往两大主力井冈山会师的远景，他对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精神，从眉宇间显现出来。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全家都极其兴奋，心中都有说不尽的感激。吃饭的时候，我父亲按照湖南人情客的习惯，用长筷子夹着菜送到对面朱德同志的面前，他总是说：“老人家不要客气，我自己来。”朱德同志是那样和蔼、谦逊，一点没有架子。我父亲感动得不断他说：“革命军的师长，真是平等待人！”

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的革命军，来到耒阳城后，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极了，纷纷参加革命军，参加游击队。那时，我们第一区成立了一个游击独立团，虽然只有五支步枪，但是，工农群众还是自动拿着上枪、梭镖、大刀和上造炸弹踊跃参加。不久，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要带队伍向井冈山进军了。游击队很舍不得，紧紧地跟在后面。但是，由于当时组织游击队还很缺乏经验，男女老少都有，目标很大，行动不便。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军的营长伍中豪同志只好率领队伍，把大部分游击队护送回来。我们虽然又转入地下斗争和乡村游击战争，但在朱德同志和他带领的革命军的关怀和影响下，同志们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二

1930年，党中央长江局选送我到上海党中央办的秘密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学成之后，于1931年初，党派我和曾三、徐作潮等同志带着电台呼号和密码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工作。

经过艰难的行程，过了很多危险的关口，辗转来到中央根据地。那时，正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正在准备第二次反“围剿”，中央局和军委都驻在青塘。我一到那里，又看到朱德同志了。我向他面前奔去，正要向他敬礼，他却拉住了我的手，并抚着我的肩膀说：

“来了啊，真好。”

忽然，他沉默了。然后慢慢地说：“你的弟弟永禄同志打长沙时负过伤。他已经长大了，后来当了连指导员。据说在一次行军中，他们连的连长叛变了，开枪打死了他。他年纪很轻，进步很快，真是可惜！”

我的心难过极了，极力抑制住自己。脑子里映出弟弟小时候直到当小传令兵的形象。他那活泼、矫健，充满朝气的神态，给我印象很深。我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

朱德同志接着对我说：“不要难过了，于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各种工作，坚决消灭敌人，为死难烈士复仇。”

这几句充满深沉感情的话，给予我莫大的鼓舞。后来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一想到总司令这些话；一想到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浑身就增添了坚决向困难作斗争的决心和力量。

我请示组织分配我到哪个部门工作。

朱德同志说：“你学哪一行，就做哪一行，分配你到无线电队去工作。”接着他又说：“去年年底打张辉瓒和谭道源时，缴获了两台十五瓦特的无线电报机，其中有一台机器损坏了，现在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你就先到无线电队见习见习吧，将来还要成立新的电台。”

敌人对中央根据地封锁很严，生活用品很难买到，我们经常吃不到盐。朱德同志就教我们：“没有盐，用酸菜炒点辣椒也是很下饭的。”同志们按照这个方法，果然吃得很好。那时没有工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也一样，只能分点伙食尾子。但是，党对电台的技术人员却特别优待：是党员的技术人员，每月多发津贴银元三块；非党员技术人员，每月发银元三十块至五十块。技术人员深受感动。他们在中央根据地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有些解放过来留用的技术人员也不例外。

有一次，行军到一个村庄，队伍休息了。老百姓听说朱军长来了，他们到处找着说：“谁是朱军长呀！”结果他们没有想到朱德同志就在旁边的大树下坐着。群众都很惊讶！原来你们的军长和士兵一样呀！开饭时，大家吃的饭都一样。电台有个同志经过小县城时，买了一些盐，炒了一些辣椒，去请朱德同志来吃。朱德同志说：“今天吃了有盐的辣椒，可不容易呀。”

老百姓看到红军生活这样艰苦，官兵平等，认识到这才真是我们工农的革命武装。大家都很敬仰，热情地问候，慰劳。

我们虽然经常行军，打仗，但党组织对宣传教育工作仍然抓得很紧。每一个单位都有“列宁室”的组织，负责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教育主作。每到—一个地方，如有两三天休息，就在官兵中组织政治、时事和文化的学习，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以及办墙报、出油印报等等。同志们战斗、工作和生活，都是紧张而又丰富多彩的。朱德同志经常给我们作时事报告，并参加各项文体活动，在他的教育和带动下，大家都能文能武，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有一次，同志们围在一间大房子里，准备测验时事。大家正在抄考题。朱德同志来了，说：

“你们考时事，为什么不叫我呀？”

大家异口同声他说：“总司令，你还考哇？”

“我和大家一样嘛，‘列宁室’的活动，我也不能例外呀。”

晚上，我们几个同志在看试卷、发现了朱德同志的答卷。也的卷子答得很好，字也写得工整。我们几个人都围在油灯下，逐字逐句地读着这份答案，与其说是评卷，还不如说是学习。结果，朱德同志在这次测验中，考了一百分。

第二天，我们把他的答卷贴在墙报上，同志们纷纷前往观看。大家都感到朱德同志处处带头，起模范作用，真是我们的榜样。

三

江西红军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敌人更加疯狂地组织第二次“围剿”，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政策，向中央根据地进逼，我们最后的一个兴国县城也被占据了。我们挤驻东固坳上村一带。这时部队士气很高，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总没有打起来。我们见到朱德同志就问，为什么还不反击敌人？他回答说：“时机未成熟，到时，毛泽东同志自有妙计。”过了几天，见到总政治部大量油印通行证，据说是准备释放敌军俘虏用的。我们心里明白，大概是消灭敌人的时机快到了。

果然，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工作很紧张，亲自指挥作战，布置行军。他们很重视电台工作，认为收到敌台的情况很重要；即使是残缺不全的情况也好。

我记得在战斗开始的那一天，无线电队和总部驻扎在一个村庄里。大家

都在紧张工作，突然间，传令兵跑进来说：

“报告总司令，溃退下来的敌人，距这里只有四、五里路远，正朝我们总部方向扑来了。”

同志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总司令身上。总司令很沉着，他镇定地说：

“大家不要慌。总部所有同志和电台赶快向后面白云山转移我带特务队前往阻击。”

说完话，他立起身来，精神抖擞，从腰间取出手枪，推上子弹，大步迈出总部。特务队的刘铁超队长紧跟在他身边。

朱总司令带着队伍冲出去以后，我们转移到白云山的山腰。不久，前线传来好消息，一、三军团已将敌人团团围住，只待全歼。不久，朱总司令回到总部。同志们都到他跟前，他说：

“不要紧啦，我们迂回部队就要到达了。敌人跑来跑去，累也要把它们累死的。”

同志们盼望他讲讲前面的具体情况。他说：

“你们等着吧，等会就要瓮中捉鳖了。”

这时敌人的确是在我们口袋里了，一、三军团包围成大圆圈。军委直属队的部分队伍也迎击上去，总之，胜利是有把握的。

突然间，电台的收报机听到连续的“滴滴滴、达达达、滴滴滴 DEXN5”的声音，慌张而急促，几分钟之后，这种声音就消逝了。报务员心里可乐啦，嘴角上现出微笑。这原来是敌军二十八师公秉藩的电台 XN5 在发送 SOS 求救讯号。我们当即将此情况报告总部，并说明敌人这个电台的机器是一百瓦特的，比我们现用的十五瓦特的机器，电力大六、七倍，最好能够完整无损地缴获它。

朱总司令说：“好得很呀，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大机器咧。”他接着说：“总部已通令全军，凡是缴获的无线电机或其他机器，均不许损坏。你们可以放心，只要缴得这部机器，前方是会加以保护送总部的。”

一个多钟头以后，果然由前方送来了这个电台，连报务员和机务员也给俘虏过来了。据说当缴获这个电台时，该台的原有人员，不了解红军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很害怕生命有危险。经战士们一讲总部的通令和有关的政策后，他们还举行了一个递交机器的仪式：把机器整齐地摆在厅堂中间的桌子上，用红纸写了“欢迎红军”四个大字贴在机器上，他们自己则站在机器前面，排成两行，表示欢迎红军。我们前方部队就是这样把这个电台的机器和人员接收过来的。从此，我们红军内部就可以进行无线电通讯了。

四

1934年10月，我们开始了震惊全世界的长征。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大维、愁功一带会合，党中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抗日。右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率领下，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左路军在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以及会合后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下，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我原是一方面军的，为了在卓克基组建左路军统一的总部，中央军委命我带着电台、电话大队、通信学校，从毛儿盖出发，到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那里去工作。

左路军原来预定的行动计划是，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但张国焘却跳出来公开分裂党，不服从中央指挥，到阿坝后拒绝北

上，密电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部队，胁迫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后来竟发展到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就在这个我党面临又一次分裂危险的时候，我正带着一方面军的一些通讯人员追赶左路军的总部。

我们赶到卓克基时，总部已经向前出发了。卓克基是靠草地边沿的好地方，有山、水、树林，出产大麦、青稞。我们已经有十来天没有吃到粮食了，到这里每人能吃几大碗无油无盐的粗面疙瘩，也不觉得饱，有一位同志差一点撑死。此事后来说起可笑，但可以想见当时艰苦情况的一斑。我们一行直到8月下旬，才在查理寺赶上在左路军的总部。我向朱总司令和刘参谋长报到时，张国焘也在座，朱总司令介绍我和张国焘相见，说这是“张总政委”。刘参谋长当即用诙谐的口气提出一个正式问题，他说：

“伍云甫同志在红一方面军是三局的政委，这次也可在‘封神榜’上一齐挂出来吧！”

朱总司令连声说：“好呀！好呀！”

张国焘犹疑一会后，不得不表示同意。就这样决定我任总部第三局的政委。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发失疑问：为什么刘参谋长这样提出问题，而朱总司令肯定的那样快，张国焘却吞吞吐吐呢？我心里想其中必有文章。

次日晚上，朱总司令便找我去谈话。我到他住的地方，他和刘伯承同志都在。我们围在油灯面前坐着，他问我：

“路上还顺利吧？”

“还好。只是粮食困难，有的同志因吃野菜和菌子，发生中毒现象，好在人和电台都没有损失。”

“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

他说了这句话，又转过头去同刘伯承同志谈了几句，我没有听清楚，看样子是有重大的事情，从神态上看来是很严肃的。

接着，他又对我说：

“现在党内发生不幸，出现了暂时分裂的现象……”

他把张国焘挑拨红四方面军同志，排斥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将整个军队拉向藏族地区，不愿北上抗日的退却主义等情况分析了一遍。然后，非常坚定他说：

“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我们要团结好红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一定要回到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路线上去。”

当时，我的脑子热极了，我说：“咱们跟张国焘斗争！不好嘛？”

朱总司令说：“你刚来，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的，不过，是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此刻愤恨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我恨不得马上找张国焘讲道理。

朱总司令嘱咐我说：“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做党的建设和红军的建设工作。我们团结红四方面军，最要紧的是工作上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不计较待遇。分裂是暂时的现象，最后是会在党的正确路线下一致团结起来的。”

我们谈到深夜，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同志又安排了一些其他工作。

这段时期的总司令，真是左路军中的中流砥柱。张国焘对他百般刁难、排斥、打击，生活上也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但朱总司令顾全大局，同战士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该忍的就忍着，该斗争的就坚决斗争。始终坚定不移地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教育着红军战士，终于带领着红四方面军

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在朱总司令、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五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同志担任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遵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在太行山、雁门关等地厦指挥部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个时期，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有一次，听说朱总司令要来西安，我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准备隆重地欢迎他。当时准备了车辆，派了好几个同志去帮他搬行李，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在月台上等待着。

火车徐徐进站，朱总司令在车厢门口出现了，他同以前一样朴实，穿着军装，态度仍是那样可亲，平易近人。我们来迎接他的同志们互相看了一眼，交流着敬仰的心情。

我们跑上前去，向他问好。

他说：“你们都好哇，好久没有见面了。”

同志们都说：“你的行李呢，我们帮你搬。”

朱总司令笑着答：“不用了，你们看，都在这里。”

我们看见他的警卫员手里拿着一床军毯，肩上挂着一个包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们都说：“怎么就这点东西？”

朱总司令笑着说：“我这样很灯；白天行李放在马上，晚上包袱可当枕头。”

晚上，他住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看见他的小包袱内，只有一套军衣和两套内衣，还有一双新布鞋，我们又感动又惭愧。我们到西安后，多多少少都有些“装备”，生活也宽裕一些了。可是朱总司令仍然一如往昔，生活还是那样简朴。他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给我们真实地、生动地上了一次政治课。

朱总司令革命几十年，同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同志在一起，领导革命，使革命取得胜利，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他身边工作，使我们得到很多教益。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着过去同他在一起的时刻，经常用他那些感人至深的光辉业绩，鞭策和鼓舞自己，坚定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写于 1959 年，发表于 1978 年

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关怀

王诤

从参加红军开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我受过朱德同志的多次教诲。朱德同志对通信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关怀备至。我回想起这一切，倍增对朱总的深切怀念之情，仿佛有一般无形的力量在鞭策着我，要我永不停步，为把我国电子工业和电子科学技术搞上去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

1931年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自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自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看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开始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1930年除夕，红军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倒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缴，不得损坏。在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了红军总部。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确实是极其简陋的：树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上坚定，技术上也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有一千余人，包含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红军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瓦件。在生活上，我们同样战胜了种种困难。

说起战胜出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叮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着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

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一个红军总司令部甘之如始，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又处处照顾我们。红军本来是没有夜餐制度的，总部却规定我们电台值班人员可以吃夜餐。红军中从总政委、总司令到每个战士，都是靠从每日五分钱的菜金中节省下来的伙食尾子作零花钱，总部却给我们几个人每月几十块银元的技术津贴。后来，我们联名要求取消津贴，总部嘉许了我们的精神，但只酌减了津贴的钱数，津贴制度仍保留着。在接连不断的反“围剿”战斗中，营、团干部都取消了骑马，而我们电台却仍然配备了马。朱总司令还把同志们送给他的、根据地极为难得的香烟转赠给电台人员抽。

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对我们政治上十分关怀爱护，着重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从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上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就是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我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那通俗而朴实的活语，像春雨一样一滴一滴渗进我们的心田，在菜油灯下，可以看见朱总司令的面容是那样慈祥，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洞察未来的眼睛向我们投射出殷切期待的目光。他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当时，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但是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他对革命前途怀着多么巨大的信心！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敌军的无线电台的行业，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的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1931年2月命令何应钦率领二十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在离富田约四十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便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二十多天来，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着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5月15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麻木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就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16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

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我们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果，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但是们心自问，我们同在第一线和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这年6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更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一百瓦的电台，1931年秋天，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局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较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1931年末，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毛委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同时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我代表通信部门，被大会授予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二

长征开始以后，我没有能跟随朱总司令工作。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朱总司令离开了陕北，到山西前线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直到1940年、朱总司令返回延安，我才又能亲聆教诲。

1940年和1941年，边区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那时，日寇对我们不断“扫荡”，国民党又对我们搞反共摩擦，在经济上封锁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朱总司令带头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我们看到，朱总司令总是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参加垦荒、种菜、纺线等劳动。在百忙中，他还常常关切地询问我们军委三局的同志们参加大生产的情况。

三局通信材料厂利用自己的车床设备，在完成通信器材生产计划的同时，争取为大生产运动多作贡献。同志们边实践边摸索，做出了一种简便的纺车。朱总司令知道了很高兴，说：“搞得不错呀！也给我做一部好吗？”同志们很快赶制了三部，一部送给了毛主席，一部送给了朱总司令，一部送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不在延安）。当我们把自制的纺车送给朱总司令的时候，朱总司令笑盈盈地收了下來，边抚摸着纺车边说：“大生产重要啊，搞好了，穿的、吃的、用的就都有了。”他还赞许我们说：“你们做得对！就是要这样：既搞好通信，又搞好生产。眼前大生产是全局。不搞好大生产，通信也不一定搞得好。”

朱总司令说得多么中肯啊！是的，我们做技术工作的同志，很容易只埋头于自己的业务，而不大注意全局。我在以后长期的技术业务工作中，每当处理局部和全局的矛盾时，想起朱总司令当年的教诲，就心明眼亮起来。

朱总司令全局在胸，但又把每个局部放在应有的地位。他对我们三局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他为克服通信材料供应困难所给予我

们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曾利用统一战线的关系和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公开采购通信材料，但在向边区运送途中，常常受到国民党军队哨卡的刁难。有一次，朱总司令从国民党统治区回来，为了掩护运送通信材料，他不乘吉普车，而是乘坐运送通信材料的卡车。因为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坐在驾驶室里，我们满载通信材料的车子就顺利通过哨卡了。单靠从国民党统治区运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还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造。朱总司令深入通信材料厂，指导工作。他看到了工人们科用铜币压制成的可变电容器片，用铜钱熔铸成的可变电容器轴，用牛角做成的旋钮，用杜梨木刻成的度盘，都赞不绝口。他反复引述毛主席为通信材料厂的亲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

1942年，通信材料厂的同志们，为了保证前方部队有可靠的通信电源，决定自己动手制造手摇发电机。但要冲砂钢片，需要冲模，要制造冲模，却找不到这种钢材，同志们都为无米之炊而伤脑筋。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到黄河东搞来了一段铁路上的钢轨。朱总司令为发展通信事业，这样天微不至地操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当钢轨抬到工厂里来的时候，有的同志禁不住涌出激动的泪花。第一台手摇发电机制成之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用它做电源，亲自试验通无线电话。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从枣园的窑洞里，通过无线电波，立刻传到了王家坪朱总司令头戴的耳机里。作为我军的通信工作者，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感到更幸福呢？

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工作不断发展。但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问题。当时在延安，大批的革命青年参加了通信工作。有些同志对通信部门的革命分工有模糊认识。在他们看来，做技术工作最有出息，做政治工作还可以，做后勤总务工作就没有出息。这个疙瘩老是解不开。我想起朱总司令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亲自给我们几个做思想政治工作，循循善诱的幸福情景，就请朱总司令来开导我们的同志。朱总司令乐意接受邀请，决定到三局来做一次报告。

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三局驻地阎店子的梨树林绿叶成荫，碧油油的小梨子挂满枝头。报告地点就在梨树林里同志们自己动手修建的通信战士礼堂。通信战士们听说朱总司令要来做报告，早就从方圆几十里内赶到会场。朱总司令来了，人们顿时安静下来。朱总司令并不急于谈怎样看待革命分工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得好苦啊，许多贫苦的劳动人民活得连牛马都不如。共产党来了，领导劳动人民闹革命，劳动人民从此才有了活路。为了革命胜利，使千千万万的阶级弟兄不再受苦，许多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同志们，你们说，我们该怎样做好自己的革命工作呢？”

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朱总司令把话题转到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上，接着讲：“你们的工作重要得很呐，指挥军队打仗离不开你们。不过，你们要晓得：毛主席讲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讲的不是你们哪一个人，而是通信工作这个整体。你当报务员，如果没有摇机员为你揭发电机，没有通信材料厂的工人为你提供器材，你能同千里之外通报吗？如果没有炊事员做饭，你整天饿肚子，还能发报、抄报吗？”

说实在的，对于毛主席那句赞誉通信工作者的话，我们许多同志并没有

仔细体会它的含义。经朱总司令一指点，大家就明白多了。朱总司令最后总结说：“所以，不管是当局长的，还是做炊事工作的，也不管是报务员、机务员，还是摇机员，也不管是工人，还是干部，只有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通信任务才能完成得好。通信工作做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

朱总司令讲解革命道理，总是那样深入浅出，叫人一听就懂。你听着听着，只觉得是在听一位亲近的长者同自己促膝谈心，全然忘了这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做报告了，而不知不觉之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乳汁就已在哺育你健康地成长。

在战争年代，同朱总司令在一起，聆听他的教诲，你就会抛开一切杂念，把全力放在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上。而在危急关头，当你还拿不准应该怎样应付突变的局势时，朱总司令的话，就会使你从困难中看到希望，透过黑暗看到光明。

那是1947年3月下旬，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几天。我带着三局的两位同志，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向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汇报关于撤出延安后，我们怎样保障通信联络和无线电广播不中断的安排。我们走进窑洞，见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正盘坐在炕上研究问题。首长们从容不迫，谈笑自若，那种神态和气度完全表现了共产党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藐视。周副主席肯定了我们的方案，但又提醒我们：要多考虑问题，要准备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做到有备无患。朱总司令最后叮嘱我们说：“回去后要给同志们多讲一讲：胡宗南来了，坛坛罐罐会打烂。但是，困难是暂时的，渡过了眼前的困难，全国性的胜利就将来临了。”正是领导同志的教导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以比较顺畅的通信联络，保障了毛主席在陕北对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指挥。通信工作者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地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安装了备用台，保证了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红色无线电广播始终没有中断，照常把党的声音、战斗的捷报传向全国，传向海外。

朱德同志这次对我们作指示之后不久，就离开陕北，到晋察冀解放区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去了。

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指示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朱德同志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我们进城以后切实管好全国的电信事业，使之成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在电信事业方面，国民党留下的工厂很少，设备非常简陋。我们遵照朱德同志的指示进行恢复和整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朱德同志又指示我们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障通信器材的供应。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遵照这个指示，把战场上缴获的美帝通信装备加以剖析，结合我国的条件，设计制造了多种无线和有线通信器材，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朝鲜战场，使得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没有进口一部通信机、一米野战电话被覆线，完全用国产装备满足了通信联络的需要。

1952年10月下旬，总参通信部和当时的电信工业局联合举办了国产通信器材展览会。我们邀请朱德同志前来参观和作指示。朱德同志对解放后短短三年内，我国电信工业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他手握着小巧玲珑的步话机试验通话。同志们告诉他，就是这种步话机，在朝鲜战场上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坑道战的通信任务，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通信人员的普遍欢迎。朱德同志

连声说：“好，好。”他指示说：“通信装备还要在体积小、重量轻，效能高，使用可靠上下功夫。你们不要松劲，要不断前进，要研究现代的电信科学。”

朱总司令十分重视通信装备现代化问题。1952年年底，他为总参通信部即将复刊的《通信战士》杂志题词：“为建设现代化的通信部队而努力”，明确地指出了通信部队的建设方向，而且也为电信工业指出了发展方向。1956年秋天，电信工业局在北京故宫奉先殿，展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电信工业的新产品。展览会用实物对比的方法，说明新产品比解放初期有了哪些进步，比国外先进水平还有怎样的差距。那时半导体技术在国外是一门正在崛起的新技术。朱德同志特意来参观展览。他一下车就问：“听说你们这里展出有半导体，这是个新东西，我一定要看一看。”在展览会上，他见到用来作对比的一部国外出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很感兴趣，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占他说：“既然半导体体积小、重贵轻，又省电，用到国防装备上不是很好吗！”他又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半导体技术走在头里。然后说：“要赶紧搞，追上人家，有困难也要干！”这年4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朱德同志在参观展览时结合实际对我们宣传了毛主席讲话的有关精神。他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朱德同志笑指着庭院内展出的一部国产警戒雷达的巨大天线说：“这部雷达不就是你们创造性地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吗？”

朱委员长经常垂询电子工业的发展情况。1973年7月，四机部举办了收音机、电子管、激光技术三个小型展览。朱委员长以八十七岁的高龄，借同康克清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他详细询问了一些收音机的市场售价，指出产品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方便使用。朱委员长无微不至地为人民群众着想，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朱委员长还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多次到电子工业企业视察，不少无线电厂和有线电厂都留下了朱委员长的足迹，很多电子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都聆听过朱委员长的教诲。

从1957年到1963年，朱委员长先后八次视察了七个电子企业：1957年视察了华北无线电器材厂；1958年视察了南京无线电厂、西安黄河机械厂、北京有线电厂、汉口中原机械厂、天津无线电厂；1959年视察了宝鸡长岭机械厂；1963年再次视察天津无线电厂。朱委员长的视察，使这些企业的同志们和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感到莫大的光荣和幸福。朱委员长风尘仆仆来到厂里，连水也不喝，就直奔车间，同工人同志见面，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生活情况。多少只油污的手被那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多少双惊喜的眼睛抑制不住热泪涌流！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天津无线电厂一车间，在朱委员长视察的当夜即创造了日产收音机的最高纪录。以生产熊猫牌收音机闻名的南京无线电厂在朱委员长视察之后，装配车间的同志们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收音机的装配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朱委员长在视察过程中给不少电子企业留下了珍贵的题词。这些题词体现了党对电子工业的殷切期望，就是要电子工业战线的广大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朱委员长在汉口中原机械厂视察时，职工们告诉他，这个厂是从上海迁来的。朱委员长诙谐他说：“哦，你们现在到了长江中游啦。可在工作上不

能甘居中游，要力争上游才对呀！”朱委员长还对一些企业的职工说：现在世界上无线电技术发展得多。快啊！你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所以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朱委员长又说：旧中国老是受帝国主义欺侮，就是因为落后。比起帝国主义来，我们人多，资源又丰富。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帝国主义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缅怀朱德同志四十多年中对通信工作和电子科学技术工作的关怀，桩桩往事如在眼前。他关怀一切革命工作，尤其关怀做革命工作的人。当我回忆他在工作上的那些谆谆教诲时，我特别不能忘怀于他对干部的那种真诚的同志爱，那样深厚、朴实的无产阶级感情。在这篇回忆录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不能不倾诉我内心的感受。

回溯 1931 年，当我刚刚站到革命的起跑线上的时候，朱德同志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我奔向前方。而四十年后的 1971 年，当我在革命的征途上遇到了坎坷，受到林彪反党集团的迫害时，朱德同志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使我更加看清了林彪一类人的蛇蝎心肠。

1911 年 10 月初，我从干校请假回到北京治病。一天，我突然获悉，朱德同志要到医院来看我。这个消息梗我太激动了。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多年不见面，而他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关心着我。为了阻拦八十五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来看我，我当即去看望他。我一进他的住室，他老人家就紧紧拉住我的手说：“这几年你到哪里去啦！我到处打听你啊……”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朱德同志连声说：“你是病人，应该我去看你，怎么你先跑来了。”他问我病情怎样，采取了什么治疗方法，深情地叮嘱我：“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啊！”

朱德同志告诉我，林彪已经折戟沉沙了。他说：林彪这个人过去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阴一套，阳一套，现在他自我爆炸，使我们党消除了一大祸害。他老人家询问了我这些年的种种情况之后说：“你不久就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要把工作抓起来。你们如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的展览，通知我，我还是要去看的。”

1973 年，我们举办的电子工业展览，朱德同志果真去看了。老人家兴致是那样好，边看边问，足足逗留了两个小时。1978 年，我们又举办全国电子工业学大庆成果展览。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再见到敬爱的朱德同志来到展览会作指示了。

1978 年 8 月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余洪远

每当我忆及往事，就不免要想到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万里长征的情景，那是多么壮观的一种场面！在艰苦卓绝、恶劣环境中，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一方面要摆脱数十万放军的围追堵截；一方面要克服无人烟地带山高、寒冻、无衣无粮的巨大困难，同时，还要与来自红军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可以说，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记录了光辉的一页。而其中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朱德同志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尖锐斗争的那一幕。在这场斗争中，朱德同志在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时刻，表现出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挽救红军北上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5年6月底，一天，我接到红四方面军总部的通知，说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要路过马尔康，要我准备午饭。当时，我担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迎接中央红军后，负责筹措粮秣，供给中央红军，收容伤病员，以及部队后勤工作。听到朱总要来的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我一直想着朱总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秘书长和总务科长，他们也很兴奋，都说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朱总。

此前，我曾在江油县中巴购买了点腊肉和酱菜，总务科长把剩下的腊肉部煮了给朱总一行打牙祭。

午时，朱总在张国焘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驻地。他虽然面容消瘦，但两眼炯炯有神，穿着补丁军装，扎着紧紧的皮带和绑腿，显得很精神。朱总一到，伸出双手，笑盈盈地同所有欢迎他的同志一一握手。朱总关切地问起他们是四川哪个县人，亲热地同他们拉起家常。而站在朱总身边的张国焘历来不扎腰带，不打绑腿，这恰同朱总的风貌形成鲜明地对照。

在一户藏民家中，因无桌椅，我们就地而坐。朱总亲切地问我，当地群众的情况怎么样？如何筹措粮食？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如何做土司、头人的工作？我一一作了汇报。尔后朱总笑着对我说，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群众纪律是很重要的一条，也是我们红军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现在困难很多，但越是困难越要注意群众纪律。另外，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打了许多胜仗，得来的战利品物资多了，但要注意节约。今后路程还很远，困难还很多，我们要想得远一些。听了朱总的指示，非常亲切，非常深刻具体，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油然激起一股敬佩之情。

吃罢午饭，朱总一行稍事休息后，便同张国焘一道离开我们驻地马尔康。我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个个新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以往张国焘是很能说的，而今天他却很少讲话；同志们鼓掌时他也不鼓掌，到底是什么原因？我预感到有一场尖锐的斗争即将来临。

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此时，他已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刘怕承参谋长率领。可是，当左路军行至阿坝后，居心叵测的张国焘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

这时，我带着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及省的各部门的干部，去上阿坝进行部队北上的粮物准备工作。一天，突然接到省委紧急通知，于次日上午八时去阿坝参加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至于开会的内容，我估计可能是研究

北上的问题。

第二天，我急着去上阿坝筹措粮秣，竟未能按时赶到会场。当我到会时，会议已开始了，会场设在阿坝喇嘛寺里。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不仅有省委委员，还有省工会、少共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其中不少是一般干部。会上的发言很乱，许多同志在发言中带着质问的口气。他们讲什么“中央北上方针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主义”。这时，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有些人起哄、因攻朱总司令。甚至，有个别人拍着桌子质问朱总，要他当众表态：“北上是由于路线错误”，是“右倾逃跑”，反对北上。我很担心地向朱总望去，见他从容地坐在那里听他们发言，他的神态既严肃、又镇静。

过了一会儿，朱德同志和颜悦色地对到会同志们讲：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应该担起抗日救国的重担。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总说完，转过头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央曾经电告你和四方面军，你是清楚的嘛！

张国焘不回答朱总提出的问题，并且又叫朱总回答：“毛、周向北是逃跑。”

这时，朱总严肃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旗帜是鲜明的，我决不能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他，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接着是一阵喧嘩，但朱总仍然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并严肃而诚恳地告诉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听了朱总的一番讲话，使我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豁然开朗。我想，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壮大了红军队伍，给中国革命的前途带来新的胜利希望。可是，眼前发生的一切，使我越想越感到痛心，再也坐不住了。恰巧这时我得知总部和川陕省委、省政府机关、部队都已无粮，便离开会场，准备带领机关干部及部队到上阿坝搞粮食。当我走出会场时，看到一幅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八个大字。这是张国焘煽风点火挑起群众起来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正确方针的恶意中伤。

没有几天，张国焘就带着左路军开始南下了。接着省委通知我带领省委、省政府机关也随后南下。

不久，张国焘在川西北卓木碉公开宣布另立“中央”。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引导下，左路军南下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一带，遭到蒋介石的主力军阻击，在军事上我军连连遭到失败，部队伤亡损失极其严重，被迫回返夹金山。时值1936年春，依然寒气逼人，加上这一带高山重叠，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广大指战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1936年3月下旬，部队到达道孚、炉霍、金川、甘孜一带后，总部驻炉霍。红二、六军团抵达黔滇边境。

此时，接到党中央电令：朱、张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电令：

1.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朱德、陈昌浩为副书记。

2.将二、六军团改编为二方面军，将一方面军的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二方面军共三个军）。

根据中央电令，决定成立迎接二方面军的代表团，以祁世平同志为团长，以傅钟、张琴秋、余洪远、曾传六、刘伯承、李文海为代表驻甘孜。尽快准备迎接二方面军的一切物资粮秣。临行前，因祁世平生病而取消了代表团，由余洪远负责领导，组织一个三百多人的工作队，前往甘孜，进驻当地喇嘛寺，积极展开筹备工作。

朱总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以北上抗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恩怨，时刻关心着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与成长。自部队到达道孚、炉霍后，在朱总的建议下，抓紧时间进行整训，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

刚到甘孜，我们便接到总部通知，说二方面军很快就要到达甘孜，要我们抓紧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我们根据总部传达的朱总的指示，除积极筹备粮草，准备住房和帐篷外，还自己动手搓羊毛线，织毛衣、毛裤、毛手套、毛袜于等。6月30日，我们排着几里长的队伍，敲锣打鼓，热烈欢迎红二方面军先遣部队的到来。当时的场面确实是激动人心的。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西北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36年7月初，分三路先后从金川、炉霍、道孚、甘孜出发北上与党中央会合。

10月5日，我们终于到达甘肃会宁，当我到西北局汇报工作时，见到了敬爱的朱德同志，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洪远同志。你辛苦了。”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半天说不出话，今天能见到首长真是万幸。随后，我去见张国焘、傅钟，并向他们汇报了后卫队的整个情况。这时，朱总将中央的电令给我看了，内容大意是：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任党中央的全权代表（负责指挥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除二方面军到陕北与中央会师外，四方面军的五个军，统由周恩来指挥，其中三个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全部西渡黄河，总指挥余洪远。

我看了电报半天说不出话，眼泪直往下淌，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因为自己病很重，每天发高烧、吐血，实在承担不了这一重任。当时，朱总看到我那个样子，便亲切地问我：“你有什么困难，对我讲，我可以将你的情况向国焘同志介绍一下。”当时，我将内心的想法向朱总讲了：1.我不能继续承担渡河重任；2.从炉霍会议后到现在的一切情况想给毛主席汇报；3.我已重病在身，到中央后可以治疗；4.病愈后到红大学习充实理论，学好文化，将来好工作。朱总完全同意和支持我去中央，并悦：这个问题，我同国焘同志去讲。同时，叫我去找傅钟同志谈谈自己的想法。我去找傅钟同志，他完全支持我去中央。最后，张国焘也同意我去陕北红大学习。这时，总部及党校有一部分团以上干部身体有病或有伤，为了减轻总部机关和党校的负担，决定把他们转移到已经建立起来的陕北根据地，发挥红军的作用。临时组织一个干部团，全团师、团干部有三百多人，由杨忠行任团长，我任政委。总部为每人配备一匹马，并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

临行前，朱总亲自指示：大多数干部是团以上的，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团里有一部分女同志，不少同志有伤，有病，大家要互相帮助，克服困难。随后，我们即整装出发，踏上去往陕甘边区的路途。

如今五十五年过去了，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但是，当年朱总在危难之际与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这场斗争中，

朱总坚持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充分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评价的那样，“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1991年5月

“临大节而不辱”

潘开文

毛泽东同志在和陈毅同志谈到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时，曾深情他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这是对朱总司令崇高而真切的评价！

—

在长征途中，我一直是军委总部的警卫班长，在朱总司令身边负责警卫工作。1935年6月，中央红军飞渡大渡河后，路经天全、芦山、宝兴时，就听到四方面军离我们不远了。同志们心情振奋，士气高昂，不顾体弱和疲劳，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川西的一个山区小镇滋功。在愁功我们同红军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大家不知有多么高兴。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同志，朱总司令对我们说：“去告诉管理排长，会个餐吧。”当天晚上在离镇子不远的一个小瓦房里，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同志一起会餐，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四方面军曾在川陕根据地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来到了懋功一带同一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央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张国焘仗着他有十几万人，看不起中央红军，继续坚持错误路线，主张向青海、西藏地区退却，并狂妄要求改组中央，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两河口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经过坚决斗争和耐心的工作，张国焘表面上同意北上抗日，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分裂党中央、篡夺红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会后，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又出发了，翻越了梦笔山、打鼓山、马唐山等大山，走了好多天，到达了松潘附近的毛儿盖。这时，一、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都已会合了。

在毛儿盖停留七、八天，中央政治局又接着开会，就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了决议，并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前敌指挥部在右路。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总司令部、红军大学、四川省委撤出机构都在左路，决定两路军在班佑会合。7月底，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翻过一座座大山，跨越茫茫的草地，走了二十几天，到达阿坝，在阿坝休息了一下，又走了三、四天，来到黄河上游的嘎曲河。这时，听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已到班佑四、五天了，正在等待左路军前去会合。

嘎曲河离班佑较近，只要走三、五天的路程就可以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嘎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站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跌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张国焘就是按兵不动。中央一再来电报催促，并指出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张国焘却连发电报给中央，谎说河水上涨，部队过不去。

许多同志气愤地说，我们连乌江天险都过去了，为什么这么条小河就过不去？

到了第三天，张国焘突然提出要部队南下，并给中央发了电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立刻来电拒绝了他南下的错误主张，严词责令他迅速北上。但是，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公开和中央闹分裂。夜晚，他擅自给前敌指挥部发了密电，说中央不同意南下，就用武力解决，企图加害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电文译出后，由参谋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电报，立即冒着极大的危险，只身去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过电报，连夜把政治局的同志找来开会，研究了紧急情况，并断然决定率领部队北上，致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北上了，张国焘便引左路军从嘎曲河折回阿坝，在阿坝住了约半个月。这时，张国焘公开进行反党活动，提出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号，攻击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机会主义”、“退却逃跑”。张国焘对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的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不让朱总司令参加会议，不给朱总司令看电报。在张国焘的策划下，召开了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斗争朱总司令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离司令部半里路远的一个正方形屋子里开的。我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会场，一进门看到屋内气氛很紧张。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紧挨着坐了下来。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后，就大喊大叫他说。中央丢了根据地，损失了红军，执行的是退却逃跑路线。接着有的人就斗起朱总司令来了。但是，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坦然自若，他当时带了一本书去，不管怎么斗他，他一言不发，总是埋头看他的书。当主持会议的人硬要朱总司令表态，承认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并逼着他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时，朱总司令开始讲话了，他庄重他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作出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的！”总司令刚一说完，会议室里吵闹得更凶了，斗争更加激烈。刘总参谋长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了一句：“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下又引起一阵狂叫：“好！你把我们党的会议说成是审案子！”斗争矛头又转向刘伯承同志。后来，有人冲着朱总司令高声嚷着：“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很明显，张国焘他们是想逼走朱总司令，以便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一方面耐心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一方面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等待时机，争取和教育更多的同志。他说：“我是赞成中央的北上抗日决定的，但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朱总司令这一番话，像一把利剑戳到张国焘他们的痛处，有的便暴跳起来说：“你既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的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在回住地的路上，朱总司令跟刘总参谋长边走边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这充分表现了朱总司令崇高的革命气节。

二

自张国焘公开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操纵会议围攻朱总司令以后，我们在阿坝的十几天中，张国焘还使用了许多险恶、卑鄙的手段，接二连三地制

造事端，分裂中央红军，迫害朱总司令。

就在那次围攻朱总司令的会后不久，一方面军五军团的一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碰上了敌人，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梭镖和物资。在回阿坝的路上，下了一场大雨，当同志们要越过一条小河沟时，碰上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个连长，他蛮不讲理地要夺五军团那个排缴获的梭镖。本来，当时大家对张国焘反对毛主席、斗朱总司令就憋了一肚子气，那连长又那样无理，战士们当然不答应，有的同志说：“缴获的梭镖和物资，是要交公的，为什么要给你！”问得那个连长哑口无言，但他为了挑起事端，立即下令叫他的部下，一哄而上，把缴获的武器和物资抢了过去。同志们回到阿坝后，十分生气，向朱总司令报告了这件事。总司令听了汇报后，沉思了片刻，他向汇报的同志说：“尽管张国焘搞分裂，而且又斗争了我，毛主席、党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对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讲团结，要顾大局，不然的话，就会上张国焘的当。”

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在张国焘的布置下，他们用担架抬上昨天抢梭镖和物资的那个连长，把他摆在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的两间房子中间，张国焘的许多人就大声嚷道：“五军团的人打了我们的干部，请朱总司令出来验伤！”这时，张国焘便气势汹汹地从屋里走了出来，面色阴森，双手背在后面走来走去。本来是张国焘指使他的部下，抢了梭镖和物资；反而诬告别人打了他，还要朱总司令出来验伤、处理，这明明是在给朱总司令出难题。然而，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沉着冷静。他慢慢地走到担架旁边，亲切而关心地问那位连长：“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都是党的干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说打了，没有打，你就说没打，你现在讲一讲嘛。”这样一来，那个躺在担架上的连长，用被子蒙上头，一句话没讲，很可能他的内心受到了责备。张国焘一看他整朱总司令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哭丧着脸，垂着头，非常尴尬地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一次，五军团一个营，在阿坝西北约二十多里的地方执行警戒任务，张国焘硬是无中生有地说，这个营不听指挥，甚至诬蔑这个营要叛变。张国焘就逼着朱总司令表态，派人去缴这个营的械，妄图把叛变的罪名嫁祸于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对张国焘严肃地说：“你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有什么根据，有什么事实？”张国焘和他的部下被问得无言对答，面面相觑。朱总司令见他们这样，便更为严厉地对张国焘说：“没有事实，没有根据，怎么能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搞，不是有意在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吗！”朱总司令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总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以浩然的正气，挫败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的这一阴谋被戳穿以后，哪会甘心，他继续唆使一些人寻衅，为他搞分裂找借口。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突然来了几个伤员，硬要把朱总司令的牲口拉走。这几个伤员嘴里不断地唠叨着：“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总司令的饲养员当然不干，就对那几个伤员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一个伤员说：“管它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我就要骑。”于是，双方都拉着缰绳，像拔河似的，你来我往。不知咋的，几个伤员一下倒在地上，大声喊叫起来：“总司令的马夫打伤兵啊！”边喊边往医院跑。不一会儿，就叫来十几个伤员。这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了。几个伤员又要去马栏拉马，被警卫员阻止了。于是，这十几人便坐在马栏门口，一直坐到太阳快下山了还不走。大家

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去报告朱总。朱总听完后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把那匹骡子给我留下就行了。”我们一听，很想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张国焘！一个警卫员走到张国焘的门口大声说道：“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员硬要把总司令的牲口牵走，劝了一天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张国焘听后装模作样他说：“啊，有这等事！”接着无可奈何地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不要胡闹，要他们回去！”那个警卫员来到马栏，传了张国焘的话，十几个伤员二话没说，便走了。

三

在阿坝，张国焘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迫害朱德总司令，闹了十几天后，继续带着队伍过草地南下。这时，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朱德总司令看完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十分高兴，对张国焘说，这个好消息应当向部队全体同志传达，张国焘不干。朱德总司令只好自己向部队的同志宣传这个重大喜讯。这个好消息一传开，大家欢欣鼓舞，多么想赶到陕北去见毛主席！可是，张国焘见到这情景，惊慌失措，怀恨在心，暗地里继续采取阴谋手段，对朱总司令进行迫害。

从阿坝到松岗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总安排到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有一天早晨，朱总司令在看书，军部领导都到伙房吃饭去了，待勤务员去给朱总打饭时，他们说没有饭了。到吃中午饭时又说没有饭了。太阳快下山了，朱总仍在看书，可是警卫等人员都饿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请示总司令怎么办。朱总马上给罗炳辉军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派人去取来一袋面粉，才用洗脸盆给朱总煮了一碗面疙瘩吃。一到松岗，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一方面向张国焘闹分裂、搞独立的错误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向红军干部们宣传党的正确路线。要大家团结起来，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过完草地，顺大金川南下，攻克绥靖县后，朱总司令到了前敌指挥部，在生活上才得到了总指挥徐向前等同志的关照。接着，第二次过夹金山雪山，经宝兴、天全到达芦山，驻扎在陈家窝。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军向我们几路围攻，张国焘极力动员部队“打到成都吃大米”，与敌军在飞仙关对峙，仗打得很激烈。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又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俘虏政策，部队消耗得不到补充，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这时张国焘才被迫引军重翻夹金山，再经懋功、小金川、大金川，翻越挡岭大雪山，撤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但他仍不改弦易辙，而是企图向青海、西藏方向逃跑。

我们在甘孜住了近半年。在这期间，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朱总司令听到二方面军来了，很高兴，骑着马到六十里外去迎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会合后，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这时，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行不通了，他的分裂阴谋被戳穿了，不得已才宣布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但他又耍了个花招，成立了西北局。

部队由甘孜出发，走了二十多天草地到了阿坝。在离阿坝后的第一天宿营时，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十几匹马，都拴在一个马棚里，第二天早上要出发了，却发现马棚的墙上打了个大洞，别的马都在，唯独朱总司令的马被偷走了。后来军部领导给朱总司令一匹马，走了几天又来到嘎曲河。这次部队一到就过河，晚上在河北宿营。次日天还未见亮，前卫部队走了，张国焘又不赶上来，当晚军部领导说，部队明天拂晓前出发，留下一个营给朱总司令担任警戒。第二天一早，我们派人去找部队联系，寻找半天，部队的影子也没看见。四周是茫茫草原，我们感到情况很危险。下午，朱总司令把身边三、四十人部组织起来，研究和部署碰到敌情时的对付办法。夜幕降临，下起小雨，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挤在一个帐篷里，十几匹马都拴在外面拉帐篷绳子的钉子上。凌晨三、四点钟，大家正在睡觉，敌人来了，割断缰绳，放跑了四、五匹马。当哨兵开了枪，大家才惊醒过来，马上离开帐篷，团团地把朱总司令掩护起来，持枪准备战斗。一直等到天蒙蒙亮，看见远处有四、五匹马在游动，派骑兵去追击，才把马找了回来。这时，后面的部队还未来。一路上发生的这几桩事，都是与张国焘迫害朱总司令的阴谋有关的。可是，我们的朱总司令无所畏惧，仍然坚持在部队里做团结工作，坚持等后面部队到来后一起北上。当时，没有粮食，部队从草原上弄来许多野牛羊，管理员想杀几头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但朱总司令不同意，他说后头大部队更困难，要留给后面来的同志吃。后来，死了几头羊，管理员又提出煮给大家吃，朱总还是不同意。他要大家把肉割成一块块挂在一些小柳树枝上晾干，留给后面的部队吃，我们只好熬骨头汤喝了。等到第三天晚上，张国焘才带队伍来到嘎曲河南岸。在黑夜中，虽然可以隔河相望，但他不过河来，自己在河南扎了营。

四

张国焘过嘎曲河后的第二天，我们又出发了，走了四、五天草地到了班佑，接着，又出腊子口到了岷江边的一个小镇，叫哈达铺。司令部和直属机关在这里休整了十几天，而部队仍继续往前走。就在这十几天中，朱总司令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陕北给朱总司令和张国焘发来了电报，并派一支部队来接应。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想到一、二、四方面军快会师了，都感到非常高兴。朱总司令就找张国焘研究行军路线和如何与派来接应的部队汇合等问题，整整商议了两天两夜。”陈昌浩同志也从前敌指挥部赶来参加商谈。张国焘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极力宣扬逃跑主义，主张进宁夏入青海。朱总司令就坚决地与他进行斗争，指出张国焘的主张是违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的，是错误的，要他丢掉自己的主张，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朱总司令十分严肃地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和党中央、毛主席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接着又谈了一个晚上，仍然没有结果。

第三天一大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和骑兵等渡过岷江，住在对岸的供给部里。朱总司令回到他的屋里坚定他说，“张国焘说他辞职了，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向前线部队发出了

继续向北行动的命令，而且决定总司令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北上。当时，司令部的每一个同志，心情都十分激动，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作好出发前的准备。

可是，就在这天黄昏的时候，张国焘从岷江对岸叫人送来了通知，说他要立即召开西北局会议，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岷州会议。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一夜，斗争十分激烈。开始时，张国焘仍然端出他那一套反对北上，向西北逃跑的错误主张。朱总司令当场对张国焘进行批驳。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都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支持朱总司令的主张，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会合。张国焘一见形势不妙，又耍了一个手腕，在会议结束时，他一本正经地说：“啊，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一夜的紧张斗争暂时结束了，当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来到岷江边时，东方已开始发白。

朱总司令回到哈达铺后正准备出发，张国焘这个两面派，却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和骑兵，直奔前敌指挥部的所在地漳县。张国焘一到，就急急忙忙召开干部会议。当时，在前敌指挥部的同志，都不知道开过岷州会议，更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议是北上。张国焘就利用这个机会，欺骗前方部队的干部，煽动部队西进，企图推翻岷州会议的决议。接着，张国焘即向所有北上的部队发了电报，要部队立即停止北上，回头西进。

这时，朱总司令已带司令部出发北上，走了一天，宿营时，收列张国焘要队伍停止北上而南下西进的电报。朱总司令十分着急，马上又向前方的部队发了急电，要部队就地停止一切行动待命。但是，机要通讯员拿到这电稿去电台发报时，电台不发，说是张国焘总政委已有命令，没有他签字的电报一律无效，不准发出。当时，傅钟同志向朱德同志说他去送。傅回来后向朱总报告说：我对电台政委说，朱总司令是中央军委的主席，总司令部是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总政委也要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我是西北局组织部长，如果你不把这份电报发出去，就是违抗军令，我可以立即枪毙你。后来经过多次做工作，才发出了这份电报。

电报发出后，我们又继续前进，一天走了一百四、五十里地。到了前敌指挥部后，朱总司令立即发电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了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并连夜在前敌指挥部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又整整开了一夜，朱总司令再次同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揭露了他的两面派丑恶嘴脸，清算了张国焘的反党罪恶阴谋。到会同志都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坚决表示要迅速北上。第二天早上，左路各部，在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的率领下，迎着灿烂的朝阳向北挺进，终于在1936年10月10日，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来迎接的部队在甘肃的会宁会师。

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加强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伟大旗帜下的团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党和红军的优秀骨干，为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威武不屈的伟大革命精神，既坚持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一再挫败了张国焘对党的猖狂进攻，维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领导，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中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写于 1979 年 7 月，改于 1991 年 6 月

朱总司令与军委高参室

童陆生

每当我忆及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时，便思潮涌，浮想联翩。朱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绝非我的笔墨所能表达的。这里谨录我在延安时同他的一段往事，以寄托对朱德总司令的悠悠情思。

1940年，为准备参加党的“七大”，我回到了延安。开始在抗大参训队当教授，编写军事教材。1942年，为了提高我军的战略战术水平，调动志愿来延安投身革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积极性，中央决定成立军委高参室，我便调到该室工作。当时高参室约有十个人。党支部书记是王世英，王到重庆后由我接任。副书记是李荫南，主任是周思诚（原阎锡山部师长），副主任是白天（原刘勘部参谋长）。高参室由朱总亲自领导，他的一言一行，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当时，高参室在朱总领导下，成立了战略研究会，规定每周星期六举行一次战略战术讨论会，每次开会都要预先拟定专题，分工准备。我记得当时正值苏德战争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德军已经包围了莫斯科。苏联能否打败德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能否继续存在的重大问题。开始，相当一部分人对此缺乏信心，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德国法西斯的本质认识不清。朱总指示我们就这一专题进行准备。在会上，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各抒己见。朱总也作了发言，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要认清当前的国际形势，不能只注意外表。虽然德国法西斯在军事上很强大，但它的本质是虚弱的，因为德国法西斯是没有人民作基础的，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苏联有人民的基础，是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只要再坚持一、二年，一定能够打败德国法西斯。当时大家听了很受鼓舞和教育，更增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国军事斗争的历史，充分调动每一个高参的积极性和充分发挥他们的军事才能，朱总还亲自组织我们编写《中国军阀战争史》。他曾对我们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的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只有认真地总结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才能更快地打败新军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记得在朱总的指导下，滇、陕、晋、桂军的战史初稿都写出来了。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1942年，朱总在领导中央军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十分严肃、认真、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人，当时军委机关所在地王家坪没有死过一个人。我记得在审干中，有人怀疑高参室副主任白天是混进来的军统特务，提出要公开批斗。党组织指定我审查他的档案材料。我看过之后，认为说白天是特务，查无实据。一天，我正要去向朱总汇报这件事，正巧在下山的路上遇到了他。他听了我的汇报，立即指示不能这样干，如果整了白天，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谁还敢来延安。白天当时思想上很苦恼，写了三首诗贴在窑洞口，大意是表明自己投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做官。朱总看了白天的诗，也和诗三首，原文我已记不得了，大意是勉励白天打消顾虑，积极投身革命，共产党是相信他的。这就使白天打消了思想顾虑，提出要公开批斗白天的人看到朱总表了态也就不再讲话了。高参室由于在朱总的直接领导下，整风、

审干运动搞得很稳。

在延安时，由于朱总带头开荒、种菜，调动了大家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高参室的成员年龄都比较大，多半人又没种过地，但一见到朱总年岁也不小，工作又很忙，却仍然参加生产，深受感动，也积极加入到开荒、种菜的队伍中。朱总种的冬瓜、南瓜、西红柿又多又好，大家都选他的瓜菜籽作种子。在边区生产成绩展览会上，我看到朱总亲手种的大冬瓜，颇有感触，便写了一首诗，现抄录如下：

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

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

朱总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作为一名老战士永远不会忘记他那高尚的品质和伟大的风范。我想用 1946 年写的一首诗来表达我对朱总的怀念：

百万雄兵救国驰，河山破碎苦心支。

功名事业传中外，屯垦奇谋胜古时。

抗战已成决策史，和平保障兆民知。

元勋花甲寿南斗，应是中华解放师。

1991 年 6 月

朱德同志在延安王家坪*

陈秉忱

1941年春，朱德总司令由杨家岭移居王家坪。1945年，由王家坪迁居枣园。1942年1月底到1946年1月，我在中央军委秘书厅和办公厅做文书、事务工作。当时军委机关就设在王家坪。在工作中，我与朱德总司令接触的时间有4年多，对我教育最深的几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一、坚决执行中央精兵简政政策。1912年2月底或3月初，朱总司令亲自领导中央军委机关整编工作。当时我是秘书厅秘书兼队列处于事。在准备整编工作中，负责和各单位联系编制人员名单、编制报表。在朱总司令的直接领导和督促下，军委机关整编工作短时间内顺利完成。这次军委直属机关整编，从七千人精简到两千人。即把当时属军委管辖的单位，如：总后勤部、直属队政治部、卫生部及所属和平医院、医科大学、经建部及所属各单位，共约五千人拨归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建制，直属中央领导。军委直属单位只留有一、二、三、四局。军委直属队的供给、卫生工作，归中央管理局和中央卫生部直接管理。是年10月，军委秘书厅也撤销了。1943年3月，在朱总司令亲自主持下，军委直属机关又进行第二次整编。为了精简领导机构，集中驻地、便于领导，把军委总政治部下属之组织、宣传、锄奸、敌工各部及作战部的一局等单位，都集中在王家坪，重新设立军委办公厅。在这次整编中，取消了原来团以上干部配备个人勤务员的制度，随个人的勤务员改为公务员，编为青年队，直属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统一负责军委机关的勤务。经过这次整编，整个军委机关，包括由朱总司令亲自领导的海外工作委员会训练班和军委高级参议室在内，总计在四百人左右。当时，朱总司令一面领导军委机关的整编工作；一面又召开军委机关生产动员大会，号召大家努力生产、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二、积极参加领导整风运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朱总司令亲自领导王家坪军委机关学习委员会的工作。记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为了深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党外各界人士的意见，大约在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因朱总司令分管经建部工作，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到会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有的是党外人士，思想比较动荡，对延安艰苦工作环境不适应，工作不安心，对领导机关和延安的某些现象也有些意见。朱总司令预先了解一些情况，在主持会议中，一面宣传艰苦奋斗；一面启发诱导大家畅所欲言，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大家反映了一些问题，当有人反映有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违法乱纪时，朱总司令及时插话，十分严肃地指出，要详细追根究底，查明实况，查实后。严肃处理。这次座谈会开了一天，开得很热烈。毛主席在会上也讲了话。

在整风运动中，朱总司令还亲自领导了军委机关的审干工作。他正确掌握政策，真正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地领导整风审干运动。军委机关从来没有发生过开大会乱批、乱斗、乱打人等现象。当时军委高参室成员很多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经历比较复杂，他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个别谈话，指示童陆生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有些高参在写自传时有顾虑，朱总司令及时找他们个别启发教育，要他们消除顾虑，向党交心，实事求是。高参室副主任白天同志曾任军阀刘勘部队参谋长，在审于中，有人怀疑他是因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提出要公开批斗、审查。朱

总司令坚持了“重证据、重调查、重表现”的原则，及时制止了在审于和“抢救”运动中过左的作法。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就结束了。从我亲身经历，深感朱总司令在延安领导军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

三、组织高级参议研究战略战术。1942年在延安，把从白区志愿奔向延安的起义将领及高级官员组成了中央军委高参室。高参室党支部负责人是王世英、童陆生。成员有：周思诚、赵唯刚、王子玉、邢肇棠、白天、肖泽苍等人。为了充分发挥这些高参的积极性和军事指挥才能，为了加强抗日统战工作，朱总司令选定一些高参成立了战略研究会，军委作战一局正副局长也参加，每周开会一次，深入总结作战经验，研究抗战的战略战术。朱总司令亲自主持每次讨论会，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他还结合自己几十年来的作战经验，写了许多军事著作，如《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论抗日游击战争》等。这些光辉军事著作对我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工作深入细致、严肃认真。1944年初，前总派左权县麻田工厂几个工人，随带试制织毛毯的织机零件，送交军委办公厅进行生产。工人由抗日前线来到延安，先到了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办事处想把工人留下组织他们生产。军委办公厅得知后，写信去要工人，办事处不理。当时军委办公厅主任要用朱总司令的名义，写信派人去要。我把信写好后，盖章前请示朱总司令，他当即严肃地说：情况还没弄清楚，我怎么能签字下命令呢？他没让盖章发这封信。第二天，听说这几个工人要转移到别处去，军委办公厅主任立即派一名秘书带两名警卫员，去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要办事处不让工人走掉。办事处负责人向刘伯承师长汇报后，刘师长立即挂电话给朱总。朱总问明情况后，批评军委办公厅主任，并教育军委办公厅机关的工作人员，意思是说办事情要商量，不能这样粗鲁，更不能拿上级机关压人。当时，办公厅主任向朱总司令说明，这是因先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去交涉，又请办事处的政治协理员来商谈，都没有结果，为了维护军办的威信，才这样派人去办的。朱总司令听后，又严肃教育我们说：“什么叫威信？解决问题才是威信。上级机关要多为下级解决问题才有威信。”后来，经他向双方进行批评教育，说明情况，刘师长即令一二九师驻延办事处立即将麻田工厂工人和其所带的织机零件送到军委办公厅，组织工人进行生产。

五、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当时在延安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只发五分钱菜金。1940年5月，朱总司令由晋东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看见军委机关干部面色苍白，为了增强官兵体质，朱总司令一面抓体育锻炼；一面抓改善生活。他经常教育我们说：大家动手、增产节约，才能丰衣足食，为了改善官兵生活，他亲自领导军委机关官兵开荒种菜。他种的菜地，品种齐全，果实丰硕。军委机关都是选用朱总司令的西红柿、冬瓜、南瓜、辣椒做种子。朱总司令还决定由海外工作委员会训练班抽调人员，统一管理军委机关人员纺毛线。他自己也有一架纺车，毛线纺得又快又好。1943年，第二次精兵简政，在王家坪的军委机关合并为一个大食堂，他经常深入伙房，和炊事员商量如何使大家既吃好、吃饱又不浪费。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公家办了个宰猪场，猪肉加工成香肠供应市场，增加收入，猪骨和杂碎经常供给军委机关大食堂。他有两次和总务处长亲自到伙房检查，了解食堂是不是真正做到每

天有一顿荤菜。他要伙房以内代油，用猪骨熬汤煮菜，想尽各种办法改善官兵生活。军委机关在朱总司令关怀下，官兵生活日益改善。

朱总司令不仅是生产能手，而且也是节约模范。他用的铅笔头只剩不到一寸长还在使用。公家发给他的衣裤，一直穿到不能再穿才换新的。他经常告诉炊事员老冯，每月伙食标准只能节余不能超过。有一次，午饭准备了一个荤菜，恰巧，大食堂这一天杀猪又送来一块肉，老冯又烧了一个肉菜。用餐时，朱总司令就查问，经说明情况后，把一个肉菜端回去留作下顿吃。

六、廉洁奉公，严格教育子女。1942年，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同志从陕北绥德回到延安，朱总司令的参谋潘开文同志，见朱琦同志洗衣服没有肥皂，便向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当我把这两块肥皂送给朱琦同志，正好被朱总司令在院外看见了。后来，他得知是潘参谋向公家领东西给朱琦同志用，便告诉潘参谋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从领两块肥皂这件小事，充分表现了朱总司令一贯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的高尚品德。

雄怀胜似海洋宽

雷英夫

朱总司令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也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又是最敬爱的老首长、好老师之一。

1938年1月，我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在朱总司令的领导下。特别感到荣幸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到1945年12月我在延安王家坪总参谋部工作期间，和总司令住的地方很近，甚至有一段时间和总司令就住在一个院子里。因此，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朱总司令，可以随时目睹他的身教，耳聆他的言教，学习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高尚的品德作风。

1945年12月以后，我离开延安先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到华东学打仗、学军管，然后又到军委机关和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见到朱总司令的机会少了，但由于我依然在军队工作，仍可以经常见到朱总司令。可以说，几十年来，不管我在哪里工作，我始终是朱总司令的部下，一直把朱总司令当做老首长、忠厚长者和尊敬的好老师看待。他对我不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都关怀备至。因此，总司令的恩情我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朱总司令逝世已经十五年了，但我时刻都在想念他。特别是在革命形势比较好或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兴高采烈庆祝胜利或用沉重的心情总结失误时，或者在欢度建党建国建军节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朱总司令，想到他的音容笑貌，想到他对我们后辈的教诲，想到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美好岁月。这里，我写几件感受最深，教育最大的小事，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深切的怀念之情。

伟大而平凡的总司令

从我记事起，就听说中国有个大英雄，他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没想到，我参加革命后不久，不仅亲眼看见了朱总司令，而且亲耳听到他的报告和谈话。那是1938年8月，朱总司令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他在延安各界万人欢迎的大会上讲了话，接着又在抗大作《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报告。他神采奕奕，相貌堂堂、笑容满面，身穿灰布军衣，腰扎皮带，腿打绑带，脚穿布鞋，讲起话来不慌不忙，如叙家常。朱总司令讲话和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深入浅出，善于用最通俗的语言和最普通的事例，阐述深奥的道理，谁都听得懂，谁都感到对。报告结束后，他又和警卫员、学员等在延安师范旧址广场上打篮球。他跑跳不太灵活，球技也不太高，但打得却非常认真。朱总走到那里，既不戒严静街，也不前护后拥。如果不认识朱总司令，谁都可能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老战士或老百姓。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地道的工农兵形像，是个忠厚长者的形像。他常说，我是个党员、一个战士，我这个总司令是一个牌子，是党和大家要我当的。因为群众要革命，军队要打仗，总得有个总司令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整齐大家的步伐。但这个总司令究竟是谁？是带有偶然性的，可以姓朱，也可以姓张、姓王、姓赵……关键是看谁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好的代表群众的利益，看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因此，他一再告诫大家，不要过分地宣扬他个人，而应该大力地宣扬党，言扬毛主席，宣扬人民群众，特别是宣扬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宣扬那些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埋头奉献的英雄模范们。

一个人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群众的拥护，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他还常说，我这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之一而已。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朱总司令这些精辟而又通俗的讲话，正确地阐述了领袖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是我们全党同志学习的好榜样。

“朱毛不可分”

众所周知，在长征路上，张国焘为了分裂党和红军，曾用多种方法强迫朱总司令同他一起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此，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原则斗争，大义凛然地说“朱毛不可分”，“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我是举过手的，是正确的，我不能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又说“你私自成立的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分裂党分裂红军，你应该改正错误，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

关于朱总司令“朱毛不可分”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他这个思想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在我们党内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井冈山上讲的，有的说是在遵义会议上讲的。由于我1938年才参军入党，没有参加长征，对党内军内错综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对这场惊心动魄斗争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对朱总司令所讲的这句著名的话更是弄不清楚。为了学习，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大胆地请教总司令。1943年春天，在王家坪朱总司令的窑洞里，他告诉我：“朱毛不可分”的话，我是说过的，而且不止一次，在大会上、小会上和个别谈话中都说过。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奋斗，只剩下万把人，四方面军则有七、八万人。张国焘就利用四方面军人多枪多的优势，向党中央闹独立性，搞分裂。党中央、毛主席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争取工作，但都没有成功。当他背着党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要彻底进行党内斗争，妄图加害中央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毛主席为了脱离险境，按照中央政治局早已确定的战略方针，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北上后，张国焘就公然诬蔑党中央、毛主席是“右倾逃跑主义”，并妄图强迫和拉拢我和其他同志同他一道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接着又成立了伪中央。这样，我不能不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我掌握两条原则：一是和刘伯承、徐向前、贺龙、任弼时等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进行坚决斗争，不能含糊；二是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要努力团结争取，处处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家明白是非真相。因为四方面军部队和广大干部是好的，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这样，就把张国焘孤立起来了。在多方的压力下，张国焘最后不得不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北上，实行三大红军主力的大会合。

后来，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朱总司令同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丰功伟绩，说他“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总司令又说，“朱毛不可分”的思想，我也不是一参加革命就有的。1927年南昌起义时，还没有这个思想；1928年井冈山会师时，我初步有了这个思想，但不够明确牢固；到遵义会议时，我才彻底的树立起这个思想，因为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是高明的，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最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因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拜毛主席为老师，拥护他担任我们党的领袖。

同样，毛主席也把朱总司令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的授意下，中南海有些人要批斗朱总司令，诬蔑他是“黑司令”。毛主席听到后气愤地说：“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如果朱德是黑司令，我就是黑政委，要斗可以，那就让红卫兵放把椅子，我就去陪斗”。这样，才制止了中南海的批斗大会。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同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曾当着大家的面，对朱总司令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如果你是黑司令，我就是黑政委。现在你不是红了吗！”毛主席这个话讲得何等好啊！也可以说是毛主席在另一个斗争场合（“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明确地坚持了“朱毛不可分”的思想。

总司令还说，所谓“朱毛红军”只是说明当时朱是红军总司令，毛主席是红军总政委，大家叫惯了就说“朱毛”、“朱毛”。其实，毛主席是领袖，是老师，我只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干了一点具体工作的共产党员，总司令的这一席话，说得很实在，很透辟，也很谦虚，使我从中受到了一堂既生动又深刻的党史教育。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朱总司令敢于坚持原则斗争，又善于坚持原则斗争是人所共知的。他和张国素反党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个最突出的典范，他和林彪的斗争也是一个很光辉的例子。这里讲两件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事情，就可窥见一斑。1943年8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军事副刊上登载了朱总司令的一篇重要文章《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其中说到“军事教育和其他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干事无补，有时反有害干事。”接着提出我军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掌握技术，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那么，我军的士气必会更加高涨，作战能力和信心必然会更加提高，给敌人的杀伤必然会更大，自己的损失则会更少。”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林彪看后，却别有用心地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大肆攻击朱总司令，说这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军的原则。林彪回到王家坪又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说我帮总司令写的这篇文章犯有原则错误。当时，我很紧张，很害怕，即向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作了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是由于我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起草了这篇文章，而使朱总司令受到林彪的攻击深感沟疚。朱总司令听了，一笑置之。叫我不紧张，不要害怕，并说，在党内军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没有关系。真理是驳不倒的，谁手里有真理，历史自有公论，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他的这种宽大的胸怀，使我由衷的拜服。1945年4月25日，朱总司令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著名军事报告，对林彪的谬论进行了有力地批判。报告说：“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和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了政治觉悟再加上体力好，技术好，就可以打更大的仗，更少伤亡。”这篇报告得到了全党全军的一致拥护，成为我们党历史上永载史册的不朽文献。

第二件事情是：1959年9月，林彪在军委召开的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利用错误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机会，狂妄地诬蔑攻击朱总司令。在主席台上，他指着朱总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等等。

到会的同志大为震惊，极为气愤。而朱总司令则泰然处之，不仅没有发火反而笑着对林彪说，“那就请你批评好了”。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利用各种机会诬蔑攻击朱总司令的林彪，1971年终于折戟沉沙，作了中华民族的罪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伟大、忠厚、善良的朱总司令，则更为人民群众所爱戴。这两件事情说明，朱总司令不仅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而且是一位坚韧的强者，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含糊的。但他并不以权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不是一触即跳，而是深思熟虑。像指挥打仗一样，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宋朝苏东坡在《留侯论》中有一段名言，他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朱总司令就是这种大勇大智的伟人。

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历史上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搞好团结，不搞团结不行，光搞小的团结也不行，必须搞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大团结，特别是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在这一方面，朱总司令也是模范。1943年，朱总司令在王家坪住处，为一个同志举行了结婚典礼，并邀请了许多高级干部参加。朱总司令这样做，不仅使这位同志感激万分，而且使所有知情的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但也有个别同志不理解，私下有所议论。他们说这个同志在长征时，曾站错了队，张国焘批斗朱总司令时，他也积极参加了，并且斗得很厉害。现在，总司令为什么还要给他举行结婚宴会？这不是和稀泥吗？但朱总司令宽宏大量，一切从革命全局出发，不仅不念旧恶，打击报复，反而不断地对这位同志进行教育，信任他，重用他，使他认识错误，以后为革命继续做出了很大贡献。朱总司令常说，一个领导人要量能容人，才能用人，德能服人，三者缺一不可。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不以个人恩怨定是非。朱总司令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历史证明，朱总司令这样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仅不是和稀泥，相反的正是高度原则性的表现，是对党对革命极为有益的一项重要政策。

屯垦政策的奠基人和带头人

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生产队、工作队。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为了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目的，对各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对敌后根据地推行“三光政策”，使得我军和各解放区的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渡过这一经济难关，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精兵简政、生产自给的方针。朱总司令不仅热烈地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方针，领导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还和王震同志一起在陕甘宁边区开辟了中外闻名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屯垦区，而且朱总司令身体力行，在王家坪和他的警卫员、炊事员等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亲自动手种了三亩多菜，其中包括西红柿、白菜、萝卜、南瓜、黄瓜、菠菜、茼蒿、豆角、辣椒等。每天早晨起来和晚饭后，我们便看到年近花甲的总司令和他的生产小组就出现在菜园里，浇水、翻土、施肥、移苗、绑架。他们这个生产小组种的菜部长得很好，自己吃不完，就送给食堂让大家改善生活。有一次，延安总部在王家坪桃林招待美军观察组，并以朱总和总部机关生产的西红柿、瓜果招待客人。当观察组的客人一看到朱总司令的菜园和吃到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黄瓜时，赞不绝口。他们说，西红

柿原为南美产品，在欧美属上等水果蔬菜，没有想到这种果菜，竟然在中国荒凉的陕北也长得这样好，并且是世界上赫赫有名的朱总司令生产的，真是奇迹。

总司令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光是批阅文电、参加会议、会见客人、作报告、写文章就需要很多时间，加上当时他年近花甲，因此，部队中、机关中、群众中很多单位或个人都写信或派人来，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为人民为革命保重身体。但总司令对这些好意总是婉言谢绝，他说，我的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和时间，但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对革命对身体都有好处。总司令在生产中的模范作用，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成为渡过经济难关的巨大力量，创造了人类的奇迹。

博学多才见多识广

朱总司令的博学是名扬四海的。1940年周总理在重庆动员大家学习时，号召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干部都要以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榜样进行学习。特别要学习毛主席读书的精和朱总司令读书的博。当时，我对总理的号召缺乏感性知识，领会不大深刻。皖南事变后，我回到延安，有幸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对总司令的博学，逐步有了体会，知道总司令不仅善于指挥作战，整军练武，精通兵书，而且其他知识也极其丰富，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1943年，我有一次在总司令家里修改报告提纲，吃惊地发现他对《三国演义》熟极了，对诸葛亮、刘备、曹操、司马懿、孙权、周瑜、陆逊等都有深刻的分析。他说，诸葛亮被人神化了。他虽然很有本事，有许多高明的见解，干过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蜀国有很大贡献，对后人有很多启发和教育，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以至于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他，把他作为智慧的化身，当做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神人，但诸葛亮的错误缺点也很多，有些还很严重。以指挥作战来说，“六出祁山”就很笨。按照当时情况，魏延建议孔明率主力出斜谷，魏延率步兵出子午谷直插长安，两路人马夹击曹兵的意见是正确的。司马懿也是这种主张，说“若是吾用兵，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不敢用此计，坚持只出祁山的错误主张，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六出祁山，完全是顶牛阵，老一套。结果一事无成，打不开局面。论工作方法，诸葛亮有严重的事务主义，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结果自己累得要死，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事情也未办好。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的这一弱点，定下了和他打持久战（蘑菇战）的方针，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硬把诸葛亮累死拖死了。论用人，诸葛亮有宗派主义倾向，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点比曹操、孙权差多了。关云长、魏延、马谡都未用好，不该用的用了，不该杀的杀了，弄得后继无人……朱总司令这些精辟的见解，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在此之前，我也曾多次读过《三国演义》，但都是随着书跑，把诸葛亮当神明，人云亦云，没有新鲜独到的见解。总司令的指点，使我如梦初醒，顿开茅塞。当然，朱总司令领导作战和在建军中的独到见解，更是多不胜数，有一次，我去给总司令送《敌情资料》、《国际资料》，这些材料的封面上照例印上了“秘密”两字。总司令看后说：“我给你们提个意见行不行？”我赶紧说：“请总司令指示。”他说：“你们把‘秘密’两字去掉行不行？要不，就请你们在‘秘密’两字之前，加上一个‘不’字，印成‘不秘密’三个字。因为现在是战争环境，有关敌情资料应该让大家知道，知道的人越多越好。除某些情报来源应该保密外，敌人的情况有什么秘密可保的？知彼知

己，百战百胜嘛！大家知道了敌人的情况，就会更自觉的去打仗，才能打得更好，不了解情况，懵懵懂懂去打仗怎么行？要知道我们是人民军队，进行的是人民战争，非靠广大群众和干部不可，不能只靠少数人。《敌情资料》和《国际资料》如此、我们作战和建军中的有些问题，如建军宗旨、编制、装备原则、政治工作、战略战术等等，也是一样，知道的人越多越好，除行动计划和某个时候必须保密的措施外，没有什么密可保的。即使敌人知道了，也没有关系，横竖他们学不会，不能用。因为我们是革命军队，进行的是革命战争，敌人是无法运用我们的一套原则和战略战术的。”总司令的精辟指示，使我豁然开朗，赶快向叶剑英参谋长和作战部的首长报告了。大家一致拥护，立即把《敌情资料》和《国际资料》上的“秘密”两字去掉了，并扩“大了发放范围，受到了很多领导同志的赞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敬爱的朱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周年了，我和同志们一样，时时刻刻想念着他。特别是一想起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一想起他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培养就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大家为失掉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尊敬的长者而悲伤，他对我们的恩情，是说不完讲不尽的。为表达我对朱总司令的崇敬和怀念，抄录我1979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怀念朱总司令》的诗一首于下，作为我这篇回忆文章的结束语。

《怀念朱总司令》

一生征战未下鞍，
横扫妖魔改河山。
忠骨堪比钢铁硬，
雄怀胜似海洋宽。
功名榜前总退后，
真理旗下一马先。
长忆桃林教诲好，
句句千钧益万年。

1991年5月

致敬缅怀

左漠野

1937年冬，我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不久，我被调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我的日常主要工作是草拟首长对外函电，记录、整理首长讲话，向首长报告从广播里抄收到的国内外新闻。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首长接近的机会多了起来。对朱德总司令，我是心仪久矣，现在得在他的身边工作、学习，如坐春风之中，深感幸运。

1938年2月中旬，朱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由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向晋东南太行山区挺进。在我们转移过程中，日军苦米地旅团正从长治出发，企图夺取临汾。2月24日，朱总司令率领总部抵达安泽的古县镇时，与前去进攻临汾的日军遭遇。据侦察报告，敌军共有三千多人，而总司令身边只有特务团一营的两个连，敌我兵力悬殊很大。总部如果离开大路转入山地，即可平安无事。然而，总司令从全局出发，为使临汾作好抵抗准备，使大批物资和人员得以安全撤离，还是决定进行阻击，以迟滞日军前进。朱总司令立即命令左权参谋长，带领几个参谋，前去侦察并与友军联络。左权参谋长在安泽的府城镇一带，指挥特务团的两个连和一部分安泽县自卫队，对日军进行阻击。是役前后战斗四昼夜，共歼敌三百余人，缴获辎重不少，为友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情况相当紧张，我总部驻地古县镇离前沿阵地不远，夜间可以听到炮声。同志们对朱总司令的安全是不免有点担心的，但戎马一生的总司令却处之泰然，指挥若定。当时，左参谋长带着几个参谋到前线去了，总司令身边只剩下了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参谋林韦同志。我记得，大概是战斗打响以后的第二天晚上，秘书处金石刚同志不在，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我正在纳闷，他回来了。他告诉我，林韦要他一同在一科值夜班，主要任务是守听电话。总司令吩咐，他后半夜要休息一下，如果参谋长有电话来，要马上报告他。金石刚笑着说：总司令在唱空城计。我说：那你和林韦就是“左右琴童人两个”了。1940年，总部庆祝朱总司令五旬晋四诞辰时，刘白羽同志写了一首祝寿诗，我非常欣赏其中的一句：“危局常从笑里安。”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的抗日战争由正规战转为游击战。1938年3月，朱总司令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副总指挥。除八路军（不包括在晋西北的一二师）外，东路军还统辖国民党第三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第十七师、骑兵第四师、第五二九旅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等部。

3月24—28日，在总部驻地沁县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到会的除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的负责干部外，还有山西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专员薄一波，以及国民党部队的曾万钟、刘戡、朱怀冰、赵寿山、武士敏等三十多人。会议由朱总司令主持，由彭副总司令作报告。朱总司令在会上讲话，分析敌我形势，介绍八路军粉碎日军进攻和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战术，强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余敌，鼓励国民党将领为抗日作出贡献。这次会议稳定了东路军中国国民党部队的情绪，提高了他们的抗日信心，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朱总司令还利用开会的间隙，去同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部队的将领进行个别会谈，讲述坚持团结抗战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4月初，日军以一八师团为主力，还有其他几个师团，共三万多人，

开始南自邯长公路、北自正大路、西自同蒲路、东自平汉路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攻。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给曾万钟、朱怀冰、武士敏发出《粉碎日寇围攻战役战术的指示》，并同时发出《粉碎日军大举进攻之部队政治工作纲领》，号召东路军各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各部队接电后，积极行动起来，加以地方游击队不断对各路进攻之敌军进行阻击、袭扰和群众的“空舍清野”，使日军陷入饥饿、疲惫、恐慌不安的困境。16日，八路军三八六旅和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将日军主力第一八师团的一部，压在武乡长乐村十五华里的河谷里，截为几段，予以大量杀伤，激战整日，歼敌千余人。这路日军被击溃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至27日，八路军和决死队第二、第三纵队以及国民党友军继续截击和追击敌人，并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长治、晋城等十余座县城。这次战役共毙伤敌军四千余人，使以大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朱总司令非常珍视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这三个法宝。他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朱总司令也是我们的榜样。1938年初，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派来高级联络参谋乔茂材长期驻八路军总部。乔是四川人，陆大毕业生。他还带来了一个参谋和两个副官。有一段时间，联络参谋和我们秘书处同住在一个大院里。朱总司令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秘书处，看看联络参谋，在院子里同乔茂材他们谈谈，谈话的内容大都是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团结抗日和坚持持久战的一些道理。总司令态度和蔼，讲话深入浅出，象话家常似的。乔茂材等和我们秘书处的同志们认真地听着。乔茂材也不时讲上几句。除了交谈以外，总司令往往还同乔茂材下一盘象棋。朱总司令的棋下得很好，经常是赢家。乔茂材对朱总司令是很钦佩的，他在同我们闲谈中，一再说朱总司令是军界老前辈，很早就是西南名将，有儒将之风。

1937年冬，已进入统战时期，总部首长对外函电很多。在这些函电中，大都是给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因为他们对朱、彭就任十八集团军总、副司令发来了贺电。有一部分信件是朱总司令的老同事，老同学写来的，其中除了表示祝贺以外，还有些叙旧和钦佩之词，对朱总司令的道德、诗文和功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还记得有一封信里有这样两句话：“豁达大度，见义勇为”，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朱总司令对亲属和子女的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在处理外来函电中，见到总司令的便于和外甥从四川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些愿意参加抗日的青年朋友，准备到前方来，不知前方有些什么工作可做，向伯伯请示。我看了以后，就把原信带着，向总司令汇报了。总司令说，青年人想到前方来参加抗日是好的，只要能够吃苦耐劳，抗日报国，不怕牺牲，到前方来是有事情可做的，多来些人更好，比如前方现在就需要担架队。如果以为我是大官，他们来了可以弄个一官半职，那就错了。我们这里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同甘共苦。你告诉他们，凡是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千万不要到前方来。朱总司令还说，曾国藩是一个反动人物，但他在家书中告诫子弟的某些话语，还是有道理的。我没有读过曾国藩的家书，不过，我觉得“不以人废言”的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受到了总司令的清廉正气，对亲属子弟严格要求的高尚品德。

当时，总部干部的政治学习气氛很浓，尤其学习马列著作蔚然成风。这

与几位首长的关怀和以身作则大有关系。朱总司令不仅自己每天都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列著作，关心国内外时事，而且还非常关心干部的学习。古人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八个字朱总司令足以当之。

抗战初期，延安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著作，出版以后总部可以收到几本，由秘书处保管，我们总是及时向首长汇报收到了什么新书。有一回，我们收到几本列宁著的《卡尔·马克思》小册子，里面还集纳了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有一天，我去向总司令报告新闻，他正在看这本小册子。他问我看了这本小册子没有。我回答说看了一遍。他说，这本小册子很好，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简明扼要，很适合我们的干部阅读。我说这本小册子刚收到，只有几本，朱总司令说，对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理解，要能够很好地记住，这并不是教条主义。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脱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把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生搬硬套地拿到实际中去滥用，那才是教条主义。如果你不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能很好地记住，你拿什么理论去联系实际！他还说，这本小册子可以多翻印一些，最好能做到直属队各单位的干部每个人都有一本，“揣到包包里”，多读几遍。总司令还问到：总部各单位的干部是否有人到秘书处借书？我说秘书处书不多，我们没有通知各单位办理借阅书籍，很少有人来借书，我们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办理出借书籍。我还说，只有薄一波同志每次来总部开会或谈工作时，总来秘书处看看，借去两本《列宁全集》，下次来时把看完了的两本书归还，再借去两本。总司令说，薄一波同志很勤奋，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总司令的这番教导，使我很受教益。我曾同有关同志谈了朱总司令的上述指示，也作了一番努力，但由于当时敌后的印刷条件有限，那本小册子终于未能翻印。后来，我一想到没有完成总司令吩咐的这个任务，就深感愧疚。

当时，宣传部有一个同志每天专门抄收广播新闻，抄写以后就复印一份送给总部秘书处。我每天上午，就把国内外重要新闻向朱、彭总副司令报告。每当我报告新闻的时候，总司令就把笔记本拿出来，将重要新闻认真地记下来，以便进一步考虑。当时，正是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策动慕尼黑阴谋的时候，总司令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有时对新闻中说得不够清楚的地方（当时收听广播新闻的设备条件较差，有的抄收不全），就提出问题，有时还查阅地图，有时也三言两语地谈点看法，使我很受启发。

朱总司令对干部十分关心，经常亲自了解干部的情况并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我调去秘书处工作不久，有一次总司令问我：你在大学里是学古典文学的吗？我回答：是学教育的。又问：你的文言文是哪里学习的？我说：在念高小和初中的时候，每当寒暑假，我父亲就给我补习古文，练习作文言文。还问我对秘书工作有什么意见。我说，在首长身边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并且如实地讲到，我刚来参加部队时，很想学习做军事工作，经组织部同志谈话，说是宣传部需要干部，我就去宣传部工作了。总司令听了以后说：那对嘛。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积极努力，做好党所分配的任何工作。干部的成长和发展是党组织考虑的事情，自己是用不着操心的。以后，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情绪有所波动的时候，就想起了总司令的这个教导。

有一次，朱总司令去决死队干部训练班作报告，我随同前往，报告内容是讲游击战。训练班离总部驻地是四十来里地。随同去的还有两个警卫员同

志，四个人都是骑马，我走在最后。走了大概十来里地，前面的马跑开了，我的马也跟着跑起来。由于我缺乏骑马经验，从马上摔下来了。马立即回头跑，跑得很快，我追不上。马跑了一段路以后，停下来在路边吃草，等我快接近它的时候，它又跑了。我一直追到总部驻地，还是没追上，马回到饲养班去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不免有些懊恼。我知道，总司令打算写一本游击战方面的书，因为当时很需要这样一本书。在训练班的讲话记录整理以后，可以作为书的部分初稿。当天晚饭以后，我怀着惭愧的心情，去向总司令如实地报告了落马和追马的情况。总司令听了以后，不但没有责备我，而且和蔼地对我说：你是一个书生，还不熟悉戎马呵。他说训练班的学员想必已经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下次我去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笔记本借两份回来，加以对照整理。总司令还边比划边说，耐心地教给我跑马的要领：两腿夹紧，两脚前蹬，抓紧缰绳，上身前倾。总司令说：骑马也是一种实践，只要掌握要领，大胆地跑几次就会了。

1938年秋，八路军总部移驻长治以北的故县镇。不久，村公所请总部首长中午“便酌”，以表示敬意。当天上午，我去总司令那里，他问村公所请吃饭，有哪些同志准备参加？我说，秘书长和几个科长大概都可以去，您就不必去了。总司令说：副总司令不在家，参谋长事情多去不了，我还是要参加一下。人家一番盛意，我不去不好。那天中午，总司令准时“赴宴”了。村长和其他几个村干部都很高兴，忙上忙下，又是端菜，又是斟酒。席间，总司令和蔼亲切地同村干部交谈，向他们详细地问到生产、群众生活、合理负担、自卫队和儿童团的情况。那时，太行山地区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村公所的“筵席”只能是几碗普通的菜肴。村干部敬酒时，总司令也举杯示意，没有喝酒，只吃了两平碗饭，就把碗筷放下了。村长说：今天没有什么菜，实在怠慢了。总司令说：菜很好嘛，谢谢你们。我从四十岁以后，不论有什么菜，都是吃两平碗饭。当时，我们还没有“拥政爱民”的提法，事实上，总司令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拥政爱民”的榜样。

朱总司令非常谦虚，我很少听到他讲自己的过去。有一天，我在总司令那里，见到孙泱同志。我在宣传部工作时曾见过他，并且交谈过。总司令问道：你们认识吗？我和孙泱同时回答：我们认识。呆了一会儿，孙泱就离去了。总司令说：孙泱的父亲孙炳文同志是一位革命先烈，是我在护国军工作时的一个老朋友，可以说是我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想的引路人，后来我们又一同去了德国。不幸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了。总司令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就声色俱厉地说道：老蒋是一个大刽子手，中国革命的罪人！我是第一次见到总司令感情如此激动，真是爱憎分明。一方面表现了他对老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无比愤慨。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总司令提到护国军，我当即表示很想知道一些他曾参与的云南起义的历史故事。总司令说：蔡松坡是一个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卓越的领导人。他为了民主共和，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总司令除了对蔡松坡的几句崇敬之词以外，对他自己早年的那一段光荣经历，一句话也没有讲。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是生活。我觉得，朱总司令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会下棋，爱打球，喜欢音乐，养兰花，还特别喜欢写诗。

有一天，我去报告新闻，那天天气很好，总司令坐在院子里的一张矮凳上休息，似乎在低声唱歌，我依稀听到一句不完整的歌词：好长苗呀……等

我再向前走两步，就听不见了。我曾听史沫特莱谈过，朱总司令爱好音乐，会唱民歌。可是，我没有听过总司令唱歌，也从未听哪个老同志说总司令会唱歌。第二天，我去总司令那里，适逢康克清同志在座。康克清同志当时任八路军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日常工作很忙，在总司令那里很少有机会见到她。我报告新闻以后，就便问了康克清同志一句：总司令过去是不是喜欢唱歌？她笑着说：总司令只会唱咦呀嗨，呀呼嗨。总司令也笑了。我当即意识到，前一天总司令低声歌唱的，很可能就是陶行知作的《锄头歌》。总司令为什么欣赏这首歌呢？我想，因为他对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这首歌可以抒发去恶务尽、除暴安良的志趣。

朱总司令还是一位卓越的诗人。1939年，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敌人对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将重点逐渐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转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我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强。当时，华北敌后的抗战是非常艰苦的。后方文艺界的同志来前方慰劳八路军。访问总部。朱总司令写了一首诗：“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这首诗的题目是《寄语蜀中父老》，实际上是写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看的。诗中充满了爱兵如子的深情和对英勇杀敌的子弟兵的赞美，同时言外之意，也把国民党反动派断绝供应我抗日武装的粮饷、封锁我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罪恶行径，揭露无余了。这首诗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和海外华侨，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的深切同情和支持，激起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极大义愤。朱总司令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风格很高，气势雄浑。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年头。在指挥太行区五月反扫荡中，参谋长左权同志光荣殉国了。朱总司令在《悼左权同志》一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首诗以歌当哭，奇痛悼于歌颂之中，感人至深。左权同志的革命功绩和英名将千古流芳，朱德同志的这首充满太行浩气和战友深情的诗，亦将同垂不朽。

古人说：诗言志。文如其人。朱德同志在1959年写的《游七星岩》一首诗的后面四句是：“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这首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身写照：光明磊落，宽宏大量，损己利人，心底无私。朱德同志在1960年写的《飞过泰山》，是一首五绝：“泰山不算高，一千五百八。飞过二千一，它把头低下。”这寥寥二十个字，看来朴素无华，其中却含有辩证的哲理，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豪情。

我在朱德同志身边工作时，承受言传身教，获益良多。遗憾的是时间太短，1939年我就因工作需要调到《华北新华日报》去了。有的同志说朱德同志像泰山、大海，我有同感。对于朱德同志的一生——道德、诗文、功业，我知之不多，领会不深。我以上叙述的一些事情，在他的伟大一生中只能说是“沧海一粟”。我不敢奢望用一滴水就能反映出太阳的全部光辉，只是想表示自己对朱总司令这位伟人的崇敬、缅怀和感激的心情而已。

1991年5月

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 何其芳

抗战初期到过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的做文艺工作的同志，总是极其亲切地谈起朱总司令。很遗憾的是，和这位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不曾有过个人的接触。

然而，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简短讲话，却给了我一个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记得的只是当时最感动了我，也就是最教育了我的几句话了。但是，就是几句话，也很应该记下来。我相信从这几句话中，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一样地感到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辉，也可以和我一样地得到重要的启发。

先后开了三天的文艺座谈会，我记得朱总司令都是到了的。他和毛主席，和另外几位中共中央的同志坐在一个大的长方桌前，用心听着文艺界的同志们热烈的发言和辩论。在最后一天的最后，发言结束了，毛主席做结论之前，他站了起来，用着很朴素的中国老百姓的语言，很深入很精辟他讲述了几句话。

当时会中有这样一个争论，革命的作家是不是要经过一个转变。当时会中又有这样一位文艺界朋友提倡新英雄主义，说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个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个作家。由于这，朱总司令说：

“哪里不要转变呵。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志愿，还是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

听着这样几句话，我内心的反应和波动却是颇为复杂的：

虽然我不象有的革命历史比较长久的文艺界朋友在这点上包袱那样重，觉得自己一开始写作就是很革命的了，根本无所谓转变；但也总以为自己一直是在追求真理的，到延安是自然的结果。总之，也没有很明确地认识这是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是一种阶级变化。而朱总司令这样的革命领袖却这样赤裸裸他说他也是投降，这就一下子打破了我自己那种可羞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理，喜欢粉饰自己的心理，而认识了这样一个客观真理：是投降。转变也好，投降也好，从好的转到、投到坏的自然耻辱，是堕落，但从坏的转到、投到好的又有什么需要遮掩的呢，这正是光荣，正是向上。而且，投降，朱总司令用的这个字眼，是何等通俗而又何等确切啊。投降，就是完全缴械。我们到延安，在延安工作，还不过是在政治上、组织上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罢了。我们还要在思想上抛弃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完全缴械。

当时内心的活动自然未必有今天写的这样明确，但是朱总司令的话的确给了我以很大的认识与决心去甘愿向无产阶级缴械。这使我在以后的整风过程中减少了很多矛盾与苦恼。而且，当我缴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小资产阶级的械之后，逐渐地我的手中就开始有了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械。

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又使我认识了革命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革命的领袖是怎样产生的。只是一心一意地为工农大众做事，打仗，并不打算要当总司令或旁的什么，这正是后来毛主席所提倡给老百姓当勤务员的精

神。伟大的领袖也灯，伟大的作家也灯，都只有人民群众才有资格来推举，不是可以由你自己来封赠，或者由你那一小集团来封赠的。

朱总司令还在继续讲下去。他又说：

“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时候，这已经是天堂啊。有的同志说，外面大都市里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

是的，在那一、二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是比较苦一点。就是在文艺界，也难免有个别的人有意见，王实味所提倡的与其实行的“针对自己的阵营工作”（即攻击），就是选择了小资产阶级思想与物质生活困难这两者来作基础。但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还不止解决了这个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看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方面启发了我。我们常常说立场，但是有的时候连延安与大后方的根本区别都忘记了。大后方一切的财富、享受、繁华，还不是都是为少数人所有？延安和解放区的物质条件虽差一些，却是人民及其先锋队作了主人的地方。朱总司令用“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这样通俗的说法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区别。这里面有立场，也有方法。

我现在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个片段了。朱总司令讲话的总精神是要作家们为人民服务，改造自己。

所以，毛主席站起来作结论的时候，首先说：“其实总司令已经作了结论了。我的意见是和他差不多的。”这并非单纯地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谦逊，他的后来发表出来差不多快到两万字的结论，自然问题讲得更广，更精密，而其基本精神则的确是和朱总司令相同的。

1946年12月

朱德同志关怀炮兵建设

丁本淳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仅据我亲自经历的朱总司令对人民炮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给予的亲切关怀记述如下，以此做为对朱德同志的深切怀念。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推动下，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展起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当时，八路军总部唯一的山炮连，也随军进至山西省五台县境内，配合步兵作战。此时，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在日寇进攻面前，一触即溃，仓惶而逃。在后逃中，将十余门山炮和野炮弃于五台县湫沈河中。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派部队前往捞炮。为鼓励阎锡山部队继续抗战，遂将捞起的其中四门野炮给阎锡山部送了回去。将其余八门山炮上交给八路军总部。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0月决定，以总部山炮连为基础，加上一二九师从河中捞起的八门山炮，组建成八路军总部第一个炮兵团。1938年1月28日，在山西省临汾县刘村镇，炮兵团召开了建团大会。同年3月，炮兵团奉命西渡黄河，转移到陕西洛川进行整训。整训期间，朱德总司令亲临炮兵团作指示和作时事报告。朱总1938年9月来到炮兵团检查整训工作时，细心地观看了部队的兵器操作和演习，看完演习后，先向排以上干部讲了话，又在全团指战员大会上作了报告，着重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树立和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他对炮兵团建立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如何建好炮兵团做了许多指示，要求全团指战员，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尽快提高作战能力，一定要把炮兵团建设好。朱总的指示大大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学习情绪和抗战热忱。

1939年1月，在炮兵团成立一周年时，朱总司令又为炮兵团亲笔题词：“坚持抗战胜利归于我们”。同时，还给炮兵团办的报纸题写了“骨干”二字报头。号召大家努力提高本领，加强炮兵建设，真正成为我军的火力“骨干”。

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炮兵团迅速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虽然学习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指战员抱着一定要把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建设好的决心，勤学苦练，互教互学，在较短时间内，军政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进入1939年以后，前方的作战任务十分紧张，炮兵团很快结束了整训任务。遵照上级指示，除一营由匡裕民、袁光率领驻洛川，保卫陕甘宁边区以外，全团开赴晋东南参加作战。时逢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山西路城中村）召开朱总司令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大会。炮兵团连以上干部也参加了大会并聆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在此期间，朱总司令还接见了炮兵团的干部并做了重要指示。他说：到敌后，要继续加强战备训练，做到边战边训，不断提高对敌作战本领。全团同志遵循总司令的指示，开展了敌后练兵活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从此，炮兵团在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领导下，转战

敌后，战斗十分频繁，打了许多胜仗。从1939年冬到1940年冬，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美帝国主义的劝降下，两次发动反共高潮，在以重兵包围和进攻我解放区的伺机，还停发了我军的军费和装备、服装等，对我边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边区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妄图把我边区军民困死、饿死。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紧密配合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想要把我根据地压垮、吃掉。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一面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艰苦斗争；一面向全党全军发出“精兵简政”和“生产自救”的号召。根据地广大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7月，炮兵团奉命开赴南泥湾，执行朱总司令倡导的“屯田政策”，一面开荒生产，一面监视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可能发动的进攻。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九十余里，土地肥沃，便于开垦。但这里人烟稀少，树大林深，部队到达后，既没有粮食可供充饥，也没有房屋可以御寒，牲畜没有草料，车辆无路通行，真是困难重重。正在这时，我们的朱总司令接连两次来到南泥湾，看望炮兵团全体同志。他在欢迎会上，首先向干部战士们耐心他讲述了屯垦南泥湾的重大意义，他说：由于敌人的围困封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坐以待毙；一条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走哪一条路呢？我看应当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路。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起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渡过难关。全团同志对总司令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搞好开荒生产。当朱总司令了解到部队缺乏生产工具，要搞好生产，困难确实很多时，就批示边区政府为炮兵团拨发了锄、镐、锹和铸铁等生产工具。战士们得到了这些生产工具，真是如虎添翼，信心倍增，并且从心里感激总司令对炮兵团的关怀。

当时，从延安到南泥湾只有一条崎岖的山间小路，部队往来和运送物资都十分困难。上级决定修筑一条从延安城南的三十里铺直达南泥湾的公路。这一修路任务，交给了炮兵团的三营九连。当时，我在三营任教导员，团领导要我带领九连执行这一任务。在我们刚刚开上山时，朱总司令在邱创成政委的陪同下，也徒步来到山上，又一次察看了公路的路线，在察看过程中，他席地坐在山上的羊肠小道旁边，要我和九连连长赵大满，指导员范船，围坐在他的身边。总司令先向我们交待了任务，然后讲到修筑这条公路，对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我们一定按政府的要求，按时圆满地完成任务，这时，秋风萧瑟，天气已经很凉了。总司令看到干部和战士们都还穿着从前方回来时的单衣，他就要总后勤部尽快给部队解决棉衣（不久，全团每人都领到了一套新棉衣和边区生产的羊毛毯子）。我们听着总司令的指示，心中非常激动，虽然天气很凉，可我们的心里都热乎乎的。总司令对部队既严格要求，又象慈母般地关心和爱护。特别是总司令在这南泥湾的荒野之中和我们坐在一起，促膝谈心，畅谈南泥湾和边区的光明前景，态度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此情此景，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之中。我们一致向总司令表示：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公路修好，按时完成任务。

九连指战员在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指导下，克服工具不足，没有经验等困难，投入了紧张的施工。施工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朱总司令的殷切希望，时

时刻刻鼓舞着我们。大家发扬不怕苦，不怕死，连续奋战的精神，终于用九十九天的时间抢在大地封冻以前完成了六十多里的筑路任务。朱总司令知道公路已经修通时，就乘坐一台华侨援助八路军的大卡车，沿路驶来，亲自检查验收。当他发现公路在山区的转弯处，有个别地方曲半径不够时，就要我们再设法加宽路面，以保障车辆行驶的安全。大家都为总司令这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感动。我们立即按总司令的指示，将各重要地段又重新检查一遍，并做了修补。这条公路的建成，大大方便了从延安抵达南泥湾垦区的交通，保证了人员往来和物资运送的需要。

从1942年起，部队全面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动，为帮助炮兵团搞好生产、建立家务，朱总司令还亲自批示总后，拨给炮兵团十辆大马车，建立运输业。同时，还指示我们搞一些商业，以繁荣延安的市场。遵照朱总司令的指示，炮兵团在延安南关新市场开办了一片商店。在商店开业前，朱总司令亲自为商店命名为“西北商厦第三分店”。此后，炮兵团又建立了生产管理处，开办了以“新丰”命名的油坊、酒厂、面粉厂、木材厂和大车厂以及商店，饭馆等企业。从1942年到1944年，朱总司令每年都到南泥湾看望炮兵团和检查工作。在总司令的关怀下，炮兵团已开垦并种植农作物一万六千二百余亩，收细粮（脱粒后的粮食）二千五百余石，收蔬菜六十四万余斤，共折合边币一亿八千万元。不仅达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使敌人的经济围困政策失败，还上交了一部分粮食给边区政府，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通过生产劳动，部队也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炮兵团被誉为边区的生产模范部队之一。

1944年，抗日战争已处于战略反攻的前夕。党中央、毛主席指示解放区军民，抓紧时机，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为了迎接全国的大反攻，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可能挑起的突然事变，党中央于7月1日，又颁发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确定在现有基础上加紧整训部队，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为将来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在此形势下，军委在1944年秋决定，在八路军炮兵团的基础上成立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命名为“延安炮兵学校”。1945年4月，全校正式开课。因为当时正在举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直到“八一”建军节时，才正式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详细地论述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然后讲了军委决定在炮兵团基础上组建我军第一炮兵学校的重大意义。要求全校同志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光荣传统，把学校办好。最后，他号召“模范战士上炮来”，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干一辈子炮兵，为人民炮兵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朱总司令的号召，给全体教职学员以极大的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终身为人民炮兵事业而战斗，以炮兵建设的成就来回答党和首长们的关怀和期望。当时，也有少数学员到校后，看到炮校装备很差，生活条件也很艰苦，要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生产劳动，因而学习不够安心。朱总司令了解这一情况后，在开学典礼结束时，亲自同七名营级学员谈了话，耐心地解答了他们提出的有关学习、生活上的问题。特别是对他们思想上的问题，更是非常关心，并且针对他们的思想问题，给予了谆谆教诲。看到朱总司令对学员们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关心，大家不由地想起了1942年整风时，朱总司令正在南泥湾中央疗养院养病，当他知道炮兵团的干部，正按照中央要求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联系实际检查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不顾身心劳累和炎炎暑天，特地来到炮兵团为部

分干部讲述了整风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积极自觉地投入整风中去，把三风整顿好。使大家难以忘怀的另一件事，就是在炮校开学典礼时，原计划进行迫击炮和山炮实弹射击，给总司令和其他来宾看一看。朱总司令看了计划以后，把山炮实弹射击的项目取消了。他说：“一发山炮弹就是一个中农，不能打，节省下来消灭敌人。”山炮实弹射击虽然取消了，但大家在思想上却感到了有了很大收获，受到了深刻教育。

为了加强炮兵的建设，朱总司令在参加炮校开学典礼以后，在8月6日，又就赵章成同志（当时任炮校迫击炮主任）关于加强迫击炮知识教育和兵工生产的建议，给党中央写了《关于建设迫击炮分队及兵工生产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于8月12日即批示：“照总司令的意见办。”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下，炮兵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火力突击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陷于土崩瓦解状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成定局。但是，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政府一面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奋力经营长江防线，妄图凭借长江天堑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则玩弄新的“和谈”阴谋，妄想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了1949年新年献词，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我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丝毫不能松懈战斗意志的指示，进行了充分的渡江作战和向全国进军的准备。在渡江战役的前夕，朱总司令来到了天津，在华北军区和天津市领导和四野特种兵首长陪同下，在天津部署海防作战，防备敌人在我大军渡江之际对我后方口岸进行扰乱，破坏我军正面渡江作战。朱总司令抵天津后，亲自到塘沽至山海关一线查看地形，并到炮二师三十团亲自看了炮阵地，检查了阵地伪装，并且告诫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不仅要准备蒋机来空袭，而且要准备对付美国飞机可能来轰炸，要做好充分准备。他还具体指示我们要挖一些防空洞，平时把炮放在洞里，训练或作战时拉出来。为抓好一线炮兵部队的战备工作，朱总司令还命令炮二师副师长张志毅和我师副政委留在炮三十团，就地帮助指导。我们根据总司令的指示，留在该团掌握部队情况，一直到我军胜利渡江以后，才离开该团。

朱总司令在天津视察期间，还带领我们考察了大沽口炮台。当时，我看到这个炮台只是一个大土堆子，我说：“这么个土堆子有什么用呀？”朱总司令听到后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这个炮台。咸丰九年时，英法联军一个很大的舰队，蛮横地闯入了大沽口，集中舰上火力轰击这个炮台，并以陆战队强行登陆。这个炮台的守军，向敌人进行了猛烈而有效地反击，击沉击伤敌舰近十艘，陆战队也伤亡大半，英军头领海军上将何伯也被击伤，使这支侵略军狼狈逃出大沽口。到咸丰十年，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开门揖盗，英法联军才得于不设防的北塘口登陆，从陆路抄袭了大沽炮台。”朱总司令向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给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们更加重视海岸防御和加强炮兵建设，激励我们更加自觉地把炮兵建设搞好。

全国解放以后，为统一全军炮兵的领导，进一步加强炮兵部队的革命化、正规化建设，中央军委于1950年3月，决定筹建炮兵领导机关。朱总司令对于兵种领导机关的建立及其工作，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并且亲笔题词：“建设人民炮兵，保卫国防。”鼓励我们在我军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把部队

建设搞好，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各项战斗任务。在抗美援朝期间，朱总司令对炮兵部队的改装、扩建以及部队的训练、作战等，都做过许多重要指示。直到1957年时，朱总司令虽然年事已高，并且担负着党和国家、军队的许多繁重的领导工作，但他仍然关心着炮兵的建设事业。为加强炮兵干部的培养和深造，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炮兵学院。朱总司令亲自为炮兵学院选定院址。他说：宣化距北京较近，靠近领导机关，便于指导学院的工作。在总司令的关怀下，经过较短时间的筹备，炮兵学院即开始招生、开课。此后，为炮兵部队培养了大批干部。

敬爱的朱总司令对炮兵部队从最初的组建，到以后的训练、作战和干部培养等方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些难忘的教诲，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炮兵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1991年6月

屯田垦荒度时艰

马兴

1941年春节后不久，我们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在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双湖峪驻地，鉴于皖南事变血的教训，部队正在紧张地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突然袭击。4月初旅部命令火速出发，兼程前进，经过几天急行军，于4月11日到达南泥湾原始荒沟，宿营地叫金盆湾。

夜晚，周围古老的处女荒山，给人带来神秘莫测的感觉。虽然经过紧张的长途急行军，可谁也不知疲倦，无不好奇地盼望着，及早认识这个陌生的奇异世界。

拂晓，一堆堆篝火象红珊瑚点缀在海面，燃红了小河边的草坪，也烧热了战士们的心，云集在南泥湾滩头的是一支整装待命的屯田大军。庄严而热烈的誓师大会开始了。我们真没有想到，由王震旅长陪同，出现在部队面前的，竟是举世闻名的朱德总司令，他要亲自指挥我们打响这一场屯田战斗！

朱总司令身穿灰色军大衣，走到队伍中间。他那魁伟的身姿，风尘仆仆的面容，慈祥有神的目光，加之部队有关他的传说之多，此时既富于神话式的传奇色彩，又给人以强烈的现实亲切感，因而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全体指战员的注意力。

朱总司令对我们讲话了。他的声音并不十分洪亮，却坚强沉重，富于鼓舞力。他在揭露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流血惨案、祸国殃民的罪恶真相之后说道：“我们九旅为什么要到南泥湾来？我八路军、新四军是最坚决的抗日先锋，蒋介石一不发饷，二不发粮，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与经济封锁，不给我们吃的，不给我们穿的，要活活饿死我们、冻死我们。毛主席讲抗战分三个阶段，现在处于第二阶段，也就是相持阶段，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铁壁合围，斗争相当残酷，蒋介石配合日本鬼子的扫荡，对我们进行封锁，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所以现在是抗战最困难的阶段。同志们说，我们怎么办？”大家在沉思中正不知道如何是好，朱总司令接着指出：“毛主席要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参加革命前，不就是拿锄头的吗？我们会作工，我们会种地，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包围着我们，有什么用？毛主席要我们会打仗，又会生产，又会做群众工作，蒋介石困不死我们，饿不死我们。你们在前方是英雄部队，就是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才把你们从敌后战场上调回来，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就在南泥湾安家。南泥湾是个好地方，有的是荒山，土质肥沃，一脚踏下去，踩得出油来，我们要在这里屯田，开窑洞，种庄稼，吃饱肚子，练好武艺，防止蒋介石搞突然袭击。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蒋介石手下有个胡宗南，他不打日本，专吃磨擦饭，打八路军。他不来磨擦，咱们就生产；他要进攻边区，咱们就给他点厉害瞧瞧：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回答朱总司令的，是全体指战员的热烈誓言，像平地一声春雷，震得荒山都在打颤……

朱总司令满意地点头鼓励道：“好！南泥湾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好好地安家立业吧！”

王震旅长代表三五九旅，在誓师大会上表示决心：“朱总司令昨天才从延安赶来，指挥我们展开屯田战斗。并且和部队一起露营，同艰苦，共患难，给了我们很大鼓舞，这只有共产党人才办得到。我们要努力做到不吃老百姓

一颗粮，还要有余粮送缴边区。我们还要开水田，种稻谷，使人人吃上大米，把南泥湾变成陕北江南。到那时鸡鸭成群，猎羊满山，纺毛线，织毛呢，叫人人穿上呢子衣服，比日本皇军的军官还要威风。这才算得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哩！”说得大家满脸笑咪咪，浑身暖乎乎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朱总司令带着一个老乡作向导，和团长、政委以上的领导人员，一起看地形去了。

金盆湾不过十几户人家，大都是从外地逃荒来的，离延安九十多里，连油盐都无处可买，菜蔬更是少见。拿什么来给朱总司令做菜呢？眼前一条碧清的小河，河里游鱼可见，还有一种野生的水芹菜，肥大的叶子随着碧波荡漾，这就成了当时最好的菜肴。王震旅长从河里捕到一些鲜鱼，动手煎好给朱总司令吃。虽然没有任何作料，他老人家却吃得津津有味，连声称赞：“这样新鲜可口的鱼味，不仅在前线享受不到，就是在延安也难得有这种口福哩！”

连队听到这情况，有的就让神枪手打回一些野猪、山羊，还有的捡到一些野香蕈、木耳，把这些野味烧好，送给朱总司令吃，还有很多山珍野味。可惜朱总司令来不及吃，就回延安了。朱总司令回到延安后，大家还在惦着他，听说他带头开荒种菜，还到大路上拣骡马粪，他的战马也成了驮载生产资料的工具。

部队遵照朱总司令的部署，一部分赴防地临镇和鄜县（现改为富县），牢牢把守着延安的这两处南大门；驻在南泥湾一带的部队，开荒地，种粮种菜，挖窑洞，从此揭开了屯田战斗的序幕。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朱总司令，朱总司令也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南泥湾屯田的战斗者。不觉已是1942年4月下旬。

“一年一度桃花开，春从江南姗姗来……”算来部队到南泥湾已一周年又二十多天，朱总司令又从延安出发，亲临南泥湾视察。使我们高兴的是，陪同朱总司令来南泥湾的还有一二师贺龙师长。原来红二方面军由二、六军团组成，六军团就是三五九旅的前身。这时贺龙师长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对九旅的感情尤深，何况三五九旅正属一二师所辖。1938年，贺龙师长曾带着九旅打通了冀中平原，很多战士当年都是慕贺龙的威名而参军的。

这时的南泥湾已不是荒芜的渊薮，而是炊烟袅袅，人欢马叫的屯田长廊了。以七一八团而论，初到金盆湾时，5月份全团开荒近万亩，6月初开始挖窑洞，炮兵连首先于八天内完成，其他连队最多也未超过十二天。秋收谷子五百零五石八斗，菜蔬夏秋两季共收二十一万多斤，割马草四万斤，新建一座纺织厂，两座木工厂，商业有骡马大店一处，合作社十九处，为开辟陕北江南打下了稳固基础。

我们七一八团政治处的文艺小组，在朱总司令、贺龙师长莅临的前夕，集体写了很多欢迎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的街头诗，贴满金盆湾街道两边的墙壁，表现了我们这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对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的热烈赞美。金盆湾虽是一条极小的街道，却是从国民党地区经我临镇到达延安的必经之地。在金盆湾驻军七一人团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中，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由王震旅长陪同，徐徐步入金盆湾街心。没想到这些街头诗竟然引起贺龙师长的注意，他停下来都一一看了。这些诗虽然写得很幼稚，可他并不觉得可笑，从中可以看出火红的战斗热情，美好的希望与向上精神。

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首先到临镇（距金盆湾四十华里）视察，看望了驻军七一一团之后，又回到金盆湾。在盛大而隆重的检阅大会上，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检阅了驻军七一一团射击、投弹等军事演习。一位绰号叫“疤子”的战士，投弹达六十米。荣获“贺龙投弹手”光荣称号。贺龙师长在讲话中，对七、八两个主力团给予高度评价，盛赞“铁的七团”、“文武八团”。

中午全团举行盛大会餐，每班一席，就地而餐，除了猪、羊、鸡、鸭、鱼肉之外，还有豹子、野猪、山羊肉，香蕈、蘑菇、木耳等山珍野味。炊事班以最拿手的好菜，献给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当他们尝到川、湘小菜的家乡风味时，都相视而笑，赞不绝口。

战士还把榨树皮做的斗笠、饭盒，马兰草打的草鞋等土产加工品献给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就在这月中旬，朱总司令视察了南泥湾农场及后勤部门，指示进一步开发深山宝藏。此后，造纸厂有牧场、养蜂场、蓄鱼池陆续建成，部队生活越来越富饶。

为了把这一盛况报道出去，王震旅长特别带我去拜访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这是我第一次晋谒我军的最高领导，思想极度紧张，青筋暴得老高，连向总司令和师长问好的话，都憋在喉咙管里，一个字也说不出。

贺龙师长先问了我的姓名，又很随便地要我把手板心伸给他看过，接着又问道：

“今年二十几岁啦？”

“二十二岁。”我回答道。

“手上了茧，要得！但还没有磨成老茧，翅膀还不硬，莫要轻视老茧，这是南泥湾大学的毕业证书呀！”

（是的，后来经过1943年和1944年生产高潮，没有一个人不是由满手血泡而结为老茧的，我当然也不例外。想起贺龙师长说的“这就是南泥湾大学的毕业证书”更感到无比珍贵。）

贺龙师长嘴角叼着那管时刻不离的烟斗，炯雾伴着话语同时并发：

“你们的街头诗我都看了，我向朱总汇报后，总司令表示满意！好好干吧！时代不同了，我们就是要在炮火中、在开荒中，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尔基。你看总司令对你有啥指示？”

我扭过头来，端详着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那慈祥的面孔，长长的眉毛，和蔼的目光，一点也没有身为总司令那种威严逼人的气势，简直使我看呆了。

朱总司令问我担任什么工作，我说在编团政治处的小报。

“小报叫什么名字？”朱总司令很有兴趣地问我。

“《战号报》。”我连忙回答。

“啊！师战斗报、旅战声报、团战号报，是不是？”

我正惊异于朱总司令对部队情况的了解如此细致入微，他又接着问道：“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

工作上怎能没有困难呢？我一个人自编、自刻（写蜡纸）、自（油）印、自发行，还要深入连队采访，工作量不能说很重；但团政治处李大同副主任对宣传工作抓的非常具体，战士写作甚为活跃；特别是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相形之下，编小报的工作反而像休息似的了。对！什么困难也没有。我对朱总司令也是这样如实地回答着。

直到这时，我才记起了一件大事：团政治处的领导和同志们一致嘱咐我，请求朱总司令为《战号报》写个报头。我大胆提出这个要求，可是心里还在

掂量，朱总司令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吗？不料朱总司令毫不思索，叫我马上拿纸笔来。其实外面早已准备好了。

我向朱总司令、贺龙师长举手敬礼，高高兴兴地回到团政治处。同志们问这问那，都把朱总司令和贺龙师长的鼓励当作无上荣誉。

这年7月10号，朱总司令又偕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并题诗《游南泥湾》，后发表于延安《解放日报》，可见他游兴之浓和精神境界之高。南泥湾面貌的改观，深深吸引着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在游历中给我们留下了情感真挚的诗篇。

1943年屯田战斗进入高潮，生产规模最大，全旅开荒三十万亩，计划产量一千万斤，作到耕三余一，实际产量一千二百万斤，上缴公粮三百万斤。上自王震旅长，下至每一个战士，无不挥动耒耜，磨起血泡，为屯田战斗立下了汗马功劳，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由于耕地面积扩大到自给有余，到1944年就可以腾出手来，大开稻田，广种大米，并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种了许多代耕田，吃到了陕北江南大米的新品种。这时完全做到了耕二余一，每人每五天吃一斤肉。及至11月南下时，粮食堆积如山，战士们身穿崭新的棉军服，在雄壮的歌声中与南泥湾告别。但是谁也没有忘记：南泥湾果实累累的金秋，都是在朱总司令亲自指挥下辛勤耕耘的报酬。

敬爱的朱总司令，南泥湾的战士永远不会忘记您！

1991年

亲切的关怀难忘的教诲

杨成武

1947年，正大战役胜利结束不久，一天，我在阳泉接到中央工委的电报，叫我去行唐县上碑镇。

那时，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同志组成的中央工委来到了晋察冀，他们住在上碑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部址也在那一带。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登程，前往上碑。

上碑，是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镇子。自从我们部队撤离张家口之后，晋察冀领导机关转移到涞源、完县之后不久也移到这里。聂荣臻司令员在这里部署了许多战役，在这里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我到上碑后，首先看到的是聂司令员。聂司令员一见我就说：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找你来，有事和你商量。

随后，我来到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的住处。他们住前后院，朱总司令住在前院，少奇同志住在后院，全是平房。院子里长着几棵枣树，枝头缀满绿茵茵的嫩叶。前后院很是对称，院子的正中间都铺着一条石子甬道。古朴幽静的深院里散发着农家的气息。上午，朱总司令找我谈话，当我走到前院，朱总司令的秘书已经为我通报了。不一会，朱总司令从室内迎出来，老远就伸出了手。

我向朱总司令敬了个礼，庄重他说：“总司令，您好，好久没见。总司令了。”

他笑呵呵地说：“成武同志，你从阳泉前线回来了。”

“刚刚到。”我说着，跟随朱总司令进到屋里。

他指着靠墙的一张硬木靠背椅，示意我坐下，又叫秘书给我倒水。

朱总司令总是那样，你一见到他，立即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亲切感。他是全军的总司令，是全军的首长，也是全军的长者。对部下，他非常关心，对我们不仅是使用，而且注重培养。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教育和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军政素质。他身教胜于言教，处处以身作则，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

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是1929年在长汀。从那时起，他经常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给我们讲革命形势，讲中国革命的胜利，红军要发展壮大，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后来，在中央苏区的各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中，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多次见到过朱总司令，并聆听他的谆谆教诲。他那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统帅气概，他那面容和蔼亲切的长者风度，他那临危不惧，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革命精神，他那事事顾全大局，时时讲团结的大海般的气度，他那平易近人，对官兵一律平等的优良作风，他那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的高尚品德，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占我想，如今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朱总司令来到晋察冀，这对我们今后的作战，尤其是从战略的高度如何正确地理解、自觉地执行中央的部署，一定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朱总司令开宗明义他说：“中央军委考虑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重新建立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构。”

接着，他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国大内战，召开伪国大、制订伪宪法，当了大总统。他派兵侵占延安，侵占张家口，下令逮捕和暗杀

民主人士，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茨，叫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刽子手参加指挥作战。还在太原、大同、阳泉起用日本部队同我们作战，实行卖国政策、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造成了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和经济危机。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不但没有消灭人民解放军，没有削弱人民解放军，反而大大地锻炼和加强了人民解放军，使人民解放军日益强大，不到一年，蒋介石就被我们消灭了一大批正规部队；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的解放战争转入了全国性的大反攻，即主力打到外线去了，正在展开全国规模的较量。眼下，敌人正在和我们抢占东北，正在向我们解放区进攻，重点是山东、延安占华北地区，中央非常重视。你们晋察冀部队的任务很重，不仅要牵制敌人在华北的部队和解放全华北，而且北面要支援东北，西面要支援西北，东面要支援华东。这是进行战略大反攻啊！

朱总司令强调说，在这种形势面前，需要加强战争机构。根据战局的发展，现在我们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察冀军区的野战部队还需要加强，需要组成一个更强有力的野战军指挥机构，野战军要完全适应打运动战和打大歼灭战的要求。目前军区指挥机构对野战军各纵队的作战指挥还不完全适应，后方庞大，战斗人员少，头重脚轻，不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从战略上考虑，决定恢复晋察冀野战军，重新成立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以加强野战军建设，使之成为一个有力的“拳头”。

他握了握拳头，说：中央工委已向毛主席建议并得到批准，杨得志同志任野战军司令员，你任政治委员，耿飏同志任参谋长，潘自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晋察冀野战军。

听了朱总司令的一席话，我一方面为成立野战军领导机构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个决定将会使野战军从此摆脱繁重的负担，可以集中力量，大大地加强野战军的组织与指挥，增加灵活性，便于更广泛地实施机动。这个决策对于今后的战略反攻，打大的歼灭战、运动战，是非常需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自己能力不够，唯恐不能胜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这个职务。

朱总司令象看出了我的心思，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和我促膝谈心，谈了很久，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我深深感到，朱总司令的话，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是对部属的殷切希望。我生怕忘记，很快地拿出笔来，把朱总司令的指示，一条一条地记录在本子上：一、要团结。

二、戒骄戒躁，做事不要粗枝大叶，要细心谨慎。

三、注意组织军队，保证满员。

四、注意连队工作，加强深入下层，帮助连队。

五、干部有问题，要直爽地和他谈，帮助他。

六、注意巩固部队。

七、注意纪律，保证物资交公，即为筹款立功劳。

八、威信问题，上下级间有问题可以疏通，不要顾虑过多，要把工作做好。工作交给你两杨（即杨得志、杨成武）负责。九、处事处人要有严密戒备，不要乱说话，要谨慎，不要慌忙，不要口松，多听人说，自己少说，生活、工作态度均要如此。十、关心机关干部，注意对下层实际问题的帮助、解决，团结他们。

十一、静坐当思已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惕，加以反省，纠正之，加以这方面之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

十二、一切问题注意调查研究，加以综合，综合群众的意见后再发言、

再说话。

十三、了解情况，了解干部（谈话、征求工作意见）、否则不发表意见。

朱总司令头一条就强调“要团结”。团结，这是朱总司令的一贯思想。朱总司令的革命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条真理：只有团结，我们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刚刚成立起来的野战军领导机关，要牢记团结一致的原则，以此去战胜敌人。

朱总司令和我谈过话之后，我感到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这是个英明的战略决策。就在组建野战军领导机关之前，我们进行了两个战役，一个是青沧战役；一个是保北战役。青沧战役从6月12日打响，我们集中了三个纵队和地方武装一部，在津浦铁路北段的陈官屯至沧县间发起攻势，战至15日，连克青县、沧县、水清三城和陈官屯、唐官屯，兴济镇等十几个车站、据点，控制铁路约八十公里，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打通了晋察冀和山东根据地的联系。出击保北，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为了打好这一仗，朱总司令于6月下旬，随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移驻自洋淀，亲自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组织保北战役。战斗于6月25日晚打响，仅用一昼夜时间，我第二纵队即攻克徐水，全歼守敌三二五团。不几天，我第三纵队攻克固城，全歼美械化三六二团，并在打援中又歼敌二千多人。

保北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干部全部到职，领导机关也在定县的一个村庄里正式成立。这时，朱总司令很关心部队的补充、训练，8月16日，他和刘少奇、聂荣臻同志来电话：如暂时各方不好打，可多整训十至十五天，将部队补充完整，好好训练，待秋高时大举进攻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带和平汉、津浦、北宁三条铁路线，或攻击石家庄。

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关成立后的头一仗是大清河北战斗。战斗之前，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曾来电指示：“你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敌地堡坚固应研究对策，筹备技术与材料后再设法攻破。”“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悉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如数次布置无效亦不必灰心，下级亦不宜说怪话，能长此灵活使用，一年内能一、二次收效亦可算成功，或可大量歼灭敌人。”大清河北战斗从9月2日打到24日，演化成清风店战役，即于10月11日以一个纵队围攻徐水，主力集中在徐水以北地区打援。14日，在徐水、容城之间，与北平出援的国民党政府军五个师打成对峙。就在这敌我双方对峙不下时，蒋介石到了北平。他对此相峙局面发生错觉，以为我军兵力不足，又不易脱身，觉得这是与我们决战的一个大好时机，便亲自督战，命令其嫡系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部北上。梦想罗历戎部从石家庄北上，与保定刘化南的两个师会师，然后再和其北面的部队配合，形成南北夹击，在徐水、定兴地区消灭我们的主力。罗历戎第三军原属胡宗南系统。后由兰州、西安经晋南转到石家庄驻守，正大战役后已是坐守孤城，如今接到北上的命令非常害怕。罗历戎不敢贸然行动，因为他知道，离开了石家庄，他就失去了依托，从石家庄到保定，要经过大片解放区，是非常危险的。他不愿冒被歼灭的风险。但老蒋坐镇北平，逼得甚紧，他又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领着第三军军部和两个师及第十六军一个团从石家庄出发，渡过滹沱河、唐河，胆颤心惊地向北推进。这时，我们正在调整部署，原打算主力由东向西。接到此情报后，我和杨得志、耿飚当即决定，抓

住罗历戎第三军主力孤军北进的有利时机，以一部兵力在徐水以北阻敌南下，我主力六个旅不再向西，改为向南，用遭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歼灭。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待军区首长的批准，我们向军区发了个电报，就开始行动了。部队以一昼夜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南下，于 20 日拂晓，将北进之敌罗历戎第三军主力及第十六军一个团包围在清风店地区。激战到 22 日，将其全歼，生俘中将军长罗历戎。此役，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灭国民党政府军一万七千多人，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

战役刚结束，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和罗瑞卿同志就赶到了野战军司令部。

朱总司令祝贺我们取得的重大胜利，即兴步杜甫《秋兴》韵赋《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诗一首：

南合村中晓日斜，
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
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
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边区胜利花。

清风店战役消灭敌第三军的主力后，石家庄守敌减半，其正规部队只剩下一个师，敌人也感到岌岌可危，挖肉补疮，匆忙空运一个团加强守备。眼下，敌人北面就剩下一个保定，再往北就是北平了。我们认为，石家庄已经成为熟透了的果子，我军垂手可得，于是提出了打石家庄的建议。当即得到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的支持。

众所周知，石家庄又名石门，地处平汉、正大、石德铁路的交叉点，是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敌第三军自抢占石家庄后，就苦心经营，企图使这座城市成为向我冀中、冀南、冀晋、太行各解放区进攻的中心。

敌人在石家庄筑起三道防线：头一道防线是外市沟，上面有密集的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外市沟后面是环形铁路，铁甲列车可以随时机动和巡逻；第二道防线是内市沟，这里是重点设防；第三道防线是由建筑物组成的核心工事。在这三道防线里筑起的碉堡达六千多个，加之石家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平川，要靠近城垣是极其困难的。

清风店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晋察冀野战军党的前线委员会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解放石家庄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朱总司令在会上就攻城的部署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并针对敌人已把石家庄变成一个筑城要塞，自称“固若金汤”的情况，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口号。要求指战员认真发扬军事民主，通过打石家庄学会攻坚战，强调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把朱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的口号向部队作了传达。会议决定：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冀中军区、冀晋军区的部队攻打石家庄；第二纵队和独立第九旅、第三军分区，第九军分区的部队集结在定县南北地区，阻敌援兵。针对石家庄的防御体系，会议决定先占四郊，改造地形；通过挖壕接敌，突破两道市沟，猛插核心工事，歼灭守敌。其具体部署是：三纵队在西南面，四纵队在东北面，担负主攻任务。冀中军区部队由东南面、

冀晋军区部队由西北面，协助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向石家庄发起进攻。

这次会议还决定释放在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近千名敌军官兵，让其回石家庄市，以瓦解敌人军心，动摇敌军士气。

会后，部队进行战前准备。我下到部队帮助基层做攻城的准备和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大搞军事民主，开展了一个“提困难，想办法”的群众运动，大家共同研究接近和通过市沟、破坏电网、穿过马路、爆破地堡以及对付敌坦克、铁甲车的办法。然后，进行攻坚作战的演习，演练挖地道、爆破外壕、对付装甲车、攻打核心工事、进行巷战，再次审讯俘虏，了解敌情，发挥从清风店战役中补充的解放战士的积极性，让他们介绍石家庄的敌情，并结合实地叫罗历戎介绍了敌人在石家庄的设防情况，如哪里容易突破，哪里是敌人的防御重点等。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进行了总动员，十几天中组织起一万一千多民兵、八万二千多民工、一万多副担架、四千多辆大车。部队开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锣鼓喧天，送猪送羊，鼓励指战员杀敌立功。

11月5日夜，各纵队渡过滹沱河，向石家庄开进。6日拂晓，打响了石家庄战役的枪声。

当先头部队打到市中心时，我接到朱总司令的电话，这个电话是从冀中军区打来的。在石家庄战役前，旅以上干部会议后，我们对朱总司令说，部队向石家庄推进时，敌机必然来轰炸，在前线不太安全，请总司令到冀中军区驻地河间县去，我们及时向你报告、请示。朱总司令理解我们的意思，说：那好，我不加重你们的负担，就不到前面去了。我去冀中，有什么事，用电话联系吧。所以石家庄战斗打响以后，他一直在冀中军区。

朱总司令在电话上问：战况怎么样？

我说：“第一道防线突破后，第二道防线也突破了，正进入市区作战。”

朱总司令指示：你们一定要注意城市政策，特别是要注意保护几个大工厂，那是民族资本家办的。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你是政治委员要抓一抓，详细情况你会明白的。

接着我们收到中央电报，说石家庄大兴纱厂、机械厂、汽车修配厂等四个大厂，是民族资本家办的，要保护好，特别是对大兴纱厂要严加保护。指示我们占领头一个大城市，一定要做好城市工作，防止敌人破坏，要特别注意保护工厂，防止损坏设备，丢失东西，各级政治委员要亲自检查，要把党的城市政策落到实处。

接到中央电报的时候是半夜，第三纵队已经推进到大兴纱厂地区，正在进行巷战，枪声响成一片。敌人的坦克掩护着步兵反冲锋。我们部队与敌逐屋争夺，逐街争夺，不少地方打上了白刃战。为了贯彻中央和总司令的指示，我带着几个同志进入市内正在进行巷战的街头，召来八旅旅长宋玉琳、政治委员黄文明和九旅旅长陈坊仁、政治委员蔡顺礼，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电报精神，强调指出：不能出问题，必须保护这些工厂，按中央和总司令指示办事。

四位旅首长听完传达，马上回到各自指挥位置，迅速向前沿各团传达。两个旅的政治干部纷纷深入到先头连队，检查落实。对于中央和总司令指示要保护的四个工厂，他们专门制订了防护措施，一经占领就立即派部队守卫。

这天夜里，我一直跟着一线部队，落实中央和总司令的指示，直到天亮才返回“野司”。

整个战役过程，我们都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城市政策，保护了工厂、仓库、医院、车站等建筑及其各类物资、器材。不少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从烟火中抢救物资。战斗中，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了石家庄市人民群众的赞扬。中央指定的重点保护单位均完好无损，随时可以投入生产。

朱总司令拍电报指示全体指战员说：入城后，遵守纪律，迅速恢复秩序极重要。军队应如此，其它方面亦须如此，要切实办好这件事。

我们对朱总司令的指示，做了及时的传达贯彻。

战斗到第六天早晨，残敌进行着最后的抵抗。这时，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像复仇似的狂轰滥炸。

突然间，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轰轰地震动着整个城市，地面在微微颤抖。战斗接近尾声，怎么会有这样强烈的火力呢？这简直像是步兵发起冲锋前的炮火急袭。

杨得志和我、耿飏、黄敬同志赶去察看，原来敌机把弹药库、油库炸着了，一叠连声地爆炸，持续不断地闪烁，致使半边天乌云弥漫。

这场大爆炸成了我们祝捷的礼炮。当响声停息下来，战斗也跟着结束了。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硝烟正在消散的空中迎风飘扬！

至此，石家庄守敌第三十二师、第三军炮兵营、保安第九团、第十团、保警队和还乡团，总计两万四千多人，被我们歼灭掉。敌人驻守石家庄两年多的历史结束了。

这时，我们决定，派三纵队八旅担任城市卫戍部队，我到八旅进行了动员。

三纵队八旅执行任务，认真负责，使石家庄市秩序井然。特别是战斗结束后，敌机临空轰炸，他们一面组织防空，一面参加救护。有家银行中弹起火，他们组织人员从大火中抢救出银行的全部现钞，致使这家银行免遭火劫。

指战员们的无畏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称赞，就连民族资本家也很受教育、很受感动。

石家庄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对发展经济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个重点设防的城市，我们仅用六天时间就拿了下來，这充分说明了我军越战越强。为此，党中央特电嘉奖。朱总司令作诗庆贺：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问。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并称赞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我们“野司”移驻晋县一村，后又转移到周家庄村。不几天，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战斗经验，布置新的作战任务。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彭真同志都来了，并讲了话。会上，朱总司令反复强调，这次石家庄胜利来得很快，并不是偶然的，不要骄傲。你们要把这些经验好好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学习和发展。这次比大清河北战役，

清风店成役，有很大进步。以后还要提高战术，发扬优点，改进缺点。现在我们学会了打大城市，土改后又不愁没有兵，革命成功是一定的了。但中国这样大，走到南方也要半年一年，我们军队不到，蒋介石在南方的统治是不会垮的。我们准备打几年，一边打仗，一边建设。伟大的事业要在我们手上成功，一定要成功！

的确，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当时朱总司令的话真是高瞻远瞩，我们的事业是成功的，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新的胜利。

1991年1月

军事工业的奠基人

刘鼎

1940年4月，我从抗日军政大学调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有幸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工作。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得我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为此，朱德同志曾多次找我交谈有关军工生产的问题。在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军工生产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还鼓励我要克服困难，依靠群众的智慧，多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前方将士。在朱德同志等总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没有钢铁，就用铁路道轨，没有炸药，就从敌占区套购硝酸。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太行山根据地的军工队伍在困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建立起一支包括技术人员、机械工人，以及铁匠、锡匠、石匠等三千多人的军工队伍，生产出大量的步枪、迫击炮、炮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支援了前方部队、民兵的抗日作战。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挑起内战。我奉中央军委的指示，原准备带一部分人赴东北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因情况发生变化，我们撤离张家口，转入晋察冀根据地。1947年春，朱德同志来到西柏坡。一天，他派人通知我去商量军工生产问题。这时，我已调到晋察冀军区，担任兵工部副部长，部长是姚依林同志，我负责改制炮弹技术的工作。当我来到朱德同志的住处时，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要说的话很多。在谈话中，他对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在谈到军工生产的问题时，他充满信心地对我说：“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同时，他鼓励我说：“你是我军专制炮弹的老兵工，要用最大的努力为前方多提供炮弹，越多越好。”从未德同志的言谈话语中，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我当即向朱德同志表示，根据以往在晋冀鲁豫时的实践经验，我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生产炮弹的能力，并且有能力研制出更安全、更有威力的炮弹。同时，我也请求朱德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制造炮弹所必需的火硝和化肥。他对我的要求表示完全支持。

回到驻地，我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按照我所设计的图纸制造出新弹尾，经过炮兵多次试用、论证，证明这种炮弹性能可靠安全，爆炸力也很强。此后不久，我们在进行炮弹定型试验射击时，朱德同志来到靶场，他拿起炮弹，向在场的同志询问炮弹的射程、爆炸力和准确性能，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嗣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全部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

随着我军作战规模的逐渐扩大，军工生产的任务也就愈加紧迫、愈加重要。我记得，在石家庄战役前，朱德同志曾致信姚依林、刘再生和我，指出：晋察冀的兵工厂两三月来整顿得大有进步，军区兵工厂统一指挥领导后，更加有利于大发展。我要求你们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反攻部队所用的炮弹。特别是山、野炮弹以及炸药、绵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

炮八二、五、六的为适用，还有机枪弹。以上这些任务你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并要争取时间尽先完成，又要能适用，取得各战地的赞美，那时自然不愁款项无着。朱德同志在信中还要求我们尽快提出1948年军工生产的详细计划，并要求今后每月直接向他汇报一次生产情况。

1947年11月上旬进行的石家庄战役，仅用了七天时间，就全歼守敌二万多人，开创了我军攻克大城市的范例。在这次攻坚战中，我军使用了大量的炮弹和炸药。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炮兵和工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以后进行的邯郸、临汾等战役中，我军也采用了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取得了同样令人满意的效渠。

石家庄战役之后，为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朱德同志在日理万机。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曾多次找我们研究军工生产的问题。他指示我们把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军工部合并为华北军工部，并且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发挥正大路一线工矿的生产能力，扩大军工生产的规模。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和姚依林同志商定，扩大阳泉炼铁厂的生产能力，使之达到日产三十吨的水平（原日产二十吨）。同时成立硝磺局，专门生产炮弹所需的炸药。

回顾朱德同志在解放战争开始前就有预见性地亲自抓军工生产，使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提高军工生产的能力，为在解放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不能不说是朱德同志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又一功勋。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朱德同志分管军工生产。我们进入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傅作义部的军械所。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迅速地把它改造成一座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兵工厂。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集中全国各地的兵工力量，制造了大量的火炮和炮弹。朱德同志曾针对当时生产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产品的质量，避免生产废品，我们还要把钱用于建设新的兵工厂。

1951年6月，受党中央委派，以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军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与苏方商谈援助我国军事工业建设等问题。在谈判期间，朱德同志曾亲自指示我们处理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使谈判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此后，在全国各地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新式兵工厂，使我国走上了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新台阶。

追忆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和成就，其中无不包含着朱德同志的关怀与支持，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朱总司令与机关生产

陈永清 贺生祥 谢邦选 李鉴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值他老人家诞辰一百五周年之际，回顾他对我们在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几件往事中的教诲，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深切缅怀。

“金字招牌”不许抹黑

1948年新中国将要诞生的前夕，党中央考虑到新中国建立后，将面临一个财政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因此，要求党中央机关必须继续发扬延安大生产时艰苦奋斗的作风，于同年7月成立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经济建设部”，邓沾同志任部长，对外称“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创业，先后在石家庄、北京、天津、大连、保定、沧县、西安等地创建了三十多个工厂企业，职工达二千二百四十八人，全年向国家纳税共合小米一百五十多万公斤。

1950年初，公司召开各业代表会议，朱总司令写了“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的题词，并同杨尚昆同志莅会指导。总司令还根据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勉励和告诫大家：你们是中央机关创办的企业，必须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不能搞机关比那一套，更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你们与中许多同志受党教育的时间较长，要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带头奉公守法，执行党的政策，照章纳税。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机关这个牌子很大，是个“金字招牌”，你们千万注意不要给这块“金字招牌”抹上黑点。总司令的告诫，使与会的同志思想震动很大。这是信任，这是警钟，更是对我们转到新中国经济建设战线上新兵的关怀。三十多年的变迁中，原公司的各企业单位虽然都移交给了有关地方，但遵照总司令的教导而形成的厂风，许多企业至今仍保持着。

纳税是向国家的贡献

为了供应党中央机关同志们吸烟和当时市场的需要，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石家庄分公司于1948年5月，筹办了新中国烟草公司，朱总司令曾三次到该厂视察。在第三次视察时，该厂负责人林峰向他老人家汇报了因盘纸、烟时价高，厂子近来赔了钱，继续办下去有困难时，朱总司令鼓励他们说：你们出的烟还不错嘛，中央开会部用你们厂的“海燕”烟招待，毛主席也抽“海燕”烟，还用它招待客人。接着便问：为什么办不下去？你们向国家缴了多少税，养活了多少人？当回答：职工有一百出头，每月缴纳两、三万元税。总司令笑了笑说：厂子直接养这么多人，又向国家缴这么多税，这就是你们的成绩和贡献。你们算过这个帐吗？我看还是坚决办下去，要从大局着想嘛。当提到能不能减点税时，总司令严肃他说：不少烟厂赚钱，你们赔钱，说明你们厂子还有许多潜力没有挖出来。你们是否可以派人到其它厂参观学习，改进你们的工作？纳税是你们向国家的贡献，我看不能减。把生产搞好，多缴点税是大家的光荣。总司令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顿时思想开朗，信心倍增。全厂职工对照学习先进烟厂的经验，找出差距，改善经营管理，使生产逐渐改观，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

“把这个仪器厂好好的办好”

1951年4月6日，朱总司令两次视察了北京新中国科学仪器厂。总司令平易近人，慈祥可亲的长者之风像春风一样温暖着各车间职工们的心。总司

令在技术室还询问了能否制造望远镜、光学、化学分析仪器等一系列问题。他还给大家讲了科学仪器的生产对军事、气象、工农业生产、科研和教学的重要意义，并题词“把这个仪器厂好好的办好”，来鼓励大家。当年新中国仪器厂的职工有四十多人，目前分别担任了各地仪器厂的厂长和中层干部。总司令的题词，至今仍闪耀在现隶属航天部的长城科学仪器厂大门右侧，鼓舞着职工们为不断发展新中国的仪器制造业而奋斗。

学会企业管理，准备进大城市

早在1947年4月，为了供应中央工委机关办公的需要，中直供给部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窑上村，办起了裕丰造纸厂，厂子规模不大，完全是手工操作，靠几匹部队退役牲畜拉碾子碎料作浆。原料是烂绳头，破旧纸。

1948年初的一天上午，总司令来厂参观。他边视察边询问生产情况，从筹备过程、生产程序、人员组成到产品的质量数量，问得十分具体。当汇报到原料短缺，影响生产发展时，总司令说：你们应发动群众想办法解决困难，在延安造纸用马兰草，这里没有马兰草，别的草可以试试，火碱缺也可以试验用别的东西代替。朱总司令临走时，还把一张纸方方正正地叠好，放在衣兜里带走。

朱总司令的视察和指示，对全厂职工鼓舞很大，不久，按照总司令的启示，试验成功了用麦秆、芦苇代替绳头破纸，用石灰等物代替火碱造纸。而且质量逐步提高。

以后总司令又来厂视察四次。每次来都帮助厂子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同志们说：“我们这个厂子是总司令亲自教我们办起来的。”在几次视察中，他老人家都强调了加强业务技术的培训和学习。他说：战士要学技术、干部要学业务，学会整套管理企业的本领，思想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准备进大城市，办大企业。

建国前后的四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不论从政治思想上还是生活实践上，都是一个大的转变。这几年朱总司令的言传身教像慈母和恩师一样，抚育我们逐渐地成长起来。最近，我们在征集原公司史料的过程中，各地的同志们都在畅叙总司令的教导。受大家的嘱托，我们写了这篇文章，以表达同志们对朱总司令的无限缅怀。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写于1986年12月，改于1991年9月

实事求是的典范

程子华

我和朱德同志相识已久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教诲，特别是他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思想、好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0年，我到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工作。那时，全国总社领导着供销、消费、手工业生产等多种合作组织，第一、二、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都是由全国总社主持召开的。其中，1953年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尤为重要。那时候，我们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把社会主义比喻为一只鸟，工业化是鸟的主体，农业和手工业是鸟的左翼，私营工商业是鸟的右翼。可见，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讨论如何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德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肯定了我国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实现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个体手工业经济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改造为集体所有制。”他还明确了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几种形式，以及改造的步骤和方法。这就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

今天，重温朱德同志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一些论述，使我倍感亲切。回顾对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走过的道路，我想起当年在朱德同志关怀指导下从事这项工作时所经历的学习、调查、研究和探索的过程。

我们根据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的指示，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关部分，学习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论合作制》等著作，联系我国手工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探讨。大家认为，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很重要，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手工业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经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使少数手工业者成为资本家，大多数手工业者沦为工业发展的牺牲品，受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榨取而穷困、破产，成为无产阶级，这是痛苦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帮助与扶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使手工业转化成为集体经济，逐步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成为国家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探寻对于手工业改造的形式和方法，全国合作总社在1951年组织了若干工作组，分赴潍坊、扬州、杭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总结经验，分析比较，终于摸索到了对手工业改造的三种组织形式，即：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生产小组是生产合作社的萌芽，是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它是由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委托加工、合同订货、推销产品的方式，把独立手工业者或家庭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这种小组，有的分散生产，只是到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领原料、交成品，内部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变；有的部分或全部集中生产，统一领原料交成品，小组内部实行分工协作和“按劳

取酬”的工资制，局部地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

供销生产合作社是由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同样的办法，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由于加工订货任务逐渐扩大，生产小组过多，为了减少业务联系单位，就在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之下成立供销生产合作社。它已不是单纯的贸易机构，而主要是组织生产，是生产小组的领导机构。它同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关系，由加工订货，逐步改变为独立经营。有的供销生产合作社长期保存下来，有的则逐步发展为全部生产过程的协作分工，转变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由手工业劳动者自愿联合起来，凑集股金，租借或购置生产工具，实行集体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生产资料全部为集体所有，实行民主管理，是手工业合作化的高级形式。

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般要经过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有条件的也可以不经过这样逐步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是朱德同志所讲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大力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

当时，对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形式，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主张用公私合营的办法改造手工业；苏联专家则主张只搞生产合作社，不搞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三种组织形式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提高手工业劳动者的觉悟，他们是容易接受的，我们就向少奇同志，朱德同志作了汇报，他们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同意我们的看法，并由少奇同志将汇报提纲送交毛主席，主席很快就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肯定了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种组织形式；这是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所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三种组织形式，得到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实践证明，引导组织手工业劳动者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从而焕发了我国手工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为手工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实现生产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引导组织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告诫我们，要注意掌握政策。他说，要把手工业的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师徒关系区别开来。有的人雇佣个别助手和学徒，自己担负主要的技术劳动，他还是小生产者，不是资本家。所有的小业主和雇工、学徒、都应该团结生产，改善关系。那么，小手工业者能不能入社呢？他说，只要他放弃剥削，本人有技术，而又愿意参加劳动。服从领导，是可以让他入社的。这些指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发展手工业生产是有利的。我们根据实际需要和上述指导思想，确立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当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要防止盲目冒进。当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了过高的标准，有的不适当地强调集中生产，有的盲目地将小社合并为大社，有的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他说，这样做，脱离了实际情况，违反了自愿原则，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反而影响合作社的发展。朱德同志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苗头讲的，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敲了警钟。但总的来说，那时候还比较谨慎，没有出大的问题。可是，后来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就出现了合并过多、急于过渡的情况，以致带来一些问题。本来手工业布点分散、经营灵活、

服务周到，适合群众的要求；而合并过多、急于过渡，强调集中生产，就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的多种需要。这里也有个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个认识问题，主要是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认识不足，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认识不足。看来强调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啊！

在和朱德同志长期的接触中，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他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的领导人，德高望重，敦厚慈祥，平易近人。在我们心目中，他始终是个普通劳动者，没有半点架子。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束，可以畅所欲言。他讲话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他常常用形象朴实的语言，表述深邃的含意，给人诚挚的教诲。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光明磊落，令人钦敬。他那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重温朱德同志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论述，是为了学习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与其说这些论述是对手工业讲的，不如说是他对整个经济工作的看法。他在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正体现了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不光是听取汇报，还经常到各地视察，亲自看看，深入群众，访问了解。他善于倾听和分析各方面的意见，而且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知道，我国手工业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是不断发展壮大了。当初的手工业已有不少实现了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逐步跨入了现代工业的行列，成为现在的二轻工业，成为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的主力军，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我们重温朱德同志的有关论述，对于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3年8月

新中国手工业建设的倡导者

白如冰

每当我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后手工业发展的历程时，便自然而然地想起朱德同志。我作为新中国手工业建设的具体组织者和参与者，亲身经历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此间，曾经多次得到朱德同志的页聆，深受启发。今天重温朱德同志的教诲，依然令人感到振奋，获益匪浅。

195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在全中国手工业系统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本手工业者，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和平改造，而对大量的、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则主要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根据党中央制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积极稳妥地对全国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在实践中亲身感受到合作化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合作化的行列中。到1956年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个体手工业者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合作社的产值占了手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手工业生产大幅度上升，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产，方便了城乡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时，也加强了与大工业之间的合作，为大工业进行配件、修理和小型机械制造，弥补了大工业的不足，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在外贸出口和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使我感受至深的是朱德同志对手工业建设的关心与具体指导，我们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请他参加，每请必到，他总是很爽快地答应我们提出的要求，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1954年秋，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把我从西北局调到北京，担任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不久，又成立了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全国手工业系统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年12月8日，全国第四次手工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我们请朱德、陈云同志到会讲话，他们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朱德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国家帮助手工业，目的是为了广大手工业者克服困难，积极走合作化的道路，积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要把合作社的各种事情办好，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要搞“三光政策”，要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使社员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想退社单干。同时，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把手工业合作社办好。

当时，全国已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化组织四万多个，比1953年增加了八倍多。由于进展较快，准备不足，工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朱德同志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合作社开始组织起来，不要要求过高，要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地把合作社办好。陈云同志也到会讲话，指出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搞得太快了，否则会出毛病。

从1955年下半年起，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时期，改造的步伐急剧加快了。至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已占全部手工业者的百分之九十二，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从整体上来讲，实现这一如此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确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当然，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思想倾向，在一些适宜分散生产的行业中也出现了大集中、大合并的现象。朱德同志曾及时地指出：组织手工业合作社，要求不要太急，集中不要过大，合并不要过多，统的不要过死。不要轻易合并厂、店，不能把所有小厂、小店全都合并起来。1957年12月，他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也指出：“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固定下来，除了极端必要并且经过省（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个别情况以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否则，就会影响到手工业合作社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朱德同志的这些指示，对纠正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并使之健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作的四年间（1958年6月调往山东省工作），和朱德同志多有接触，每次见面，他都要详细询问手工业的工作情况，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意见，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也愿意向他请示，他总是尽力帮助我们想方设法排忧解难。当时在总社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叶夫谢耶夫曾对我说：“你们真幸福，朱总司令对手工业如此关心，你们的工作一定能够搞好。”

1954年11月，组建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时，我去向朱德同志请示如何搞法，并且反映了有的同志对手工业的作用认识不足和工业原料缺乏的问题。朱德同志听完我的汇报，语气平和地鼓励我要树立起信心，把手工业工作做好。他说，要把广大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这样才会有力量，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发展生产，更好的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服务。至于说有人看不起手工业，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所生产的东西与群众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即使是实现工业、农业机械化以后，手工业还是不能缺少的。宣传部门也要配合工作，大力宣传手工业的重要性。他还说，党中央对手工业是很重视的，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广大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发挥手工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谈到如何解决原料不足的问题时，朱德同志笑着对我说：“如冰同志，我们眼前到处都是原料啊！”开始，我还有些疑惑不解。他又说：“国家现在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不可能把工业原料的供应都包下来。你们要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组织人力把社会上别人看不起的破铜烂铁收集起来，变废为宝。这样既便宜，又没人和你们争抢。”后来，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的意见组织收集废品，仅此一项就为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

1956年5月15日下午，朱德同志把我找去谈话，了解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这时，正是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阶段，许久没有见到朱德同志，我也很想向他汇报合作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先向朱德同志汇报了手工业合作社的状况，朱德同志说：“组织合作社要注意保持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凡是不宜集中生产的，不要勉强集中。搞大的合作社一定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否则，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垮台的。”

“有的地方组织合作社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结果集中起来后，没有厂房，只好在露天生产，致使生产下降。”我继续说道。

“这种盲目集中的现象必须立即制止！”他挥着手说，接着又问我：“这种现象是否引起各地党委的重视？”

“重视的不够，有的同志认为管理合作社是合作总社的事，他们只看重

地方工业，而不重视合作社。”

“这种想法是不适宜的，手工业合作社与地方工业同样是重要的。一定要让各地党的负责同志亲自抓。”

随后，我又谈到，目前手工业合作社在原料供应、产品推销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困难，因此，就提出了是否取消合作总社的问题。苏联已经取消手工业合作总社，我们也准备这样做。

朱德同志说：“解决原料、销路不一定都由总社包起来，可以改由合作社去找。但是，总社还是应该要的。至于苏联取消了总社，他们有自己的情况，我们不能什么都仿效人家的，这是教条主义。目前我们不是要取消这些机构，而是应该加强这些机构。”

最后，朱德同志又问我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他握着我的手说，搞手工业产品不要怕没有销路，而是怕产品质量、花色品种搞不好，你们可以搞各式各样的食品，既可以解决国内需要，也可以出口换外汇嘛！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看来，朱德同志当年的谈话仍能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他那种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国手工业的基本特点是历史悠久、行业繁多、品种纷杂、分布面广，具有独特的民族技艺传统。特别是工艺美术品，构思奇妙，工艺精细，深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

我在主持手工业工作期间，朱德同志多次和我谈到要继承、弘扬我国手工业的优良传统的问题。他指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手工业生产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的优良传统。例如工艺美术行业，制作出许多巧夺天工的工艺品，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务必要保护和发扬，防止人亡艺绝。

记得在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致使部分手工业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朱德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提醒我们，合作化不是要搞掉传统的手工业产品，而是为了更有利于它的发展。手工业产品不能减少，还要保证质量，特别要注意保留具有优良传统的服务态度和销路广、名气大的名牌产品，例如王麻子、张小泉的剪刀等。

1957年7月，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海团城举办了全国工艺美术品展览，朱德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其中有一件牙雕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这是北京老艺人杨士惠等七人在一根一百三十斤重的象牙上刻下的以北海公园为背景，首都人民欢庆宪法公布的盛大场面。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对这样的老艺人，一定要好好爱护，他们经验丰富、技艺高超，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大部年事已高，亟待培养接班人。所以，要注意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创造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接班人，师傅要爱徒弟，徒弟也要尊敬师傅，形成尊师爱能的新风尚。

这年八月的一天，我和邓洁同志来到中南海朱德同志家中看望他时，他详细地向我们询问了手工业生产的情况。在我的印象中，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要扩大手工业产品的生产，特别是特种工艺品的生产，花色品种也要丰富多采，这些产品是出口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是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括香港的产品，你们都可以买些样品，开阔眼界，改进我们的产品，争取使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多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第三是要发展手工业产品，仅仅依靠

老艺人还不够，要培养大批的新生力量，为了使传统技艺发扬光大，还要克服过去那种手艺“只传男不传女、只传长不传幼”的封建意识。对艺人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仅能传女、传幼，还能传给外姓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手工业的发展。

朱德同志的意见，对于指导和推动手工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在工作中，我们对传统名牌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品，采取了“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一系列挖掘、恢复和提高的具体措施。例如，提高老艺人及年轻工艺美术工作者的生活待遇，为他们提供重新学习的机会；大力培养新艺人，实行包教保学，允许师傅自己选择徒弟，也可以培养自己的子女；加强工艺美术的设计工作，改进产品的花色品种，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需要，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等等。由于我们贯彻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受到广大老艺人和科技人员的拥护和支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许多老艺人把自己的绝技奉献出来，传授给年轻人，“尊师爱徒”的新风尚在手工业行业迅速传播开来，使我国手工业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弘扬。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手工业生产的速度、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践证明，这种变化，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才能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当我们看到今天手工业战线出现的可喜局面时，也不会忘却朱德同志为之倾注的大量心血，朱德同志的亲切关怀与教诲，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

1991年8月

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王从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且决定朱德同志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同志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后，提出建立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党性坚强，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相当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到纪委工作。朱德同志自己以身作则，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带领大家认真负责地做好纪律检查工作。在全国解放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犯党纪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许多重大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朱德同志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一直是认真严肃的。在我们党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现在认真整顿党风，严明党纪，以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认真贯彻执行的时候，我重温了朱德同志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两次讲话，受到了很深的教益。时间虽然过去了二、三十年，但这两次讲话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德同志在 1950 年 5 月的一次讲话（见 1979 年 7 月 4 日《人民日报》）中，首先讲到要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来“保证党的路线、政策能够顺利执行”，“更好地克服一切破坏党的路线、政策的行为或倾向”。他要求“每个参加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经常地检查了解，在党的组织中、党员有没有违犯党的政治路线，违犯党章，党纪、党的决议，有无违犯国家法律、法令及政策，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和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朱德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极其重要的。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能否顺利贯彻执行，是关系党、国家、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因此，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正确贯彻执行，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头等重要的任务。正如朱德同志所说：“这一工作作好了，我们就能起了保证作用，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等等都能正确执行，就能成为在贯彻政策、实行决议方面的有力助手。”如果这项任务完成得不好，其他方面即使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不能说是完成了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是正确的，但在贯彻执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少数地区、部门和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贯彻执行起来就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特别是那些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他们是党的隐患、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他们用种种办法来抵制、反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绝不能麻痹，否则就会使党的事业遭受灾难。各级纪委发现后，必须及时向上级反映，认真解决。

朱德同志在同一次讲话中，严肃地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他讲到：“有些党员、干部，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痛苦，不了解共产党员的重大任务是要随时随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同志对工作疲塌松懈，得过且过，逐渐失去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们“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不负责任或不大负责任的态度”。朱德同志指

出，对这种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罪恶行为。凡是有这种态度有这种作风的同志，如果不痛加改正，将不能取得党、国家和人民的原谅”。由于官僚主义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它随时都可以找到赖以掌生的土壤。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破坏，使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更艰巨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有的同志不调查新情况，不研究新问题，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对上级指示只知照抄照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执行，有的对业务知识不学习，安于当外行，不尊重科学，不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搞瞎指挥，有的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搞特殊化，不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对坏人坏事不坚决斗争，听之任之，对人民疾苦熟视无睹；有的公文旅行，只划圈不拍板，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效率很低，贻误工作。如不克服官僚主义，我们的党就会严重脱离群众。

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首先是进行教育，使他改正。但是，对那些由于严重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纪律检查部门必须认真检查，不管问题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都应该查明情况，选择典型，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这是纪律检查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5年5月，在有董必武、刘澜涛、钱瑛等老同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朱德同志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殷切地希望今后“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

他曾对某些以功臣自居，特权思想严重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他严肃地警告这些同志：“我想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你们就会在革命队伍中掉下队来，失去了和革命同伴继续前进的机会。”他还批评：“有些人没有认识到纪律的重要。认为党的纪律只是给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更有些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政府算什么，管不着我这个老党员：法律也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我可以不遵守。所有这些，都是剥削者的思想和行为。而这些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却是一种耻辱！”在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严重破坏的今天，重温朱德同志这一教诲，使我们倍感亲切。

大家知道，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各级主要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受了党和人民的委托，担负着重要职责，对党、国家、人民的事业的兴亡成败，关系重大。因此，干部的职位越高，党和人民对他的要求和监督就越要严格。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纠正和防止某些高级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殊化，曾发布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五中全会后，又公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印发了准备提交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全面的严格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以此为镜子，经常对照检查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事事能当表率，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执行。同时，各级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定期检查，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这样，少数领导干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纪律废弛的现象是能够克服的，党风是能够逐步搞好的。

朱德同志在1955年的讲话中，还提出了“检查和处理案件时要本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要认真负责、严肃处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关

怀同志的政治生命，防止错误的处分；既要反对照顾情面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也要反对滥用职权和粗枝大叶的作风。”朱德同志的意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检查处理案件时，一定要坚持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所谓严肃，按朱德同志的话来说，主要是“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只要他违犯了政策，违犯了纪律，我们就去检举他，纠正他。”所谓慎重，就是不要“轻易地提出和处理别人的问题，提出和处理别人的问题时，一定要有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是按照这个方针去做的，平时检查处理的大量案件，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在运动中处理的案件，错误就不少。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受了“左”的思想的影响，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或者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定性偏高；一是粗枝大叶，没有机作为处理根据的事实认真弄清楚，做到准确无误。这两点，都滚背了严肃慎重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引为教训。今后我们检查处理任何案件，都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按严肃与慎重相结合的方针办事，做到弄清事实，定性准确，手续完备，处理恰当。

朱德同志在1955年的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对各级监委专职干部的理论教育、政策教育、业务教育的工作，以便有效地提高他们在履行职责任务时的工作水平。”朱德同志的这一意见，固然是对我们纪律检查工作干部的关怀，但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出了认真学习任务。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每一个纪律检查工作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在学习中，要刻苦钻研，善于联系实际，接受别人的经验和总结自己的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随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当前，我们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党要完成四化建设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健全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严肃党纪，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为此，我们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当好党的助手，负责检查监督，以保证《准则》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我们要同败坏党风和违犯党纪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和广大党员与人民的期望，不辜负朱德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期望。

1980年7月

朱德总司令与国防现代化

张爱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朱德同志对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就富有远见卓识，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

国防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武力保障。在两霸争雄，战争不绝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要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能没有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国防现代化，包括了广泛的内容，如先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精良的武器装备，高质量的教育训练，科学的编制体制和兵员动员制度，完善的军事设施、战场建设和人防工程，良好的后勤供应和充裕的物资储备，规模可观的国防科研、军工生产体系等等。朱德同志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深刻的论述和鲜明的主张，其中讲得最多的是作为国防现代化主体和核心的军队现代化。我们认真学习朱德同志建国初期的建军理论和实践，对于推进今天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现代战争是前后方浑然一体的立体战争，是诸军兵种一致行动的联合作战。因此，军队现代化，从编制体制上来说，首先要改变单一步兵、单一陆军的情况，建立和发展诸军兵种及技术分队，向“合成”方向发展。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及太平洋战场上已形成规模。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我军也有了初步的体验；1955年，我军在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中，组织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有了首次实践。毫无疑问，军队合成的程度，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总体能力，已成为衡量一支军队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建国之前，我们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也没有独立的技术兵种。我军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完成现代化的建军任务，就要尽快组建新的军兵种，为“合成”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朱德同志多次指出，现在的作战对象不同于国内战争时期的敌人，它有高度的现代化装备，有根完善的诸军兵种。我们应针对它们的编制和战术来研究出有效的对策。他及时地向全军提出了总结经验，整顿编制，学会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新任务。为了尽快使我军编制和战斗编成达到合成化，朱德同志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先后从陆军中抽调大批骨干充实到这些部队，以欣喜的心情看待这些具有强大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新军兵种的诞生。他在各军兵种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中，一再指出这是把我军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历史性变革，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大事。在此后的年月里，朱德同志在政务繁忙的情况下，仍一直关心着各军兵种的建设和部队合成作战能力的提高。他还经常深入海边防视察，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和院校，对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

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对于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国防现代化是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体现。武器装备愈是精密，涉及到的新知识、新技术就愈广泛，对于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人的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要求就愈高。近年来，外军学术界流传的军队战斗力的所有部分都是科学知识的体现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初期部队成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很低的，文盲和半文盲数量很大。文韬武略兼备的朱德同志，高瞻远瞩，清楚地看到科学文化将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便及时地领导全军向科学文化进军。他告诫大家，搞军队现代化，指战员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行的。不要以为现代化武器一装备部队，部队

就现代化了，人和武器就自然结合了。用先进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先进武器，要靠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去掌握。只有通过学习和训练，从根本上掌握和驾驭新技术；新战术以后，才有可能成为现代化武器的真正主人。否则，对新科学、新技术一窍不通，对新式武器的原理、性能一无所知，有了先进武器装备也不能发挥威力，不能形成战斗力。他总是谆谆教导广大干部战士把提高科学文化素养作为加强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带根本性的大事来对待，强调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学习上来。朱德同志对部队在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取得的每一成绩，都表示由衷的高兴，及时予以鼓励；对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更是倍加器重，把他们看作是建设现代化国防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指挥员，对于实现军队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指挥员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现代化的水平。朱德同志对这一带战略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没有一支政治觉悟高，军事素质好，专业能力强的干部队伍，军队现代化是“化”不起来的。他要求各部队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强对各级指挥员的培养。1954年3月，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了以朱德同志为主席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对学员进行考核。朱德同志在对学员的讲话中着重指出：如果没有一大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是不可能的。他对办好各级各类院校予以特别的重视，要求各院校应明确认识自己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所担负的培养干部的重大责任。朱德同志为了督促广大干部尽快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和指挥艺术，变外行为内行，在《技术在装甲兵建设中的决定作用》一文中，把这个问题提到很高的位置，指出：大家要以党性保证，全心全意钻技术，达到专业化。他的这些主张和论述，对于加强我军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在现代战争中，一个人员的失误，一个环节的梗阻，都有可能致全局的溃败。因此，要在现代条件下完成作战任务，没有周密组织的各种兵力兵器的协同动作是不行的。而严格的、科学的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则是达成协同动作，提高部队现代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由于环境所迫，条件所限，训练只能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进行，没有统一的训练计划和教学大纲。这种练兵方法，虽然曾起过极大作用，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已不能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为了迅速把我军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技能提高到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水平，朱德同志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部队进行现代化、正规化训练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在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和作战对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有大量军事技术、战斗器材和各类人员参加的现代战争中，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突击式的简单的战场练兵方法，丢弃过去长期处于农村环境而造成的游击主义、分散主义等一些带副作用的东西，实行现代化、正规化的统一训练计划，达到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使部队掌握复杂的武器技术，使各级指挥员精通现代的指挥艺术，善于组织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朱德同志号召全军各级首长都要认清形势，明确意义，亲自动手抓正规化训练，要求每个首长都能当教育参谋，会训练部属。他本人作为全军的总司令，更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亲自抓了1952年陆军训练大纲的落实。

朱德同志是善于把革命精神与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楷模。在经济建设上，不赞成闭关锁国；在军队建设上，不主张固步自封。50年代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很低，军队的技术装备有限，部队成员绝大多数又是来自农民，再加上刚刚取得全国性胜利，干部战士很容易产生墨守陈规、因循守旧的思想，迷信自己的传统。朱德同志敏锐地洞察了这一实际，及时教育部队排除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思想障碍。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高度的政治素养、军事素养，总结以往作战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虚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学术、国防科技和治军方法，开阔自己的视野。同时，他还以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全军同志在学习外国的时候，要紧密结合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选择有创造的学习方法，不机械照搬，不盲目崇拜，不依赖别国，把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与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闯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军情的现代化国防之路。他号召大家，要把所学的军事科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化国防建设、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斗争中去，直到战胜敢于来犯的敌人，以完成我军光荣的历史任务。不能否认，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各种大规模杀伤和破坏性武器大量涌现的当代，我们一定要加快研制和装备先进武器的速度。我们拥有一定战略核力量，既有对付敌人核袭击的还手之力，又可滞制、反对核战争。但是，我军过去的经验和现代局部战争的经验都证明，不管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质量差别有多大，都抵销不了战争的正义性，团结一致，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富有牺牲精神的部队所拥有的强大力量的优势。在朱德同志的军事著作中，贯穿着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的思想。早在1938年，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就曾指出，我们的武器虽则落后，但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只要从政治、精神、战术技术等各方面提高部队素质，就能够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朱德同志在建国初期的军事著作中，对提高部队素质也作过许多重要论述。例如，他强调军队要坚决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指挥；强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个人主义；强调坚强英勇，临难不苟，不怕劳苦，不怕牺牲，把革命英雄主义发扬光大；强调力戒骄傲自满情绪，保持谦虚谨慎的美德，不断增进军内外团结；强调提高革命警惕，丝毫不松懈战斗意志；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部队训练，严格要求；强调勇敢加技术、勇敢加战术等等。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从总体上提高部队战斗力，都是仍然必须遵循的原则。

朱德同志认为，科学是永远向前发展的，国防现代化也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你赶人家，人家也在进步，稍慢一步就赶不上了，一定要急起直追，一刻也不能松懈。朱德同志的这一思想，是极其光辉的。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支军队是否现代化了，不能只用自己的今天同自己的昨天相比，更重要的是要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在国际上把大量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当代，如果闭目塞听，抱残守缺，固守过时的概念，如果不及时研究和解决军队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将导致不可设想的严重的后果。我们学习朱德同志的建军理论和实践，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他大力提倡的“和社会一道前进”的进取精神，全面研究、随时掌握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加速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增强训练和战备的科学性、计划性、预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集中全军同志的智慧和力量，为建设一支无敌于天下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1983年8月

不尽的思念

江渭清

在我党、我军的老一辈领导人中，我很敬佩朱德同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令人尊崇的长者。他那淳厚朴实的性格，求真、求实的工作作风，在我的脑际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我曾多次亲聆他的教诲，受到启发和教育，至今难以忘怀。

还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即 1948 年，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正在河南濮阳一带进行整训。当时，我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是王必成同志。

这年 5 月，朱德同志专程赶到濮阳，代表党中央对部队的整训工作做了重要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我记得，他在指示中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加强军政纪律的问题。今天看来，这三个问题仍然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德同志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指出，要把部队训练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只有使指战员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才能在作战中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才能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才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才能加强团结、协同作战。政治觉悟越高，战斗力越强，就越能自觉的为人民利益，不惜流血牺牲，为解放全中国奋斗到底；政治觉悟越高，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就越好，加强和巩固各方面的团结，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保证。

接着，朱德同志强调指出，要努力地、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军的优势。尽管我军在作战规模、战斗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武器装备上，仍然与敌人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敌人的武器装备在质量、数量上特别在重武器上仍是超过我军的数倍。因此，在运动中捕抓战机，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野战军指挥员应当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朱德同志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军政纪律。他强调部队要有严明的纪律，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服从命令听指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各个部队在作战中协同配合，取得战斗的胜利。同时，严明的纪律又是和高度的政治觉悟相联系的，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是依靠人民进行的战争。所以，我们说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回到人民中间，服务于人民，就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在整训过程中，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进行的莱芜战役、济南战役，以及淮海战役中，我们三个纵队作为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遵照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经过审慎、周密的计划，不打则已，一打必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诸多战役的胜利，是与朱德同志的重要指示分不开的。

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进入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朱德同志尽管年事已高，却仍然对经济建设十分关心。他曾多次来到江苏省，我作为江苏省委的负责人，多次陪同他视察工作，听到他的指示和建议，深受启发。

朱德同志很重视江苏省的水利建设。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苏省地处各省河流的下游，因此，在兴修水利上必须考虑到既能抗旱又能排涝，还要排、灌分开，各行其道。特别是在苏北地区，解决排灌问题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关键问题。朱德同志听取汇报之后，指示我们要大力发展水利，以自流灌溉、提水灌溉、水灌并举、三管齐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水源问题。据此，我们在苏北地区盐城至南通一段，每年冬闲投入大量劳动力，兴建和疏浚了五条河（南北向二条，东西向三条），同时采用三级提水的方法，把长江水源引入扬州，淮阴、徐州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南水北调的设想，使扬、徐、淮、盐地区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同时，我们在水利建设中坚持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的大型的方针，发展各种水利设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的水利建设也引起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与重视。当时，毛泽东同志得知我们进行水利建设的情况后，还要安徽、湖北的负责同志来江苏参观学习。

朱德同志在江苏视察时，尤为关注出口贸易工作。他对江苏出产的纺织品（包括丝、麻、毛、棉纺）、薄荷油、香料、禽蛋、手工艺品等很感兴趣。他认为，出口贸易的大门是关不住的，应当大力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多创外汇，支援国家建设。他建议我们在建造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时，不要盲目追求大而全，可以根据出口商品的生产特点，多搞一些小厂，这样变化灵活，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当我们谈到外贸体制存在一些问题，束缚了出口贸易发展的问题时，朱德同志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并且详细询问了许多与之有关的问题。时隔二十多年，我看到当年朱德同志视察江苏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针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向中央建议：江苏省发展出口贸易的潜力很大，物产丰富，运输便利。因此，发展出口贸易，应多下放外贸管理职权，内销、外贸一体化，并且统一核算手续。拜读之后，深有感触，朱德同志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朱德同志在视察中还特别告诫我们，发展工农业生产，要注意积累资金，不要吃光、分光，要多投入，扩大再生产。同时，他还对江苏省的工业、农业、纺织业生产，以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推动了我们的工作。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怀念不已。

更使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德同志的交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作为江苏省“最大的走资派”，同样遭到难以避免的厄运，被关押、批斗。1967年2月，在周恩来同志的具体安排下，我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时和我一起住进京西宾馆的还有湖北的张体学同志、浙江的江华同志和广西的韦国清同志。我到北京后，听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朱德同志。接电话的是康克清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之后，我来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谈谈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

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搞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

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

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够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

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德同志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

“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

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

朱德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

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然而，朱德同志当年对我的勉励和关心。却始终在我的记忆中难以泯灭。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每当想起朱德同志的话，周身热血沸腾，希冀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做一点事情，也算是报答朱德同志对我的期望吧。

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一百零五周年，难免又激起我的怀念之情，写就这篇文章，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一片情思。

1991年7月

深切的怀念

谭启龙

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与世长辞，至今已经十五年了，但他的青容笑貌和亲切教诲却时常索回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听到朱德同志的名字，是1928年在我的家乡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的永新县。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朱德同志与毛泽东同志被人们称为“朱毛”，他们领导的队伍被称为“朱毛红军”。我就是在“朱毛红军”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跟随“朱毛红军”打上豪，分田地，为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而故斗。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里，我虽然在湘赣省和中央苏区工作过，有时离朱德同志的驻地很近，远远望见他打篮球，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见面。直到1948年5月，我参加革命二十年以后，才有幸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集中濠阳整训，为即将到来的同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作准备，那时我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朱德同志在陈毅、粟裕同志的陪同下到达濠阳，向我们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并决定组建渡江先遣纵队，为大军渡江南下作战创造条件。朱德同志在濠阳先后召开了第一、四、六纵队团以上干部大会和战士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慰问广大指战员，并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学习战术，研究敌情，更多地消灭敌人。朱德同志作报告时谈笑风生，幽默生动，深入浅出，很有针对性；他衣着朴实，和战士穿同样的衣服，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丝毫没有总司令的架子，他的言行给人们留下了既是伟人又是凡人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地方工作。朱德同志多次到我工作的地方调查研究，视察指导工作，我陪同他参观过浙江、山东的一些工厂、矿山、农村和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他都认真听取汇报，不断提出问题，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指导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从中受到很多教益。

朱德同志善于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对各级干部进行思想教育。1966年1月他到山东视察工作，我们向他汇报南稻北栽，在涝洼盐碱地里种水稻取得成功时，他很高兴，指示我们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抓住事物的规律。并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毛主席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他还强调，革命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跟不上也不行。当我们汇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情况时，朱德同志说，两条道路在干部、群众中一定要搞清楚，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人们都没看见，不把社会主义搞出个样子，大家还是不明确。生产搞好了，人也摆平了，生活也改善了，弄虚作假没有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就有信心了，他还说，社会主义是一定能够胜利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共一百多年的时间，地球就大变了嘛。朱德同志的这些话，言简意深，对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指导当时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现在，虽然已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坚定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朱德同志一贯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48年濠阳整训时，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亲临

濮阳作报告，针对部队中政治工作有所削弱，出现了军阀主义残余和违反纪律的现象，着重讲了政策与纪律和军队的建设问题。他说，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要提倡革命英雄主义，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反对军阀命令主义。过去那些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倾向都要去掉。部队要既会打仗，又会执行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违反政策纪律的问题，必须认真追究。这样，我们才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我们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认真整顿军队纪律，纠正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的政治军事建设，使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战斗力大大增强。1962年12月，朱德同志到山东视察工作，当听到省委汇报有的农村干部贪污浪费时指出，贪污是犯法的，要惩办几个人，以教育广大农村干部。无法无天的事，不少出在党内，监察委员会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教育好党内的干部。他的这些话，表明了当时我们党反贪污腐败的态度和决心，也说明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党风党纪建设问题。今天，我们对此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朱德同志一贯重视工业和外贸工作，对手工业和外贸工作尤其重视。我在浙江、山东工作期间，多次听他谈到要恢复发展手工业的问题。他说，中国人多，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小生产还不能取消。1950年6月，当他看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的《关于浙江省肖山县发生破坏手工业生产的严重事件的通报》（即把反封建地主的斗争方式用之于手工业者，并搬用了征收农业税的办法）后，代中央起草转发了这一通报和对手工业政策的指示：“肖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对不允许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各种手工业，如造纸、榨油、纺织、轧花缫丝等，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并大大地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指示，对澄清当时人们的模糊认识，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1966年1月，朱德同志到山东视察工作，我们汇报农村副业生产情况以后，他说，桑蚕、柞蚕、蓖麻蚕，山东有较好的基础，可以大搞一下，发展对外出口，换取更多的外汇。还可以充分利用我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生产物美价廉的东西，同发展中国家搞贸易，加强双边往来。外贸可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东西多了怎么办？可以做成罐头，晒成干菜，销到世界各国去。只要销路找到了，东西就不怕多。朱德同志对石油工业也很重视。在这次视察中，他听我们汇报山东已发现并开采出大油田时，他很高兴，不顾年已八十高龄，冒着凛烈的寒风，到位于山东北部广饶县的九二三厂（即现在的胜利油田）矿区视察，并驱车到荒郊野外参观了日产千吨油的高产油井。他听了矿区领导的工作汇报后，赞成为建设矿区提出的“大庆加大寨”精神的口号，要求省里帮助把九二三厂建成一个工农结合，亦工亦农，半工半读的新型矿区。要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朱德同志的这些意见，对山东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德同志德高望重，平易近人，既是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对同志关怀体贴，是可敬可爱的长者。1951年，他到杭州休养，只带几个随行人员，住在南山。早晨，他同常人一样，到附近的凤凰山散步，观看小街上丰盛的

各式小吃和手工业产品，向群众问这问那，亲切交谈。当时，随朱德同志一起到杭州的，有一位苏联保健大夫。朱德同志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叫这位保健大夫给我和我爱人严永洁等同志仔细地检查了身体。还有一次，朱德同志坐火车路过济南，我到火车上去看他，他把从南方带来的他很喜欢建兰送给我两盆。1966年1月，我陪同朱德同志到九二三厂视察，他看到九二三厂取得很大成绩，挥笔写下了一首长诗，歌颂社会主义制度（1988年，我到胜利油田时，还找过这首诗，当时没找到）。随后，他又给我亲笔写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题词，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1977年，我到青海工作后，得知朱德同志曾到青海视察过工作，他针对当时有些同志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情况，说“青海是祖国最可爱的地方”，我遵照他的教导，多次到各地调查，感到青海确实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确是“最可爱的地方”。因此，便向中央提出了开发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80年，我到四川工作后，在四川仪陇朱德同志的故乡主持修建了朱德故居纪念馆，并为纪念馆植树两棵，还将朱德同志给我的题词复制一件赠送纪念馆陈列，以表达我对朱德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朱德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设社会主义，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他的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怀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朱德同志，就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学习朱德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革命原则，平易近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发扬革命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朱德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91年8月

留给后人的绿色丰碑

雍文涛 刘广运

朱总司令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他生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关心林业，重视林业，为发展林业对我们的谆谆教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我们回忆往昔，重温朱总对林业发展的许多重要指示，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也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项产业，又是社会公益事业，兼有经济、生态、社会三种效益。发达的林业，是同家富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朱总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和关心我国的林业开发和建设，曾多次视察林业，深入调查研究，作出重要指示，为我国的林业生产建设指明了方向。1958年，他亲临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普遍开展植树造林运动，认真抓好木材生产，严格管理木材分配，搞好木材节约代用。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木材的综合利用。1957年和1958年，他先后两次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林业馆，并亲笔题词。1964年，在他七十八岁高龄的时候。还不辞辛苦，和董必武同志一起到河北、内蒙古和东北三省巡视林业工作，深入到林区的林场、苗圃和采伐现场，历时四十五天，行程四千多公里，调查了解采伐运输、更新造林、木材加工和综合利用、木浆造纸、森林资源保护、林业职工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朱总对林业的重要指示，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涉及林业生产建设的许多方面。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依靠群众造林绿化、采育结合、加强集约经营、充分利用资源、多林种造林、农林牧结合全面发展等关系林业建设的重大问题上。

造林是林业的基础。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努力增加森林资源，是一切林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朱总针对我国森林资源少、荒山荒地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特别强调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早在1957年，他在视察云南后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就云南和长江以南几省说来，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木材生长比北方快得多，许多树木十年即可成材使用，只要我们注意到发动广大群众大规模地植树造林，木材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同年在参观林业馆时说：“五亿人口就有五亿双手，只要依靠群众，那么什么事情都能搞得起来，不要净知道花钱而不依靠地方党政和群众”。朱总积极主张多林种、多树种结合，协调发展，多次谈到：“要使长期林、短期林、经济林相互结合……既要种松杉，也要种杨柳，同时还要种桃、李、桑、茶等”，“这种长期、短期结合，用材林和经济林结合，对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群众也是十分欢迎的。”在1958年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朱总更高瞻远瞩、高度概括地明确指出：“要继续搞好造林运动，凡山荒及‘四旁’（即村旁、宅旁、路旁、水旁。——作者）尚未造林的地方，今后应该‘普遍造林’……中国之大，九百多万平方公里，要根据当地气候和各种条件，因地制宜地想想办法，把林子造起来，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木材用不完、瓜果吃不完、桑茶采不完的环境优美的大花园”。

朱总关心造林，不仅着眼在它的经济意义上，而且着眼在改善生态环境和政治意义上。在他重视首都的造林绿化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53年的

大年初三（2月16日），他在当时的林业部部长梁希的陪同下，冒着严寒视察了北京西山。在详细听取了有关西山的绿化工作汇报后指出：“西山绿化的政治意义重大。此事，应由华北、北京主管部门作为重要任务之一，颁发决定，制定计划，提前完成。”他还满怀期望地嘱咐梁希部长：“请赶快绿化西山，在我有生之年，还要看到西山的绿化呢！”至今想起，声犹在耳。

为落实朱总的指示，林业部和北京市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山绿化做了专题研究，并于当年6月成立了相应机构，进行调查规划，制定绿化计划。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55年6月正式开始了西山绿化工作。首都的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市民，群情激奋，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参加造林，并成为绿化西山的主力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到1957年底已全部完成初期造林计划任务，首都军民共投工六十多万个，克服重重困难，完成造林面积五点六万亩。整个造林过程，朱总一直十分关注，几次过问进度和质量。此后，首都军民继续在西山植树造林，到现在，已有林地八点五万公顷，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如今再去西山，已是一片林海、满目葱茏了，并逐渐成为首都西北部的生态屏障和重点风景区之一。抚今追昔，可以说，西山的造林绿化，为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造林绿化和生态环境改善都提供了宝贵经验，开拓了新的道路。不仅如此，西山绿化的成功，还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1959年9月，阿富汗副首相来华访问期间，在参观了西山绿化后大为赞赏。在与周总理会谈时，专门提到：此次来华访问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中国的针灸治好了他的病（阿富汗副首相患有手臂麻木症，活动不便，访华期间经中国医生针灸治疗后即痊愈。——作者），一是西山绿化令人瞩目。并恳切希望我国派出造林专家，帮助阿富汗首都进行绿化规划。周总理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责成林业部于1960年6月派出专家小组赴阿富汗，经过一个半月的考察，帮助其制定了绿化规划。

木材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资。木材供需矛盾尖锐，历来是我国国计民生中的突出问题。朱总早在1957年就指出：“将来的木材供应，主要是依靠现在新造的林，而不是依靠过去的老林。”他还说：“靠种上百年才能利用的树种是不行的。而是要在立地条件（即树木或林木周围密切联系、并能够为之利用的气候、土壤等条件的总和，在林学上称为立地。构成立地的各个因子称为立地条件。——作者）好的地区，营造几年、十几年就可以利用的速生丰产林”。他在1964年视察黑龙江省带岭林业局，看到落叶松人工速生林时非常满意，高兴地说：“更新（采伐过或者火烧过的林地上形成新一代森林的过程。——作者）和条件好的地区造林，都应该像这块丰产林一样，高质量、高标准地搞上去。这样，才能给将来的木材过关打下可靠的基础。”现在，我国的速生丰产林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初步实现基地化，开始走上集约经营的道路。

林业生产不同于其他生产。森林是可再生资源，林木生产周期长，要使木材和林副产品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就必须做到采伐和培育相结合，永续经营，合理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但我们当时基本上是集中大面积皆伐（将一定面积的成熟林同时全部伐除的作业方式。——作者），采完就搬家。朱总在1964年7月视察东北林区后，几次提出：要实行轮伐（即按照一定的采伐量，在同一块有林地上逐年进行循环采伐、更新的过程。——作者），采育结合，永续利用。7月13日在吉林省和龙林业局东沙沟林场察看采伐现场时，听到一片林子计划三年采完后就搬家，朱总说：“应该长期固定下来，

永续作业，不要采完就搬家。”当时与朱总一起视察的董老对东北林业总局的负责人讲：“朱总司令有一个想法，就是应该根据资源情况具体计算，实行轮伐作业，并搞些农副业，亦林亦农，子子孙孙长期干下去。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要在这方面开辟一条路出来。”关于采伐更新，7月15日在黑龙江省东京城林业局听取汇报后，朱总说：“更新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一定要高质量、高标准地跟上采伐，现在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条件都具备了，之所以没跟上，是思想认识和决心问题。要积极地跟上去”。

大力发展木材的综合利用和节约代用，是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缓解我国木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朱总对此十分关注，先后十多次谈到这一问题。1957年2月，当他在海南山区看到当地群众烧山垦荒，以致连山竭岭大火蔓延，成材林、灌木林一扫而光时，十分可惜地说：“不要再烧山了，应动员和组织群众有计划地采伐。还可以利用丛生的灌木林来烧炭、烧砖、烧瓦。”后来，他在内蒙古林区看到山上采伐“丢片子”现象（即林木在采伐运输后，在林地上丢弃木材的现象。——作者）严重，又一次严肃地说：“一切要按无产阶级的思想办事，按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方针办事，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规章制度不合实际情况、不合理，就要改，不能浪费国家资源而不理。”他还十分重视木材的综合利用，曾亲笔题词：“发展木材的综合利用。”在1958年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朱总特别强调：“综合利用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回去以后要从各方面找出路，大量利用废材废料制造纤维板、刨花板等人造板，积极扩大木材综合利用，提高木材利用率。”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木材综合利用和人造板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并在林业生产建设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关于利用林区废材小料，朱总还提出：“今后一定要设法利用枝丫废料造纸，不能老是吃大原木。可以考虑国家今后少拨或不拨给造纸厂原木。有些机器不适应，应该积极设法改装。利用枝丫废材可能成本高些，利润小些。但要算国家的大帐，不能光打企业内部的小算盘。”同对，他还要求各行各业、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节约木材和推广使用代用品，改用水泥轨枕和矿柱，并在全国普及。

在农、林、牧三者的关系上，朱总一贯主张农林牧相结合，协调发展。1960年3月，朱总和康克清同志重返四川故乡时，还关切地问生产队长，“山坡植树造林搞得好吧？”队长说，“这几年主要抓粮食，别的没有顾得上。”朱总听后说：“要按山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可在山坡、河边、路旁、田埂栽桑树、茶树、果树、白蜡树等，还要种植广柑、药材、山竹。”1964年，朱总在视察内蒙古时，对哲里木盟在流动沙丘上造林，保护了农田和草场的做法很感兴趣，满意地说，“你们采用农林牧结合，全面发展经济，成效很显著，应该很好地坚持下去。”为贯彻朱总的这一指示，哲里木盟盟委专门开会研究，提出了“四四”、“三三”、“一五”（即建设四百万亩基本农田、亩产四百斤，实现三百万头牲畜，人工种草三百万亩，大力造林、使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十五）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全盟各族人民在这个目标的鼓舞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运动，从1965年到1970年的六年间，共造林三百九十万亩，封沙育林二百六十四万亩。到1990年，森林覆盖率已从当年的百分之七点四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点九六，实现了林业规划目标。林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全盟的经济建设。

朱总关于发展林业的这些重要指示，对当时的林业生产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观点对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的林业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导意义。朱总关心林业、爱护林业的精神，将永远鼓舞和鞭策着我们在林业的改革和建设 中，开拓进取，不断前进。他那种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当前，我国林业正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林业建设道路向前迈进。我们坚信，朱总对林业发展的殷切期望一定能够实现，一个国家富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朱德同志在广西

乔晓光 贺亦然 陈业生

朱德同志离开我们虽然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坎里。对于他的丰功伟绩，党和国家已经作出了全面的、高度的评价。这里，我们仅就朱德同志来广西视察工作的一些片断作一追忆，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之情。

热情地关心广西经济建设

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朱德同志曾多次到广西视察工作，先后到过南宁、柳州、桂林和河池、宜山等市（县），深入到工厂、农村、农场地，进行调查研究，对广西的经济建设和城市、乡村的其他工作，特别是对工农业生产、外贸出口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他的这些活动和指示，不仅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怀和对广西各族人民的爱护，而且对广西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7年1月，朱老总首次来广西视察，在南宁先后听取了省委、省委工交部、省工业厅、省委农村工作部的详细汇报。省工交部、省工业厅的同志汇报说，广西像样的工厂只有贵县糖厂，生产的自砂糖质量很好。朱老总听后说，要下决心办些工业，下决心搞些出口产品，能从外国人手上赚到钱才算有真本事。在听取省委农村工作部汇报时，朱老总指出，广西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和环境条件都很好，物种丰富，是块宝地。又说，像广西这样加宝地，全国只有四块（指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作者），在广西工作的同志，要珍惜这块宝地，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把农业生产、多种经营和外贸出口搞上去。在这次视察期间，负责接待工作的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贺亦然同志向朱老总汇报时，朱老总总是把话题转到发展多种经营和组织外贸出口上，诸如，询问广西有哪些土特产啦，要如何组织收购出口创汇啦等等。他还反复地说过，广西山上的宝很多，也很值钱，如有些兰花一苗就可以换回几块美金。同时他要求广西积极开发自然资源，自力更生壮大广西的经济力量。一天，朱老总视察南宁临江的一条街道时，看到市场上摆满了热带、亚热带的多种水果、龟、鳖、山瑞、果子狸、猴、蛇、蛤蚧以及八角、罗汉果等等土特产品，心里非常高兴。他一方面兴致勃勃地向群众了解这些土特产品的名称、价格和养殖、捕捉技术；一方面对陪同的同志说，广西有这么多土特产品，资源又那么丰富，是发展经济的一大门路，要好好组织生产、收购和出口。

后来，朱老总又几次来广西视察工作，他除反复强调要重视开发亚热带资源外，还特别关心广西山区经济和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1964年3月，朱老总代表中央来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周年的庆祝活动。在此期间，他先后接见了自治区和各地、市委的领导，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还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一方面赞扬广西各族人民依靠集体力量，战胜了1963年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干旱，鼓励群众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方面再次赞赏广西是个好地方，不仅农业生产大有可为，而且林、副、牧、渔也大有可为，指出广西地

下矿产资源丰富，宝贝很多，要尽快有计划地组织开发，把死宝变成活宝，加速广西的经济建设。随后，他又去贵州视察。当他由贵阳乘车返回桂林，途经河池县城时，看到群山环绕、山青水秀，便叫停车稍息，特地接见了该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在了解了这个县的山区资源及其开发打算后，特别指示这两位县领导说，靠海吃海，靠山吃山，你们要深入山区调查，该造林的地方，植材造林，能种水果的地方，发展水果，订好开发规划，使山为你们创造财富，改变山区面貌。

朱老总先后视察过柳州农业机械厂和柳州园艺场。在柳州农业机械厂除听取该厂的工作汇报外，还观看了该厂生产的高扬程水轮泵，实地观看了广西自己生产的红河牌拖拉机和挖坑机的现场表演，在红河牌拖拉机旁照了相，在视察的过程中，他不断赞扬柳州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有志气、有智慧、有能力，对发展农业作出了贡献。同时鼓励广西自力更生发展地方工业，尽快改变经济发展上的落后面貌。并说，回去以后要叫农机部派人来柳州好好总结经验，开现场会议向全国推广。果真，第二年农机部部长陈正人便来柳州主持了现场会。

朱老总还十分关心广西的城市建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桂林视察漓江风景游览区时，看到沿江石山上树木不多，便说漓江风光虽好，但两岸石山尽是灰色，显得单调，应设法使它绿化、彩化、果化，把桂林秀丽的山山水水装点得更美。为此，在从阳朔返回桂林的途中，特地登门访问了雁山植物研究所的一位对石山绿化研究很有成就的教授，请教美化石山的计策，并请这位教授向政府献计献策，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绿化大地。当他知道环境幽美的雁山公园被农校占用时，心里很不高兴，便叫陪同视察的桂林市的领导向自治区有关部门反映，尽快把雁山公园收回修复。在桂林视察期间，他还详细地听取了七星公园建设规划的汇报，认真观看了园林景色，鼓励桂林市城建局局长韦启彰等同志认真实施建设规划，把七星公园建设得更美更好。当他看到月牙楼是靠山顺势用石头砌成时说，石楼与石山浑成一体既自然又美观，建议今后桂林的建筑要多用石砌，增加自然美感。他在月牙楼品尝素面后，赞扬该楼食品很有地方特色，并指示说，今后风景游览区的饮料食品不要大单一，要搞多样化，还要搞得有地方风味，这样才能使游客的旅游生活丰富多彩，玩味无穷。

同群众打成一片

朱德同志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平时注意关心部下和群众的疾苦，到处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几次来桂视察中，每到一处无论对领导干部还是对群众都十分亲热，对所住宾馆的工作人员不仅平等相待，而且临别时还一一道谢话别，处处表现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同呼吸的情感。

南宁市园艺场有一名领导干部，名叫潘少洲，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朱老总的警卫员达六年之久。朱老总视潘为手足，潘则认为朱老总比亲生父母还要亲。1957年1月，朱老总来广西视察时，特地到南宁园艺场探望了这位阔别多年的老部下。见面后，朱老总和蔼地询问潘的工作生活情况，诸如拿多少工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在广西工作习惯不习惯等等。当潘少洲说到农场人员来源复杂很难管理时，朱老总笑着说，叫你来管理情况复杂的单位是组织对你的信任，要在复杂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提高自己。当看到潘少洲的鸡舍

修得比较讲究时，朱老总严肃地说，鸡舍能养鸡就行，何必那么讲究！临别时，朱老总特别关照潘少洲，要他安心在广西工作，努力把园艺场办好，还要求他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千万不要在生活作风上出问题。老首长的亲切关怀和期望，使这位老警卫员想起了当年的往事：老首长常常自己走路，把马让给伤病员；关心战士的生活，有时间饭吃的饱不饱……等等。往事、今事、远事、近事的情景交织在一起，顿时使潘少洲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握住朱老总的手久久不放。朱老总回到住地以后，叫秘书亲自给潘送去一些钱。潘拒收后，朱老总又交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注意关照潘的工作和生活。并对潘严格要求，保持党的光荣传统。

朱老总不仅关心部下，同其他干部、群众更是亲密无间。当年，他来柳州视察工作时，年事已高，他要求会见柳州市八十岁上下的老人。当他知道柳州机械厂对制造汽车发动机、拖拉机作过重要贡献的工程师吴鼎瑞与他同龄时，马上叫人把他接来。见面后，朱老总向吴鼎瑞详细询问了工作和生活情况，并鼓励他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带好青年技术人员，为发展广西工业贡献余热，还祝愿他晚年生活愉快。最后同吴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合影留念。1963年1月，朱老总来到桂林，在榕湖饭店下榻。当时，在这家饭店住宿的，还有处级以上干部十多人。当他得知这种情况后，便不顾旅途疲劳，主动登门看望他们，亲切地同他们交谈。干部们无一不为朱老总这种关心干部，平等待人的举动所感动。

朱老总一生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在桂林活动期间，在榕湖饭店用膳。桂林的豆腐乳，是远近闻名的佐餐食品，开饭时，服务员每餐都给他端来几块。一天，餐厅服务员收拾餐桌，朱老总指着小碟里剩下的豆腐乳说，剩下的不要丢掉，下次还可以吃，千万不要浪费了。朱老总是农家子弟，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很尊重人民的辛勤劳动。他说，豆腐乳的黄豆是农民洒汗水种出来的，要制成腐乳又要经过工人多道工序的劳动，如果每餐吃不完就倒掉，就对不起农民和工人了。服务员听后非常感动。此后，服务员便每餐只端上一块切成两半的豆腐乳，朱老总很高兴。

高雅的生活情趣

革命领袖与普通群众一样也是血肉之躯，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爱好和情趣。朱德同志喜欢种兰花，且很有研究。他种的兰花有春兰、建兰、墨兰、四季兰等多个品种，有的以清香驰名，有的以观叶为上。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写了有关兰花的专著《兰谱》。1963年1月，朱老总来桂林时，曾把《兰谱》的手稿复制两套共八本赠送给桂林市和当时的市委书记黄云同志，此手稿全部转给了当时的广西第一图书馆——今广西桂林图书馆收藏。朱老总为什么如此酷爱种兰花？他说，年纪大了，像农民一样种田不行了，但种种兰花，懂得种植作物的原理，对指导农业生产有好处。他还说，种兰花可以增加生活志趣，可以调节工作和生活；兰花是世界上的名贵花种，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可以出口创汇。因此，他不仅自己种植兰花，而且到处宣传种兰花的好处。他每次到广西都带上许多品种的兰花，地方上缺少的，便主动给予调换。在桂林时，他特地接见了当时主管园林工作的市城建局局长韦启彰，并同他一起到苗圃看望了花木技术员刘统祖同志，看到刘种的兰花长

势很好，便同他一起交流种兰花的经验。当朱老总再次来桂林时，又去看望刘统祖，看到刘正在专心整理假山盆景时便问：“你还种不种兰花？”刘答：“还种呀！”朱老总便叫警卫人员把四盆从贵州带来的兰花新品种送给了桂林七星公园。

骑马、登山、作诗，是朱老总的又一种雅趣。也许是因为这些活动能磨练意志和抒发情怀，所以他每到一地尚有机会，总要“温习”一番。1957年，他来南宁视察工作时，曾同当年的警卫员骑马登上南宁园艺场附近的山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南宁周围的景色。在桂林游漓江时，他随身带着一本《诗韵集成》，边看景色，也构思佳句。1963年1月29日，年近八旬的朱老总和徐老（特立）一道，健步同登叠彩山山顶——明月峰，看到徐老不拄拐杖徒步而上，顿时诗兴大发，即兴作诗以赠：“徐老英雄，同上明月峰。登高不用杖，脱帽喜东风。”徐老也吟诗一首回赠朱总：“朱总更英雄，同行先登峰。拿云亭上望，滴水来春风。”这是何等雄伟的气魄，何等高尚的情怀！

朱老总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视察广西时所作的重要指示，他对广西各族人民的关心和爱护，将永远铭记在广西各族人民的心里，激励他们努力把广西的经济搞上去，为完成四化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7月

高山景行风范长存

杨超

朱德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五年了，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回忆朱德同志对四川经济建设的关怀，以寄托对朱德同志的深深怀念。

新中国建立以后，朱老总对四川的经济建设十分关心。几次来川视察工作。从1957年至1963年之间，他老人家不顾七十多岁高龄，多次来四川省调查研究，往返奔波、风尘仆仆，从一个县到又一个县，从一个厂矿到又一个厂矿，深入到生产现场，亲切地与工人、农民交谈，细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汇报，掌握第一手材料。朱老总就当时经济建设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写了大量的报告和函件。比如，1961年4月份，朱德同志来川调查我省贸易及轻工业生产情况达一月之久。他回京后致函毛泽东同志，认为“手工业在1958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了，存在不少问题；必须打破县与县、社与社之间的经济封锁，加强物资交流；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1963年3月份，他再度来四川，分别在成都、重庆、泸州、隆昌县、永川县等三市五县调查近一月，并做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指示。比如，他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这些指示不仅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是一种尖锐的批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朱德同志对四川省经济建设的关怀给我教育最深的首先是他对黄金生产的指导。朱德同志历来重视黄金生产，认为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一方面要加速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资金缺乏又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加紧黄金勘察和生产。搞建设需要外汇，而黄金是硬外汇。要抓好黄金的生产。他曾指出积极安排黄金生产，是扩大积累扩大进口的一个简捷便宜的办法。记得1957年2、3月间，朱德同志到四川视察工作。他在视察后写的《外出视察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矿产资源的问题”。文中直接指出：又如会理一带（西昌以南），原是产金子的地方，据说解放前，群众每年要挖二万两金子进贡给当地土司。现在这一带经过民主改革，不再需要向上司进贡金子了，但是金子也就不挖了。如果仍然让群众挖，并加强组织领导，每年挖上几十万两金子，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朱老总那时当面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抓好四川黄金的生产。1977年6月，王震同志到四川，在听取四川省国防工办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还特别提到朱总对黄金生产的关心和重视。王震同志说，“朱总司令在世时问我，你怎么不到四川发动搞金子，我们四川金子多，人多，可以多搞点。”

今天，四川省黄金生产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调动了地方和群众的采矿积极性，同时，加强了黄金勘探专业队伍的建设。十年来，全省黄金产量增加近四倍，与此同时，探明的地质储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这里无不凝聚着朱德同志的心血。

建国后，我们曾一度存在着忽视手工业生产的倾向，在原料、价格等方面限制过死，致使许多手工艺“人绝艺亡”，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朱德同志早在1953年就指出“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着其他工业不可替代的“自己的许多特点”。并且批评了一部分同志“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的错误观点。1957年，朱德同志来四川时，视察了不少小手工业工厂。他强调指出，“办好手工业是很有前途的。”1962年，朱德同志视察四川、云南后又提到对手工业产品价格限制过死的问题，认为“应该允许他们在维持成本，稍有利润的原则下，适当提高售价”。可见，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生产的重视是始终一贯的。

朱德同志对于工作从不满足于面上的了解，听取一般的汇报，停留在泛泛的一般性的号召上。而总是深入到基层进行一个点、一个点地调查，亲自解剖麻雀。1960年3月，朱总在听取四川省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汇报手工业生产情况后，马上提出要选点调查。他先到灌县实地调查，然后又坚持到下面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石羊场调查。石羊场距灌县县城几十里，生产和经营农具、五金、缝纫、修配等行业，一直很兴旺。由于在“大跃进”中被合并到一个大厂中，改变了核算制度和分配方式，大锅饭取代了原来计件工资按劳取酬的办法，结果使生产很快就垮了下来。1963年，在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朱德同志指出：“不少手工业勉强统起来，转为国营工厂，不利于国计民生，还是让他分散经营好”。这些意见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朱德同志对四川省的工艺美术品生产也给予了巨大的关怀。他曾指示说，手工业、手工艺品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搞了，我们要发展这个优势。1963年春，我曾陪同朱德同志到宜宾地区视察工作，地委的同志把当地艺人制作的笔筒雕刻、竹编屏风等给他看时，他老人家高兴地称赞屏风编得好，制作精致，鼓励地委的同志一定要抓好工艺美术品的生产。1965年10月1日，四川省工艺美术品展览在北京市团城开幕。展厅附设出售点，出售陶瓷、竹编、漆器、夹江国画纸、藤椅、剪纸、儿童玩具等，品种规格较多，首都群众竞相参观购买，颇得当时一些四川籍中央负责同志的鼓励。在展览开幕前几天的预展过程中，朱德同志亲临视察展出情况。当时，他老人家已近八十高龄，仍步履矫健，四个展厅逐一仔细参观，达三个小时，毫无倦色，兴致很高，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职工的生活情况等。展品中有一种扇子，名叫贡扇，是由粗细近乎于头发的竹丝编的，利用竹子正反两面不同光泽度编出仕女、山水、花卉等图案，扇子显得精美、高雅，使人爱不释手。此扇是由自贡老艺人龚玉璋创造制作出的。朱德同志参观到贡扇时，马上关切地询问：“龚玉璋还在不在，老人身体情况怎么样啊？”朱德同志对一个普通的民间老艺人这种深切的关怀使在场同志深受感动。展品中还有两个银制大盘，直径约一米，分别雕有毛泽东同志诗意画“风景这边独好”与“江山如此多娇”。还有一个大型木雕，把红军长征途中情景刻划得维妙维肖，十分感人，我当时给起名叫“万水千山”。朱德同志看了后称赞说，四川省工艺美术品把古老的民族艺术与现代题材结合起来，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创新。朱总还高度评价展品富于日用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雅俗共赏，物美价廉。荣经县生产的沙锅，煮饭味道醇美，价格仅几角钱，朱德同志当场就坚持按照零售价格买了一个。他还为展览会题词：“亦工亦农，发挥特长，面向群众，扩大出口”。朱德同志的重要指示成为四川省手工业

生产发展的指导方针，一直鼓舞着四川省手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群众。据1985年统计，四川省二轻系统手工业总产值达四十五亿三千万元，出口交货值达一亿二千八百二十九万元，其中工艺美术品出口交货值达六百七十七万元。

朱德同志爱兰已是众所周知的，据说就是在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间也要遣兴培植欣赏兰花。解放后，朱德同志来川，总是要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中抽出时间到杜甫草堂、文殊院、人民公园等处参观兰花。在他的住处阳台和花架上摆满了兰花，朱德同志清早起来看，午觉起来要看，晚上还要看，对兰花是达到了酷爱的程度。他不仅爱兰，而且精研《兰谱》，说起兰花，如数家珍。

1963年春天，朱德同志来川，我曾陪同他到青城山去采集过野生兰花。朱德同志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兴致勃勃地一直攀登到“天然图画”（青城山上一景）上面，在远离石阶的一处山坡上终于发现了野生兔耳兰。当时，朱德同志和康克清大姐都非常高兴，对兰花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颜师古赋兰有：“惟奇卉之灵德，禀国香于自然。洒佳言而擅美，拟贞操以称贤。”我想，与其说朱德同志爱兰，不如说他更看重兰花具有质朴、高洁的品格。说到兰花，我总是很自然地联想到朱总的高贵品德。朱德同志与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和谦虚的高贵品德至今为他的家乡人民怀念和传诵。1960年初春，朱德同志回家乡仪陇县马鞍场，在走进一座房舍里时，微笑着对随行人员说：“这房子还是老样子，记得我小时候读书或赶场，总是把斗笠放在这儿，给他家添了许多麻烦。”当房子的主人，一位银发苍苍的老太太认出面前站的就是朱德同志时，一面激动地喊着：“啊！朱司令！”一面就忙不迭要下拜行礼。朱德同志赶忙扶住她，亲切地说：“我是朱德”。朱德同志还一再嘱咐仪陇县领导同志说：“你们要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而且还特别关心和询问妇女与孩子的营养和卫生条件。朱德同志这种热爱人民、与人民的鱼水深情确实感人至深。

朱德同志父母的故居仪陇县柏林嘴，1957年因接待前来参观的外宾，曾用三间空房陈列了一些朱德同志的照片和使用过的实物，并在外面修了一个小亭。朱德同志1960年回乡参观时看到这些情况，对县委书记说：“不要办我的展览。如果社员也不愿搬进这些房子住，那就把这个地方办成一所学校，好不好？现在就改。”以后朱德同志到了南充和成都，都重申了这个意见。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老人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仪陇县出席会议的同志时，又一次特别问到柏林嘴的陈列室是否改成了学校。

今天，在朱德同志故乡的纪念馆内外，已栽植了三百棵楠木，并且培植了九百余盆兰花，有十几个品种，前往瞻仰的群众可以看到那一盆盆秀丽、典雅的兰花，闻到那清芬袭人的花香，更加引起人们对朱德同志高贵品德的思念和向往。

写于1986年12月、改于1991年7月

朱德同志对首钢建设的关怀

周冠五

今年12月1日是朱德同志诞辰105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他老人家时，许多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我和朱总司令的接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时我已从军队转业到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

50年代，朱老总曾多次来厂里视察，每次都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直到今天，朱老总那种奋发忘我、志在千里的精神，仍然鼓舞着我这个老战士在工业战线继续奋斗。

记得在1951年底，我们钢铁厂完成全年生产任务后，曾以全体职工的名义致函朱老总，汇报我们的工作情况。不久，就收到一封发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信，展开一看，朱老总那苍劲潇洒的字迹立即映入眼帘——

石景山钢铁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你们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信已经收到。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你们不仅提前完成而且超过了国家所规定的生产任务，我特向你们祝贺！

你们的厂是我国仅有的几个钢铁厂之一，我曾亲自来看过，看到过去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的厂，在你们手中正一天天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你们厂的负责同志告诉我，厂里现已开工的两个高炉，和原来当作废品的两个小炉，都是工人同志们以很大的热情迅速修复的，并且它们的生产量都已远远超过敌伪时期的最高纪录。这些表明同志们已能够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担负起自己的生产任务。你们的厂目前虽然还只能每年生产几十万吨，但国家对它希望很大，它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因此，我希望你们更好地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钢铁生产方面的新技术，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在领导方面，应该紧紧掌握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方针，以便以最快的速度来完成国家的建设石景山钢铁厂的计划。最后，希望同志们于一九五二年在生产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并祝你们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朱德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朱老总这封信，给全厂职工以极大的鼓舞。他在信中要求我们厂的领导者“紧紧掌握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方针”，这在今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而且，他还对当时那样一个小厂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它是有很大发展前途的”，同时，他还要求我们努力学习，“为石景山钢铁厂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些朴素的话语，当时在我们这些厂领导心目中，份量是相当重的。

朱老总多次来我厂视察，给我们的促进更大，我印象最深的，是朱老总来我厂参加扩建开工典礼的情景。那是1958年5月28日下午，朱老总轻车简从，只带着两位随从人员来到厂里。当时他已年届古稀，但精神很好。

因为离开工典礼还有20多分钟，我们请朱老总先到自楼招待所稍事休息。朱老总一坐下，就笑着对大家说：“要开工了，应该搞快点！这次‘八

大’的精神，你们都知道了嘛，在北京搞个大的钢铁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大影响。”他像谈家常一样亲切的语气，立即感染了大家。

当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矿山，准备在河北迁安建矿，当我们向朱老总汇报谈到那里铁矿蕴藏量丰富时，朱老总非常高兴，他说：“好啊！好啊！你们敢于不敢干？有没有信心？”在座的同志答道：“有信心！我们很想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接着，我打开扩建平面图，请朱老总审阅；他戴上老花镜，像战争年代审视军事地图一样，察看得十分仔细。当看到烧结和炼钢车间等项目时，朱老总风趣地问：“是不是要全面开花啊？”我答道：“是的。”他微笑着赞许道：“很好！搞快点，紧凑一些。”沉吟片刻，他说：“建筑工程都不是在北京吗？听说他们有很多机械，跟他们要点儿嘛。”

当他的视线投到新厂房的位置时，关切地问我：“制造厂怎么样了？”我说：“已经搞了一个扩建计划，报到部里了。我们打算搞成一个能生产大型设备的制造厂。”没等我说完，朱老总兴奋地说：“好，一定要搞成一个能生产大型设备的制造厂。这是工业的姆机，我们国家需要，有这个基础条件为什么不搞呢！”

这一番热情的话语，使我们在座的工厂领导备受鼓舞。当我们陪同朱老总来到开工典礼会场，并请他剪彩时，两千多名工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事后，许多工人纷纷表示，朱副主席在百忙之中赶来我们石钢剪彩，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我厂建设的关怀，使我们增添了力量！

朱德同志作风踏实，他每次来首钢视察，都不是仅仅走马观花地看一番，或是泛泛地说几句话，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一些情况，有时甚至提出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以商量的口气与我们研究，或者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1958年9月1日朱老总在视察首钢时，不仅仔细地视察了烧结、三高炉、三焦炉、转炉、炼钢和电炉等工地，而且还对着平面布置图，向我们详细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与我们共同探讨解决办法。

那一次，在谈到扩建中的机器制造厂时，朱老总说：“你们自己把机床搞起来，就方便了，就有把握了。”紧接着，他关切地问：“机器厂的人有问题吗？”“发展有问题吗？有限制吗？”他说：“要是有限制的话，那就一段一段地、一期一期地搞……”，“现在要规划好，一有闲工夫，就打零工，搞那些零星活，为发展作准备。”

当时国内正在搞“全民大炼钢铁”，朱老总在谈话中对此没有具体评价，不过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各地小高炉已经搞起来了，他们自己上山背矿，什么地方有，就在什么地方取，交通不便，自己背矿、码铁，很苦。”我们介绍说：“附近有些县办的小高炉，我们给了一些帮助，交通不便的地方，我们打算提供小推车等运输工具，帮他们解决交通问题。”但朱老总沉思一会儿，温和地建议道：“他们上山背矿，人多势众。你们做个计划，把这些矿石收起来，怎么样？不要赚他们的钱，不亏本就行了”。你们做得到吗？作个计划，先从最近的收起。”

现在想起来，朱老总这番话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全民大炼钢铁”的看法，而是把希望寄托在钢铁企业这个“正规军”。后来的事实证明，到处搞小高炉的做法并不科学，浪费大，效益差。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到朱老总的求实精神。

这次视察过程中，朱老总对我们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大于社会主义的

精神十分称赞，对大家的干劲表示赞许。当时正值“国庆”前夕，工人们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想出多种办法克服重重困难。生产建设需要的大批耐火材料不能保障供应，工人们就在数十里以外的山区找来原料，自制成耐火砖和耐火土，保证了施工进度。朱老总对这种自力更生创造条件的做法表示支持，他还建议我们自己搞个耐火材料厂，勉励我们“大力促钢”。

这次视察，古稀之年的朱老总去工地、登高炉，走了很多地方，边看边谈，兴致很高。快到中午时，我担心朱老总太疲劳，请他休息一会儿，他看了看表说：“还是赶回去吧。”在登车离厂时，他还大声对我们说：“加劲地干，快点干吧！”直到现在，他说这几句话时的情景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那种不知疲倦的高昂斗志，时时激励着我。

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是朱老总的一大特点。到首钢视察时，由于他经常问得很仔细，有的问题涉及到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知识，有时还碰上一些技术本语，遇到不明白之处，他总要反复地询问，或要工程技术人员解释得更详细些，直到弄明白为止。这些情景，常使我们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也深受教益。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不掌握一定的专业科技知识，就不配做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企业越发展壮大，现代化程度越高，技术越先进，对我们领导者提出的要求也就越高、越严，因此非下决心钻进去不可。不久前，我们根据首钢公司发展的新情况，办了一个卢沟工校，专门培训厂长、书记，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习管理知识和冶金专业工艺技术；我们的目标，在于培训出一支素质好、能够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应该说，重视掌握专业知识，是朱老总带给我们的好作风。至于我自己，在学习专业知识方面，自然也不敢懈怠，好在随时可以向周围的科技专家请教。

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老总深知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他来首钢视察时的言谈，我们能够感到他那种希望祖国钢铁工业有更快发展的迫切心情。我们知道，朱老总多次视察首钢，这不仅体现了朱老总对首钢建设事业的关怀，更反映了他对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密切关注。

1959年5月15日，朱老总视察首钢时，对我们的生产和发展情况问得格外细，诸如“三高炉开炉一个月以后的生产水平可达多少？”“三焦炉一天可出多少焦？”“迁安铁矿明年可出多少矿？”“磁选后含铁量多少？”“运输问题怎么样？”等等，当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朱老总又询问我们对下一步发展有什么打算。

我打开公司的平面布局图，向他汇报公司布局情况和下一步计划，他一边听，一边看，并且不住地点头，汇报完后，朱老总笑着称赞道：“你们的雄心更大了！”

紧接着，他显得有些兴奋地说：“你们搞一千万吨也不算多。我在苏联乌克兰呆了一天，他们的大高炉容积一千九百多立方米，三个月搞成一座。”他提高声音说：“我们将来也可以搞大的。”

朱老总接着说：“你们搞一千万吨还不算大，可以搞两千多万吨。听说美国就有两千多万吨的大厂。”他在谈话中还问我们，“你们赶鞍钢赶得上赶不上？”他表示希望我们做个计划，一步一步地来，逐步发展。

而今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首钢与祖国一样，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文革”的大动乱，最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钢有幸成为我国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这

使得它能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

我们首钢人并没有自满。朱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厚望，始终激励和鞭策着首钢人不断进取。现在，十八万首钢职工正期待着利用自己积累的资金，在外地（如齐鲁地区）再兴建一座大型钢铁厂，从而实现朱老总当年提出的“我们将来也可以搞大的”愿望，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6月

朱德同志对我的殷切期望

李师弼

光阴流逝，白驹过隙，匆匆间，我所敬重的朱德同志已辞世十五年了。每每回忆起我参加革命队伍前后朱总对我的谆谆教诲，心潮如涌，久久不能平静，这种心情决非文字所能表达的。

朱总和我的父亲李云鹤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两人志同道合，私交至厚，曾订有金兰之盟。在学期间，他们受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后又一同参加辛亥云南重九起义。1921年，先父曾将我作为朱总的螟蛉义子。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三龄幼童。

1946年，我从国民党陆军大学二十期毕业后，被授予少将衔，担任国民党第六十军（曾泽生部）代理参谋长。不久，六十军调往东北，旋于1948年秋在长春起义，我当时因病在昆明家中养息。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可终日。此间，我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如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朱总的《论解放区战场》等等。目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腐败无能，数百万军队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一败涂地，损失殆尽，我愈加感到前途暗淡。在先父的支持下，我决定脱离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去。经同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在他们的周密安排下，我带着先父写给朱总的信，由昆明启程，取道香港、南朝鲜，抵达北京，终于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刚到北京，我被安排住进前门外大栅栏内的远东饭店，这里已有一些先期到达北京的民主人士，如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等。

没过几天，一个素昧平生的客人来访，他自我介绍叫金城，是中央统战部派来了解我和朱总的关系，我们的谈话持续到深夜。次日，刚吃过早饭，开来一辆小轿车，把我接到了中南海。

当我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客厅时，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迎面走了过来，我猜想他一定就是从小敬仰的朱总司令，我紧走几步，上前就要给朱总叩头。

“不要这样，这是旧礼教嘛！”朱总一边笑着，一边把我扶起。

当时，我的眼泪已经夺眶而出，竟连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说出来。

坐定，朱总关切地询问起我父亲的近况，又详细地向我了解云南的情况，以及征求我对解放云南的意见和看法，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当我向朱总汇报了自己以前所作的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时，他说：“你能够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走向人民的一边，我们还是欢迎你加入革命队伍的。”

当我向朱总谈起我在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学习的情况时，他说：“对资产阶级军事学要批判地吸收，你要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把过去学到的东西拿过来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

在无拘无束地谈话中，我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仰慕向往的心情，冒昧地向朱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像我这样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了这么多年的人，是否能够参加共产党？他老人家听罢，严肃地说：“你才这么点年纪，刚刚三十岁，怎么就气馁了。我离开旧军队到德国留学时，已经三十六岁了，还蛮有信心的，我在旧军队比你干的年头多。你今天过来了，就很好嘛！你要有信心，努力争取进步。”

接着，朱总又告诫我：“共产党是不讲私人关系的，你要积极靠近组织，抓紧学习，努力改造旧思想，接受新思想，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我一边听

着，一边细细地琢磨着他的每一句话，真正体会到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与朱总见面后不久，我被介绍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军大学习期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正感受到革命队伍里同志式的关系与国民党军队中尔虞我诈的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

1950年2月，我突然接到妻子发来的急电，说我父亲因心脏病发作不幸辞世。我心中很悲痛，立即向校方请假，要求回云南奔丧。校方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没有批准我的请求。对此，我感到很不理解。于是，就提笔给朱总写了一封信，请他向组织上建议，派我回云南工作，籍以料理父丧，公私两便。信发出后，很快就收到了朱总的复信，他在信中写道：

“你父亲年过六十去世，人生竟称满意之格，勿用悲伤。你来信要求回滇工作，是可以派你回去的。但是，你的思想刚由封建思想转变到新社会思想，全靠环境光明，才会有进步。你回滇，虽然可以做一些工作。但是，为你的前途着想，还是以在北方工作为宜。最后，你究竟回滇，还是在北方工作，请你考虑，再写信来，以便决定你的工作。”

我读过朱总的来信后，一夜未眠。想起第一次和朱总见面时的情景，想起在军大受到的革命教育，内心不免感到有愧于朱总的谆谆教诲。第二天，我又给朱总写了一封信，表示不回云南，继续在军大努力学习。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其间，我也遇到过挫折。但是，每当我想起朱总的教诲，就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支持着我，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信任。虽然我已年逾古稀，仍愿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绵薄之力。

1991年8月

人民友谊的画卷

廖盖隆

翻开当年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同志出访东欧五国（即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蒙古的日记，一幅幅各国人民友谊的绚丽多彩的画卷，跃然展现在我的眼前，使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星转斗移，一晃三十五年过去，朱德同志也已故世十五周年。当今世界，激荡变迁，朱德同志曾经访问过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然而有一种东西却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以及欧洲、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鲁迅在一首赠日本友人的诗中说得好：“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作为当事人，把当年随同出访的记录奉献给读者，以此表明朱德同志在增进各国人民间的友谊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也算是我对朱德同志的最深切的追思与缅怀。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出访日记是随访的几位同志共同整理的，它记录了朱德同志从1955年12月至1956年4月出访的全过程。我仅摘其主要日程、活动，并根据自己的回忆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出访

1955年12月10日，由朱德副主席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民主德国总统皮克八十寿诞庆典）于上午十时从北京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周恩来、陈云、彭真、张闻天、李济深等党、政、军负责同志，以及罗、民德、匈、捷、波、苏、蒙等国驻华使节。

两个代表团的团长是朱德同志，团员有聂荣臻、刘澜涛同志和随员十余人。

列车途经天津、沈阳、哈尔滨，抵达我国境内的最后一站——满洲里。沿途，朱德同志听取了前往车站迎送的各省（市）负责人的汇报。与聂荣臻、刘澜涛同志联名致信党中央，表示这次是初次出国，自当审慎从事，不负使命。

在罗马尼亚

列车穿越苏联国境，经过近十天的旅途，于12月21日上午七时半抵达罗马尼亚东北部边境城市——雅西。车站上聚集了二千多名欢迎的群众。罗马尼亚工人党政治局委员阿波斯托尔和武装部队部长萨拉扬上将专程前来迎接。朱德同志致辞说，我代表中国人民向雅西城的市民及全体罗马尼亚人民表示兄弟般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

在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途中，萨拉扬上将快人快语，嘲笑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伟大的新中国的存在是十分愚蠢的。火车抵达布加勒斯特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在车站迎接。宾主双方在代表团下榻处进行了友好、热情的交谈，乔治乌—德治表示

对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感到极大的兴趣和鼓舞。朱德感谢罗马尼亚在石油开采方面给予中国的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的国土面积有二十三万七千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千七百万。它是东欧唯一的生产石油的国家。石油年产量达一千五百多万吨，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罗马尼亚工人党是1947年11月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组建的。

12月23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听取乔治乌—德治代表罗党中央作的工作报告，报告长达七个多小时。24日，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贺词。

从24日至29日，在参加党代会之余，朱德和代表团其他成员还参观了罗马尼亚的工厂、革命博物馆、军事学院和研究所等。在参观火花印刷厂时，朱德愉快地接受了印厂赠送的罗马尼亚文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鲁迅选集》和《郭沫若选集》等，并应印厂工人的要求，写下“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强大工具”的题词。

在民主德国

结束了在罗马尼亚的活动之后，朱德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民主德国参加皮克总统的八十寿庆活动。在列车上，代表团召开了党支部大会。朱德曾于1922年10月至1925年7月

在德国留学，因而对德国人民的情况很熟悉。他在会上发言说，德国人民有一些很好的习惯：严肃，整齐，遵守时间，讲效率，有礼貌，有秩序，不轻然诺，说了必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56年1月1日下午四点钟，列车驶进柏林车站。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等领导人前来迎接。我国驻民主德国大使曾涌泉（代表团在民德期间也是团员之一）也到车站迎接。

柏林的气候温暖，却不晴朗，下着毛毛细雨，这种景象很像是北京的晚秋天气。

代表团在游览市容时，走进了一所幼儿园，孩子们看到中国客人的到来，纷纷行礼问候，一群学龄儿童把蓝色的领巾献给朱德、聂荣臻、刘澜涛等，并拉着客人们的手，又唱又跳。

1月3日，是皮克总统八十寿诞。上午十时，朱德、聂荣臻、刘澜涛、曾涌泉等前往总统府为皮克总统祝寿。下午六时，在国家歌剧院举行庆寿大会，朱德致词祝贺民主德国人民在统一社会党和皮克总统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争取国家的统一、和平、民主和维护欧洲安全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大会始终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代表团在柏林期间，参观了一些工厂、博物馆等，工人们高涨的劳动热情和所采用的先进技术，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

随后，代表团来到莱比锡、魏玛等地参观访问。当我们步入位于莱比锡的季米特洛夫博物馆时，大厅内回荡着当年审判的录音，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的法庭上与法官戈林辩论的一段。季米特洛夫那坚毅、镇静的声调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朱德参观完毕题词：“季米特洛夫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斗争的精神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共产主义万岁！”

在离开民主德国前，朱德、聂荣臻、刘澜涛等再次拜会了皮克总统，并向他告别。随后，朱德在我国驻民德使馆接见了留德学生代表，他勉励留学生们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发展中德人民间的友谊。

在匈牙利

应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邀请，朱德率代表团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匈牙利人民与中国人民有着久远的亲邻关系，他们的祖先就是长期居住在长城以北地域的游牧民族——匈奴。约在二千年前，匈奴族人才向西迁移至东北欧，至今匈牙利人的语法结构和姓名的排列顺序仍与中国汉藏语系是一致的。也许是由于这层亲戚关系的缘故，匈牙利人民对我们异常的亲切、热情。

代表团在参观过程中；受到匈牙利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热情地跟随和围绕着朱德，欢迎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我们在拉科什恰巴的米丘林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时，一位老年饲养员拉着朱德的手向他问候，并请朱德回国后转达他对中国农民兄弟的敬意。当朱德离开合作社时，拉科什恰巴一带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合作社的院子里和街道上，长时间地向客人们挥手告别。

这里应该顺带提到的是，三年之后，即 1959 年 3 月，我又一次随从朱德副主席和习仲勋副总理重访匈牙利，参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众所周知，1956 年 10 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之后，匈党第一书记由卡达尔担任。匈牙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一如既往，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注重形式，而是更简朴、更注重实际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

1 月 16 日晚十一时，代表团乘坐的列车驶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经过八个小时的运行，于次日晨七时抵达斯洛伐克首府布拉基斯拉发，受到当地党政领导人的欢迎。代表团作短暂停留后，又登车前往首都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工业化国家，面积十二万七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三百多万。捷克生产的步枪和拔佳皮鞋为中国人民所熟悉。

第二天上午，在捷共中央书记帕歇克的陪同下，朱德参观了斯大林格勒机器厂，在工人们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朱德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同志们表示兄弟般的敬意和祝愿。下午，朱德向捷已故总统哥特瓦尔德的陵墓献了花圈。陪同献花倒的捷国民议会主席兹德涅克·费林格高兴地对朱德说：“我还在童年时，就知道你是中国红军的总司令。今天能够陪同你，是我终生的荣幸。”

鉴于朱德及代表团成员一个多月来不停地参观访问，旅途劳顿，捷方邀请代表团前往休养地卡罗维瓦利温泉区休息数日。卡罗维瓦利仅有三万常住人口，马克思晚年曾在这里休养过。

就在代表团到达这里的第二天下午，捷牙科女医生罗别愁兴冲冲地赶来看望朱德、聂荣臻、刘澜涛。罗别愁曾于 1945 年——1946 年到延安援助过中国人民的对日抗战。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朋友相见，格外高兴，朱德对罗别愁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钦佩和感谢。

1月24日，代表团到比尔森参观了著名的列宁重型机械厂和比尔森啤酒厂。这个重型机械厂原为世界知名的斯科达兵工厂，有四万五千名工人。他们正在为中国的唐山和南京设制两套二十八万千瓦的发电设备。工人们因为中国代表团来访，决定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中国的订货。为此，朱德专门致电周恩来、陈云，嘱咐国内作好提前接货的准备。

1月25日下午，朱德在捷电视台发表广播电视演说，他说，这次访问所受到的热烈、友好、亲切、周到的接待，表现了捷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这一友谊必将更加巩固和发展。

1月29日，朱德及代表团就要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往波兰访问。临别前，捷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一套能够耕播收七千公顷（等于十万五千亩）土地的机器设备赠送给中国人民，朱德代表中国接受了这套设备，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在波兰

1月29日晚，代表团乘坐的列车进入波兰境内，我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赶来迎接。在这之前，他正在瑞士日内瓦代表中国同美国方面进行马拉松式而结果甚微的大使级会谈。显然，那时美国政府顽固坚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只是为了敷衍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才同意周恩来关于中美双方“坐下来谈判”的倡议的。

列车经过约十个钟点的行驶，便到达波兰的首都——华沙。代表团受到波兰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罗科索夫斯基，以及数千名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

曾经多次遭受战火蹂躏的华沙城，经过波兰人民的重新建设，已看不到战争破坏的痕迹。宽阔整齐的街道，街道两旁矗立着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显示了波兰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无限活力。

在波兰时，朱德曾参观了座落在克拉科夫市近郊的诺瓦·胡塔列宁联合冶金企业。这是波兰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有一万六千多工人，年产钢一百万吨，素有波兰“鞍钢”之称。朱德在万名职工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他代表中国工人向诺瓦·胡塔列宁联合冶金企业的工人同志，以及全波兰的工人同志致以问候和敬意，并且感谢波兰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与帮助。

在波兰期间，朱德率代表团拜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未曾料到，仅仅一个多月，当朱德在苏联访问时，接到我国驻苏使馆的电话通知，说贝鲁特因心肌梗塞病逝，中共中央委托他再往华沙参加守灵及葬礼。大家部为失去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感到难过。

在苏联

2月3日，莫斯科时间上午五点半钟，朱德乘坐的专列抵达苏联边境城市布列斯特城。1918年2月，苏俄政府被迫签订的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就在这里签约的。当时，包括布列斯特在内的西白俄罗斯的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波兰，直到1939年11月2日，这部分地区才重新回归苏联。

次日上午，列车抵达莫斯科，米高扬、莫洛托夫、朱可夫等苏联领导人前来车站迎接。

在我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李强向朱德汇报了中苏贸易情况，朱德指示说：出口的食品、手工业品等，一定要保证质量，要经过严格的检验，合格的才能出口。你们要把国外市场的需要及时地向国内反映。

朱德和代表团其他成员聂荣臻、刘澜涛、刘晓（我国驻苏大使）等先后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参观克里姆林宫，使这次访问达到一个高潮。我们参观列宁的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会议室时，向导介绍说，人民委员会会议每天下午六点钟准时举行，规定报告时间为十分钟，发言时间为三分钟，列宁主持的会议，总是开得短、有内容，又能够解决问题。当我们走进列宁的卧室时，向导介绍说，1923年，列宁已身患重病，3月2日，他在这里口授了最后一篇论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论文连同同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评居·苏汉诺夫的札记）》、《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三篇论文一起，是列宁留给苏联人民和世界劳动人民的政治遗嘱。列宁为俄国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殚精竭虑的一生是极其感人的。参观完毕，朱德充满激情的题写道：“列宁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和后代学习。”

在苏联访问期间，恰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朱德应苏联广播电视台的邀请，发表广播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的巨大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最后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同伟大的苏联人民、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为争取进一步缓和国际局势、巩固和平和增进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而不懈地奋斗。

就在代表团即将结束访问时，接到国内的通知，中共中央宣布组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团长是朱德，团员是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聂荣臻、刘澜涛等先期返国。至此，朱德出访东欧五国和苏联的使命即告一段落。从2月14日至4月2日的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朱德率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之后，又在苏联参观访问了一段时间，并于返国途中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1956年4月2日晚九点，朱德率代表团回到了阔别一百一十四天的我国首都——北京。当朱德一行走下火车时，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沈钧儒、彭德怀、邓小平、彭真、章伯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迎接。

近四个月的友好访问，增进了我国人民同出访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并且还学习到这些国家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真可以说，此行是“不负使命”的。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我国的情况和上述国家的情况都有很多、很大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大趋势是改变不了的，我国人民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友谊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会对它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公正的评判的。在敬爱的朱德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之际，笔者谨以这篇回忆录向广大读者作刍蕘之献，以表怀念之情。

1991年7月

革命到底的光辉榜样

陈友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有幸在敬爱的朱德同志身边工作了一个时期。那时，朱德同志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朱德同志为社会主义事业英勇奋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纪律的革命精神，使我终生难忘，激励我在革命的征途上努力前进。

为社会主义奋战不息

建国初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除了参与制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每天批阅大量电报、文件外，还要出席许多全国性会议，做报告，作指示，接见与会代表，还要到各地区、各部门去视察，工作十分繁忙。朱德同志有早起的习惯，中央的会议有时开到凌晨才散，但他照样坚持早起工作。朱德同志当时已六十三、四岁了，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中年龄最高的一个。在中南海的几年里，我亲眼看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忙碌而紧张地进行工作，看到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为党为国操劳的日日夜夜。过去二十多年中，他为推翻三座大山指挥作战，废寝忘食；而今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早日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仍然奋战不息。朱德同志这种快马加鞭未下鞍的革命精神，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发出了“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的伟大号令，朱德同志也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犯的现代化国防军”，“要在过去反动统治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新的、繁荣强盛的国家”。毛主席、朱德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给了八百多名来自全国的各路英雄模范以巨大的鼓舞，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会场。代表们一致通过了热情洋溢的向毛主席、朱德同志的致敬信。英雄模范们回到自己岗位不久，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战鼓就敲响了。

1950年10月27日，毛主席、朱德同志的亲密战友、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不幸因病逝世。朱德同志心情十分沉重。就在这全党全国哀悼的日子里，他抑制心头的悲痛，把悲痛化为无惧的力量，带着毛主席、党中央的委托，连夜赶赴某地，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将领作抗美援朝的战斗动员。接着，他又亲赴某机场，检阅空军指战员的战术表演，勉励他们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发挥最大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发扬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新中国走什么道路？毛主席对这个关系全党全国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早在开国前夕和建国初期，就作了明确的指示。1952年6月，毛主席又重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1953年10月，毛主席又强调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朱德同志一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办社会主义之事。

1955年6月中旬，正当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两杀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向前发展的时刻，朱德同志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在呼和浩特市郊视察了红

星蔬菜合作社。看到这个合作社在三年多时间里由七户贫雇农的互助组发展成拥有三百二十二户、一千三百多社员、农业生产和社员收入都有很大提高的大社，他非常高兴，勉励干部社员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把合作社办得更好。第二天，朱德同志又到桃花板视察了一个中等社和一个三类社，同支部书记、社长、会计、社员分别谈了两个多小时，鼓励他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进经营管理，向先进社看齐，打个翻身仗。我们敬爱的朱德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满腔热情地鼓舞、激励、促进、指导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朱德同志对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思想，理解极深。怎样使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建国以后他老人家时刻关注、念念不忘的大问题。无论工业、矿业、农业、林业、手工业、商业、财政、交通、水产等等，他都很关心，孜孜不倦地加以调查研究，了解总结群众的经验。他经常听取各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提问题，谈意见，作指示。对一些重大问题，他就把意见和建议提交毛主席、党中央。朱德同志每年都有几个月下去视察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点成就，他都满怀喜悦。看到广东解放后很快改变了吃进口粮的状况，并有余粮支援外省，他表扬广东为人民作了好事。看到川西平原农田精耕细作，灌溉系统不断改善，他嘉勉四川省委的同志把“天府之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裕。朱德同志视察了创建时期的长春汽车厂，为我国第一批国产汽车的出世当了促进派。

朱德同志对钢铁工业十分关切。他详细地视察过鞍钢、首钢、武钢、本钢等重点企业，指示他们多出钢、出好钢。他视察过弓长岭、宣化、石碌等大型铁矿。1955年夏秋间，他视察边远地区一处正在开始建设的大型钢铁基地时，发现业务部门的同志有搞大城市、高标准的思想，新建城市规划庞大，造价高昂。朱德同志按照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方针，耐心地作他们的思想工作，指出一定要把资金集中使用到生产建设上去，要按城市规划服从生产而不是生产服从城市规划的原则，争取早日把钢铁工业搞上去。

为了解决我国石油工业发展问题，朱德同志多次找地质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详细了解石油地质勘查的情况。他坚决反对所谓我国是“贫油国”的谬论。他指着地图对我们说：既然西伯利亚有丰富的石油蕴藏，怎么到了我们东北就没有石油了呢？这是不合情理的，不要相信外国专家那一套。1955年冬，他代表党中央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格·乔治乌-德治同志从布加勒斯特车站把朱德同志接到宾馆。坐下寒暄一会，朱德同志就同格·乔治乌-德治同志谈起石油勘探、开采的问题，肯定了深钻的作用。其后又详细参观了罗马尼亚石油城普洛耶什蒂，还参观了一个利用天然气作动力的发电厂。朱德同志亲自到石油工业部同余秋里同志和计划司的同志一起研究石油工业发展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朱德同志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1964年，他和董老一起视察了大庆油田。当他亲眼看到了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这个光辉典范迅速成长，看到了毛主席亲自树立、周总理精心培育的这面鲜艳红旗迎风挺立，他老人家是多么高兴，多么欣慰啊。

为了发展农业，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朱德同志就叫身边工作人员调查研究在北大荒、河套、新疆等地移民、开荒、屯垦等问题，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朱德同志很关心林业的发展，50年代初，他就派身边工作人员对我国森林资源和木材生产进行调查研究。1952年秋，他去东北视察时深入林区，把有关负责同志找到火车上谈话，详细询问了东北地区的森

林资源、抚育更新、生产加工等情况。在深入研究之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出建议。毛主席、党中央采纳了朱德同志的建议，增加了对林业的投资。

朱德同志非常关心我国国防建设。他多次到海防要地视察，巡视了葫芦岛、吴淞口、虎门等军事要塞，巡视海南岛国防建设。一次，朱德同志视察某地一项施工中的国防工程，在坑道半途中遇到几寸深的积水，坑道又黑又湿，陪同的负责同志为了照顾他老人家的健康，劝他不要往前走。他说了声“不要紧”，在手电筒照射下，踏着积水继续前进，边走边询问施工中的问题，一直走到出口。朱德同志视察过各地区的不少国防工业企业，对有些重要的筹建项目，他还亲到现场察看地形，研究布局。他指示：军工生产一定要高质量，高效率，不断进行技术改革，不断创新，保证用精良的武器装备我们的部队。

在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战不息的过程中，朱德同志对毛主席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直是言传身教，坚持贯彻，发扬光大。他每年到各地视察，都深入到工厂、矿山、人民公社、部队、学校，同干部、工人、社员、战士、学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革命、生产、战备、学习等情况，肯定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总结他们的经验，保持着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的联系，从不空谈，从不随意发号施令。朱德同志平时考虑问题，处理工作，总是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1954年春，朱德同志第一次到广东视察。他先后听取了华南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各部部长的工作汇报，又分别听取了海南、粤东、粤中、粤西几个区党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同时，派我们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同各厅局长分别座谈，下工厂参观学习，到中山、顺德、佛山等地作调查：他自己也亲自到工厂、林场视察，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直到快离开广东，朱德同志在接见分局全体常委时，才讲了对华南的印象，肯定成绩，提出今后意见：对于分局主要负责同志代表分局提出的几点重大意见，不便由个人作决定的，他表示带回中央研究，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后再作决定。

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从内蒙古草原到天山南北，除了西藏、宁夏和台湾之外，祖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朱德同志辛勤视察的足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老人家还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殷殷为念。敬爱的朱德同志啊，为了搞社会主义，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搞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您没有想到、没有办到的呢？建国以来，您一直是呕心沥血创大业，辛勤跋涉绘宏图啊！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朱德同志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认真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对于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的问题，始终坚持严肃慎重的态度。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保守国家与党的机密，加强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保证党的一切决议的正确实施”而成立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受理、

审查并决定各级党的组织及党员违犯纪律的处分；加强党内纪律教育。成立以后，朱德同志就指示马上建立办事机构，制定工作细则，选调和提拔一批党性坚强，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相当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到纪律检查部门工作；指示要定期向毛主席、党中央写工作报告，报告要总结工作经验，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报请毛主席、党中央批示。朱德同志经常听取专职领导干部的工作汇报，定期召开委员会研究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从不搞一言堂。朱德同志是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模范，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五年的期间，都定期向毛主席、党中央写工作报告，这些报告都得到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并转发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两三个月以后，受理了几十起关于处分、申诉、控告等案件，发现有些党委对于党员、干部违犯党章、党纪与党的政策和决议以及违犯国家的法律和法令等重大问题。注意不够，存在着纪律松懈的现象，而有些党委在处分党员时又不够慎重，滥用职权。朱德同志指示发一通报，要各地检查纠正。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及时地警告说，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朱德同志对毛主席的指示领会很深，对资产阶级的思想、生活作风深恶痛绝。他在1950年5月召开的中央直属系统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严肃地批评了某些有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同志。他指出：“如果哪一个同志以为自己有了了不起的功劳，要党和人民给他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人物，即使你作得最好、贡献最大，也不过只是作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们共产党人胸怀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又说：“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在进入城市之后，看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便眼光缭乱，学起样来，把衣食住行样样都弄得很阔绰。就以住房子来说吧：有些同志总说房子挤，房子不好，其实我们过去在山沟的时候，成千成百人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也还觉得不算挤，可是到了北京这样大的城市，却说房子不够住了。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小问题，其实却反映了一种严重的思想状况，应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朱德同志总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苦口婆心地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敲起警钟，防止党员干部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朱德同志在这次讲话中，对如何克服党内违犯政策和纪律的错误，作了重要指示。朱德同志的这次讲话，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以后，转发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

在老“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在贯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在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朱德同志都指示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定要当好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助手，认真做好本职工作。高、饶反党联盟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开发难的时候，朱德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加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由于朱德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认真进行了工作，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严肃慎重地检查处理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违反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违犯党的纪律的错误问题，及时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并就发现的问题制定了有关的政策界限，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1953年8月，毛主席明确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朱德同志从各个方面为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而斗争。在他主持下的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方面同样如此。1953年11月，在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朱德同志作了《过渡时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总路线是规定党的各项任务、政策的灯塔和指针，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应当从“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防止和反对城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侵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等任务来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执行。朱德同志还号召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随时了解、检查和纠正党员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思想 and 行为，并认真处理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申诉案件，切实做好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以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毛主席、党中央把朱德同志的报告批转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

1954年12月，为了保证党的政策和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实施，朱德同志指示召开工矿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各城市党委要加强对工矿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工矿纪律检查工作要为生产服务，要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彻底完成；继续深入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团结和全体职工的团结，反对和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1955年3月，朱德同志又指示召开农村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朱德同志对到会同志着重指出：“农村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实现，保证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完成……要通过检查和处理农村中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违犯党纪的案件，来提高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侵蚀，制止党员干部中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以巩固和纯洁农村党的组织，发挥全体党员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两次讲话，都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转发各级党组织执行。

1955年5月，在有董必武同志参加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朱德同志到会讲了话。他简要地总结了五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肯定成绩，也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且希望中央监察委员会今后“加强对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中的监督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各省（市）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主要是监督他们有无违反党的路线、政策、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朱德同志始终关心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对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对于党员干部违犯党的纪律问题的处理，朱德同志一贯坚持严肃慎重、分清是非轻重的原则，坚持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以党内教育为主，执行纪律为辅的方法，反对惩办主义，反对把人一棍子打死，朱德同志对我说过：处理党内同志的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错，使自己的同志受委屈。我们自己的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里，无论受到多么残酷的摧折和迫害，他都受得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敌人的残暴行为。可是在我们自己党内，如果处理不当，伤害了同志，那就会结下疙瘩，一时不容易解开，因为他觉得同志之间不应这样做。在延安整风时是和风细雨，审干搞错了的要赔礼道歉，这都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一定要

把工作做细，不要轻易处分党员，更不要作错误的处分。朱德同志这番话，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对犯错误干部“一要看，二要帮”和“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的方针，体现了对党员干部政治上的关怀，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在执行党纪方面党的优良传统，到今天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国初期，朱德同志同一个领导干部谈话，发觉这个同志有个人名位思想，便严肃地告诫他说：不要想做大官，要时刻警惕和约束自己：要当心啊，弄得不好将来会杀脑袋的哟！在“三反”运动中，这个同志的比较严重的铺张浪费等错误被揭发出来。朱德同志审阅了有关材料后，派我去调查核实，并嘱咐说：这个同志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有一定贡献，要按照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弄清他的问题，分别是非轻重作出严肃慎重的处理；他和刘青山、张子善、宋松贵这些人的错误性质不一样，要保住他的脑袋。经过详细的调查核实，这个同志的上级党组织对他做了必要的组织处理，并把他的下放到基层去锻炼。后来，这个同志接受了教训，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以后，又重新担负了领导工作，对党的事业继续作出贡献。

革命到底

朱德同志的晚年，是朝气蓬勃、继续革命的晚年，是革命到底的晚年。无论是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还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我都被他崇高的革命精神所感召。

1960年，我在上海工作。记得是春夏之交的一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老首长来了，还是住在过去住过的地方，他请你就来。”我明白是朱德同志到上海视察工作来了，马上赶去看望。老人家向我询问了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有些问题问得很细，要我讲真话，不要讲假话。我如实地向他谈了“大跃进”中的情况和问题。当我说到党的威信很高，群众对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干劲很足，但也确实交了一些“学费”时，他说，经验不足，会从中总结教训，改正过来的，很明显，他是在调查真实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同志对于林彪一伙和“四人帮”对他的诬蔑陷害，他处之泰然，表现了他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性。对林彪、“四人帮”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罪恶勾当，他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同“四人帮”一样，大搞“清君侧”，肆意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同志。他们以“战备动员”为借口，把八十三岁高龄的朱德同志“疏散”到广东。在抵达指定地点前的很长的一段路程上，汽车也不给一部。朱德同志泰然自若，昂首挺胸，迈开大步往前走，不减当年长征时的革命老英雄本色。走得实在累了，就在路边的树墩上坐一会，再继续前进。他老人家乐观豁达，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坚信不移。面对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种种迫害，他始终坚毅不拔，奋勇前进，把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踩在脚下。

1972年2月，我到北京时，前去看望朱德同志。那时陈毅同志逝世不久。朱德同志沉痛地说，“陈毅的确是个好同志，死得太早了！”“死得太早了”这几个字的语音特别低沉。我理解他老人家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把董老的《挽陈毅同志》诗给我看。我问他是不是也写了悼念陈毅同志的诗，他说：“要写的，还没有写好。”后来，一位同志把朱德同志《悼陈毅同志》的诗抄给我：

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

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朱德同志以短短二十个字，高度评价了陈毅同志的革命一生，也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妄加于陈毅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一位老同志告诉我，1971年夏天，陈毅同志作过直肠癌手术后，乐观豁达，一如既往，常常去看望朱德同志。二老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丑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战胜一切妖魔鬼怪，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果然，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以及“四人帮”丑类，都相继垮台、遗臭万年了。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英名永在。让我把一首写得不够格的诗，敬献给人人敬爱的朱德同志，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永远怀念。

巍巍峻岭一苍松，党国元勋著奇功。

功丰不伐归群众，德高不显矢为公。

挥戈直指三山倒，所向披靡五岳红。

革命坚持真到底，毕生学习务精通。

万险千艰等闲事，黑云浊雾仍从容。

宽宏大度如江海，交心献胆是英雄。

循循善诱培桃李，赫赫声威斥蠹虫。

斗张意志坚如钢，有理有节竹在胸。

亲干爱群群益尊，平易近人人更崇。沥血呕心创大业，推诚相见聚群龙。磅礴诗文传天下，高歌猛进贯长虹。英名朱总震寰宇，党指挥枪贯始终。忠于马列忠于党，忠于十亿主人翁。五五未终含恨去，四化宏图跃进中。熏陶教诲长铭感，高举红旗展东风。

写于1979年，改于1991年7月

寓伟大于平凡

顾英奇

1954年12月25日，翁永庆大夫带我去见朱德同志。当时，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调到北京才一个多月。这是我第一次去见全国人民敬仰的朱总司令，行前，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之感。及至见面后，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人民的公仆、群众的领袖。他俭朴的生活，敦厚的性格，朴实的谈吐，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我读到续范亭先生赠总司令的诗句“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时，深感其真实地描绘了人民总司令的风貌。

1955年7月12日，我正式到朱德同志身边工作，直到1965年10月15日离开，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我耳濡目染了他老人家的崇高思想、博大的胸怀、高尚的革命情操和模范的言行，亲耳聆听了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他寓伟大于平凡，于平凡中见伟大的品格，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艰苦朴素堪称楷模

朱德同志的美德之一是崇尚简朴。他一生和旧势力、旧观念作斗争，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谋解放，一生中过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我第一次见总司令时，只见他贴身穿的是一套浅蓝色丝绸面的丝棉袄裤，袄裤面已完全破烂，补丁挨着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一直舍不得丢弃。外边罩一套制服，照样年年穿它过冬。一直到1960年以后，这套棉衣实在无法再补了，才换了一套新的。朱总还有一双穿了多年的老式棕色皮凉鞋，颜色已褪落得斑驳不匀失去光泽，但他也总是不肯换新的。他老人家每年夏天叫卫士同志给拿这双鞋，有时风趣地说：“拿草鞋来”，同志们都知道朱总要的是这双凉鞋。直到1965年我离开时，这双鞋还在伴随他老人家过夏。1956年有一天，朱总司令向卫士郭盛魁同志要一套灰色吡叽料中山装。小郭说：“那套衣服两只袖子已经磨得破烂不堪，不能再穿了。”总司令坚持说：“补一补，还可以再穿嘛！”衣服补好后，他很满意，高兴地说：“衣服不怕它破，破了可以补上，洗得干净，这样穿起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外国人看了都好嘛！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做出榜样。”

1954年的一天，工作人员正在大扫除。总司令散步回来看见后很高兴，对大家说：“每个人都要锻炼，要能吃苦，有朴素作风。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的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旧习气不可能一下子除掉，沾染旧习气也很容易。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于满足的。”

那些年，工作人员为了保护朱德同志的健康，总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以保证营养。厨师邓林同志为此想了不少办法。而朱德同志为了这件事不知和邓林师傅谈过多少次话。有一次，总司令笑着问：“邓师傅是不是资本家呀？”邓师傅红着脸赶紧说：“首长莫开玩笑，我哪里是什么资本家呵！”总司令依然和蔼地说：“不是资本家，怎么那样阔气呀？不要天天都成席嘛，要吃家常便饭。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是吃粗粮、小（青）菜长大的，

身体也很健康。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一切从六亿人民出发，生活上不要太超乎人民生活水平之上。”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总司令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严了，减少了粮食定量，一般不吃肉食，并反复对大家讲：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要同他们同甘共苦，节约一点是一点，绝对不能铺张浪费。他真正做到了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共渡难关。

名重不骄 平等待人

朱德同志为国为民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建立了丰功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十分敬重他。而他自己一贯以普通老百姓的形象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从不居功自傲。他宽厚质朴，和蔼可亲，平等待人。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午饭时，卫士向总司令报告：“董老夫人何莲芝同志上午曾来看望康大姐，大姐不在。何大姐曾问到总司令，我告诉她：您正在楼上办公。她就回去了。”总司令听完后和蔼地对他说，“你这个同志呵，怎么能这样子待客呢？周公离现在已经几千年了，他是周成王的叔父，又是宰相，很谦虚。周公有时在一次洗头当中，三次握着头发接见来访的人；有时在吃一顿饭当中，三次吐掉口里的食物接见来访的人。这叫作‘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古人都讲谦虚，不搞官僚主义。你不让客人见我，就给打发走了。这样做，多不好呵！”总司令那种心平气和、循循善诱的态度和对来访者的谦虚诚恳、平等待人的精神，使在座的人都深受教育，深为感动，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到朱德同志身边工作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阅历浅，经验少自不待言，政治上、业务上也不成熟。朱总司令那时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从任何方面考虑，我们之间相差部极为悬殊。在近十年的接触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总司令既没有官气，也不摆老资格，甚至连年龄上的老资格也不摆。他对我这个青年人很尊重、信任和爱护。尽管他平时说话不多，但他用行动来说话，他对同志充满深厚的感情。十年当中，一些老首长和同志们都喜欢称呼我为“小顾医生”、“小顾大夫”。但朱总司令却一直亲昵地称呼我为“顾医生”，“顾大夫”。总司令这样郑重地对待我，我觉得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尊重的一种表示。在医疗保健方面，朱总对我的意见也很尊重，一有事总是说：“请顾大夫来”。听了我的意见之后，他总是说：“可以”，接着就照办。从来没有“在保健医疗问题上乱发表议论，自做主张。同时，他又不盲目听从，而总是在医生讲明道理之后，再接受检查或治疗。一旦接受建议，他又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到底。

1960年，我因血清转氨酶偏高，于2月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住院前我和康大姐、秘书、警卫商量好，请他们一定劝首长不要去医院看我；我出院之后，一个时期之内也不来接触首长。但是，在3月27日这天，朱德同志和康大姐突然一同来到我所住的北京医院东房子510室。东房子病房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从病房门进入室内要下十多级台阶才能抵达地面，行走很不方便，总司令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以七十四岁高龄，不避疫病，亲临探望，垂询病情，慈祥亲切，使我很受感动。病房的医生、护士和病友，也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朱总司令这样一位高职领导同志，竟能如此关心一位青年医生。当我目送他老人家的身影离去后，不禁想到，在这位

老革命的心中，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和多么深沉的友爱啊！

1962年，有一天康大姐来到我的住所，手里拿着总司令手书1961年3月3日的诗作“游越秀公园”一首，并转告说：“老总让我来看看你，他还送你一幅字留作纪念。”大姐还询问了我的情况。我深知，这是总司令和康大姐对我的慰勉。我们尊敬的朱德同志就是心中既装着对全中国人民的热爱，也装着对一般同志的关怀，这看似平凡，却又多么伟大！

朱德同志对我的关怀一直持续到最后。“文革”那些年，他经常向周围的人打听我。我知道这是怕我遭遇不测。为了使这位老人放心，我曾几次去看望他。

总司令的谦虚、淳朴、平等待人和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表现在各个方面又是贯彻始终的。他每次外出视察回来，都要征求随行工作人员的意见：“你们谈谈，我这次外出与人接触当中，有没有摆架子的地方？”出差在外地，凡离开一个地方，他都要向厨师、服务员、警卫道谢、告别。

总司令的崇高人格和道德修养，是我党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后辈永远敬仰、学习的。

襟怀坦荡 坚持真理

朱德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思想修养很好，实事求是的作风很突出，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上，都显示出他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可贵品质。

在我刚到总司令身边工作不久，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是1955年7月间，在一次健康检查会诊之后，总司令留几位医生吃饭。席间，有一位老中医发议论：“西医就是不科学，什么病都是一个治法，不懂得辨证。”大家听了他的议论，不禁愕然，但谁也没有讲话。这时，总司令笑吟吟他说：“老先生，我要批驳你的观点。科学是客观存在，你说西医不科学，如果不科学它就不会在二百多年里发展得这样快；同样地，如果说中医不科学，那就没得办法解释为啥它存在了两千多年。所以，中医、西医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们的道理。不能说我这个科学，你那个不科学。你们中医、西医要团结，要互相学习，将来我们中国医生在世界上，就是本领最大的医生！”朱德同志不是研究医学的，但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站在医学发展史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的高度，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而且坦诚直率，态度鲜明，使在座的中医，西医和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教育。

1958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吃大锅饭”，并且从一开始就被当作“革命的新生事物”肯定下来。

朱德同志对这种做法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经过一段充分调查研究之后，十分了解农民群众的真实想法，是不愿意吃“大锅饭”的，因为吃“大锅饭”否定了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巨大浪费，朱德同志不顾当时一边倒的形势和个人得失，在各种场合包括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坦诚地反复表达己见，直到致函党中央陈述自己的观点，表示不赞成这件事。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朱德同志找两位省委书记来谈话。当时，因秘书有事外出，便找我去做记录。在听了两省情况汇报后，朱德同志又尖锐地指出：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农民是劳动

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到错误地批判之后，有一天晚饭后，朱德同志要去看望彭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觉得这个时候去不合适，替他担心，怕他被牵连进去，因而进行了劝阻。朱总听了同志们的劝阻后，边踱步边沉思，最后还是以光明磊落的态度，义无反顾地去看望了自己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会议以后，朱德同志也受到了错误地批判和不公正地对待。但他总是坦然处之，虽遭非议而不悔，真是“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样宽。”

“文革”期间，朱德同志横遭林彪、“四人帮”的无耻诬蔑和打击。一时间恶浪滚滚，黑白颠倒，把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说成是毛泽东、林彪会师，“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甚至说他“连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面对魑魅魍魉，他总是淡然置之，既不动怒，也毫不气馁。对孩子们的询问也只是说：“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在那之后不久，有一次康大姐对我说，“他这个人的心胸是很宽宏的，人家说他连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他只是一笑，说这对别人一点损害也没有，只是否定了他自己。”我曾反复琢磨朱总这句话。是啊，历史是客观存在，谎言只能暴露说谎者是骗子，林彪的诬蔑，对总司令来说正如尺雾障天，无亏于大，寸云点日，无损于明。然而，面对那样的恶劣行径，能平静自如，知其必败，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

1966年12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偶感风寒，我去看望他。那时，北京城已经闹得翻江倒海，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可是总司令的家依然是那样整洁、朴素、宁静。当我进入办公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他的面貌和神情仍然是我所熟悉的，慈祥泰然，镇定自若，双目炯炯有神，统帅的威仪一如当年。他虽已八十高龄，又两年未见，并没显出多么苍老，只是头发更加花白稀疏了。听说我来了，他很高兴，他的笑颜淳朴而又富有感情。照例握手、让坐、吃茶，依旧闲话家常。这一切使我几乎忘掉了外边的严酷现实，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平静生活。他高若五岳，博如大海，置千军万马中而不惊，处崎岖坎坷而不馁。他当时那种迎异于常人的精神力量，至今令我钦佩。

革命到老 学习到老

朱德同志非常重视学习。他不但自己坚持学习，而且还帮助、督促身边工作人员学习。建国以后，朱德同志已进入老年，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激励自己。50年代，他常在工作之余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有时外出散步还带着书，中间坐下来休息时，就读一段。出差到外地也带着书，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他就读书。朱总读书很细致用心，每读必圈点，作眉批。每当中央向全党干部提出读书计划、读书目录，他就身体力行，带头按中央指示办，并要求他所在的党支部的同志都来学习。有时他自己制定选读计划，坚持不懈。60年代以后，他年事日高，自己读书越来越困难，就请身边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学习，两人读一段，讨论一段，循序渐进。我和另外几位同志都轮流和他一起学习过。这样，又读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那些年帮他读书最多的是护士

郭勤英同志。她同总司令不但读过许多马列经典著作，而且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常常是小郭给他通读，他给小郭讲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文章形成的过程，对当时革命进程所起的指导作用，以及对现阶段的重要意义等。总司令研读《毛泽东选集》总共有十多遍。

除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外，朱德同志还非常注意政策、时事的学习。60年代前后，他曾多次组织身边工作人员讨论当时中央的一些政策。在讨论中，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他自己则常发表一些精辟、实在、符合客观实际的意见。如1958年11月间，他就组织过《十五年共产主义建设纲要（草案）》的讨论。他发表了不少与《纲要（草案）》不同的意见，特别强调要根据条件办事，要有小自由，有自愿，有纪律，不要命令主义，不要强求一致，要提高而不是要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等等，其后，还组织讨论过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朱德同志直到晚年，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密切注视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自己不能看报刊，就让家里人或身边工作人员，把报刊上的重要消息和文章念给他听。

战士情怀 青春常在

朱德同志心胸豁达，步伐坚定，虽届高龄但充满活力。和他在一起，随时都可感受到他的进取心理，抗争精神，战士情怀。他志趣健旺，壮心不已，因而得以永葆青春。

朱德同志爱好相当广泛，第一爱好就是体育锻炼。他把体育锻炼视为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目的明确，决心很大。他常说：“要革命，就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是不能为革命作更大贡献的。”他热爱体育，但并不奢求条件，而是以最简朴的方式，求得最好的体育锻炼效果。

他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散步是一项重要的体育活动。每天早晚一定散步，有时工间休息，也要散步。他散步一般走得较快，七十多岁时，还是大步流星，两臂大幅度摆动，当年的雄风犹在。早晚散步后，要做自编的体操，以四肢、腰部、头颈及呼吸运动为主。寓体育于生活是朱德同志体育锻炼的一大特点。他在中南海居住时，住在二楼，每顿饭都要走出家门到另一座楼的餐厅就餐，每年夏天到北戴河也是住在二楼，到另一幢房子去用餐。在他七十岁以后，工作人员为照顾他生活方便，准备把卧室、办公室布置在一楼，这样他出入可方便些。当工作人员向他报告这一考虑时，他没有同意，曾风趣地说：“住在楼上，楼下吃饭，上上下下，强迫锻炼。”

爬山是朱德同志体育锻炼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他总要在星期天、节假日，或利用工作之余去爬山。在桂林市叠采山明月峰下的石崖上，镌刻着朱德同志和徐特立同志在1963年1月29日爬叠采山后，彼此唱和的两首诗。朱德同志赠徐老诗为：“徐老英雄，同上明月峰，登高不用杖，脱帽喜东风。”徐老少韵和诗一首为：“朱总更英雄，同行先登峰。拿云亭上望，滴水来春风。”那一年朱德同志七十六岁，徐老八十七岁。两首诗记载了两位老人登山的情景和壮志豪情，也留下了一段传颂千古的佳话。事隔二十七年，我们这些在场的人，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两位“登山健将”的勃勃英姿。

朱德同志从事体育锻炼，表现出强大的意志。他每年到北戴河海滨，都

坚持每天下海二次。他不只在晴空万里、风平浪静时坚持，在白浪翻滚、凉风夹雨时也坚持。有时，因下雨气温下降，水温低到摄氏十八度以下，大家劝他这样天气就不要下海了。他却戴上草帽，撑起雨伞，然后笑向大家，以热烈的口气说：“谁愿意去，走呵！”随即大步向海滨奔去。朱德同志坚持游泳锻炼一直到去世前的1975年，时年八十九岁。他那种藐视一切困难的决心，钢铁般的意志，高龄而葆青春的气势，永远激励人们前进。

朱德同志还喜欢书法。晚年，他每天午饭后，站立悬肘时写大字半个多小时，坚持多年而不辍，在我同他接触的十年中，朱德同志曾赠我三幅墨宝。除前述的一幅外，还有1963年为我和我妻子许奉生书写的毛主席《七律·长征》；另一幅是1964年为我书写的1941年自作诗《赠友人》。每逢我观赏这几幅字画时，就唤起我对朱德同志的无限怀念。

朱德同志还喜欢作诗、弈棋、养兰，以及戏剧、园林、花卉，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等等。总之，他爱好广泛，兴趣高雅，生活丰富多采。兴趣与爱好不是他的生活目的，而是用其锻炼身体，陶冶性情，以便更好地为革命工作，同时也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传统文化的高尚精神境界。朱德同志一直到最后，始终保持了春山不老，郁郁葱葱的状态。

革命到底 至终不渝

朱德同志在青年时代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寻求革命真理。自1922年投身共产主义事业，戎马倥偬大半生，为建立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皓首壮心，继续为国为民，奋斗不已。

他对祖国的山山水水充满着爱，对社会主义事业十分关心，对我国取得的每项成就都欢欣鼓舞。二十多年间，除在京工作、开会外，他经常外出视察，调查研究，不断地把所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报告，提出看法、意见和建议。今天看来，他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有些堪称远见卓识。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四面八方，而且绝大多数省、市都不只去过一次，少则二、三次，多则八、九次。对北京大大小小的许多工厂企业，包括一些手工业工厂，早在50年代他就视察过，到他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是不辞辛苦地进行视察，像首都钢铁公司，建国以来他总共去过二十多次。

他每次到外地视察，常以一地为出发点，然后向不同方向往返奔波。每到一地他就深入到车间、钻井台、采矿工作面、庄稼地、果园、毡包、牧场、垦区、军营、战士宿舍、工人食堂、农牧民家里，与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牧民、战士谈话、开会或探望。一天时间都在行车、飞行、视察、访问、开会中渡过。看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他的心情就十分兴奋，常常乐而忘疲。

1975年3月6日，朱德同志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以明志。这四个字充分体现了朱德同志一生的理想、奋斗和追求，全系于民族的自由解放，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幸福安乐，表达了一位革命者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境界。

正当“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周总理不幸逝世了，毛主席重病缠身。当时，朱德同志已经跨入了九十高龄，但他不顾年迈体衰，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主动要求增加工作，目的是希望减少毛主席的负担。他对国内、国际事务十分关心，对“四人帮”的疯狂叫嚣横眉冷对，态度非常鲜明。真是

“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的英雄气概不减当年。

1976年6月26日，朱德同志因重病住院，但他仍惦记着还有一次会见外宾的任务，直到秘书报告说，已另安排别人会见之后，他才放心。7月6日逝世前，他还不住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朱德同志一生为革命，忠贞不渝，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他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位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篇章。朱德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他的高尚品质，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万代子孙的心中。

1991年7月

对《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关怀*

成仿吾

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几十年中领导我们奋勇战斗的我们的朱总司令，是一位好学不倦，而且能深入钻研的老模范。他坚持地体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革命精神。

他在年青时代曾经参加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但是当他升到较高的领导层时，他感到不是正确的道路，而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毅然转变方向，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去取革命的“经”。

很快他就找到了革命的组织，并立即加入了在柏林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学习马列主义，他是学习的积极分子。在组织学习中他积极为大家服务，勤勤恳恳，从不嫌累，虽然他在同志们中间年长许多，但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1926年，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他参加了“八一”起义，在南下严重失败的危急关头，集合残部，经过顽强战斗，终于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成立了第一支强大的工农红军。从此，在几十年间他成为我们敬爱的总司令，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战斗与工作的剩余时间，总是以好读书、爱劳动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格外尊敬。

*本文是《永远的怀念》一文的一部分。

我从1975年初，根据中央批准，开始对马恩著作的中文译本进行校正，首先对我自己1938年从德文译出的《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校正工作（该译本曾经有人根据俄文修改过，这次根据1848年的德文原本，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进行了校正），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终于出版了。

1976年的5月18日，我把新译的《宣言》送呈朱委员长。他大概19日收到，20日就看了一遍。这本他很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号字他自己看，小号字由秘书念给他听。

21日的早晨，朱委员长的秘书要我接电话，说朱委员长要来看我。我请他转告，他九十高龄了，还是我去看望他。但很快我就接到回电，他一定要来。

果然，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按时来到我的宿舍。我向他表示歉意，是我应该去看望他，他笑了一下，立刻把话题转到我的《宣言》的新译本上面来。

他说：好懂，很好。他并且说明，若是不好懂，他是不能一口气看下去的。

他强调指出，这是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部经典著作讲的都是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得很清楚。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

他指示，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他还郑重指出，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

他还详细了解我有多少个助手，这个新译本花了多长时间。他指示还应该多培养几个接班人，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他就把我这里当个“点”，时常来。

当我问到他的健康情况时，他说，中央对他照顾得好，消化情况不坏，他还每天坚持带游泳圈在水里泡一泡。

在临别前，他指示我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保重身体，并着重指出，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我陪他坐车环绕校园看了一下，就和他握手分别了，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们敬爱的总司令，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和我们永别了。

在这短短的见面中，他对我的鼓励与教育是非常诚挚与非常深刻的。我对这一切都十分感动。但是我当时并不是完全理解他所讲的话的全部意义的。比如，对他所讲的，做好这个工作有世界意义这句话，当时我只觉得这是对我的工作过分鼓励，使我愧不敢当。后来我在工作中逐渐感到他的话确是真理。

1977年12月

朱总与我谈诗

臧克家

十四年前一个夏季的早晨，电话叮铃铃地响起来了。当我拿起听筒清楚了电话的来处时，快乐又紧张，平静的心胸像一池春水，被一阵东风吹得波浪叠起。

“朱委员长约您来谈谈，好吗？”

“什么时间？”我问那位秘书同志。

“明早九时好吗？”

“准时到！”我激动地挂上了电话。

这一天，我的思潮翻腾，想得很多，很远，整个的心在快乐的兴奋中动荡。想到1926年在武汉，就震于朱总的大名，那时，他是北伐革命军中有名的将领。后来，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关于朱总的革命伟绩和革命故事，我听到很多，令人钦敬，衷心向往。解放以后，在大会的会场上，在群众的集会中，我有幸多次见到朱总，距离虽然远远的，但心里觉得很贴近，明天，就在明天，我就要去会见崇敬、仰慕了几十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威名赫赫的朱总，心里怎能平平静静呢。

第二大早上九点，我坐车到了中南海。我的心，比车子跑得还快。

在门口招呼我的，大约就是昨天打电话的那位秘书同志吧。四十左右的年纪，穿一身褪色的灰色军装，口袋上插一枝最普通的自来水笔，一看样子，就是朴实的八路军风格。当他上楼通报的时刻，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心情十分激动。客厅很宽敞，但极简朴，没有什么陈设，沙发上的凉席，也像用过多年的了，洁白而素净。当我看到那个久已熟悉了的高大形象走下最后一级楼梯的时候，我自然而又肃然地立了起来，望着朱总满带笑容、略略放慢了一点步子走了过来。

朱总慈祥的神情，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话题是从诗开始的。

朱总说，在公余之暇，也喜欢读一点诗。自己偶尔也写一点。接着又谦逊地说：总写得不是很满意。接下去，朱总对诗的问题作了指示。大意是说，诗要表现战斗生活，为革命服务。不要写得大深奥，叫一般人看不懂，那样，就会失掉它的作用。诗应该通俗化，群众化，意思、语言，要朴素、明朗，叫人人看得懂，念出来，听得懂，这样，群众自然会喜爱它，不仅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

当时，我一面倾听，一面想，这和毛主席对文艺和诗歌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关心诗歌问题，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成为典范。现在有机会亲聆朱总的教导，心里极钦敬又感到很亲切。口里说的是伟大真理，但态度却那么平易，那么随便，好像并不是在作指示，而是在提出个人的看法，听取对方的意见似的……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了，”朱总把话题一转，“他们将出纪念集子，要我写点诗。”一谈起辛亥革命，朱总从平静中激动了起来，眼睛向上凝视，好似纷坛的往事，一齐涌现在心头。朱总心情愉快地畅谈当年辛亥革命的情况：云南起义，生擒总督。靳云鹏怎样逃走，钟麟如何被击毙。朱总带领队伍，打着红旗，戴着红边帽援助四川，到达自流井……朱总谈起这些历史上的伟大革命事件，像谈家常一样，满含热情，生动感人。谈到一些反动顽固

军阀被俘、被杀时，发出鄙视的嗤笑声，谈到自己在内的革命起义队伍，自然流露出亲切欣慰的情感。我听朱总生动的讲述，想到吴玉章同志写的《辛亥革命》一书中描绘的情况，真是心情激动，深受教育。使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崇敬与热爱了。这些领导同志，远在清末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意气风发，斗志凌云，推倒清朝，建立了民国，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又领导亿万革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缔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勋业比山高，却平易谦和，不自居功。我和这样一位历史上伟人对坐，听他讲述革命故事，也是在接受最生动的革命教育。

最后，朱总笑着把他为辛亥革命纪念册写的几首诗拿给我看，我严肃认真地拜读了。诗，朴素真挚，反映了革命历史，也表现出一个老革命家的真情实感（这些诗篇已选入《朱德诗选》）。这时候，我深深地以亲身经验印证：朱总的人，朱总的诗，关于朱总的种种赞美的传说，甚至关于跟随朱总工作的同志以及室内的布置，统一在崇高、朴素、平易、亲切这一总的印象之中。

谈话虽然只有一小时略多一点，然而印象之深却是无法比拟的。

另一次朱总和我们一道谈诗，是1962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这次谈诗是陈毅同志倡议，由《诗刊》社主办的。济济一堂，到了五十几位诗人，堪称盛会，至今我还珍存着朱总含笑的留影。

朱总到的很早，带着笑容走进“福建厅”，和我们亲切握手，随意叙谈。从温和的态度、快乐的表情中，透露出心怀的舒畅。与会的同志们心情都很激动。接着，陈毅同志、郭沫若同志接踵而至。

朱总首先讲话。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掌声落后，厅堂里静静地，静静地。朱总话音并不高，但声声入耳，深入人心。

他首先谈到，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得到了重大的发展。诗歌要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涌现出来的动人的真实事件。要真情实感他说出心里的话。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很好了。谈到个人，朱总说：自己时有所感，写上四句八句的，说诗不像诗。只是完成表现的欲望。愿意和各位写诗的同志们常见见面，多多交换意见。“我经常要拜郭老为师，当个徒弟，他就是不收。”

朱总风趣的话引得哄堂大笑，郭老站了起来插话：“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谈诗。”

又是一阵快意的欢笑，像春风鼓浪。

朱总谈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谈到现在写诗要注意从民族传统中吸取营养。深刻地阐发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去糟粕、存精华，对民族遗产批判继承的指示。

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联系到历史情况，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联系到诗歌的创作。最后，肯定了最近几年诗歌和整个文化运动的成就，鼓励大家好好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思想，继续向前迈进。

朱总，态度谦逊，热情诚挚，诙谐风趣，出语动人。他是那么崇高，又是这样平易。他是元帅又是诗人。

两次聆听朱总谈诗以后，在个别场合没有机会再见到朱总，但心里很系念，时时回忆到谈诗的情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到江南“五七”干校去锻炼，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心里为狂风暴雨中的苍松、清秋飘香的老桂，日夜悬悬。在毛主席生平照片展览中。我极喜爱的毛主席和朱总一起在一张

地图上共运心机、作决策的合影不见了。听说毛主席和朱总井冈山会师的历史真实被篡改了。我心里充满对朱总的怀念，充满了疑虑。林彪“571工程纪要”的暴乱阴谋暴露之后，一切都明白了。去了林彪，出现了“四人帮”。一些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领导同志，全成为他们打击，迫害的对象。全国人民都为这些年高望重的老同志担着一份心。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他们几十年来，为共产主义宏伟理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领导斗争，辛劳备尝。而今呵，在“四人帮”的毒雾下，窒息着，遭受着难以忍受的打击、陷害。在电视上，看到朱总和一些老同志向敬爱的周总理遗体告别时候那沉默而悲痛的表情，夺眶而出的老泪，人人心欲裂，泪如倾。而王、张、姚却以伪装的表情掩饰他们内心的狂喜。江青，狗头高昂，帽子也不脱。看到这情况，恨不得把这帮狗男女从银屏上扯下来斗他们一场！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也听到朱总挺身斗争的传说，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为朱总，为多年紧跟毛主席的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焦虑、担心，日夜不安。

痛悼敬爱的周总理泪水未干，朱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又相继逝世，噩耗像恶浪一而再，再而三地八亿中国人民袭来，而“四人帮”却暗中发出狞笑，馋涎欲滴地向无产阶级政权伸出毛耗耗的黑手，步步进逼，急于攫取……。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喜浪排空！悬悬的心，放了下来，雄心壮志，得以伸展。这时候，我们多么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怀念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总理和朱总呵！

在打倒“四人帮”、社会主义祖国以雄健脚步前进的声响中，在八亿人民热气腾腾干劲冲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怎能不殷殷缅怀它的缔造者、鼓舞者，老一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呢。朱总，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时代，从开国一直到逝世，几十年来，始终和毛主席一起，南征北战，艰苦创业，万苦千辛。从来不计较个人名位，乐观、谦虚，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又像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他地位崇高，品质高尚。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一个朴实、热情的诗人。我们想到他在井冈山的那条“扁担”，便觉得自己的肩头沉重！我们看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像繁荣茂盛的百花园，便想到老一辈革命家，披荆斩棘、破土下种、以汗水血水浇灌的情景，怀念、崇敬之余，自然会自问一声：你应该怎么样呢？

朱总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怀念的心思流水一般长。我不禁噙着泪水默默地想：我们本想朱总至少可以长寿百岁，体魄、精神那么健旺呵。我又退一步地痴想：朱总能够再多活上三个月也好呵。我今天只有把痴想换成怀念了。

朱总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朱总永远活着！他的事业，他的人品，他的诗句，永远、永远活在亿万人的记忆中，永远、永远！

写于1977年6月16日，改于1991年6月

朱德同志爱好书法

沈敏珂

朱德委员长很爱好书法。这种爱好，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他自己曾说过：我十年寒窗，只有三门功课，一门是“学而时习之”；一门是“天对地，雨对风”；还有一门是“永字八法”。这后一门功课，就是学习书法。

朱德同志从六岁入学到十八岁读私塾这段时间里，每天都要练毛笔字。他说：我刚开始写字时，名曰“描红”，其实是“描黑”。因为印刷的红字，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买得起，像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只好“描黑”了。他说的“描黑”，就是由老师以正楷在竹纸上写一首诗，名曰“字格”，学生将“字格”套在麻头纸内，依照映出来的字影描写。当时这种方法叫“写仿”。朱德同志的启蒙钟老师，给他写的第一篇“字格”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据朱德同志说：这种“字格”，大概一个月一换。

朱德同志学习书法，比较集中地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六岁到十八岁读私塾这段时间。朱德同志脱离“字格”之后，开始临帖，他当时临的是柳公权的《神策军碑》。

第二个时期，是从1916年到1920年率护国军驻军泸州这段时间。他在戎马倥偬之余，除练习书法外，还组织了“颐园诗社”，并且学会了打洋琴。据当时和他相处过的老人回忆，他在泸州时，学的是北碑。北碑，包括北魏、北齐、北周等碑：但不知他具体临的是什么碑。最近翻阅他看过的《广艺舟双楫》一书，发现他在《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高贞碑》、《崔颢墓志》、《西门豹碑》（隶书）等碑目上，部划有圈记。可能当时以一碑为主，兼学别样。1963年5月4日，朱德同志参观洛阳龙门石窟时，当地文物部门送给他“龙门二十品”一套，他看后十分高兴，说他曾学过魏碑。当天晚上在翻阅“龙门二十品”时，他边看边议论说：北碑——特别是北魏之碑，体裁俊伟，笔气深厚，隶楷错变，无体不有，所谓“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是也。到了唐宋时代，书法集南派之伟丽俊逸，北派之古朴苍劲，南北特点，兼收并蓄。

第三个时期，是全国解放后至1976年这段时间，朱德同志以学习黄庭坚的书法为主，偶而也阅写一下其他碑帖。他认为黄庭坚的字，肉丰而苍劲，态浓而意淡，巧藏于拙，秀出于伟。在黄庭坚的碑帖中，他最喜爱的是《戒石铭》和《幽兰赋》。《戒石铭》的正文大字，仅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连同后记，不过一百多字，但朱德同志对于此帖，经常临摹，并且是走到哪里就带到那里。《幽兰赋》系多幅长轴，悬挂于他的书橱之前，这也是他经常临写的黄字。由于朱德同志长期临摹黄字，所以他晚年的书法苍劲古朴，深得山谷笔意。

朱德同志对于书法，仅是业余爱好。因为他年届高龄，工作很忙，既要阅批各种文件，又要参加各种会议，还要看书学习和阅读报章杂志，同时还经常外出参观访问，所以他的时间是很紧的。对于书法，朱德同志的本意是：一是艺术爱好，二是休息脑子，三是活动筋骨腕手。因此，他练字的时间，多在午饭和晚饭前后，或者是在阅读书籍文件后休息之时。他每次练字的时间，大概在二十分钟以内。

朱德同志用的毛笔，大中小都有，但经常用的是长锋狼毫，这种笔产自

湖北，是董必武同志给他推荐的。此外，也常用“二纯羊毫”和“汉壁羊毫”。

朱德同志用的墨，系由安徽买来。警卫员每天都要磨墨，但有时也用墨汁。

朱德同志练字时爱用白麻头纸，后来因为这种纸不好买，改用黄表纸。练字时，将大张黄表纸裁为六开，然后按格书写（纸下垫有划好的方格）。

朱德同志的砚台有好几个。其中比较珍贵的有史可法用过的大方砚。但他最喜爱并且经常使用的，是朝鲜议会代表团送给他的雕龙方砚。这个砚台雕刻精美，前低后高。下有木座，上有木盖。遗憾的是，有一位同志磨墨时，误将热水倒入砚内，致使砚台中间炸了一条裂缝。

朱德同志到外地视察工作时，照例要携带“文房四宝”。他特制有一个扁木箱，将笔墨砚以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长方不同的格子内，并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纸张等放在上边。外出时，无论乘车乘船，打开木箱，随时可以写字。

朱德同志认为：纸墨笔砚的适当与否，对于书法的好坏关系极大。古人所谓“善书者不择笔”的说法，那是在书法上造诣极深的人的见解。其实，同是一个人，不仅用笔好坏，字态妍媸各异，就是用狼毫与羊毫，字形也有不同。在用墨方面，也很有讲究，墨浓则笔滞，墨稀则笔滑。可见，纸墨笔砚对于书法的关系不小。他抄过米海岳的一段话：“东坡谓：砚之发墨者必损笔，不损笔则退墨，二者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发一大笑也。”朱德同志认为苏东坡这段话，很有点辩证法思想，因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利弊相连，只能根据情况，两利择其大，两害取其轻而已。

朱德同志对书法原来就有较深厚的基础，但他直到古稀之年，仍然注意基本功的锻炼。我亲自看到，他对执笔的方法，就反复研究过。他对于《广艺舟双楫》中的“执笔第二十”，曾逐句圈点，一再研读。对于《仅溪书法通解》中的执笔图，曾按图练习过“拨镫法”、“平覆法”等方法。所谓“拨镫法”，即以五指紧握笔管，笔管紧靠中指名指尖，虎口间圆活如马橙，五指分别掌握抵、压、钩、揭、抵、拒、导、送，使笔管转动自如。所谓“平覆法”，就是双钩双挑，平腕覆掌，实指虚拳。食指中指谓之“双钩”，名指小指谓之“双挑”。因为掌覆，所以腕平；因为拳虚，所以指实。就我所知，朱德同志的执笔法，基本上是“平覆法”参用“拨镫法”。其他“握管法”、“单包法”、“拨镫枕腕法”、“平覆枕腕法”等，只是照图试过，并未经常使用。

朱德同志练习书法时，行笔较慢，一笔不苟。他认为缓笔定形势，忙则失规矩。匆匆作书，点画尚或失之，精妙又从何来？

朱德同志在书法上很注意结构。他认为汉字是方块字，总的精神要掌握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大字贵结密，小字贵开阔。如果结构不好，“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股。”1961年10月17日，他作了一首诗：

书法以精巧，用笔重结构。

字无百日功，人人学得透。

朱德同志认为，有了楷书的基本功，然后行书草书等，才能运用自如，才能做到：横如列阵排云，直如倒笋垂露，戈如百钩弩发，点如危峰坠石，牵如万岁枯藤，纵如惊蛇激水。他常引用张从绅的话说：“笔法不精，虽善

犹恶；字形拂妙，虽熟犹生。”

四

朱德同志认为初学书法时，当以一家为主，先形似而后神似，然后遍观各家之长，摘而临之，杨子云说过：“能观千剑，然后能剑”。如蜜蜂酿蜜，广采百花，香甜自成。这就是博采众长的意思。他对于一些书籍中独宗南碑如魏碑，很不以为然。对于讥颜真卿之“丰肥拙厚”，讽柳公权之“骨存肉削”，也认为是偏狭之见。他认为在书法上各代有各代的特点，各家有各家的长处。丰肥多浑厚。刚瘠显清秀。在他的笔记本上有这样一首诗：

杜陵评书贵瘦硬，
此论未公吾不凭。
长短瘦瘠各有志，
玉环飞燕谁敢憎。

朱德同志认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将随着汉字的不断改变而不断发展。他的意见是：汉字始于象形，从甲骨、钟鼎和籀字的体形来看，奇古生动，各尽物态。到了秦分（即小篆），裁构整齐，一变古态，到了汉分，削繁成简，形成隶体。到了汉朝末年，改觚为圆。由隶正之间，发展为真书。同时，行书、草书、飞白并出，盛极一时。

朱德同志认为，书法由繁趋简，这是大势所趋。“钟表兴则壶漏废”，是任何人也扭转不了的。因为繁难者人所共畏，简易者人所共喜。人心所向者荣，人心所背者衰。书法的发展，也不能例外。

写于 1980 年 7 月，改于 1991 年 7 月

朱委员长与兰花

虞佩珍

兰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花朵端庄秀丽，高雅朴实，具有独特的风韵，人们常以兰花寄托我们民族高洁、坚贞的性格，所以，兰花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

每当兰香飘逸的季节，我都会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中，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他那魁梧伟岸的身材，他那饱经沧桑的页容，和他那温和慈祥的教导，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戎马终生、运筹帷幄的总司令，竟和那深山幽谷中的兰蕙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因为兰花，使我这个普通的园林工作者和他老人家有了接触的机会。当兰花事业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更加深了我对朱德委员长的怀念之情。

50年代后期，我们中山公园开始种养兰花，他老人家经常来园观赏并指导。当年朱老总第一次来看兰花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一天，当听到他老人家要来时，我们几个同志急忙整理花棚周围的环境。在这以前，我们从未接待过这样高职位的领导同志，对这样一位为国家立下丰功伟绩的革命老前辈，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领袖，我们怀着敬仰、喜悦、兴奋而又有几分神秘、好奇的心理。当他老人家走下汽车的时候，我们又感到是那样突然，显得有些紧张拘束，手足无措，连一句问候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还是他老人家先解了围，边走边打招呼，面带笑容和我们一一握手，气氛顿时轻松下来。他细细观赏着每一盆兰花，对名贵品种，更是全神贯注，仔细端详，深深品味。在这不足五百平方米的兰棚下，他老人家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偶尔和我们交谈，介绍他自己的栽培经验。他临走时，嘱咐我们要养好兰花，多向老师傅学习。

从此以后，他经常来我园，每次花展他都不会放过。就是在他要离京到外地之前，也总是先到我们兰花棚下转一转，看一看，问问有什么兰花新品种可以送给人家，还需要带回一些什么新品种来。他不断地为我们作着兰花品种的交换工作。经他手给我们带来的有无锡的名种春兰，海南岛的“象牙白”，湖北鸡公山的蕙兰，四川的雪兰以及云南的“红舌头”等等，真是数不胜数。从而沟通了我们和全国各地的联系，为我园搜集兰花品种作了大量的工作。

朱老总看到我们有这样多江浙名种兰花，每次来园都谆谆教导我们要养好名种，发掘野生种。他把兰花既看作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又当作一种资源与财富。他不单纯要我们养好，还要我们争取出口，换取外汇。他要求我们普及兰花知识，让兰花深入到老百姓家，低价卖给兰花爱好者，人家养坏了用“以送口来，你们养好了再给人家，好好服务。当时，康大姐也在场，提出了异议，说人家是事业单位，怎么能不顾成本呢！大家哈哈大笑，在轻松的谈吐间，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兰花事业的关切。

一天下午，朱老总兴致勃勃地来看兰花。那时，我们的花房与花圃很简陋，连一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他老人家从四川青城山的野生兰花谈到江浙一带的名种，切磋养兰的技术，谈了好一阵，愈谈大家兴趣愈浓，使我们受益不浅。临走时，他邀请我和养兰花的师傅随他同车到中南海去看兰花。朱老总乘坐的车是苏联产的大吉斯，后座前有两个加座。他老人家上车后，亲自打开加座，要我们上车。那时，我还很年轻，第一次进中南海，又是坐着

领导的汽车，异常兴奋。中南海花圃的温室里，兰花种类非常丰富，有四：川的夏惠，广东的墨兰、银边大贡，贵州的野生种，无锡的名种春兰等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兰花千余盆，他老人家一一作了介绍和讲解，一片“兰”的海洋，真是大开眼界。

我们想养好兰花，但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其他省市也很少，可以从图书馆借阅比较完整的资料，只有一套日文版《兰花谱》，是30年代日本人小原荣次郎编著的。作者主要总结了中国传统养兰的经验，对我们很实用。当朱老总知道我们阅读日文有一定困难时，他想方设法请人翻译成中文，印发给我们。同时，还印发了《四川的兰意》、《我的芝兰生活》、《兰惠》等书，并分赠给杭州、四川、广州等其他省市。这些书，为我们对我国的兰花历史、栽培技艺及兰花文化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64年秋季，朱老总决定把他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都送给中山公园，这为我们公园兰花的发展，打下了丰厚的基础。多年来，我们对朱老总的鼓励与信任，始终牢记在心，精心养护着这些兰花，深感责任之重，情意之深。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花为媒”的故事顺便说一说，那是6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谦三先生，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与朱老总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来我园观赏兰花，并点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四个兰花名种。朱老总都一一答应了。

不久，松村谦三先生又回赠了几株日本杂交兰。就这样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为中、日建交开辟了途径。对这些作为友谊象征的兰花，我们非常珍惜。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离开了我们，但友谊之花仍年年开放，松村谦三先生的长子松村正直先生来京时，总要来看看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兰花，并对我们为养好这些兰花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朱老总不仅有丰富的养兰经验，对兰花的鉴赏也有较高水平。有一次，海南岛的“象牙白”正在开花，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是哪种兰花，朱老总就说：你们看，这像不像翩翩飞舞的海燕，咱们就叫它“海燕齐飞”吧！当时，在场的同志都觉得这花确实具有海燕飞舞的神采，这名字非常形象而且逼真。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把这种兰花称为“海燕齐飞”，以纪念他老人家。又有一次，“台兰”开了，这是一种一个花序上开好几十朵小花的多花兰，呈红褐色。他老人家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这花多像一群忙忙碌碌正在采蜜的小蜜蜂啊！于是，“蜜蜂兰”便因此得名。

朱老总对兰花的深情，确实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文革”中花卉作为资产阶级玩物的象征也蒙上了冤屈。我记得，1972年春节后的一天，天气很冷，他老人家又来到了花圃，花洞子阴暗，台阶的阶梯又高，我看他老人家身体较弱，深怕他跌倒，告诉他凡开花的都送展室去了，劝他别到花洞里看了。但他老人家出于对兰花的喜爱和对兰花事业的关切，还是高一脚低一脚地进了低于地面一米左右的花洞子，当他看到生长茁壮的兰花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地连说了几声：“好啊！好啊！”

“文革”后期一个“五一”节，他老人家突然出现在中山公园的兰圃。因为好久不见了，我们特别兴奋，互相问好。当他看到大部分兰花依然生长健壮，便面带笑容地鼓励我们说：“作为国家珍贵财富，要好好保护这些兰花。你们养护得好啊！”当时，我们长时间受到压抑的心情，不知有多激动。

当“五一”游园会的工作人员赶到兰圃时，我们才知道，朱老总是作为中央领导同志的代表，出席在音乐堂举办的节目庆祝活动的，老人家是特地忙里偷闲，来看望这阔别数年而又寄有深情的兰花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他老人家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有一次，我们要到南方去采集兰花，他知道后就告诉我们，在战斗的岁月里，他路经广东北部从化县一带的山区时，看到那里兰花很多。我们就遵循他的指点，到了从化县的小雨水等偏僻的山区。那里是次生林带，林下山溪所经之处都有兰花。我们几个在北方生长的人，真是开了眼，也顾不得长时间跋涉的疲劳和脚上磨出的水泡，伸手就挖，恨不得全部背回来，当然，这次是满载而归。他老人家看到后，给我们讲述当年战斗的历程。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兰花坚贞纯洁的性格，与朱总司令的革命乐观主义融成了一体。

在朱老总的身上，我们不仅学到有关兰花的知识及栽培技艺，更看到他老人家高尚的品德。有时，他看到心爱的兰花开了，想带回去多看些时间，常常很客气地询问：“借给我拿回去看看好吗？过几天再送回来。”说得那样认真。其实他老人家送给我们那么多兰花，拿回去几盆看看又算得了什么！弄得我们倒觉得不好意思了、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这不正反映出他老人家公私分清、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吗？！

又一次“五一”节，朱老总精神焕发地来到中山公园唐花坞。那天游人很多，为了使老人家能尽情地赏花，有的工作人员提出是否关下门，控制一下游容量。朱老总马上说不要关门，平时大家忙于工作，好不容易有个节日出来游玩，绝不能让大家扫兴。他自己也在群众的簇拥下，缓慢地边走边看。当他走到花房中厅时，一位游人发现了朱老总，大声说：“这不是委员长吗？”灯多游人前来和他握手，问好。不知谁带头鼓起掌来，游客们以敬仰的眼神注视着他老人家，朱老总对大家挥手致意，并抚摸身边的孩子们，谈笑风声。此刻，公园内顿时一片欢乐的笑声，大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为能亲眼看到这样一位可敬的领导而感到庆幸，感到这个节日是欢快而又有意义的。他老人在细小的事情上，也是为群众着想，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的。

1976年7月6日，朱老总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的心情无比沉痛，很长时间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前几个月他老人家还来公园看过兰花，怎么会这样快就离开了我们呢。直到我们接到布置遗体告别与追悼会场地的任务时，才如梦初醒。于是，我们用自己培养的鲜花，怀着对他老人家崇敬的心情，献上我们的一片敬意。我们精心选择了郁郁葱葱的龙柏、米针柏，象征他老人家的精神似苍松翠柏，永存于世。同时，还选了四盆他老人家送给我们的兰花和大量君子兰，表达对他老人家君子之风的崇敬。以洁白的东洋菊，色彩缤纷的绣球花、洋蝴蝶、扶桑等，环绕在他的遗体与遗像的四周，表示他永存在群众之中。

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但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却依然留在我的脑海中。近年来，我们的兰花事业迅速发展，我们和全国各产兰地区加强了合作，与日本、新加坡等国及台湾也进行了交往。今天，我们在留有朱老总足迹的旧兰圃原址建起了“惠芳园”，终年展出兰花。他老人家亲笔写下的“兰室”两个大字，高挂在展室的门额上。这两个字刚劲有力，浸透着他坚强的个性，也激励着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兰花事业。

1991年3月

永记父亲的教诲

朱敏

我敬爱的父亲朱德，生前非常关怀我们后辈的成长，经常以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和实践教育他的儿女子孙们：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要革命到底，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始终铭记在我们后辈的心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今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将牢记父亲的教诲，学习父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继承父亲的革命意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永记父亲的教诲，勤奋攻读 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几十年来，父亲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无论工作多么繁重、紧张，学习从不间断。他常对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一定要好好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父亲言教又身教，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光辉榜样。

1960年，党中央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学习三十本马恩列斯的著作，父亲立即带头响应。尽管这些书籍他早已钻研过了，有的还读过多次，但他还是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有时甚至在散步时也要带上书，走一会儿就坐下来读一段。从1960年到1966年，他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记下了十多本读书笔记。

对毛主席的著作，父亲的学习兴趣更浓。他常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而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路明灯。”“毛主席著作里写的事，许多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他先后通读了9遍，最后一次通读时，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父亲每读一篇文章，都要在题目下用红笔写下“×月×日读完第十遍”的字样。打开他读过的毛主席著作，就会看到他红笔划下的许多标记。

父亲不仅勤奋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议、指示、号召，总是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并作出了中央委员一年应有三分之一时间在下面的具体规定。父亲尽管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他对中央的这一规定带头执行，每年抽出许多时间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去调查研究，视察工作。他的足迹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寒风凛冽的北大荒，从风沙扑面的茫茫草原，到山青水秀的锦绣江南，到处都是他调查访问的场所。每次视察回来，他都认真地向党中央写出调查报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父亲不仅自己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循循善诱地教育我们子女努力学习。1950年前后，我还在苏联学习，每次回国度假，父亲总要问我是不是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由于我从小生活在海外，中文水平较差，学习毛主席著作有比较大的困难，父亲就戴上老花镜，让我坐在他身边，教我一字一句地读，他一边读，一边讲解，每讲完一段就问我懂了没有，如发

现我哪些地方还未理解，就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讲解，直到我真正弄懂为止。有一次，父亲给我讲解《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讲到文章中一段论述中国人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时，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少人都经历过寻找革命真理这段历史，多少革命先驱者甚至为此牺牲了性命，你们现在学习马列主义条件这样好，多幸福啊！你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1948年，父亲第一次见到嫂子赵力平时，送给她的礼物就是一本毛主席著作。1952年我结婚时，父亲送给我爱人的第一件礼物也是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

后来，我们兄妹都有了孩子，并且渐渐地长大了，父亲又开始教他们读毛主席的书。他不但给孩子们划出学习的篇目，提出思考的问题，而且还指导孩子们写读书笔记，他说：写笔记可以帮助记住文章的中心和重点，还可以锻炼思考、分析和概括问题的能力，也是既学政治又学文化的一个好方法。有时，他还检查孩子们写的笔记，哪个孩子没有写，他就严肃地批评说：“不写，一是怕写不好，丢面子；二是怕艰苦，贪玩。”在他老人家的引导督促下，后来，孩子们逐步养成了认真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记读书笔记的习惯。

星期日或节假日，一般是家人亲友团聚的日子。在我们家里，通常成了学习日。父亲说：“你们平时都有革命工作，凑到一起很不容易，要利用这个机会交流学习体会。”只要父亲在家，都是他亲自主持学习，从不间断。父亲还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他面前，让他们轮流领读毛主席著作，并让孩子们讲书里的意思，谈自己的体会。谁讲得好，理解得准确，就受到表扬；谁读错了字，他就马上纠正；谁讲得不对，他就提出问题，进行启发。在他老人家的引导下，孩子们的这种学习会每次都开得很认真，很活跃。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围着我父亲聚精会神学习的时候，我就油然想起当年父亲手把手教我读毛主席著作的往事。父亲言教身教，勉励我们勤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诲，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并世代传下去。

永记父亲的教诲，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

父亲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真心实意做人民公仆的一生。他一生没有任何嗜好，只知道工作、学习，学习、工作。永远是那样兢兢业业，永远是那样不知疲倦。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加珍惜时间，力争为党多做些工作。他每天睡觉很少，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到吃饭时也要再三催促才离开办公室。有的伯伯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我能做的事就应该努力去做，这样可以分担毛主席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借着吃饭的时候劝他：“您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的。”他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候，孩子们也说：“爷爷，您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严肃地对孩子们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共产主义我是看不见了，你们要不为名、不为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啊！”

周总理逝世后，他强忍着内心的极度悲痛，更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仅在他去世前的半年中，他的外事活动就多达数十次。父亲是要用加倍工作来

弥补我们党由于周总理逝世所受到的无法估量的损失，寄托自己对亲密战友的哀思！

1976年6月26日，父亲因病重不得不住进医院，直到这时，他还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按预先的安排接见外宾，接受外国驻华官员递交国书，虽被医生坚决阻止了，但他仍然惦记着这件事。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经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父亲一生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对我们后辈的基本要求，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十分耐心地教育他们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父亲和周总理也分别为雷锋同志题词，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父亲告诉孩子们：“雷锋同志在平凡的工作中培养了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意志，我们大家都要向雷锋学习。”这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父亲委托妈妈送给孩子们每人一本印有毛主席题词的日记本，在扉页上，妈妈还代表父亲给孩子们写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题词。在送日记本时，妈妈对孩子们说：“爷爷希望你们要像毛主席要求的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兢兢业业，学好文化知识，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要求你们把学习雷锋的收获体会写在本子上。”以后，父亲还不时地对孩子们的日记本进行检查批改。

孩子们长大后，父亲又教育他们“干工作不要挑挑拣拣，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干好。”我的二孩子刘康被分配到工厂工作，父亲知道后很高兴，对他说：“当工人好，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有饭吃，”“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说着，他又回过头亲切地问我的小儿子刘武：“你长大了去当农民，好不好，农业重要啊！你会做饭吗？现在就应该学会自己做饭，学会自己独立生活。”

我的大孩子刘建参军了。当他穿着新军装去看望爷爷时，老人家严肃地对他说：“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让你去养猪喂马你干不干？养猪喂马也是为人民服务，也要干好。”“不要在别人面前摆架子，不要当‘兵油子’。”有一次，父亲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看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林彪、“四人帮”掀起篡党夺权的妖风恶浪之际，父亲的锋芒所向是很清楚的，真是字字重千斤。

父亲还常常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早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我正在苏联学习并准备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服务工作。那时，父亲就很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希望我能学好本领回国参加建设。他在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百忙中，给我写了一封信，教诲我：“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当时，这封信我没有收到，是后来才读到的。当我读了这封信后，深深感到，父亲希望我能学到真本领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心情是多么深切啊！1948年，当我的哥哥朱琦转业到铁道部门工作时，父亲就嘱咐他：“你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你应该到

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才能学会管理工作的经验。”遵照父亲的教导，哥哥分配到了石家庄铁路局后，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司炉、司机。有一次，父亲坐的专列，正好是哥哥当司机，父亲便在车厢中接见了。当父亲见哥哥身着工作服，满身油污，便十分高兴地紧握他的手说：“好！好！你学会了开火车，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又说：“我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政治，技术上也要精益求精，不要满足现状，要谦虚谨慎，工作要更踏实认真。”

对于我们的孩子，父亲则要求他们从小努力学好文化科学知识。他不但教育孩子们要端正学习态度，而且经常询问他们学校里的教学、生活情况，有时还抽出时间亲自检查他们的作业，发现他们做错了或态度不认真，就叫他们重做一遍，找出错误的原因：看到他们的学习进步了，就加以勉励，提醒他们不要骄傲。

我的大孩子刘建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贪玩，学习成绩下降。一次考算术，得了59分。下课后，老师要留下他谈话，他又偷偷地溜走了。教师为了教育他，便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反映了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并且表示没有把孩子教好是自己的失职，实在对不起革命老前辈。父亲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把孩子叫来谈话。父亲严厉地对他说：“光想着玩，不学好文化知识，将来就不能为人民服务。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什么也不会干。当工人不会做工，当农民不会种地，怎么能生产出机器和粮食？你喜欢体育、美术是好的，但是别的功课也要学好，更不能上课画小人，坐在教室里还想着攀双杠。”孩子不大服气他说：“老师出的题我全会，这回是粗心了。”还说59分跟及格只差一分，老师为什么还要告诉爷爷？父亲耐心地对他教育，讲明道理，说清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差一分也是不及格。再说，难道及格就满足了吗？应该争取好成绩，老师批评得对，是对你负责，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一定要尊重老师。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多幸福啊，一到年龄就能上学，学革命道理，学科学知识，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困难。在旧中国哪有这样的好事情？我小的时候全家整年辛苦劳动，没有一个人读过书，后来东借西借，才供、我一人上学。那时上的是私塾，读的是古书。你们的老师多耐心，哪一个学生没有学好就着急。我小时候的老师对学生一不顺眼就打板子。”父亲的这番话，不但使孩子们明白了许多道理，逐步克服了缺点，就是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一定牢记父亲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图虚名，不谋私利，永远做人民的公仆。

永记父亲的教诲，严格要求 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父亲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要求十分严格，经常进行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教育，绝不允许我们有一点比别人特殊的想法和表现。在他老人家看来，搞特殊化是“万万要不得”的。

1953年，我从苏联回国参加工作，父亲就让我住到学校去，并一再嘱咐我：“要住到学校宿舍，不要老回家，要好好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学校家属宿舍还没盖起来，我便遵照父亲的要求，在学校单身宿舍住了4年，1957年才搬进学校分配给我的房子，至今我还住在这里。

1960年，我的大孩子刘建要上学了。开学那天，他背上小书包，换上干净的衣服，笑啊！跳啊！高兴得不得了。他知道学校离家很远，走出门就嚷嚷要坐小汽车上学。但出乎他的意料，等着他的并不是爷爷平时坐的小汽车，而是一辆三轮儿童车。孩子一见就嚷起来：“这不是四个轮子的呀！我要坐四个轮子的车！”父亲听到了，大步走出来，严肃而又和蔼地对孩子说：“你问一问王怕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坐过汽车吗？”拉车的老王同志说：“别说汽车，就连三轮车也没有坐过呀！旧社会我给有钱人家拉黄包车，光着脚跑遍北京城，可是还吃不饱肚子。”这时，父亲又亲切地对孩子说：“你要坐小汽车，别人的孩子也要坐小汽车，那要浪费国家多少汽油啊？你今天坐，明天坐，以后还能和没有汽车坐的小朋友在一起吗？你今天想坐汽车，明天想穿新衣服，你能爱学习吗？你坐了汽车就高兴，吃了糖果就舒服，你还能爱劳动吗？”孩子听了低下头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拍拍孩子的头说：“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下地干活，帮助妈妈做事了，你们多幸福啊，可不能变成小泥鳅！”孩子一听就笑了，周因的人也都笑了。以后，孩子们上到小学二年级，父亲就要他们坐公共汽车上学；念到小学高年级，又提出周末回家时不坐公共汽车，要求他们锻炼从学校走回家，并对孩子们说：“我当初刚到德国时，听不懂话，坐车没法买票，问路也没法问，我干脆出门就走路，口袋里放一本柏林地图，按地图去找，不到一个月，就熟悉了柏林的街道，以后办事也就方便了。”听了父亲的话，孩子们就坚持每周步行回家，星期日下午再步行回到学校去。我的两个堂弟当时上中学，学校离家二、三十里路，也一直坚持着步行往返。

在生活其他方面父亲对孩子们要求也很严格。孩子们的鞋通常是从军队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上缴的旧鞋；衣服总是大孩子穿了后再留给小的穿，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孩子从九岁起就自己锻炼洗内衣内裤，逐步做到生活自理。星期天，我们回到家里，父亲不仅要我们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让他们休息，还经常带着孩子们到地里劳动，学习刨地、下种、施肥、管理。父亲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热爱劳动，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现在不热爱劳动，将来就要厌恶劳动，就要脱离人民，你们可要从思想上重视劳动，向工人、农民伯伯们很好地学习啊！”

父亲和母亲多年来还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每年在春暖花开大地吐绿的时候，经常挖一些野菜给全家人吃。1962年，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一个晴朗的早晨，父亲和母亲散步回来时，又带回来许多野菜。两位老人的衣袖和裤脚都被露水沾湿了，满手泥土。但是，父亲却高兴他说要请孩子们会餐。吃晚饭时，桌上摆了几碟野菜。孩子们刚吃到嘴里就吐着舌头说：“这叫什么菜，多难吃啊！”妈妈指着桌上的野菜告诉他们：这是野苋菜，这是苦苦菜……然后说：“现在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很艰苦……”这时，父亲接过话，深沉他说：“这菜苦吗？这在野菜里还是最好吃的哩！长征的时候，我们连这样的野菜也没得吃，多少同志因为没有东西吃而牺牲了。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最后他要求孩子们：“以后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回家来就到大食堂吃饭，一点也不要特殊。”孩子们住校后，只在星期六回去看望爷爷奶奶。父亲又给他们规定：买饭时要排队，不能超过个人定量，不准超过一般人的伙食标准。

1969年，我的大孩子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

只有十六岁，第一次离开家。到兵团以后，组织上分配他去养猪。一次在他喂猪的时候，猪食撒了他一身。他一气之下，把桶一扔，跑回宿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家。父亲收到信后，很快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严肃地指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关系到青年人能否接好班的大问题，应该很好地在农村锻炼，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有丰富的知识，宽阔的胸怀，坚强的革命意志，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父亲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克服了怕苦、怕累、怕脏和想家的思想，工作积极了，热爱本职工作了，思想、工作、学习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我有一个侄儿原在海军某部工作。我哥哥去世后，有关组织考虑到父亲身边一个孙子也没有，就把他调到北京，父亲知道后很不高兴。一次，他见到海军的负责同志时，提出把孩子调到基层连队去，并严肃地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的坚决要求下，1975年侄儿被调到南京部队海军某部服役。调令下来后，正是农历除夕，孩子想在北京过春节，和他久未见面的妈妈团聚几天再去报到。父亲听了他的想法后，既严肃又慈祥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必须提高革命纪律性，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那里更有意思。”听了爷爷的话，他给在天津工作的妈妈打电话，希望她大年三十日上午能到北京，母子俩能见上一面。不巧，他妈妈因为开会不能脱身，等她乘夜间火车赶到北京时，孩子已经离开北京到部队报到去了。

我的另一个侄子也在外地部队服役。1976年6月，他回京探亲，看到爷爷的身体不如以前健壮，面容也消瘦了许多，心里不由得一阵发酸。他亲眼看到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带着病去的，回来以后一连几天病情仍不见好转。这时他的假期已经满了，他多想在爷爷身边再住几天照看他老人家啊！但是一想到爷爷平时抓紧每一分钟为党工作的情景，就好像又听到了爷爷要他们严格遵守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他知道，如果这时他提出留下来，爷爷是会生气的，这只会给他老人家的病情加重。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按时归队。当他去向爷爷告别时，父亲很高兴，对他说：“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工作。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的。你回去后，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你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不料，就在他归队途中，父亲住院了，等他赶回到爷爷身边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

敬爱的父亲就是这样时时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用党的纪律约束我们。而他老人家自己，事无巨细，处处为我们做出了艰苦奋斗，永远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建国二十多年来，父亲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俭朴作风。他每顿饭差不多都是一碗米饭、一小盘素菜、一小盘自己家里腌的泡菜，另一盘菜里几片肉，一小碗汤。他的衣着也很简单，几件较好的衣服只有接见外宾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服。他的内衣、毛巾都破到不能再补、无法再用时才换新的。他床上铺的褥子、床单，盖的被子也都用了二、三十年，上面打了不少补丁。他对我们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补补能穿能盖就行，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好多年。”

父亲不肯要任何特殊照顾，不愿让国家为他多花一分钱。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由于来往客人多，粮食亏了五十多斤。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父亲坚

决不同意。他坚持和全家人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所亏粮食补了回来。他用的澡盆比较高，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太大了，身体不灵便，澡盆又滑，容易出危险，几次要把澡盆放低一点，再按一个喷头，便于他坐着淋浴。但他始终不同意。他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再修又要浪费钱财。”直到1976年6月他住进医院，工作人员才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准备他出院后再接受他的批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父亲这次再也没有国家。

父亲曾经说过：“我是无产阶级一员。我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只有我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我只有两万元存款，我死后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确实，我的父亲生前虽然没有留下更多的财物，但他却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私、德高不自显这样高尚的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德，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永记父亲的教诲，革命到底， 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敬爱的父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直到病魔缠身卧床不起时，他心里想的也仍然是党的工作，国家的大事。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父亲极大的义愤！虽然父亲从来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在儿女面前提及不该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但是从他的言谈话语中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党和国家前途的焦虑。1975年，他曾写下了“真心搞马列，地覆又天翻”这一意味深长的诗句。同年3月6日，又用他那浑厚苍劲不减当年的笔触，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这不但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更是他对日益猖獗的“四人帮”的有力批判，可以想像，在他挥笔写下这些挫骨有力的字句时，他的胸中正掀起多么巨大的波澜啊！他曾坚定地对妈妈说：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军队是好的，是稳定的，谁要想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是必然要失败的。历史已经证明，谁违背人民的意志，必然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四人帮”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时候，父亲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是何等高深的马列主义洞察力啊！

父亲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以后，病情发展很快，但他还一直在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焦急。他对每一位前去探视的领导同志反复叮嘱：一定要大胆抓工作，一定要迎着困难，排除干扰，搞好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7月1日，他的病情变得十分严重，连说话都感到很困难了，医生要他绝对安静。但是，一清早他就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是‘七·一’，报纸发表社论了吧？拿来读读吧。”以后又提出要给他念书念文件。秘书为了让他能安静地休息一会儿，只好含着热泪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去了。于是，他又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使每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万分，无不泪流满面，一齐发出哽咽的声音。

7月2日，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突然间，病情又稍有好转，恰好我一个正在上大学的侄女赶来看望他。父亲见到侄女，示意要她靠近些，然后对她说道：“我们的大学生来了……要做无产阶级……”

“革命到底！”“要做无产阶级！”至今，我的耳畔还时时回荡着父亲轻微而有力的声音！这简短而闪耀着人类最崇高思想光辉的语句，是他老人家自己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是对我们后代的最宝贵遗嘱，也是对我们全体共产党员、革命人民的殷切鼓励和期望。我将永记父亲的教诲，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勇往直前！

编后记

今年12月1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一百零五周年诞辰。为了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和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道德情操，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回忆专集，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本书所收文章，从几个革命历史时期和不同侧面，回忆了朱德同志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反映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全书共收纪念和回忆文章五十五篇，其中大部分是应邀为本书撰写的新作。此外，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朱德同志的革命生涯，还选收了一部分已发表过的旧作。这些旧作在这次收录时，大都经作者重新审定。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何静修、李洪才、于俊道、姚建平、周中菊、王纪一。

《回忆朱德》编辑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